

目 录

第一章 最初印象	(1)
1. 突然的调动.....	(1)
2. “林办”的秘书班子.....	(3)
3. 初见林彪、叶群.....	(5)
4. 奇特的差使.....	(8)
5. 赵秘书传授“讲文件”要诀.....	(12)
6. 林彪的“规矩”.....	(13)
7. 叶群的“下马威”.....	(15)
8. 神秘的毛家湾.....	(19)
第二章 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	(22)
1. 旁观林小琳的遭遇.....	(22)
2. 罗舜初告急.....	(24)
3. 谁来关心军队的稳定?.....	(27)
4. 荒谬的整人逻辑.....	(31)
5. 此地无银三百两.....	(33)
6. 做贼心虚.....	(35)

7. 在各省、市委受到冲击以后.....	(39)
8. 毛主席是在赞扬林彪，还是在批评林彪呢？.....	(40)
9. 军委发布“10·5”命令前后.....	(42)
10. 叶帅痛斥“小老鼠”.....	(43)
11. 林彪和“拉条子”.....	(44)
12. 叶群和严慰冰.....	(47)
13. 鲜明的对照.....	(52)
14. “乱”到了国防部.....	(56)
15. “老军们莫要瞎议论”.....	(62)
16. 从批肖华到保肖华.....	(65)
17. 一次“紧急援救”行动.....	(68)
第三章 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	(76)
1. 林彪和军委“八条命令”.....	(76)
2. 叶群的“撒谎两重性”.....	(78)
3. 谁是“左派”.....	(83)
4. 沸腾的西山.....	(86)
5. 青海的枪声.....	(90)
6. 怀仁堂的怒吼.....	(93)
7. 风云突变.....	(95)

8. “此例不可开”	(98)
9. 林彪的“3·20”讲话	(100)
10. 老师们的困境	(102)
11. 看风使舵	(105)
12. 一份“反革命”匿名信	(108)
第四章 “5·13事件”真相	(112)
1. 一次破例的“接见”	(112)
2. 谁是“黑后台”？	(114)
3. 肖华求见难	(115)
4. 叶群的恶作剧	(118)
5. 醉翁之意不在酒	(121)
第五章 林彪和“武汉事件”	(124)
1. 江青火急见林彪	(124)
2. “寄希望于小将”	(126)
3. 武汉事件的起因	(127)
4. 得意忘形	(128)
5. 林彪请教戚本禹	(129)
6. 替罪羊	(131)
第六章 “杨、余、傅事件”始末	(133)
1. 危险的信号	(133)

2. 又一个迹象.....	(135)
3. 叶群大骂吴法宪.....	(136)
4. 林立果背后吐真情.....	(138)
5. 当面作人，背后作鬼.....	(141)
6. 故伎重演.....	(142)
7. 受害者的控诉.....	(145)
8. 可怕的自白.....	(146)
9. 居心不良的“关心”.....	(148)
10. 不光彩的“使命”.....	(149)
11. 林彪出场前后.....	(151)
第七章. 毛家湾与钓鱼台.....	(155)
1. “十一楼”的常客.....	(155)
2. 林彪与江青之间.....	(156)
3. 唯“老夫子”之命是从.....	(157)
4. 江腾蛟泄露“天机”.....	(159)
5. 一个神秘的文件包.....	(161)
6. 林彪与江青迎头相撞.....	(163)
7. 林、江之间的牵线人.....	(164)
8. 笑看叶群“挖墙脚”.....	(167)
9. 叶群说：“我要紧跟江青！”.....	(171)

10. 一出捧场戏·····	(172)
11. 又向周总理发难·····	(176)
12. “老夫子”诉苦·····	(179)
13. “螃蟹中有政治”·····	(180)
14. “不能为了一个军，丢了一个常委”·····	(182)
15. 令人费解的“炮打张春桥”·····	(184)
16. 叶群与康生之间·····	(190)
17. 明里一套，暗中一套·····	(192)
18. 左右为难的“拉条子”·····	(193)
19. 黄永胜出国引起的风波·····	(201)
20. 钓鱼台又出难题·····	(205)
21.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	(209)
22. 温玉成落选之谜·····	(215)
23. 假“搬家”·····	(220)
第八章 看林彪怎样“紧跟” ·····	(225)
1. 林彪的“特点”·····	(225)
2. 叶群的“语录”“像章”热·····	(227)
3. “紧跟”种种·····	(230)
4. 秘书“把关”难·····	(233)

5. 做作的“突出主席”	(235)
6. 林彪的题词热	(236)
7. 真与假	(240)
8. 表与里	(243)
9. 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246)
第九章 林豆豆的悲剧	(256)
1. 如此母女情	(256)
2. 叶群的“新发现”	(258)
3. 黄夫人为儿子求亲	(260)
4. “美男子”的梦	(261)
5. 派人四出选“佳婿”	(266)
6. 豆豆服毒	(269)
7. 又一道难题	(273)
8. 风波并未平息	(277)
9.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	(279)
10. 强加于人的“接力赛”	(282)
11. 谁摆布谁	(288)
12. 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	(291)
第十章 如此国防部长	(293)
1. 独特的“试验”	(293)

2. 林彪与核试验.....	(297)
3. 林彪手下的“叶推事”.....	(300)
4. 元帅与将军.....	(302)
5. 林彪的“战备热”.....	(305)
6. 林彪视察张家口.....	(308)
7. “一号命令”发出前后.....	(316)
8. 假戏真作.....	(320)
9. 叶群的一句话.....	(323)
10. 林立果乘机捞油.....	(324)
11. 外事活动中的国防部长.....	(329)
12. 林彪的“失常”.....	(330)

第十一章 “选美”记..... (334)

1. 假探亲，真“选美”.....	(334)
2. 林彪亲点锦州有美女.....	(340)
3. “三个在一起比比看”.....	(342)
4. 少女的“奇遇”.....	(345)
5. 有进无退.....	(347)
6. 江腾蛟“戴罪立功”.....	(348)
7. 悠悠广州行.....	(351)
8. 直言不讳的韩司令.....	(354)

9. 瞧瞧这一家.....	(357)
第十二章 “九大”后的林彪和叶群	(361)
1. 林彪“重上井冈山”.....	(361)
2. 毛家湾内的“黑人”.....	(366)
3. 叶群的障眼法和“学习热”.....	(369)
4. 林彪、叶群和历史学家.....	(373)
5. “大秀才”的遭遇.....	(375)
6. 门庭若市的毛家湾.....	(378)
第十三章 庐山会议前后	(382)
1. 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	(382)
2. 双方都在演戏.....	(385)
3. “摊牌”前夕的林立果.....	(339)
4. 庐山传来的火药味.....	(393)
5. 令人迷惑不解的沉寂.....	(395)
6. 林立果故意露“底”.....	(397)
7. 从膨胀到“收缩”.....	(399)
第十四章 脱离险境	(402)
1. 毛家湾“大查夜”.....	(402)
2. 令人作呕的“聊天”.....	(406)
3. 危困之际见知音.....	(409)
4. 妖形毕露.....	(409)
5. 以毒攻毒.....	(412)
6. 恼羞成怒，反咬一口.....	(415)
7. 趁势“下台阶”.....	(417)
8. 转移视线.....	(418)
9. “好离好散”.....	(421)
后记.....	(426)

第一章 最初印象

人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很多事情如过眼烟云，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唯有那人生的转折点，那令人感到或惊、或喜、或爱、或恨的人和事，那突如其来的事变，才会永远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对于我来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给林彪当秘书的那段经历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岁月不堪回首，但只要我想对往事稍作反思，那时的情景便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地重现在眼前。

1. 突然的调动

1966年8月17日。

我正在午睡，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干部处的刘处长。

“有事吗？”我睡意未尽，若有所惊地问。

“有事。”刘处长微笑着说：“你快穿好衣服。时间很紧。”

“什么事这样急？”

“刚才接到军区干部部的电话通知，决定调你到林副主席办公室去当秘书。军区要求，你今天下午先到沈阳，明天去北京报到。”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这位刘处长和我共事多年，

平时好和我开个玩笑。我对他的话表示半信半疑。

“这样的事情哪能开玩笑！”刘处长一本正经地说，“下午四点半有趟特快。你抓紧准备一下，争取乘这次快车赶到沈阳。”

这无疑是真的了。初听这消息，我心里蹦蹦直跳。给谁当秘书？——林彪！调谁去？——是我！我行吗？我在省军区当过政治部秘书、党委秘书，干这一行并不陌生。但是给中央一级领导人当秘书，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我得交代一下工作。”我愣了一会儿，向刘处长请求说：“明天再动身吧？”

“北京催得很紧，别拖了。工作不用交代了。”

我看看手表，已近下午两点。如果赶乘下午四点半的火车，确实时间紧迫。除了向妻子告别之外，再做什么都已来不及。老母亲患了脑溢血，正在本市住院。老父亲也在本市工作。两个女儿在幼儿园。还有妻子正怀孕，再过两个月就将分娩……唉，这些都顾不得了，工作要紧！

在沈阳，我受到军区曾副司令员的接见。这位副司令身材矮胖，态度亲切，既有一点大首长的威严，又给人以长辈般的温暖。他先是仔细打量一下我，然后笑着问：

“调你去给林总当秘书，愿意吗？”

“愿意。”

“这个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在林总身边工作，就等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这个你懂吗？”

“懂。”

曾副司令点点头。他接着介绍说，长征时，他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因此林彪很了解他。不久前林彪在大连休息，

叶群让他帮助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能“讲文件”的秘书。他责成军区政治部物色，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我。他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哪！”

曾副司令说的并不算夸大。后来我才知道，叶群为“林办”秘书的条件规定了不下十来条：不是林彪带过的部队，不能去选；在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北京高级干部中有熟人关系的，不能用；不会讲普通话的，不用；性格不随和的，不用；喜欢“多嘴多舌”的，不用；水平低的当然不行，但职级太高的也不能用；此外还有一般机要秘书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业务条件、身体条件，等等。条件如此反常和奇特，能够到“林办”当秘书的人选就寥寥无几了。

这样看来，我能够被选为不受林彪、叶群怀疑的秘书，还真是一种“荣幸”。

2. “林办”的秘书班子

8月19日早晨，我乘发自沈阳的快车到了北京。我先去国防部办公厅报到，然后由办公厅的宋处长领我到了林彪的临时住地——人民大会堂。

“林办在大会堂吗？”我有些好奇。

“不，”宋处长解释说。“林副主席的住地是毛家湾，林办也在毛家湾。因为天气太热，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临时住在大会堂，所以林办的一部分值班工作人员也在那里。”

人民大会堂这座宏伟建筑，我以前还是在电影和新闻照片中见过她的雄姿。万万想不到，这所党和人民最高级的议事和聚会场所，竟还是我即将去工作的林彪办公室所在！

下了汽车，我随宋处长上了几十级台阶，进了大会堂北

门。门口有佩带手枪的警卫战士守卫，里面也是层层设卫，但由于宋处长熟悉他们，因而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穿过宽敞的走廊大厅，又向右拐行几十步，宋处长上前轻轻推开一道门。我们进去后，觉得似乎是进了一座白天正在放映电影的电影院，眼前一片漆黑，所不同的是这里一片寂静。正在这时，室内右前方的一个房间开了一道门缝，射来一道光线，这才能够辨认出附近几个人的面孔。

“这是刚从东北调来的张秘书，张云生同志。”宋处长把我向室内的几位工作人员作了介绍。这几位工作人员，当我们进来时都是摸着黑坐在室内一个角落的沙发上。我非常纳闷：室内这么黑，为什么不开灯呢？没有光线，他们怎样进行工作呢？

“首长和主任起床没有？”宋处长问他们。我能听明白：“首长”是指林彪，“主任”是指叶群。我不明白的是：现在是下午四点多了，难道还有午睡不起床的吗？

“可能快了。”其中一位回答说。

宋处长又走进右前边那间刚开一道门缝、透出一道光线的房子，然后领出三个人向我走来。这是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阳地、赵根生、李春生。而前边和我见面的那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在这里值班的警卫干部。

“阳秘书，你们和张秘书谈谈吧，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宋处长对留着短平头、上穿白衬衣、40来岁的阳地说。

“好。”阳地点点头。

“我们有机会再唠。”赵根生、李春生两位秘书因为都有工作，回那间办公室去了。

宋处长走后，阳地和我坐在另一角落的沙发上，促膝谈

了起来。

“你来得好，我们这正需要人呢，现在有些拉不开枪了。”阳地首先对我到职表示欢迎，然后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从他介绍中知道：林彪办公室共有六名秘书。阳地是秘书兼林办党支部书记，主要精力放在支部工作上，经常在毛家湾“守摊”。赵根深是负责讲文件的秘书，李春生是帮助林彪看书的秘书，李文普是负责警卫工作的秘书。此外还有两名秘书——郭连凯、于运深，目前正在陕西农村参加四清。以前，林彪任国防部长时，大量的日常工作由军委办公会议在挡第一线，林办的工作量不大；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情况变了，林彪一跃成了主席的接班人，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也就显得空前忙碌起来。光说“讲文件”，赵根生一个人就忙得不可开交；没办法，叶群临时决定把在毛家湾“守摊”的阳地调来帮助应付工作。而阳地离开毛家湾，那里的一些事情上又没人管。因此我的到职，阳地一再说“正是时候”。

“首长和主任就住在这个大厅里吗？”我问。

“首长住在附近的浙江厅。”阳地说。“这个厅叫西大厅。”他又指了指右侧的几间屋子：“这个有亮光的，是咱们秘书的临时办公室。隔壁是间会客室，再隔壁是叶主任临时休息的地方。”

我还想接着向下问，阳地突然站了起来，低声说：“首长过来了，我们以后再谈吧！”

3. 初见林彪、叶群

我向大厅的另一端望去，见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漫步进

了叶群的临时休息室。我心里想：这人大概就是首长——林彪吧？

过了一会儿，只见阳地和赵根深在叶群住室与秘书办公室之间来来往往。秘书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也偶尔传来。西大厅的灯光顿时亮开了。这时才看得清楚：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厅呀！大厅呈长方形，长有四、五十米，宽有二十多米。长度的两端，由两扇高大的屏风挡在门口，一个屏风绘的是孔雀开屏，另一个屏风上是放大的毛主席手迹——《满江红》词。顶棚很高，除有一些很和谐的辅助灯光外，还有几个大吊灯：每个大吊灯都配有几十盏各种形状的小灯泡、灯罩，组成一团漂亮的灯火图案。灯光都是可以控制的，平时只开一两组灯，必要时才全部打开，那就会照得室内如同白昼。这个大厅，如果不是地下全部铺着地毯，不是厅内布置着一圈、一组式的几十个大小沙发，作个篮球场也是绰绰有余的。

一个身着灰色便装的人从叶群住室出来，又从大厅另一端的门走了出去。一望便知，这是刚进去的林彪。他脑袋光秃秃的，走路时慢条斯理，目不斜视，好象四周不屑一顾似的。因为离得比较远，又是侧影，他的面孔如何是看不清楚的。

接着是一个矮胖的女人从那间屋子向这边走来。这是叶群。这位叶主任，我在1963年首闻其名。那是在吉林省军区工作时，听说林彪在长春一号招待所“养病”，省军区首长经常去招待所关照，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位叶群。后来在《政工通讯》上，又常见叶群以传达林彪的“指示”为名，把自己摆在显要地位。但叶群其人如何，我还是这次来京前首次听说。有位“好心人”和我谈起叶群时，说她如何“谦

虚”、“热情”和“有水平”。那时我想，有这么一位主任作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倒是难得的。

“这是张云生同志。”阳地为我向叶群介绍说。

叶群毫无表情地扫了我一眼。她伸出手来，我以为是要和我握手；但我刚刚伸出手，她又马上缩了回去。我有些不愉快，心想：传说叶群“热情”，原来如此！

“你把情况给他介绍一下。”叶群对阳地吩咐说。

“我简单地介绍过一些了。”阳地说。

“叫老赵也介绍些。”叶群又说，“张云生的事情，主要是帮助老赵看看文件。”

“我可以回毛家湾了吗？”阳地请示叶群。

“回去吧。”叶群说。“那个摊子你要抓好，不能出事。你把各间房子都看看，把墙上挂的山水画都拿下来，换上毛主席语录。”

“首长房间的山水画也摘下来吗？”

“都摘！”叶群把牙一咬：“不管首长的，还是我的，一律摘下。首长号召红卫兵破四旧，外边都在破，我们却挂那些旧东西，叫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看了不好。不过，那些山水画都是些珍品，首长和我都很喜欢，摘下后要好好保管，不要弄坏了。”

他们一边说，一边领我进了秘书办公室。这原是西大厅的一间休息室，也很宽敞。左侧放着一张大型玻璃板写字台，上边摆着三台电话机。离写字台不远，放一张三屉办公桌，看来是临时添设的。两张办公桌子上摆着一堆堆待阅的中央、军委文电和其它各种文件。办公室的一端放着两张单人床，有现成的被褥，是给值班秘书休息用的。另一侧，放着几张沙发。摆设朴素简单，但比起我在下边单位看过的各

类办公室，还是阔多了。

“张云生！”叶群直接叫我，我一愣。“你刚来，先熟悉一下文件。”她又转过身去对赵根生说：“老赵，张云生的任务是帮助你看看文件。先叫他熟悉一下，不急于去给首长讲。他看后，选重要的给你，你去给首长讲。你抽时间给他介绍一下怎样看文件、讲文件。”

老赵说：“好。”

叶群和几个秘书一直在站着说话；她不示意，谁也不敢坐下。好在她很快就离去了，大家这才坐下，室内的气氛也一下变得轻松了。

4. 奇特的差使

赵根生是个热心人。他是河北人，三十七八岁，原是空军政治部政工研究处的副处长，1964年年底调来林彪办公室当秘书。他一直分工讲文件，口齿清楚，办事利落。我后来几次见他在叶群面前答对一些事情，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叙述一些情况，也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内心中，我对这位老赵十分尊敬。

老赵找了一大堆文件给我：“老张，文件多得是，够你看的了。你这次来，帮我解了围，不然我一个人应付这些文件，还有一些别的事，实在够呛。”

“怎么看、怎么讲呢？”我急于向他请教。

“看文件，这容易；讲好文件，就不易了。你先看看，熟悉一下。至于怎么讲，先不急，以后咱们再慢慢扯。实际上也不难，熟悉了就好讲了。”

我扒开文件堆，逐篇翻着看。老赵给我看的这批文件，

主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还有最近中央、军委的收、发电，全部标着“绝密”。我在吉林省军区任党委秘书多年，接触过中央、军委发至省军级的许多文件，但和我现在看到的文件相比，其内容的重要性和机密性就差得远了。

我埋头看了两天多，总算是把老赵让我看的那堆文件看得差不多了。积存的文件尚未全部看过，新的文件又一批批接踵而来。有些重要文件看过一遍记不住大意，还得再翻上一遍、两遍。怪不得老赵叫苦，一个人担负这么重的工作量，是够他呛的。

我正在看文件，忽见老赵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通知我：“老张，首长要听听你讲文件！”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讲什么？怎么讲？”我突然听到说林彪要我去讲文件，心顿时紧张得嘣嘣直跳。

老赵见我有些紧张，赶忙帮我解围。他说：“首长可能是想见见你，试听一下你讲文件怎么样。你找两份比较简单、好讲的文件，赶快看一下，讲几句就行了。”

什么文件既简单又好讲，我一下也辨认不出来。还是老赵帮我从新来的文件堆里翻出两份动态性的文件，一份是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电讯，另一份是外交部编印的《每日要闻》。两份文件都是外电对北京“八·一八”大会的反应。

老赵说：“就讲这两份吧。一是比较短，也比较好讲；二是有关于首长的反应，首长比较注意；三是最新的动向，与我过去讲的不重复。我不多啰嗦了，你抓紧看看，记住大意，讲明白就行了。”

这两份文件我都看过，因为现在又要给林彪去讲，我又认真看了看。照老赵教的办法，在文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下面划了几道铅笔线，以便讲时参照。

“行了，去讲吧。”我站起来想走。很奇怪，我刚才还是那样紧张，现在即将临阵，竟又镇定下来了。

“你注意，给首长讲文件，只能讲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首长听后会由于紧张而出汗，那就砸锅了。”

老赵向我叮嘱这些话时，态度十分认真，使我毫不怀疑万一讲不好会有“砸锅”的危险。但说林彪听人照念文件就会“紧张”、“出汗”，我难以相信。不过为了尊重老赵的劝告，我初次上阵，还应尽量避免“砸锅”为是。

老赵领我到西大厅叶群临时用的休息室，既不报告，也不敲门，很随便地就把我领进去了。一进门，就见林彪和叶群都在这里坐着。

“张云生同志来了。”老赵报告一句之后，就自动退出去了。

“一〇一，这是新从东北调来的张秘书。”叶群坐在里边的沙发上，微笑着向林彪介绍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叶群摆出笑脸；过去两天，她在工作人员面前一直冷冷地板着脸。她管林彪叫“一〇一”，我觉得很奇特，但后来听她总是这样称呼林彪，工作人员们都习以为常了。

林彪坐在左边的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由于离得很近，我这次可算把林彪看清楚了。他的模样，和平时在报纸上看到的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新闻照片中的林彪都是带着帽子，现在看到的林彪却是头顶秃光。虽已脱发，两耳后侧和后脑盖以下，还残留着几根头发。由于常年不见阳光，面色是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张云生秘书是东北人，说话容易懂，是我托曾思玉帮助物色的。”叶群的用意是叫林彪先不要讨厌我。她继续对

我说：“张秘书，你讲几份文件，让首长听听！”

“我想着重讲一下外电对北京八·一八大会的反应。”

我说。

“好。”林彪点点头。

“8月18日，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消息，外电反应很强烈。”我尽量沉住气，压慢语调；语言全是文件上的，但尽量显得自然，显得不是在照念文件。“外电普遍注意的是三点：一点是出场领导人名单的排列。首长被排在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我们报道时又称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外电认为这是表明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电也很注意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十位，认为他现在开始失宠了。第二点，很注意首长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表明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也是掀起对毛主席的新的个人崇拜。第三点，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后的动向。认为中国现已确立毛林体制，决心利用红卫兵，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运动。法新社说，毛主席发动红卫兵运动，等于是把一艘航船驶向怒涛滚滚的大海，有可能破浪前进，也可能被大海淹没……”我讲了几分钟，就收口了。

林彪听后立即表示：“你讲的我听得懂。还有什么吗？”

我说：“没有了。”听林彪说“听得懂”，我想大概不会“砸锅”了。

“你多大年纪？”林彪大概高兴了，竟和我唠起家常来。听老赵说，他平常是很少和工作人员闲谈的。

“三十四岁。”

“身体怎么样？”

“没有病。”



“能睡觉吗？”

“能睡。”

“能睡觉，这是很难得的优点。到底是年轻人，我就不行了；一天睡不了几小时的觉，离开安眠药就不行。”林彪一反他平时沉默寡言的习惯，看来今天很有兴致。

“好，你讲的我能听懂。”林彪又一次重复说。

叶群明白了林彪的意思，对我说：“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老赵赶忙过来问：“怎么样？”我说：“首长说能听懂。”老赵说：“太好了。那就说明，首长是满意的。你不知道，当个秘书，这第一关是不好过的。尤其是第一次讲文件，首长如果不满意，就再也上不去了。”

叶群突然走进来，脸色与过去不大相同。她显得特别热情，开口叫我“小张”，虽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叶群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小张，首长说对你讲文件很满意。现在咱们人手少，老赵一个人忙不开，我看你从明天起就正式上阵吧！”

5. 赵秘书传授“讲文件”要诀

从8月22日起，我就开始“上阵”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进入高潮，有关这方面的文件、电报和参考资料特别多。林办每天收到的各方面的文件差不多平均上百份，多时达二三十万字，少时也有二十万字。

“文件这么多，怎么讲得完呢？”我向老赵请教。

“都讲不可能，只能选重要的讲。”老赵说。

“我看都很重要。怎么办呢？”

老赵笑了：“重要中还有更重要的，不可能同样重要。比如关于人物，涉及中央或省级以上干部的，就比一般干部更重要；关于事件，涉及全党、全国、全军的，就比局部的问题重要；关于动向，涉及某种新的趋势、新的苗头的，或有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就比一般动向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可以不讲；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

“一天讲几次，一次讲多长时间？”

“现在首长一天最多听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半小时怎么够？为什么不可以多讲一点？”

“首长说他身体不好，时间多了吃不消。现在一天讲两次，这就不容易了；若在过去，……”老赵讲到这里停住了。他面有难色，似乎不好再向下讲了。

“我看首长的身体和精力还可以呀？”

“不行，怕风、怕光、怕出汗……”

我也不好再问了。但一天国内外大事这么多、这么重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内把几十万字的文件讲完，这怎么可能呢？

我和老赵又作了进一步分工：我上午讲，着重讲“文革”动向；他下午讲军事和国际动态。这样，我每天都得奋力把当天的文件看完；实际上，有些文件只能“一目十行”，有的甚至只能看个标题了。

6. 林彪的“规矩”

林彪住在大会堂浙江厅。这个厅呈方形，足有大半个篮



林彪一边听一边踱着步，手里摆弄着一盒特制的高级火柴。

球场大。厅内布置得很别致：地毯是浅绿色的，沙发是浅绿色的，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色的。林彪怕光，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加上地毯、沙发、帷幕反衬，整个厅内都象被浅绿色沾染了一样。

我第一次进浙江厅，是林彪的内勤叫我去的。这是规矩。除有特殊情况外，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让内勤临时去叫。内勤不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来。特别是林彪正在吃饭和吃饭后半小时以内，是不能和任何人谈话的，更不能听讲文件。为什么？因为据说如不这样，林彪就会“出汗”；而林彪一旦“出汗”，那责任是谁也担当不起的。

我进了浙江厅，见林彪正在厅内踱步散心。我向他敬了个军礼，他示意我坐下，而他自己却仍然踱来踱去。

“以后你们来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

既然林彪让我坐下，我只好遵命，然而他却仍然立在那里。

我讲着文件，林彪还是踱来踱去。他一边听，一边踱着步，手里摆弄着一盒特制的高级火柴。他擦着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着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就扔在了下边。然后他又擦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的火柴杆已有几十根了，然而他还在继续擦。

我心中不由地想：“这位首长真怪！”

……

7. 叶群的“下马威”

刚到林办工作的头些天，我的心情异常兴奋。然而没过

多久，从叶群给我的“下马威”开始，我的那种兴奋感就荡然无存了。

在大会堂值班的秘书，属老赵最忙。我是个新手，一切都还摸不着头脑，除了看文件、讲文件外，叶群有什么事也不找我。另一个秘书李春生，是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分工帮助林彪看书；他的担子倒不重，但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叶群很少用他，他对别的杂七杂八的事也插不上手。这样一来，好多事就靠老赵了。老赵除了负责讲文件以外，还得应付电话、迎来送往以及处理叶群临时交办的一些差使。老赵一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常常不能在叶群面前讨好。叶群不斥责几句，这就算“表扬”了。弄得不好，叶群动不动就给点颜色看，不用说老赵，别人也跟着吃不消。老赵深知叶群是难侍候的，但他还是尽力把一些事情办好，免得引起“主任发火”。虽说如此，岔子还是难免的。

一天下午，老赵告诉我：“等一会儿，李讷来见主任，我去接待一下。你在办公室看文件、听电话；如果有事离开办公室，叫春生听电话。办公室千万不能离开人。”

“李讷是谁？”我问。

“主席的女儿。这是贵客，我得好好安排一下，万一有个不周到可不得了。办公室值班的事，就得靠你了。”

“你去吧，我值班。”

老赵走后，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办公室来。他脸色紧张，眉头紧皱，一开口就是：“真糟糕！”

我问他：“怎么了？”

“李讷要走，没车了！”

“车呢？”

“糟糕！”老赵顾不得回答我，拿起军委一号台电话后

急促地叫：“九七五，快！”他是打电话给毛家湾的林办值班室，让阳地赶快派一辆汽车到大会堂来应急。原来，李讷来时坐的钓鱼台的小汽车，被叶群打发回去了。叶群把李讷留下来，想和她好好聊聊，然后用自己的专车送她回去。叶群的汽车司机恰巧在这个时候出外加油去了。李讷要走时，叶群的车还没回来，可把老赵急坏了。幸亏老赵从毛家湾火急调来了一辆车，这才把客人送走。

我插这个空，想给叶群报几份文件。这些文件反映的都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动向——有些省委正在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原是准备给林彪讲的，但林彪说他“出汗”了，只好先报叶群。不料，叶群这时正在心情不顺，我便成了她发泄怒气的对象。

“有什么事？”叶群见我走进她的休息室，冷冷地问道。

“有几个省委正在受冲击，我想报告一下情况。”

“我不听！”叶群两眼一瞪：“我不管它冲击不冲击。我管不了那么多，这些事你向首长报告去！”

“首长有些汗，暂时不能听。”

“他不听，你想把球踢给我呀？我不管！”

我看风头不对，转身想退出来。

“你别走！”叶群拦住我。“我有事问你。李讷的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我在值班室值班。车的事不是我安排的。”

“你说什么？”

我又重复一句：“我没管车的事。”

“你是干什么吃的？！”叶群顿时火冒三丈。她恶狠狠地盯着我：“你就没责任吗？你是秘书，不是做客！你不要有临时思想！你为什么不和老赵把李讷的车安排好？这叫

失职！你知道李讷是什么人吗？”

“我知道。”我争辩说：“我确实没管车的事。”

我这一争辩，叶群几乎跳起来了。她破开嗓子大叫：“你不管就有理了吗？不管就是错误的！不认错是错上加错！你有临时思想更是错误的！”

我还想分辩几句，被内勤小林圆过去了。小林说：“主

任在逃，不能怪别人。叶群同志，你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应该负起责任来。”

说你什么，你不能解释，不能和她争辩。你越解释、争辩，她对你越火，因为她认为你是不尊重她，不服从她。何必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老赵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虽然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但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也确实不能不注意。久而久之，我也慢慢“适应”了。你叶群耍威风，我“惹不起躲得起”，避开锋芒，忍辱负重。真的，何必自讨没趣！

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叶群在工作人员中间经常散布说：她到了“更年期”，因此好烦躁。她的意思是：她不管怎样训我们、骂我们，不管她怎样霸道，请我们都不要见怪，因为这是“更年期”带来的生理现象。

“我这还算好的呢！”叶群在高兴的时候，常到秘书办公室来为她自己的恶劣作风辩解。“我听说有的家属到了更年期，骂人、打人，光暖瓶就摔了十多个。我对你们也不好，但还不至于这样。人到了更年期，有什么办法呢！”

叶群离开办公室后，我脱口说了一句：“我也到了更年期，可是跟谁发火去！”

“小声点！”有人在旁警告我：“这叫主任听到，还得了？”

8. 神秘的毛家湾

林彪在大会堂住了一个多月，于9月中旬回到毛家湾。

“啊，这就是毛家湾！”我早已知道林办秘书办公室也在毛家湾，但到职后这些天一直在大会堂值班，所以对毛家湾这个地方感到很神秘。我就是到了毛家湾，并且在这里工作了几年，那种神秘感也没完全消失。

毛家湾，位于北京西城区皇城根附近，是两条不太显眼的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两条小巷中间，夹着几个大的院落。中间的院子，是林彪、叶群的住宅。两侧的院子，是林办秘书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后边有个小院，是林彪一家的厨房和储藏库，还有几间供工作人员临时居住的平房。林、叶住宅的东侧院，“文革”前是一家医院，“文革”后医院被迁走，住上了林彪的警卫中队（林办秘书室办公室后来也迁入此院的一座楼内）。院内东南角的一幢二层楼，原来是医院的门诊部，后来成了林办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原来林办秘书办公室西侧和工作人员宿舍的东侧，还住着十几户居民，后来也被全部“动迁”。这样，前毛家湾和后毛家湾两条小巷中间，被用一道高高的灰色砖墙围成一体，其中院中有院，院院相连；院内的房子也有内廊相通。从此，“毛家湾”也就成了林彪、叶群住地的代名词。

毛家湾大院内究竟有多少房子，内部装饰如何，连我也说不清。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常去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里边林彪占用四间：一间作卧室，两间作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学习室”。林豆豆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此外还有什么电影放映室、藏书室、文物室、台球室和叶群的游泳池等等。听说还有“战备地下室”，我连问都没敢问过，就不用说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和是什么样儿了。

毛家湾大院的门特别多。前毛家湾就有三道门：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住地的门，林彪、叶群出入住地也从此门通过；五号门，因改成林彪的

车库，早被堵死；七号门是林办秘书室办公室；九号门，是锅炉房。后毛家湾还有两道门：一道是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叶住宅的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办公室。大院外的四角，昼夜有全副武装的哨兵站岗；每道门内侧都有武装警卫。所以尽管院大门多，也就不必担心什么安全问题了。

毛家湾内工作人员知多少？听起来并不算多：秘书有六人（阳秘书、赵秘书不久后被调离，又调来一名张秘书，李文普后改为警卫干部的职务），林彪贴身警卫人员二人，林彪内勤二人，叶群内勤三人，医生二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汽车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二十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作诗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像的、作文章的、“找人”的，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毛家湾的一切，对外“绝对保密”。由于叶群有令在先，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守口如瓶”，就连对自己的亲属子女也不准透露半句。难怪我的家人后来看过我写的这篇回忆录，说：“谁信！”

第二章 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几乎把中国大陆上的每个人都卷了进去。大多数的人们莫名其妙，少数人乱中渔利。许多人在蒙昧的状态中参加了这个派、那个派，到头来成了恶梦一场。

我呢？我什么派也不是。然而，由于我处在高层政治圈的特殊岗位上，见到和听到的也许比普通的人们多一些吧！

1. 旁观林小琳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成千上万，林彪前妻生的女儿林小琳也是其中之一。令人意想不到的，加害于小琳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林彪和叶群。

“老赵，你看小琳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赵秘书谈到了小琳。据她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小琳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两派的观点严重对立。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的“左派”，而林小琳参加的“八·八战斗团”是“老保”。叶群听到这些风声，为了表明林彪和她是站在“真正的左派”一边的，就开始在小琳身上打主意。

“我也没办法。”赵秘书应付着说。

“小琳太不象话！”叶群继续发牢骚：“她的‘八·八’团是个保守组织，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还以为 是 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们才不支持她呢！”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谁让他把小琳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我这个后妈更不在她眼里。但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

叶群自言自语地在那里絮叨着，老赵在旁听着，一直不吭气。我是新秘书，自然不能多嘴。

“我想用首长名义向哈尔滨发个正式声明，”叶群继续说：“我说个大意，老赵记录一下，然后整理好，我再找首长商量去。”接着由叶群口授，老赵作了记录。不等老赵整理好，叶群就拿它找林彪去了。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回到秘书值班室，对老赵说：“我和首长一讲，首长非常生气。首长同意发个声明，但嫌我们搞的这个语气还不够，还要加重。”于是叶群又说，老赵又记，最后形成了一份大约有半页纸的《林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

叶群走后，我问老赵：“首长声明小琳一贯反对他！是这样吗？”

“谁知道！”

“为什么说小琳一贯反对首长呢？”我还是忍不住问。

“照首长现在的地位，他这一句话就能置小琳于死地。不用说父女之间，就是对一般人也是不能轻易这么说的。再说，用公开声明这种方式，一下子捅到社会上，凭首长的身份，

这样做好吗？”

老赵也不满，但他不吭声。

很快，由于叶群的催促，林办通过国防科委的渠道，把林彪的公开《声明》传到了哈尔滨。不出所料，这份《声明》在哈尔滨引起了巨大震动。它被到处张贴，“八·八团”也由此在几天之内被摧垮了。

“小琳还是不服，越发不象话了。”叶群不知从哪里得到这种消息。她又一次来到秘书值班室，对老赵说：“首长说一句话，‘八·八’团就完蛋了；可是小琳到处宣传，说首长的那个声明是假的，是对立面组织捏造的。她还在闹，吵吵要来北京找首长，那还行？我这个人是一不做，二不休，反正首长已经正式表了态。”她吩咐老赵：“你给我要个电话，找吴司令，找……”

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林小琳被骗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去了。这个差使，是叶群指派一个林小琳所在单位的上司承办的，吴法宪奉叶群旨意派了一架专机，由那位上司坐着去哈尔滨，向小琳欺骗说她的父母让接她回北京。小琳信以为真。但是她坐的飞机一经升入云霄，就掉头奔向西北的大沙漠了。那里附近几百里人烟稀少，原来是个国防科研试验场，几乎与外界隔绝。当小琳发现自己受了骗，再想以大哭大闹来摆脱这难以接受的流放生活时，已经无济于事。

这罕见的伎俩，是叶群自作主张呢，还是林彪亲自下令干的？林办的工作人员谁也不得而知。

2. 罗舜初告急

我在太会堂值班，除了看文件外，在电话上第一个与之

打交道的是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

罗舜初来电话，要找叶群。我去报叶群，叶问：“谁？”我说：“罗舜初。”叶群摇摇头：“不接。”我刚要走，叶群交代：“你就说我不在。他有什么事，可以对你们秘书讲。”

罗舜初没办法，只好对我说：“那就请你转报叶主任吧！我希望得到林总的指示，我自己确实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接着报告说：“几天来，国防科委门前一直坐着一群学生。他们自称是‘北航红旗’的，一定要我们把赵××交给他们去批斗。赵是我们科委的一个局长，曾经在不久前担任过进驻北航的工作队队长。学生们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因此非要揪他不可。我们考虑，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耐心向学生们做工作，对他们说明情况，但他们根本不听，坚持要揪人，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开始，人数不算多，而且只是静坐示威；现在参与静坐示威的人越来越多，从静坐发展到了绝食。有些娃娃已经绝食几天了。我们派人给他们送饭吃，他们坚决不吃。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出问题；若真的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也担当不起。究竟怎么办好，希望给我们指示。”

我把罗舜初报告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我请教老赵：“这类电话如何处理？”老赵说：“先报主任。”

我去报叶群。她漫不经心地表示：“我管不了，你去报首长。”

我又去报林彪。林彪独自一人在大会堂浙江厅里踱着步，见我进来，停了下来：“有事吗？”我说：“罗舜初同志电话报告个重要情况。”林彪似乎有些兴趣，向我近处走

来：“什么重要情况？”我把罗舜初的电话内容复述一遍。林彪没等我讲完，就转过身去，又去踱步。

“罗舜初同志希望得到首长的指示。”我说。

林彪头也没回，继续踱着步，吝嗇地吐了几个字：“不用答复。”

事过两天，罗舜初又来电话报告，说绝食的学生有增无已，有的学生身体瘦弱，开始有些支持不住了。罗舜初不放心地问：“我前天报的情况，你向首长报告了吗？”我说报告了。他又问：“有什么指示吗？”我说没有。他又叮嘱说：“请你务必把我今天报的情况再报一下，好吗？”我说：“好。”

由于叶群不爱理睬这类电话，我又直接去报林彪。林彪听后还是不表态。我非常着急，但又无能为力。

以后，罗舜初又接连来了几次电话，一次比一次口气紧迫。据他报告，已发现几个绝食的学生晕倒了，正在抢救。我见报林彪也不得答复，又去报偶尔来大会堂查看的叶群。叶群嘟囔说：“罗舜初不该老是把球往这里踢。绝食的学生一旦出了事，还想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呀？别想好事！”她似乎又是带搭不理，但这次却把电话记录要了去。自言自语说：“你推，我也会！我去找老夫子（陈伯达）！”

当天晚上，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她到大会堂，一进门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让在值班的我和老赵看。我见纸上写着火柴盒般大的几个铅笔字；很明显，这几个字是出于两个人之手。上边的几个字稍大些，写的是：

“交出赵××”。

下边的几个字稍小些，但字迹端正：

“如果学生打死赵××，陈伯达愿意抵命。”

叶群得意地对这几个字的来路作了解释：“我把球踢给了老夫子。他开始不愿管，我说不管不行；你如不管，学生饿死了，你负责！老夫子架不住我将军，于是拿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她指着那张纸：“这上边，是老夫子的亲笔字；这下边的几个字，是关锋替老夫子写的。”

叶群向我们显示过她“踢皮球”的本事之后，收起那张纸，见林彪去了。她离开大会堂前，对我和老赵说：“首长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桥前自然直。对于那些告急电话，不必过分重视，横竖天不会塌下来！”

“罗舜初再来电话怎么办？”我向叶群请示。

“有了老夫子这张条子，他不会再来电话了。”叶群说。“我去答复罗舜初，请他交出赵××，支持学生造反。怎么搞的？罗舜初跟首长这么多年，还这样胆小怕事！”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事后听说，罗舜初被迫把赵××交给了北航的学生，接受批斗。赵××免不了要受到各种凌辱、体罚，精神上、健康上都受到了严重损伤；但他确实没被学生打死，因此“陈伯达愿意抵命”的空头支票也只不过是一句笑谈。绝食的学生由于获得了胜利而趾高气扬；“北航红旗”也由此而一举出名，成了北京城内响当当的“左派”！

3. 谁来关心军队的稳定？

8月下旬的一天，我险些闯下大乱子。

这天晚上，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军委常委准备开会，讨论一下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请你报告一下叶主任，如果林副主席不能出席，最好请她来参加一下。另外，开会地址选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请你预先

通知一下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把会场准备好。”

这个电话是我接的，可我却把它忘在脑后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肖华主任突然来到大会堂西大厅：“我想见见叶群同志。”

“您请坐，稍等一下。”我让肖主任坐下等候，赶快去向叶群报告。这时才猛然想起：上午九点开军委常委会的事，我还没报叶群；新疆厅的会场，我也没告诉有关人员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这样大的漏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以前工作向来精细，为何现在变成这样“马大哈”？

叶群正在浙江厅与林彪闲谈。为了不露破绽，我先向叶群报告开会的事，

“肖主任报告，今天上午开军委常委会，讨论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肖主任说，如果首长不能出席，最好请主任参加一下。”

“我不参加。”叶群不加任何思索，就断然拒绝参加会议。“我不到会就不承担责任。”

“肖主任到了西大厅想见见主任。”

“他不是要开会吗？怎么又要见我？”

“他们开会在新疆厅，现在时间还没到，想必是顺便来到这里。”我解释说。

叶群马上站了起来，对林彪说：“肖华既然找来，我得去见见，你就不用见了吧？”

林彪摇摇头：“你见见就够了。”

叶群去见肖华，我赶紧去布置新疆厅会场的事。新疆厅与西大厅离的很近，就隔一道走廊。说是布置会场，实际上就是召唤大会堂工作人员把锁着的新疆厅玻璃门打开就行

了，厅内开会用的桌子、沙发椅齐备，又敞亮，又干净。

我回到西大厅，正赶上叶群送肖华出来。叶群当着肖华的面向我布置说：“张秘书，等一会儿新疆厅开会，你去参加一下，作好记录，回来向首长汇报。”她又转向肖华说：“肖主任，我看这样就行了。林彪同志相信你，我也支持你！……”

根据叶群的指示，我首次列席一次重要的军委常委会。我于九点准时去会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我们现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叶帅宣布会议开始。“今天的会主要讨论一下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肖华同志最近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汇报会上作了一篇讲话，对当前运动形势作了估计，对今后应当怎么办提出了意见。讲话的记录稿已印发给大家。肖华同志建议军委讨论一下，如果同意，就将他的讲话发下去，以便各军兵种部队有所依据。”

叶帅讲到这里，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参加会议的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以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都在翻着一份用八开纸印成的肖华主任讲话稿。

“我先说说。”贺龙元帅首先发言。“肖华同志这篇讲话，我已看过两遍。我认为他讲的一些问题都很重要。讲得也很好。我同意转发。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了，需要加强领导。开展‘四大’的单位，要做到既搞好运动，又不耽误工作。现在不搞‘四大’的单位，要保持绝对稳定，不准把部队搞乱了。这些肖华同志都讲了，我认为就应当这样办。”

聂帅接着表态：“我同意转发。”

徐帅也表示：“可以吧！”

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人持不同意见。

“那好，这个问题就这样定。”叶帅最后做结论：“我们都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建议以军委名义转发全军。这件事还需向林副主席请示一下，如果他同意就早些把文件发下去。”

散会后，肖主任嘱托我，“你回去后，把今天大家讨论的情况向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报告一下。我的那份讲话记录稿，已送林办两份，你们看后给林副主席详细讲讲。我的意见是，争取早点发下去为好，因为各单位都在催促，军委应当有个态度。”

回到西大厅，我把军委常委开会的情况和叶帅的最后结论，肖华的嘱托，向叶群做了汇报。叶群听后显得很不高兴，冷冷地说：“肖华的那个讲话，用不着你们给首长讲，我和首长说说就行了。他们开会都表示同意，有的人又评价那么高，首长还能再说什么！？首长也不敢擅自作主，这样大的事得报主席……”

叶群的不悦之色以及她所做的一番表白，使我摸不着头脑；她是对肖华的讲话不满呢？还是对“有的人评价那么高”有些嫉妒呢？

不久，叶群亲自拿着肖华的讲话稿，请林彪批上“送主席阅”，把此事推给了主席。

又过了两天，肖主任来电话问：他的那篇讲话给林彪讲了没有？林彪表态了没有？我只好告诉他：已由叶群亲自向林彪讲了，林彪已将讲话记录稿批送主席阅，主席还没把文件退回来。

时间不长，肖主任又一次来电话问。我只好打电话给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问他关于肖华讲话稿的下落。徐秘书很快把文件退给了林办。在文件的左上角，徐秘书用铅笔标明

“已送”。这说明，此文曾送主席。但主席阅过没有？既不能断定，也不便再问。

“主席没有明文批示，首长不好表态。”叶群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如果肖华再来电话问，你就说要等主席有了批示后才能答复他。”

就这样，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采取的一项稳定部队的重要措施，被林彪、叶群以“等主席批示”为借口，无限期地压了下去。

4. 荒谬的整人逻辑

1966年8月25日，总参发生了“炮轰×××”的大字报事件。大字报由一个总参下属部门的全体人员联合签名，自然是为了响应“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受了社会上思潮的影响，也是在执行林彪关于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的指示。殊不知，这一张大字报很快被林彪、叶群所利用，成了整倒贺龙元帅的开端。

“一个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轰总参领导人，这件事真稀奇。”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自言自语地念叨说：“我看他们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你们看呢？”

赵秘书不敢吭声，我更摸不着头脑。

叶群走后，老赵对我说：“看来要抓后台了。对这种事，我们可千万要慎重。不管主任说什么，我们宁可装作听不懂，也不要参加议论，是非太大。”

过了一阵子，叶群又过来念叨：

“×××部的大字报，肯定有后台。后台是谁呢？……”

我和老赵严守一条戒律：任凭你叶群念叨去，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决不搭腔。然而我心中也在琢磨，叶群在打谁的主意呢？

这几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宋处长经常到大会堂来。他有时和在西大厅值班的警卫人员聊聊天，有时也到秘书办公室坐一坐。他作为警卫处长，对林彪的安全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对于他的出出进进，我们都习以为常。

叶群此时对宋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每次见到他，都热情地打招呼：“老宋，你太辛苦了。你对工作这样认真负责，林彪同志和我都很感谢你。……”由于叶群十分热情，宋处长见了她也就更加毕恭毕敬。

有几次，叶群把宋拉到西大厅的另一端。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次谈话后，宋来到秘书值班室。

“张秘书，给我找些纸，找支毛笔，砚台……”

“你要练毛笔字吗？”我问。

“不！叶主任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表情严肃，但有些激动。

“什么任务？”我想问一句，但话没敢出口。如果是在下边工作，遇有这种猜谜的事，我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嗜好；但在这个是非之地，我不能不小心谨慎些。

宋拿着我给他的白纸和毛笔，自己又从旁处拾来一张小长桌，在西大厅正中间的一侧，作起文章来。我觉得好笑，一个拿枪杆子的人，今天居然在那里操着毛笔，作开文章了。

宋一连忙了两个大半天，把写好的两份材料分装在两个敞口的信封里，直接交给了叶群。

事过数日之后，我才得知，宋在那神秘气氛中所写的东

西，都是揭发所谓贺龙问题的材料。

这时我和赵根生也才明白：叶群一直在念叨的那个“后台”原来就是指贺龙。

贺龙想干什么？林彪、叶群认定，贺龙想夺权！其根据就是××部的那张“炮轰×××”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部长××带头签名的，而××是“二方面军”的，是贺龙的老部下，如果没有贺龙的支持，他有那样的胆？他炮轰×××是想夺总参的权，而总参的领导是林彪所信任的，这是贺龙想夺林彪权的一个信号。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贺龙既然把手伸向林彪，不就等于伸向毛主席吗？……

林彪、叶群整贺龙，就是用的这个荒谬的逻辑。

5. 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那么几天，叶群忙得团团转。她亲自坐车去空军、海军；她亲自打电话给装甲兵、工程兵、炮兵和二炮的个别领导人；她亲自在大会堂召见北京军区某负责人……紧接着，就从空军、海军、装甲兵、北京军区等单位转来一封封“绝密件”，上写林彪或叶群亲收，由于标有“他人勿拆”，这些绝密件都直接送到叶群手里。

这些绝密件都写的什么？我后来知道，这都是揭发所谓“贺龙问题”的。

“张秘书，这些材料你给保存一下。”叶群把一叠厚厚的文件给了我。“这都是经过主席圈阅的文件，内容非常重要，都是些珍品，可不能丢失了。”

我接过文件，简单翻了翻，大约有十多份。每份文件的开头都写着“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席”上面画了一个工整的圆圈，“林副主席”四字则用红油笔圈上。一份文件有三四页和五六页的不等，信封都一律别在文件的后面。……

“这些材料你可以看看，因为对你们秘书是无需保密的，但绝对不准泄露出去。”叶群坐下来继续说：“对一个人真无法看透，想不到贺龙竟把手伸得这么长。……”

我又翻了翻这批材料，翻到中间，我发现有两份是宋××写的。

“这里还有宋处长写的材料呢？”我觉得好奇，不由地冒出了一句。

“那是宋××自发地写的。”叶群说。“宋××是做警卫工作的，经常到反帝路17号去。他是忠于主席和首长的，见有不正常的事，写信向首长和主席反映情况，这很自然。但他写这些材料完全出于自发，没有任何人预先向他布置……”

听到叶群公然扯谎，我觉得可笑。我想直冒一句：“宋××几天前向我要纸写材料时，说是要完成主任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明明是他奉命而写，怎么能说他是自发的呢？”我偷看老赵一眼，他在旁绷着脸，一声也没敢吭。我也把眼皮搭下，翻着那些揭批贺龙的文件……

一天，叶群为了掩人耳目，特意把宋××叫到秘书值班室，当着几个秘书的面，问宋：

“你写的那些揭发贺龙的材料，是真的吗？是，我们就上送；不是，我们就不送。”

宋××神色有些紧张地答：“是。”

“你不害怕打击报复吗？”叶群又装模做样地问。

“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什么都不怕。”

“好，你可以回去了。”叶群打发走了宋，立即请我们三个秘书（赵根生、李春生和我）联名就叶群与宋这段对话写个证明。大家推我整理成文字，叶群看后不满意，又口授了一大段话加在上面，用意不外是证明宋××写材料是自发的。

我对叶群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把戏十分反感，但又不敢公开反抗。事过之后，我偷偷在那份所谓证明材料的底稿上加了一个小条：“此材料是根据主任（叶群）口授写的，修改处也是主任让加的。”这个底稿和小条将存在档案里，请未来的人们去作评断吧。

6. 做贼心虚

1966年9月上旬，林彪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说是奉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打一下“招呼”。林彪说，有“证据”表明，贺龙有野心，想在军内伸手夺权。他列举了总参的大字报以及驻京一些军事机关发生的一系列“炮打”事件，说这都与贺龙有关。

林彪讲话后，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很惊讶。

林彪召开这次打“招呼”会，军委常委委员大都到场，唯独没请贺龙参加。贺龙渐渐发现自己的处境反常，想找林彪当面谈谈。由于主席说过对贺龙的方针是“一批二保”，林彪对贺龙的求见无辞拒绝。但这一下，可把叶群吓坏了。

“老李！”叶群找李文普。“贺龙要来见首长你说怎么办？”

“他要来，就请来呗！我负责接待。”李文普回答得很

轻松。

“宋××说，贺龙家里有支小手枪。他来见首长，会不会带枪来？”叶群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对枪炮的事毫无主意。在这样的事情上，她在认真地请教李文普。

“一个元帅有支小手枪不算奇怪。他带枪不带枪我可说不准。”

“那他要带枪来呢？”叶群有些紧张。

“带枪来也不新鲜。”李文普还是那样满不在乎。“不过这样高的首长，一般自己很少带枪。随身警卫那么多，自己带枪有什么用！”

“我问你，如果他真的带枪来怎么办？”李文普越是轻松地回答，叶群越是心急火燎。“他如果是带枪来借和首长谈话的机会，不会向首长开枪吗？”

“主任尽开玩笑！”李文普笑着说：“那怎么可能！”

“你这个李文普，太天真！”叶群面孔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说：“首长召开军委常委会，就贺龙问题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风的墙吗？贺龙想见首长，准是为这事来的。他一定恨死了首长，见面后动了火，谁能保证他不先动手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首长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错，怎么向主席交代呢？……”

叶群的一番话，把李文普脸上的笑容驱散了。他听说贺龙想夺权的事，但并不相信它是真的。他了解叶群的为人，深信这一次又准是叶群小题大作的结果。他对叶群神经质般地担心贺龙可能向林彪开枪的说法，觉得实在可笑。但他是负责警卫林彪的，在林彪安全问题上，他不能玩忽职守。因此当他听到叶群讲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不能再在此事上和叶群轻松地开玩笑。



叶群用左手控制着帷幕，把右手贴在身后，随时准备发出“冲出去”的命令。

“主任放心。我们研究一下，保证不出问题。”李文普表态说。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但这件事，你们要听我的指挥！”

“那好，听主任指挥！”

.....

当天下午，贺龙来到大会堂，在浙江厅会见了林彪。客人从容而来，平安而去。但事后李文普透露，在林彪与贺龙谈话时，叶群确实如临大敌，在幕后亲自指挥了一场令人笑掉牙的“战斗”：

贺龙还没走进浙江厅前，叶群就把李文普等几个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的幕后。

“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把子弹推上膛。”叶群若有其事地向几个警卫人员布置说。“你们谁也不准咳嗽，谁也不能露一点动静，我负责顺着幕布的夹缝观察动静，一发现反常，我就一挥手，你们就赶快冲出去！.....”

等了一会，贺龙进来了。林彪迎上前去，与客人握手寒暄后，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内勤去给客人送了一碗茶水，很快退了出来。宾主谈话开始，气氛平静如常。.....

在浅绿色的帷幕里边，气氛却异常地紧张。从脸部表情看，最紧张的还是叶群。她的脸色平时就少见红润，此时变得更加蜡白了。她把脸紧紧贴在帷幕上，顺着一丝夹缝，用一只眼睛向浙江厅中央张望。她用左手控制着帷幕，把右手贴在身后，随时准备挥动这只手发出“冲出去”的命令。在她身后埋伏的几个警卫人员，虽然枪在手，严阵以待，但并不象叶群那么紧张。他们互递眼色，示意叶群的这副洋相实在值得引为笑料，但谁也没敢露出一声色。.....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

别人倒没什么，唯独可怜的叶群一直屏住呼吸站在那里，姿势不适，但又不能移动。一开始，她的脸还是蜡白色的，到后来渐渐变成紫红色的了。

直到客人离开，这场“战斗”才告结束，战果是无一伤亡。不晓得叶群如何在林彪面前渲染这场“战斗”，反正我听李文普回到秘书值班室的第一句牢骚话就是：“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

7. 在各省、市委受到冲击以后

林彪、叶群在贺龙问题上煞费苦心，对社会上的动乱却如隔岸观火，无动于衷。

9、10两月，全国的大多数省、市委都受到一些“造反派”的冲击。有些省委机关被“造反”的群众所包围，不少党政负责人被揪住不放，正常工作陷于停顿。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让带“长”字的干部一律靠边站，成了受到鼓励的“革命行动”。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正在全国蔓延。

各地不断发生的这类情况，我根据中央收电、军委收电、中央文革简报以及其他各种来源的文件所载，每天都注意搜集归纳，分门别类，在一些反映重大情况的文件上作出特殊标记，准备尽量详细、准确地讲给林彪听。我看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被一些造反派弄得束手无策，自身难保，更谈不上什么“权威”了。有权威的，仅限于中央一级，而且在中央也仅限于为数很少的几个人：除毛主席外，主要是中央文革能够左右形势了。但从中央文革的文件中看出，他们认为目前乱得还不够，似乎越乱越好。我作为林彪

的秘书，对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全国的影响还是估计很高的。我希望他多了解些实际情况。但林彪一天内只能听一、二十分钟的文件。如此复杂多变的全国动向，每天仅给一、二十分钟时间，是说什么也难以讲清楚的；但“讲总比不讲好”——我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和平时一样，每天上午，我根据内勤传来的信号，去浙江厅给林彪讲文件。这一天，我要重点讲讲各省委受到冲击的情况。我一个一个地讲述山西、陕西、四川、江苏……

“不要再讲了！”我刚点了几个省的情况，被林彪挥手拦住：“这样讲用处不大。今天这个省委受冲击，明天那个省委受冲击，反正都是受冲击就是了。讲的再多，只是省的名字搬个家，没有什么新东西。以后这类情况可以不必再讲。你们要注意有什么新动向，新的值得注意的苗头，不要老是重复大同小异的情况。”

被林彪这一拦，我准备讲的东西全部报废了。

“有什么新情况吗？”林彪问。

“没有了。”我回答。我所准备讲的各地动向，本来都是从未讲过的“新情况”；既然说这都是“名字搬家”，那我确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了。

8. 毛主席是在赞扬林彪，还是在批评林彪呢？

“新”动向天天有。第二天我向林彪报告：在太原、西安、兰州等地的“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有的示威游行的人甚至把毛主席的画像撕碎，踩在脚下。……

“这些情况是哪里反映的？”林彪这回对我讲的情况引

起了注意。

“有两份中央文革的《快报》，有一份《群众来信简报》。”我回答后，把这几份文件挑了出来，给了林彪。

林彪想了一下，然后拿起摆放在茶几上的油笔，象是要批字。“你把这几份材料，再念念！”我又给他照念一遍。三份文件都不长，几分钟就念完了。

林彪听后才在一张现成的十六开白纸上写了几个大得显眼的红字：

“送主席阅。

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林彪×月×日”

“先叫叶群看看，然后送主席。”林彪交代说。

当时叶群不在大会堂，因此这份文件压了一个多小时。等叶群来后，我把文件大意讲了，并请她过目之后，叶群立刻表示：“这样的文件应该送主席看看。你们当秘书的，应当多推荐一些让首长批给主席看的文件，这是最大的政治。”叶群接着催促：“快送！快送！别再等了。”

这份文件送给主席后，主席当夜批退回来。主席在林彪批字的那张纸上，用黑色软铅笔批道：

“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毛泽东×月×日×时”

我看过主席批示后，有些不解：林彪说“甚堪注意”，主席批“这是大好事”。主席是在赞扬林彪呢，还是批评林

彪的大惊小怪呢？

9. 军委发布“10.5”命令前后

此时，与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的形势相对照，军队的院校显得有些“跟不上”。但许多军事院校的学员由于受到社会上红卫兵运动的鼓动，也纷纷起来“造反”。他们中有不少人涌向北京，要求给他们以地方学生同样的“四大”权利：既然在地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要在军内开展这种批判；既然毛主席已经批判了“工作组路线”，那么他们也要清算在军内的“工作组错误”，给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律实行平反；既然地方的学生可以在全国大串连，那么军事院校的学生也应同样。不管领导上同意与否，他们反正要冲破一切“束缚”，要起来“造反”了！

军事院校的动向，由分工看军内文件的赵根深秘书及时讲给了林彪。

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

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全军文革根据林彪的授意，很快完成了军委命令的起草工作。林彪的劲头十足，他去当面请示毛主席，取得了主席的同意。之后，他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一次有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宣布了他授意起草、经主席批准的这份军委命令，并决定以中央名义将这份命令转发全国，一律照此贯彻执行。从此，军事院校的“四大”就如同社会上一样，弄得难以收拾了。

10. 叶帅痛斥“小老鼠”

过了几天，叶帅来电话说，军事院校的学生要在东郊体育馆召开万人的庆祝军委命令发布的大会，要求林彪接见，还要求几位老师讲话。叶帅说：“考虑到林总的健康，我想我们几个出场就够了。请你报告一下林总，看他有什么指示？”

我去报告林彪，林彪只是点头笑了笑，说：“我不参加。”我回电话给叶帅，叶帅问：“没指示吗？”我说：“没有。”

东郊体育馆的这次大会，林彪办公室没人参加。但是会后不久，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师的讲话记录稿，便由全军文革整理印发。我把四位元帅的讲话要点讲给林彪听。

“都是照稿子讲的吗？”林彪问。

“除了贺老总是念稿子外，其余几位老师都是即席讲话。”

“他们讲的内容有什么特点？”

“共同点是歌颂毛主席和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强调军事

院校的学生要作听毛主席话的模范，要掌握好斗争大方向，要团结大多数，要遵守纪律。”

“不同点呢？”林彪又问。

“不同的是讲话的风格。”我说：“贺帅、徐帅的讲话比较平稳；特别是贺老总的讲话，是照稿子念的，显得很慎重。陈老总和叶帅的讲话很活泼，也很直率。”接着，我讲了在叶帅讲话时发生的一段有趣的插曲。叶帅正讲话，场内有人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叶帅看了看这纸条，恼火地说：“我正在讲话，有人向我写条子。写条子的人认为我们今天讲的话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还在宣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相信，写条子的人并不晓得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信，就请他站到台上来，我可以和他辩论。他敢站出来吗？”叶帅讲到这里，场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叶帅又高声说：“他既然能写条子，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呢？”但场内除了一片欢快的笑声外，仍不见任何人站出来。叶帅继续说：“他不敢站出来，说明他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话，他是心虚。这样的人，我看他是怕见阳光，只是个小老鼠！”

我讲到这里，林彪哈哈大笑。他还重复了一句：“小老鼠！”

11. 林彪和“拉条子”

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召集秘书开会。她说：

“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讲话，另叫陈伯达

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老赵和老张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我问老赵：“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

“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习惯说拉条子。”

“你过去拉过条子吗？”

“我也没真正干过。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没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准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找人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

“肯定是白费劲。”

“那为什么还要搞这种无效劳动呢？”

“都是主任在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

“咱们干吧！干什么样算什么样。”

我和老赵经过研究，认为林彪讲话的内容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从林彪所处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讲些什么，实在心中没底。为了交差，只好东抄西引，由我执笔写了足有四五千字。

“首长听说你们拉成了条子，叫你们去谈谈！”郭秘书在我和老赵“拉条子”时，代替我们“讲文件”。他从林彪

那里回来，说林彪对拉条子的事很关心。

我和老赵去林彪处。林彪、叶群的住处和林办秘书办公室是两个院子，但房脊相连，内有走廊相通。我们去见林彪，只须穿过几十米的走廊就到了。

“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他的会客厅的沙发上，看来情绪还好。这个会客厅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对面还有一间，与这一间的面积相仿，也是林彪的会客厅。我和赵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我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

“都是些废话！”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拦住。他显然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样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

林彪的一盆凉水，浇得我和老赵心灰意冷。倒是后来，叶群一直给我们鼓劲：“不要怕失败。他（林彪）准备他的，你们准备你们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别怕重复，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我们又重新振作精神给林彪拉条子。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我们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我们不便去问。但听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在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后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在地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记录稿，我在不久后就看到了。正如原来所料，我们准备的东西他根本没用。只有一句象是我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他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12. 叶群和严慰冰

运动开始以来，叶群对揪斗陆定一特别感兴趣。据说这是因为，陆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叶认为陆是其后台，所以与其结下了不解之仇。

还是我刚到林办不久，就从存档资料中看到了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的复制件。严慰冰骂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严慰冰的匿名信，确实打到了她所要打击的人的痛处。

陆定一被打倒后，江苏无锡的红卫兵抄了他的老家。抄家者派了两个红卫兵代表，把他们抄到的东西拍成照片加上原抄照片的复制品送到北京。这两个红卫兵不知怎么和叶群接上了头。叶群待她们如上宾，亲自安排她们住上高级招待所，领她们上天安门去“见世面”；她们送来的几十张照片，叶群视为珍宝，亲自请求公安部的谢富治协助，复制几十套，分送中央文革等处一些人。但即便这样，她还不解恨。她听说在东郊体育场要开十万人的批斗陆定一等人的大会，就拉着林办一些工作人员去看“热闹”。别人难受之时，正是她开心之日！

一天下午，叶群到秘书办公室下令：“快给我准备车！我要到东郊体育场去！”

郭连凯忙抓起电话，为叶群备车。



“怎么不见严慰冰呢？”

“要老杜的车!”叶群又一次命令说。

老杜是林彪的汽车司机，他当时开的林彪专车是苏联造的保险“吉斯”。叶群本来自己也有辆专车，是西德造的小型“苯斯”。“吉斯”车体宽敞，如放开平时不用的中层活椅，前后有三排座，除司机外，能挤坐七八人；而小型“苯斯”，与普通小轿车一样，充其量只能坐四五个人。叶群要用“吉斯”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多挤进去几个人陪她去体育场，以便为她保镖。

“从中队派几个警卫战士，”叶群吩咐说：“秘书也去两个。谁去呢？就张云生和李春生吧！别人还有事，在家应付首长。”

“主任到体育场去参加什么大会吗？”老郭纳闷地问。

“对。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定一、严慰冰。当初他们那样反对首长，反对我，现在受批斗，活该！”叶群咬咬牙：“我去看看怎样批斗他们，开开心！”

“主任前去，非同一般。”郭连凯说：“我们得和会场联系一下，不然……”

“不要。”叶群拦住了郭连凯。“我不能公开露面。我如公开出场，人家就会说这个批斗大会是我在当后台。”

叶群让内勤帮助她化了装：她戴一个大口罩，掩住了大半个脸；在仅仅露出的眼睛上，她又戴上一副司机开车用的挡风眼镜；晚秋是北京并不算凉，但她在头上蒙着一个大围巾，这样，她就装扮得活象一个异国他乡来的怪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想笑，但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主任，你这样一化装，到了会场不就更引人注目了吗？”由于叶群拉我当陪同，我不得已劝了她一句。

“注意就注意，他们知道我是谁！”叶群说。

三个警卫战士，两个秘书，还有一名内勤，随同叶群上了汽车。大约一刻多钟，我们到了东郊体育场。场外人群熙攘，大多数人戴着各式各样的“红卫兵”袖标。在会场的入口处，排列着几行长长的纵队，人们正在进入会场。有些车辆被挡在远处，验证才能放行。但我们坐的是“吉斯”保险车，这种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交通警察一见就放绿灯，畅通无阻。因此场外维持交通秩序的民警没找我们麻烦，挥手让我们把车开到了出入口处附近。

我们下了车，周围几百双好奇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叶群。人们看到从一辆“吉斯”车中下来的七个人中，有六个穿着军装，簇拥着一个穿便服的矮胖的怪女人。他们从这女人移动的脚步中，从她那超出寻常的派头中，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大人物”。但是有谁能想象，这就是副统帅夫人呢？

入口处验证的工作人员，也被我们这一行人的不约而至惊呆了。我们一直向里闯，没有遇到阻拦。

但是到了会场内侧的走廊，我们遇到难题了。列队参加大会的人们，都有被指定的座区：零星入场的“要人”，可以凭公开的身份到主席台入座，我们呢？既无人引导，我们自己也不知该到哪儿去。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主席台的后侧。

“站住！”两个警卫工作人员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你们是哪里的？没有证件，不能向前走了。”

我们几个随员都停了下来，但叶群还在向前闯。

“回去！”会场警卫工作人员毫不客气，向后推叶群：“告诉你们没有证件不准向前走，为什么不听话？”

“为什么不让我进？”叶群火了：“找傅崇碧去！找傅崇碧去！”叶群大概在想：北京卫戍司令见了我们叶群都要毕

恭毕敬，你一个小小的警卫战士算老几？

我把叶群拉到一边，小声告诉她：“主任，你这样大声叫傅崇碧，不就把自己暴露了吗？你不要出面，先叫中队的同志去联系一下为好。”

叶群不吭声了，气哼哼地在那里站着。在毛家湾，她一手遮天；在这里，她岂能容得一个小战士这样对待她？她大声叫“找傅崇碧去！”是想显显威风，让那个战士知道她是比卫戍司令还重要的人物；但她还想“保密”，不想让外人知道她到了批斗会场，以避“后台”之嫌。经我提醒，她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矛盾处境，于是暂时忍气吞声了。

随我们来的一位警卫战士，进去联系了一会儿，一个40多岁的负责人出来安排我们。他看了看叶群的奇怪打扮，知道这是个惹不起的人物，也没再问什么，就把我们带到主席台左侧的一个看台上，示意这就是我们的位置之后，转身走了。

会场里边，已经挤满了人。在体育场四周的看台上，在运动场的草坪上，到处是人海，到处是红旗。向主席台望去，一片乱哄哄的，有的人背手在那里站着，有的来回走动，但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面孔。场内的扩音器播放着各种流行的进行曲，加上场内人声嘈杂，交织成一阵阵刺耳的噪声。

不久，一个上穿草绿色制服、腰束皮带、头戴军帽、大约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站在扩音器前，她高喊：“红卫兵战友们！请肃静！请肃静！快开会了，请肃静！”她连续喊了四五次，会场内乱嘈嘈的气氛才平静下来。

这时候，我望见主席台上新增加几个人。我附近的人小声议论：“中央文革来人了！”“戚本禹……”

还是那个女红卫兵，以她那尖细而清脆的嗓子宣布大会

开始。通过她的宣布，我才知道今天要批斗的不仅有陆定一，还有林枫、周扬、田汉、阳翰笙……等人。

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宣布：“把他们押上来！”被批斗的人一个个地被带上来了。他们都光着脑袋，有的头发被揪得松松乱乱，分别由两个彪形大汉反剪着他们的双臂，死死地按着他们的头，步履踉跄地被押向主席台前。他们中有一个长得胖胖的50多岁的人，一上来就在台阶上被搽倒了，额角划破，鲜血直流，但由于他的双臂一直被反绑着，那些血滴只能任其滴下……

这种令人心寒的场面，我是头一次经历。我暗想：这样搞，毛主席同意吗？为什么这样残酷呢？我因不忍看下去，低下头偷偷看了看在我旁边坐着的叶群。她此时仍戴着大口罩，但把眼镜摘下去了。他发现我在看她，也埋下头低声问我：“怎么不见严慰冰呢？”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又探着头向那些被批斗的人望去。

参加这次大会之后，我的心情很不舒畅。在回来的路上，汽车里的人们都一声不语。大家都用一种淡漠的目光望着飞驰着的汽车两旁，一群群带着各种表情的人们、一排排迎着残秋树木、一幢幢新式旧式的建筑物向后边逝去。

在汽车上，叶群也不吭声。她似乎也在思索着，回味着。直到汽车开回毛家湾，她还在念叨：“太可惜，为什么没见严慰冰呢？”……

13. 鲜明的对照

我渐渐发现，叶群这个人，只对与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有兴趣，除此之外她一概不爱理睬。而林彪呢？他是整天沉默

寡言，叫你捉摸不透；对社会上的动乱，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过火行为，他在秘书面前一向显得不在乎，不着急，不吭气，不表态。

林彪还好说，对我们这些小人物并不怎样斤斤计较。叶群则不然。你有事不告诉她，她责备你“封锁”；告诉了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中午，总政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我说叶群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急，等了会误事。我于是通过内勤把叶群叫醒，接了肖华的电话。事后叶群把我叫去，怪声怪气地质问：

“张秘书，你叫不叫我们活呢？”

“怎么了，主任？”我莫名其妙。

“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中午休息一下都犯法吗？”

“肖主任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

“有个屁急事！”叶群口出不逊，但并没大发作，只是一味对我进行挖苦：“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一个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

我也学乖了：此时不能再和叶群争辩，以免自讨麻烦。我说：“我们今后注意就是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期间，除了主席和江青之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话多么急，都必须等她起床后再报。

11月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干副司令的紧急电话。

“我是张才干，我有急事想直接请示一下林副主席。”

“林副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回答说。

“那就请叶主任接一下电话吧？”对方降了格，以为这总还是可以办到的。

“叶主任也在休息。”我说。

“请你叫她一下嘛！我有急事。”从对方的口气中，确实听出他急不可耐。

“叶主任有交代，她在休息的时候不能接电话。”前几天我因肖华的电话冒犯过一次叶群，这次说什么也不干那种受气的事了。我心里有数：只要不是爆发了战争，说是“急”，也不一定急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怎么办呢？”张副司令无可奈何地问。

“你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下记录，等林副主席和叶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他们。”

“那就等不及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算了！”

没过几分钟，总机又把南京的电话接了过来。

“张秘书，”张副司令恳求说：“我把情况对你说说，你看不找林副主席或叶主任能行吗？”接着，他报告了以下情况：“杭州的一个连队，不经请示，全副武装，到我们军区机关来要抓一个科长。这还得了吗？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说话根本不灵。现在人都还在这，怎么做工作也不行，非要带走那个科长不可。”

“他们为什么要抓那个科长呢？”我问。

“这个科长带工作组在那个部队蹲过点。现在不是批反动路线吗？他们说这个科长执行的就是反动路线，因此非揪斗他不可。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张副司令说到这，问我：“你说这事急不急？”

我说：“确实急。”

“既然急，你快去报告一下，看怎么办吧？”

“请您先把电话放下，稍等一会儿，好吗？”

“好。”他把电话放下了。

接了这个电话，我比张才干副司令还着急。一个连队公然跑到大军区机关闹事，确实严重，急待处理。既然军区首长做工作不灵了，立即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副主席请示，这也理所当然。但我怎么办呢？马上叫醒叶群吧？她不但不愿沾手，还非埋怨我误她睡觉不成。直接向林彪报告吧？林彪肯定又会向主席那儿推；何况，即便林彪表了态，没有叶群“把关”，我也不能答复南京。我压半宿再说吧？南京已经火烧眉毛，的确压不得，否则后果更为严重。和别人商量一下怎么办吧，值班的秘书就我一个，再去找人也不济事。

事出无奈，我急中生智：找总理！

“请你看看，总理休息了没有？”我拿起电话问总机。看看手表，已经下半夜了！

“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我。

“请接总理！”我很兴奋，因为只要找到总理，就有办法了。很快，总机把总理的电话接了过来。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位？”总理总是这样谦逊。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我在值班，刚才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干副司令的一个紧急电话。他要我立即向林彪同志请示，然后答复他。可是林彪同志已经休息了，我不好叫醒他。听说总理还没休息，我想请总理……”

“完全可以。”总理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后他

问：“南京报告的是怎样的紧急情况呢？”

我于是把张才干副司令报告的情况，向总理复述一遍。

“好，这个事由我处理。”总理干脆利落地答复我说。

“谢谢总理！”我深深被总理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的精神所感动。

放下电话后，我心中暗想：在毛家湾，何曾有过这样痛快的事呢？

因怕张副司令等得着急，我在过了20多分钟以后，主动给南京去了电话。张副司令高兴地对我说：“总理已来过电话，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的处理经过报叶群，叶群说：“你没叫醒我，这就对了！”我又去报告林彪，林彪只是笑了笑。他还是那样：不说对，也不说不对。

14. “乱”到了国防部

11月上旬的一天凌晨，频频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接过电话后知道，来电话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

“请向林副主席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今晨三点左右，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不听劝阻，打伤了门卫战士，冲到国防部大院里去了。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也有一部分是其他院校的，共约几百人。他们昨天就在国防部西门外吵吵闹闹，要揪出总参李天佑副总长；理由是李天佑同志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军文革派人给他们做工作，说明他们对李副总长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揪斗。他们不听，硬要往国防部大院里冲。警卫

部门说，这是国防部，是全军的最高统率机关，不准乱冲。学生们说，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给他们的权利，谁也不准干涉，谁干涉就是执行反动路线。为了防止他们冲击，警卫部队在西门口组成了一道人墙。但这些学生很不象话，他们不但殴打警卫战士，还打了在场维持秩序的一名副团长，在他身上抹浆糊，贴大字报。警卫人员坚持和他们讲道理，对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就是不准他们冲进国防部。但他们越发变本加厉，弄块长条板子压在警卫战士的人墙上，从他们头上跳了进去。就这样，许多学生都冲进大院去了。现在，警卫部队动员一部分学生出了大院，但还有不少人在院子里游游逛逛，赖着不走。这些情况，请你在林副主席起床后及时报告他。”

“我一定及时报告。”我说。

“现在，叶帅正在西山和我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刘志坚副主任继续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对统率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就会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对全军各部队的影响也是很坏的。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里胡闹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请及时告诉我。”

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肖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他在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

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彪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肖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九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作报告。

“首长，”我去向林彪报告说，“今天早晨接到刘志坚副主任和肖华主任的电话报告，学生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冲进国防部了！”

“啊？冲进国防部了？”林彪显得有些惊讶的样子，用手向他对面的沙发指一下，示意让我坐下来。我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林彪听讲文件，从来都是让秘书坐在他的对面，为的是怕给他带来“风”。但是我这次进来，见他的儿子“老虎”（林立果）正坐在他的身旁。

我开始向林彪报告国防部受到冲击的情况。正说间，叶群进来了。叶群大半是中午才起床，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段，她夜间出外活动较少，所以第二天起床稍早些，说是“稍早”，也快中午了。

我又报告了叶帅和刘志坚他们一起研究后提出的几项措施，说他们希望得到林副主席的指示。

“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去处理吧！”林彪又想不吭声，不表态。

“那怎么行？”叶群急了。“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他们向你作了报告，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说他们的胡来都是经你同意的，那样，中央文革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

“那就给刘志坚回个电话吧！”林彪听从了叶群的劝告，对我交代说：“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

“也不要叫学生们写检讨了。要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不要和他们对立。”林立果在旁插话说。他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1967年22岁。运动开始后，北大停课，他就躲起来了。8、9月间，他以“红卫兵”身份跑到上海、杭州一带去“串连”，不久前才回北京。平常没事，他就陪着林彪。

“老虎不愧是红卫兵，对红卫兵造反很有感情。”叶群夸奖林立果说。林立果听后笑咪咪的，歪着脑袋，斜着眼瞅了瞅叶群。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当他特别开心或者遇到不顺意的对话者，总是歪着头用斜眼望望对方，只是表情不同。

“对。把老虎说的也加进电话记录里。以我的口气传给刘志坚。”林彪这回态度很明朗。

回到办公室，我把林彪的答复传给刘志坚。他听后表示：“好吧，我们尽量做工作。”

林办值夜班的秘书，第二天中午可以多睡几个小时。我趁这个机会，换上了便装，跑到离毛家湾不远的国防部西门，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

此时，国防部大院西门口还是乱哄哄的。但很显然，冲进大院的学生都已退出来了。但他们的大多数，还都在门口外边坐着，并有少数人来回走动。周围站着不少看热闹的群众，把国防部西门完全堵塞了。在门口处，站着几位全军文革成员，我认出他们是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看来他们正在向造反学生的头头做工作，动员他们离开国防部西门

口，但毫无效果。在门口内侧，站着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不惯造反学生们的无法无天行为，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那里呆呆地怒视着，守卫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一个学生头头领着大家不断念毛主席的语录。

“把李天佑交出来！”“打倒李天佑！”“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谁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砸烂谁的狗头！”另一个造反学生的头头，不断领着静坐的学生呼喊口号。

“同学们！同学们！”一位40多岁、带着眼镜的军人走到学生前面来。他是全军文革成员、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他想讲几句话，让大家先静一静。“同学们，请大家静静，我相信大家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希望……”

“你代表谁？”一个学生站起来尖声质问道。

“我是全军文革的，并不代表谁。我想对大家……”

“打倒刘少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连串的口号声，把谢镗忠刚出口的话音立刻压了下去，那个头头又带着学生高喊：“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谢镗忠讲话不成，只好耐心地站在那里静等着。

“我们喊毛主席万岁，你为什么不举手？”另一个学生站起来，点着谢镗忠的鼻子厉声质问：“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谢被弄得很狼狈，只好退下去了。学生们又高喊：

“打倒谢镗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又一位全军文革成员走出来，也象是要对学生讲几句话。他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学生们可能认识他，没让他讲几句话，就把他轰下去了。

总政青年部长辛国治又出来了。他穿着昔日的校官呢大衣，比较斯文，又有风度，学生们一开始没有象对以前两位那样无理。但他只是讲了几句话，学生们听不进去，又用口号声把他压下去了。

在一片短暂的寂静之后，国防部西门外开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人群让开一条路，他们走进来了。人们很快认出他们是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和戚本禹。张春桥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戚本禹长得高胖。两个人一走进来，学生们立刻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张春桥、戚本禹没有讲什么，就把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找到门卫值班室去了。学生们继续在外边念语录、喊口号，带头的那几个已经喊得声音嘶哑。不一会儿，张春桥等人又走出来，人群顿时寂然无声：

“同志们！”张春桥开始讲话了，立即引起学生们的一片掌声。“同志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他这句话，又引起一阵更起劲的掌声。张春桥继续说：“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伯达同志给同志们写了几个字，我来念念好吗？”他讲话慢条斯理，富于感情，说了几句话就把学生们的心抓住了。他问“好吗？”的话音刚落，学生们齐声欢叫：“好！”张春桥于是从口袋里拿出陈伯达写的条子，念道：“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你们知道，国防部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精神很好。但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最后，张春桥又用着重的语气念了署名：“陈伯达。”

学生们本以为陈伯达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冲进国防部

的“革命行动”的，没想到泼来的是一盆冷水。他们大感意外，没人鼓掌，也没人敢于提出异议。

张春桥抓住机会，紧接着问大家：“伯达同志的话，同志们拥护吗？”

“拥护！”学生们回答。

“既然都拥护，就请大家回去吧！”

也真灵，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张春桥的几句话，就把这场围解了，学生们陆续散去。国防部西门又恢复了平静。

回到毛家湾，我才听说：国防部的解围措施，是在总理的督促下进行的。总理正在大会堂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如果此策不行，他就要亲自出场了。

15. “老军们莫要瞎议论”

1967年元旦一过，各种惊人的消息一个一个地传来。

1月3日，全军文革组长、中央文革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被江青点名打倒了。

1月4日，中央常委、党内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顾问陶铸被陈伯达、江青点名打倒了。

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了。他在死前留下一张条子：“我的死，是陈伯达逼的！”

全国各省市的党政机关，都已基本瘫痪。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社论的煽动下，各地夺权之风盛行。光是在北京市，听说就成立了三个夺权组织。据说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但被夺权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关几乎百分之百！谁怀疑这是“革命行动”，谁就是“反革命”！

军内的各种告急电话也有增无已。

许多重大情况，我都根据文件所载，及时向林彪报过。我期望他有所表示，但他一直默不作声。

这时传来主席的内部指示：当前运动的方针是继续“放”，而不是“收”。“死了张屠户，不吃生毛猪。”看来主席的意图是让这种很乱的局面继续下去，因为只有“大乱”，才能引向“大治”。林彪是“紧跟主席”的，他对目前这种大乱的形势采取任其发展、不理不睬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这种乱确实理解不了，接受不了。形势越乱，秘书们的背地议论也就越多。

“主席说过，这次运动只打倒一小撮，可是现在，差不多都被搞垮了”。阳地不平地说：“我就想不通。要说保守派，我就是保守派！”

“亏得主席在，首长在，总理在，不然更完了。”郭连凯说。

“领导人有何高见？”我问李春生。他有个外号叫“小眼镜”，但李文普又给他起了个古怪的外号——“领导人”。他对此并无反感，秘书们这样称呼他也习惯了。

“没有。”李春生笑了笑。

“你是读马列书的，我向你请教一下。”我说。“列宁批判过‘左’派幼稚病。联系到我们当前的情况，你看我们有些人的毛病象不象‘左’派幼稚病？”

“有点象。”

“老军们莫要瞎议论，国家事莫要尔等操心！”赵根深一边听着大家的议论，一边哼起京剧唱腔来。

“老赵，你唱什么？”我问。

“我哼的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段唱词。诸葛亮由于错用马谡，街亭失守了。结果，司马懿率领40万大兵直冲到诸葛亮的城下。因为赵云领兵去运粮草尚未回来，诸葛亮想退已来不及，就冒险设下了空城计。他让军士们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楼上弹琴作乐，几个老军在城楼附近进行清扫，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丞相一生用兵都很精明谨慎，怎么司马懿的兵马快到城下了，他还不着急呢？有的说，这城里兵很少，又是老弱居多；丞相让敞开城门，自己只顾弹琴，这哪里象个要打仗的样子？诸葛亮听到了这些议论，就引出了这段唱。”接着他又小声唱起来：“老军们莫要瞎议论，国家事莫要尔等操心！……”唱完，他面色低沉：“现在的形势，确实叫人忧虑啊！”

“人都在吗？”叶群其人没至，其声先到了。

“都在！”郭连凯机警地答了一句。这样一来，秘书们的窃窃私语就被掩过去了。

“好，你们都在。”叶群进来后，坐在一个沙发上。看来情绪还不错，没有平常那种冷气逼人派头。“我刚从钓鱼台回来，有些事和你们传一下。”叶群说着，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上面是她作的简单记录。她说：“中央文革最近几天开会的精神是，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十月革命时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左派’。只有左派才是最革命的，才有资格掌权。中央文革决定，立即派王力去接管中宣部，派关锋去接管教育部，派戚本禹去接管文化部，现在是不怕左，就怕右。你们几个讲文件的可要注意，屁股千万不能坐在右边，尽从右边向首长耳朵吹风。我这是爱护你们，不希望你们犯右的错误。……”

叶群讲了这一阵之后，使大家本来就很忧郁的心情变得更加忧郁了。叶群走后，谁也没再议论，各人都在暗中思考着，忧虑着。

郭连凯带头打破了这种沉默：“主任警告咱们不要把屁股坐在右边，各位老军可要当心啊！”大家听出他的话里有“潜台词”，都会心地笑了。

16. 从批肖华到保肖华

1月19日下午三时许，江青到毛家湾来了，江青与林彪密谈时，叶群也在场，江青走后，叶群急促地按铃，叫秘书快去。

我到叶群办公室，听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打倒肖华啦！”

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还在几天前，我从林办存档的来往电话记录中知道，林彪、叶群是不同意打倒肖华的。江青曾给叶群来电话，说揪出刘志坚后，造反派还不满，当前“群众”的主要呼声是揪出肖华。叶群说，这个事，她请示过林彪。林彪的意思是：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江青见林彪有保留，就把打倒肖华的事暂时搁下了。

“首长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肖华的，但现在的想法变了。”叶群说。“刚才十一楼从一组那里来，与首长研究后决定，立即开会批判肖华。过一会儿，先在京西宾馆开小会批判，今天晚上七点在工人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判。现在，我要到京西宾馆去，代表首长参加批肖华的会。快给我准备车；另外，你和老赵也陪我到京西宾馆去。”

看叶群那急匆匆的样子，我没敢多问，就返回办公室给

她叫车。然后我和老赵一起到叶群办公室。老赵低声问我：“主任叫我们陪她干什么去？”我说：“参加批肖华的会。”老赵大惊：“怎么，又批肖华了？”

我们来到叶群办公室，叶群正在收拾她的文件包。她一边向皮包里塞着乱七八糟的资料卡片，一边嘟囔着说：“好小子，这回姑奶奶可要找你算帐了！”她见赵根生和我已经来到面前，又说：“你们俩跟我去京西宾馆西。我参加批肖华的会，说不定会用上你们。”

叶群拉我们一同上了她的汽车，向京西宾馆开去。途经钓鱼台时，叶群让司机拐进去，停在十五楼。她在车上就嘟囔：“打倒肖华后，总政治部主任谁来当？我得去搬老夫子的兵！”

叶群下车后，让我们在楼下等候，她上楼上去见陈伯达，过一刻多钟，叶群下来了。“走！老夫子刚起床，不等他了。”叶群上了车，又在念叨：“批肖华，我发言时讲点什么呢？你们快帮助想想。”

批肖华的会场，在京西宾馆的三楼会议室。我们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从会场门缝传出来的吵嚷声中，可以想象场内的气氛是相当激烈的。叶群见其他参加会议人员的随员都在走廊或休息室内等候，也叫我们等在外边，她独自进去了。

我和老赵到了休息室。室内的工作人员不少，其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之后，谁也没再说什么，都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候。大家都明白，在这种场合，谨言慎行是至关重要的。

时间不长，主席秘书来电话通知，主席请总理和叶帅立即前去议事。总理、叶帅一走，批肖华的会暂时中断了。陆

续退场的人物中，我看到有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有几位老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的一部分负责人。江青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和肖华谈着话。江青盛气凌人，调门很高：她厉声训斥肖华：“你这个人有民愤，批你活该！”肖华跟在她身后，脸色涨红，象是想要说点什么，但江青根本不爱理睬，先上电梯下楼走了。叶群尾随其后，示意我和赵根生跟她上了电梯，我们也走了。

“上大会堂江苏厅！”叶群上车后吩咐司机说。她又向我和赵根生透露：“总理和叶帅被主席召去了，说不定与我们这个会有关。会议暂停了，中央文革和列席文革会议的几个人到江苏厅等候，待总理和叶帅从主席那儿回来后，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汽车在向大会堂行驶。叶群停了一会儿后又说：“批肖华，我还没来得及发言。你们帮我想想，我讲点什么呢？”没等我们回答，汽车到了大会堂。

走进大会堂，那些要人都进了江苏厅，我们所有随行的工作人员都留在外廊等候。由于不知总理、叶帅什么时候回来，加上这时天色已黑，不知什么人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张罗了一顿晚饭。在这种挤空吃饭的情况下，细嚼慢咽是要饿肚子的；幸亏我平时养成了快速吃饭的习惯，不到五分钟就把肚子填饱了。但直到我们用饭后半个多小时，才见总理、叶帅回来。

总理、叶帅和中央文革成员在江苏厅开会，大概是在传达讨论主席的最新指示。会议散场后，叶群出来小声对我说：“走吧，咱们回毛家湾！”我问：“不是批肖华吗？”叶群说：“不批了，主席指示对肖华还要保，不能批。”

叶帅和叶群同车去毛家湾，向林彪传达主席关于保肖华的指示。就这样，原定晚上在工人体育馆开的万人批肖大会

也告吹了。

但是事情还没完。在京西宾馆批肖华的会暂时休会后，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回去透露了会议的内容，结果引起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一些人当夜去抄肖的家；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才免遭揪斗。等主席“对肖华要保”的指示传到北京军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北京军区那些抄肖华家的人，又立即揪斗了杨勇，因为他“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杨勇因此而被“烧焦”，“九·一三”事件后才得翻身。

总政副主任袁子钦也由于头晚泄露了批肖华会议的内容。第二天也遇到了与杨勇相似的命运。

在以后召开的保肖华的群众大会上，叶群代表林彪讲话，说肖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认为肖华是“几任总政治部主任中最好的一个主任”，好言动听，亲切至极。这时，她把自己不久前在肖华问题上玩弄的那套把戏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7. 一次“紧急援救”行动

就在肖华问题出现前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日子也岌岌可危。

邱会作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胡敏，几次来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都不理。胡敏吃了叶群的冷眼，只好向林办秘书袁求帮助。“张秘书啊！”胡敏在电话中的声音又低又弱：“请你转报叶主任，我们老邱被二医大红纵抓去好多天了，听说还挨了打。他身体很不好，这样对待他，他可受不了啊！希望叶主任在林副主席面前讲句话，放出我们老邱吧！”

我把胡敏的电话内容报叶群，叶群冷笑着说：“活该！邱会作的小丫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

但是胡敏的呼救电话还是不断来，她的声音颤抖，语调凄伤。“我们老邱天天挨打，现在快不能动弹了，快被折磨死了！他平时对林副主席一贯忠诚，对叶主任处处尊重，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快想办法救救他的命吧！”胡敏说着，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又把胡敏的电话报叶群。叶群这回没冷笑，也没再骂邱会作。她显然被胡敏说的表白忠诚的话语所打动，立刻把电话记录要了去，找林彪商量对策去了。

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到办公桌子上。

“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

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边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

“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

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的签字后边，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

“老夫子是中央文革组长，有了他的签字，就更好办了。”叶群说。“这个事我得亲自出马。邱会作是首长的老部下，能够见死不救吗？”叶群接着布置，让我和李春生以及负责警卫工作的刘吉纯陪她一起去总后大院，另外还要带



“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上几名警卫中队的战士，以便应付“意外”。她还叫郭连凯，在毛家湾守着电话，一旦她在总后被学生围住不放，就要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让他派部队去“解围”。

布置已毕，叶群领着我们几个人分乘两辆小汽车向总后大院进发。我和李春生坐前车，为叶群领路；叶群和几名保镖人员坐后车，紧紧相随。

进了总后机关大院，除了路灯处附近外，多数的办公室都没灯光，院子里各个角落也都是黑乎乎的。院里很少有人行走，我们的汽车一直向中心办公楼驶去。在一座有灯光的楼外，我们停了下来，我先下车去问问路。

“你是哪里的？”一个30几岁的干部见我进了他的房子，用一种惊奇加怀疑的口气问道。

“我是林副主席办公室的，叶主任就在外面的汽车上。我打听一下，邱会作被群众组织抓走以后，现在什么地方？”

那个干部听说我是林办的，又听说叶群已经来到他的楼外，茫然不知所措。他隔窗望了望停在外边的两辆汽车，又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打量一下我，才慢吞吞地说：

“邱会作就在这个大院里。你们想找他吗？”

“对，我们想找他。”

“你们从这向东走，再向南拐，遇横道向西拐，右侧第二幢楼便是。”

按照那个干部引导的途径，我们很快找到了那幢楼。一进去，学生们听说叶群来了，个个都非常兴奋，有的女学生甚至拉着叶群的手欢跳起来。这也难怪：学生们都是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反的，现在，在这个“司

令部”里举足轻重的叶群大驾亲临，他们怎么能不特别激动呢？

学生们拥着叶群进了一间会议室，让叶群坐在会议桌前排中央，然后大家分别围坐四周。

“叶群同志，我们真想不到您会来到这里。”一个20岁上下的女学生兴高采烈地对叶群说：“我们见到您，心情激动极了！”在场的许多学生也都附和着说：“太好了！”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叶群故作亲切地说。她对学生们讲话的腔调，是从江青那里学来的。“红卫兵小将们，林彪同志让我代表他向同学们问好！林彪同志听说大家住在这里，派我来看看大家。他让我告诉同志们，他非常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不用说，叶群说的这每一句话，都赢得这些天真的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请叶主任代向林副主席问好！”一个学生带头说了一句。

“谢谢！我一定转到。”叶群问：“哪位同学是负责人？”

“我是。”一个和叶群坐对面的男学生回答说。

“你真年轻。”叶群夸奖说。“这样小年纪，就能领导这么多人，真不简单。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那个学生说：“向叶主任学习，向叶主任致敬！”

叶群又说：“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

叶群又装作关心大家的样子，问问这，问问那。绕了半天圈子，才书归正传。

“听说邱会作在你们这里，是吗？”

“是，在我们这里。”学生负责人回答。

“邱会作这个人太坏了，”另一个学生插话。“他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群众。到现在态度还很坏。我们要求：坚决把他打倒！”

“邱会作在总后机关也干尽了坏事。”一个30岁上下的军人补充说。“他品质恶劣，阴一套，阳一套，疯狂对抗毛主席……”

“你也是二医大的吗？”叶群看这个发言的人年纪不象学生，问了他一句。

“不是。我是总后机关的。”

“对同志们造邱会作的反，林彪同志非常支持。”叶群继续对学生们说。“但听说邱会作现在的身体不太好。林彪同志的意思是：放他出去把病治一下，这样如果他病情恶化了，大家也没责任。你们看好不好？”

学生们想不到叶群这次来的用意是叫他们放出邱会作，心里蛮不高兴，但又不敢顶。几十个人屏住呼吸，谁也不吭声。

叶群见学生们默默抵制，脸部表情顿时显得不悦。她终于拿出了林彪、陈伯达给她的“上方宝剑”，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但还是按捺住了她想要发作的火气。

“不瞒同学们说，我这次来，是执行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给的一项任务。”叶群说着，把那张纸条递给学生负责人看了看，然后又赶紧收了回去。她又故意把纸条向四周展示一下后说：“这是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亲笔写的字：立即放出邱会作。大家不会怀疑吧？”

在场的学生和总后机关造反派的头头们，全被惊呆了。一张纸条虽小，但它是出自威慑全国的林彪、陈伯达之手。这分量确实不轻啊！

“我们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同意让邱

会作去看看病。但说心里话，他出去后，我们不放心。”那位学生负责人表态说。

“不要紧，”叶群说。“你们把他交给我。”

“今后我们要批判他，能保证随叫随到吗？”另一个学生插上来问。

“这个没问题。”叶群打保票说：“大家要批判他，可以找全军文革联系。”

“我们见叶主任一次，机会难得。”另一个学生说。

“我们有一大堆心里话想说，有一大堆问题想解决。可以提一提吗？”

“不行了。”叶群故意看看手表。“我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好好谈谈心，但实在太忙，只好改日再说了。现在，有一个几万人的群众大会，还等着我去参加呢！”叶群站了起来，表示就要走了。

叶群讲有个“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在等她参加，这是句大谎话，但还是骗住了天真的学生们，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把邱会作交给她带走了。

出总后大院时，叶群把我们两辆车的行车顺序作了颠倒：她与邱会作在前，我与李春生在后。汽车还没出大院，前车在门口附近又掉头向院子的另一个方向开去。我和李春生都被弄糊涂了：这是往哪里开呢？又绕了一阵圈子，我才明白：原来有一辆汽车在紧紧地尾随我们。前车可能感觉到无论如何是甩不掉这辆跟踪的车，就在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下车一问，才知是一场虚惊。跟在后面的不是造反派学生，而是总后政委张池明。他听说叶大人亲临总后了，能不一见吗？但叶群此刻哪有心思与他搭话，应付几句就分手了。

汽车出了总后大院，一直向市内开去。但走不多远，它又向南一拐，进了一个招待所的院子里。这是叶群预定去的地方，但我们这些随从都被蒙在鼓里。

下车以后，叶群命令几个警卫人员扶着邱会作进了一所房子，我们其余的人在外边等候。听进去的工作人员讲，邱会作一进屋里，就给叶群下了跪，痛哭流涕地说：“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我们回到毛家湾，已过午夜12点了，郭连凯告诉我说：“你们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可把首长急坏了。他以为你们准是出了什么事，一直不肯休息。如果再不见主任回来，他就要亲自去总后大院了。”

第三章 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年头。每年都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但我回想起来，1967年似乎没有春天。政治气候就象人患了疟疾一样，忽而冷得令人“牙关错”，忽而热得如同“锅上坐”。谁受得了呢？……

1. 林彪和军委“八条命令”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乱，连一向沉得住气的林彪也如坐针毡了。

来自南京的报告说：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大造南京军区的反。军区有八个领导人被揪斗，被罚跪，军区许司令情绪很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来自沈阳军区的报告说，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副司令员唐子安被造反派揪斗游街，还被用残酷的肉刑加以迫害，险些致命。

福州军区韩司令来电话告急，说“首都三司”的学生到福州胡闹，弄得战备工作都无法搞下去了。他愤愤然地说：“如果再这样搞，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毛主席身边有坏人；可要警惕啊！”

在北京，在各地，各军事领导机关也在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去年10月林彪授意起草《军委命令》的时候，他是很自信

的。现在，他发现他点的这把火，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大有烧到自己头上之势。

林彪终于采取行动了。他在把各军区的电话报告记录批给主席参阅的同时，于1月20日晚紧急约见叶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郭连凯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这个九条，中心内容是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否则必将严加惩处。

军委和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是在钓鱼台召开的。平时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开这次会时躲开了。她料到会上将有一场交锋，而“九条”的后台是林彪，军界又都是支持“九条”的，一旦展开辩论，她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天早晨，叶帅打电话给林办。叶帅说：“我们昨晚在钓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七条，还有两条，就是军内的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战斗组织，暂时很难通过。”叶帅稍停一下，又对我说：“请你报告林副主席，通过七条就很不容易了，应当争取早些把它发出去；剩下的那两条，可以在以后再争取机会。”

我把叶帅的电话内容报林彪，林彪点点头。他问：“通过的七条，送回来了吗？”我说：“还没有。”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这就是昨夜钓鱼台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听说后，立即约

见主席。主席当面表示同意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上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全军的那个军委“八条命令”。这个命令的发布，博得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拥护。军委在印发这个命令时，又把毛主席批示的：“林彪同志：所拟八条很好，……”用红字印在上首，使它更加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

“八条命令”下达后，冲击军事机关之风很快被煞住了。有些带头闹事的造反派头头被抓了起来；有些破坏部队稳定的分子被执行了纪律，福州军区还据此精神发了一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通告，提出必须坚定击退反党乱军的反革命逆流。毛主席看到这份通告后，亲自批示将它转发全军参照执行。

与军队内部形势渐趋稳定相对照，此时地方上的混乱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夺权”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地方的党政群团组织都已瘫痪；由于在“夺权”问题上引起的分歧，群众组织进一步分化，各种派别林立，武斗不断升级。毛主席同意“八条命令”的战略意图看来是：只要稳住军队，就不怕地方乱；有军队作支柱，乱得越透，治得才能越“彻底”。

2. 叶群的“撒谎两重性”

在林彪将军委“八条命令”的最后送审稿批呈给主席那天的中午，还发生过一段插曲。

送审稿虽由林彪批上“即送主席批示”，林彪并嘱必须于中午送出，不得延误。但由于叶群曾规定：凡林彪表态的文件，送出前必须经她“把关”，所以尽管林彪催得很紧，

还得等叶群点头。

林彪和叶群的生活规律大不一样：林彪通常是早六点左右起床，中午十二点左右休息，下午两点左右起床，晚上十一点左右休息。叶群则是中午才起床，下午两三点以后再休息，五点左右起床，下半夜两三点以后休息。所以往往成了这样：林彪起床了，叶群正休息；林彪休息了，叶群才起床。林彪办公室秘书只有一套人马，既要应付林彪，又要应付叶群。特别是讲文件的秘书，每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有时弄得连饭都吃不上。偶尔开午饭的时间到了，叶群还在睡觉，我们趁空跑到食堂吃口饭。恰恰在这当儿叶群起床了，打铃叫秘书“随叫随到”。这边正在吃饭的秘书听到消息后，只能扔下饭碗，象赶赴救火现场那样急匆匆地跑到叶群那里，但此时已迟了。这时，你就硬着头皮听叶群的“牢骚”吧：“我整天忙得要死；你们几个人对我一个，为什么开午饭这个时候就不能等我几分钟？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不同情我一点？”

正巧，林彪批文件的这天中午，虽然开午饭的时间到了，我还留在办公室值班。叶群起床后没打铃叫秘书，就到办公室这边来了。

“人呢？”叶群问。

“吃中午饭去了。”我答。“我在值班。”

“有什么事吗？”

“首长批个文件还没发出，”我为此正准备找主任呢。

“什么文件？”

“军委命令的修改稿。”

“我知道这个稿子。昨晚文革讨论，我没参加。命令稿是首长口述的，我是首长老婆，不好发言。首长怎么批

的。”

我把林彪的批件拿到叶群面前。叶群也没细看，就问：

“这里提到路线了吗？”

“没有路线二字。”

“不提路线不行，容易叫人挑毛病。现在上边非常强调路线；不提路线，就会犯路线错误；首长是紧跟主席路线的，他亲自搞的文件，怎么能不提路线？”

听了叶群的这番话，我觉得好笑。“不提路线，就会犯路线错误”，这叫什么逻辑？路线对不对，还在于提不提路线吗？

“文件很短，我看提不提问题不大。”我说。

“你们不懂。正确与错误，往往在一字之差。特别是见诸于文字的东西，一定要严密，不能叫别人抓住一点漏洞。”叶群用毫无商量的口气说：“必须加上关于路线的提法，否则不能发。”

我说：“首长说，中午必须送主席，不让压。”

“首长过一会儿就起床，你们再给他报一下，填上路线的提法后再发。千急万急，不差个把小时。”叶群又问。

“首长起床后，你准备怎样向他报告？”

“这简单。”我说。“就说主任建议，请首长考虑是否加上一句关于路线的提法。”

“那怎么行！”叶群急了。“我是首长的老婆，不要什么事都打着我的旗号。外边有人说我是首长的后台，我才不愿听这个名声呢！”

“不讲主任建议，我们当秘书的不敢压首长批的文件。”

“你不会撒个谎吗？”

“撒什么谎？”

“你就说主席正在休息，这个文件只能下午送。”

“说主席在休息，我根据什么呢？”

叶群对我这样答对她很不高兴，起身说：“那就算了！”说完就走了。

叶群走后，刚回办公室的郭连凯对我说：“主任叫你说主席在休息，你就说呗，何必非要坚持？”我说：“明明没有的事，我说不出口。”阳地接着说：“这是家常便饭。”

我们正说着，叶群派内勤来叫我。我去后，见叶群已经在准备午休。她经常是这样：中午起床后两三个小时，就又休息。她的住室在林彪住室的东侧。从秘书办公室顺着走廊向东走，经过内勤休息室和林彪卧室、会客室的走廊，在尽头处进叶群住室的门。向右拐，是叶群的会客室兼办公室；向左拐，是叶群的卧室。会客室与卧室中间，是卫生间。叶群的专用电话，不是设在办公室或卧室里，而是在既有洗漱又有便溺设备的卫生间内，为防止别人偷听她的电话，她的卧室很宽敞，仅有的两扇窗被紫红色的金丝绒遮得严严实实的，透不过一点光线；室内全是地毯铺地，床前摆着一道屏风。叶群在床上打铃，被叫来的秘书站在屏风外边，听她吩咐，颇有一点“垂帘听政”的味道。

“我来了。”我站在屏风外，对叶群说。“主任有事吗？”

“你打个电话给徐业夫，问主席是不是在休息？”叶群吩咐说。

我走向叶群的卫生间，心里已经明白八成：她让我打这个电话，可能与刚才让我撒谎说“主席在休息”有关。

“你等等！”叶群叫住了我，又叮嘱一句：“给徐秘书打电话，要用你自己的口气，不要讲是我叫问的。”

我拿起电话找来主席秘书徐业夫：“主席休息了吗？”徐秘书回答说没有。因林办秘书与主席秘书常打交道，所以徐秘书对我问主席的活动也未见疑。

“主席休息了吧？”叶群急不可耐，在床上大声问我。

我走出卫生间，告诉她：“主席没休息。”

“这真难哪！”叶群叨念着，下了床，走出屏风，直奔卫生间。她又命令我：“你给我要十五楼，找王秘书。”

所谓“十五楼”，是陈伯达在钓鱼台的住处。叶群称呼陈伯达，一般称为“老夫子”，有时也称为“十五楼”，他对别人喜欢称代号，例如称主席为“一组”，称总理为“三组”，称江青为“十一楼”，称康生为“八楼”，等等。

我要到陈伯达处的王秘书后，叶群接过电话机，示意让我别走，听她打完电话再说。

“王秘书吗？你好！我是叶群。”叶群一反和我们工作人员讲话时那种严厉口吻，轻声轻气地对着电话说：“伯达同志休息了吗？……啊，刚休息。王秘书呀，我求求你好吗？……就是求求你，不是客气，……林彪同志送给主席一份文件，上面没提路线，我想还是提上好。但林彪同志是个急性人，他批了就要往上送。我是他老婆，也不好拦；可是不提路线，这个文件就有毛病了。王秘书，就为这个事，我想和伯达同志商量一下，请他帮助出个主意，可是太不巧，伯达同志又休息了，你看怎么办呢？……那太好了，你叫伯达同志接个电话。王秘书，你真好，我太感谢你了！”

我听到这里，心想难怪外界有人吹捧叶群如何“热情”、“谦虚”，果然事出有因。这是她的拿手戏，当什么人说什么话；用着你则奉为上宾；用不着你则踩在脚下。

叶群拿着电话机等了一会儿，可能陈伯达出场了。叶群

还是那样甜言蜜语：“伯达同志，打扰了你休息；我太不安了！……我想求你帮帮忙……；不，林彪同志非常尊重你；……真的。”叶群接着重复了一遍对王秘书说过的话。“你说，是不是提一下路线好？……对，不提不好。怎么提，你帮助出个主意吧？……在命令的开头，加上一句‘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太好了！你真不愧是

林彪同志的秘书，林彪同志左右逢源的建议

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林彪立即批“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并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在此前后，主席还批示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军训，对一些乱得难以收拾的单位实行军管。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引起了许多新的复杂情况，矛盾更加激化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谁是“左派”？谁是“真正革命派”？这时，各地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名目繁多，都称自己为“革命派”，即“左派”。但每地的群众组织都分裂为观点对立的两派或三派，都自封为“革命派”即“左派”，而视对方为“老保”，即“右派”。两派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各派都要求军队支持它。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怎么办？

一天，我原来所在的吉林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我们过去很熟，他遇事向我求教也属自然。他说：

“毛主席号召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坚决执行。但我们不知道，谁是左派呢？在长春这个地方，群众组织很多，观点也不一样，我们支持谁呢？听说北京的‘首都三司’是最出名的造反派，他们在长春也有人。我们想，‘首都三

司’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大概是‘左派’；他们支持谁，我们支持谁，这大概没错。可是，‘首都三司’的人在哪里呢？我们又找不到。为这个事，省军区首长让我打个电话给你，请你帮助打听一下，‘首都三司’在长春的代表是谁？住在哪儿？我们好找他联系。”

这个电话，使我感到为难。他们不知道“左派在哪里”，我也同样不知道。他们以为“首都三司”支持的就都是“左派”，但“首都三司”在各地串连的人几乎无不受到反对，福州军区的韩司令就正式要求过“把他们赶回北京去！”我因此拒绝了吉林省军区的求助，当然回答是婉转的。

各地的部队也都陷于类似的处境。他们急于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但除非中央，任何一级都是无法作出这样的指示的。而在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有裁决之权的，大概只有中央文革，因为中央政治局都已既无名也无实了。中央文革也经历了一再分化的过程：一些被人敬重的“老革命”，已经被一一“打倒”了；剩下的都是些“真正的左派”。他们认为在军队中，除了林彪、叶群和极少数跟着他们跑的“左派”外，没有几个人是可以相信的，至少是有待观察的。因此，他们对军队“支左”问题愿保持沉默。

但是，各个部队也有办法识别出自己应当支持的“革命派”即“左派”。他们对于一些肆意搞打砸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从心眼里压根儿有反感，绝不相信他们是“真正革命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群众组织，尽管遭到对立面的辱骂，他们也深表同情，认定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个

部队在“介入”地方的运动之后，都渐渐使自己支持谁的态度明朗化了。

可是，情况并未因此变得简明一些，而是更加复杂起来。我每天看到的反映“文化大革命”动向的文件，对同一地区、同一类事件的看法和估计，就截然分成两极。颇有代表性的，一极是中央文革编印的《快报》、《简报》；另一极是转述各军区、各部队报告的《军委收电》。从中央文革的文件看出，各地驻军所支持的群众组织，几乎全被看作是“老保”；从《军委收电》中看出，凡中央文革所支持的那些“革命造反派”，全都以打砸抢起家，而且大都和当地的驻军严重对立。有的“造反派”甚至骂部队是“刘少奇的兵”、“黄皮狗”、“灰老颠”，开始对部队进行冲击。各地部队有“八条命令”作依据，对冲击部队的“造反派”并不畏惧，除了向他们作些宣传教育外，还抓了一些“坏头头”。但“造反派”有中央文革给撑腰，有前一段冲垮地方党政机关的体验，对于敢在他们面前设禁区任何人——包括解放军在内；也不减锐气。他们认定，部队说是“支左”，实是“支右”。因此他们越加胆大妄为，有的竟对解放军干部、战士进行人身污辱，抢夺部队枪支，殴打部队人员……。

所有这些动向，我都向林彪报过，我心急如焚，而他却仍然无所表示。几天前他在搞“八条”时的那种似乎急切需要稳定部队的样子，此时又不见了。

4. 沸腾的西山

2月上旬，主席对如何处理部队受冲击的问题作了书面批示。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

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抢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

林彪看过主席批示后，派我立即把主席批件送给军委秘书长叶帅看看。我坐汽车到北京西山附近的叶帅住地，叶办的秘书引我到叶帅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大约30多平方米的向阳房间。房间的东侧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的后身有几个玻璃书柜；房间的西侧放着几个单人沙发，把一个围着白布的圆形茶几围在中间。办公室内装饰朴素，摆设大方。

“你先坐下等等，我去看看主席批示后再说。”叶帅说。因为我曾预先用电话联系过，叶帅知道我是奉林彪之命来送主席批示的，所以一见我就把文件接了过去，没有再问什么。

叶帅已年过花甲，两鬓渐白，但容光焕发，步履矫健。可知老人家的精力仍很充沛。但叶帅见到我时，面色忧郁；只是当他看完了主席批示后，表情才渐渐变得爽朗而明快些。

“张秘书，你再坐等一会儿。”叶帅说，“主席的批示太重要了，我再看一遍。”

叶帅正在继续看文件，突然，放在他左后角落的电话铃声响了，叶帅走过去接电话。我站起身来，想回避一下。叶帅挥手示意我可坐等不动，可能是觉得我并不妨碍他打电话。我坐下来，只听叶帅在讲：

“噢，叶群同志，你好！……

“我们昨晚开会，气氛很紧张。……

“现在才弄明白：好多东西，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其实不是。……”

“对，他们过去根本听不进我们说的话。……”

“我对陈伯达说，听说你们支持上海成立什么上海公社，这是做不得的。我们的传统就是党和政府，成立了公社，还要不要党和政府呢？上海这样做，别的地方怎么办呢？可是，那时候，你陈伯达就听不进我的话啊！在你的眼里，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吗？现在主席表了态，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我对他们说，现在搞得这么乱，责任完全在他们。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第一步把党搞垮，第二步把政府搞垮，第三步把军队搞垮？你们想干什么？”

“我这几句话，把他们惹翻了。那个关锋气势汹汹地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呢！……’”

讲到这里，叶帅充满自信地笑了起来。

“最后总理收了场。总理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陈毅同志小声对我说：‘剑公，你真勇敢！’”
叶帅又爽朗地笑了笑：“……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什么，无非是秀才造反！……”

听了叶帅的电话，我不由地对这位老帅肃然起敬。同时我也担心，叶群是个表面上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和钓鱼台穿着连裆裤的人，叶帅这样对她推心置腹，会不会被她出卖呢？

叶帅讲完电话，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主席的批示，对我

说：“张秘书，你需和我一起走一下。我们正在西山开会，各军区都来了人，各位老师也都在，应当把主席的批示给他们传达一下。”

我随叶帅到了西山。开会的人们早已到齐，在一个不算很大的会议室，四五十人坐得满满的。其中，我仅认识一部分是各总部和各军区的首长，大多数我不认识的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估计也都是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负责人。我进去后，有个工作人员帮我在一侧找了个座位坐下；论年纪，这个会场内可能属我最年轻了。

叶帅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师陆续进场。刘帅已双目失明，由工作人员扶他入座，但他的气色和精神很好。他和各老师一样，都面对着大家坐在最前面一排桌子之后。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今天就要结束了。”叶帅首先站起来说。他作为军委秘书长，是这个小型军委扩大会的主持者。“在请刘、徐、聂几位副主席讲话之前，先给大家传达一下主席最新作的重要批示。”接着，叶帅逐字地给大家念了主席批示的原文。

在其他几位老师作了简短讲话之后，叶帅讲了话。叶帅说：“从主席的最新批示中我们看到，主席对我们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爱护的。前一段，地方搞的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一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

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有些同志原来以为这是毛主席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某些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叶帅讲到这里，会场内顿时沸腾起来。叶帅讲的“某些人”是谁，大家都听得明白，我也同样理解；这明显指的钓鱼台那帮人，特别是江青。经叶帅一点，人们中的愤怒情绪顿时爆发了。有的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肖华同志尤其激愤难平。他再也坐不住，怒气冲冲地举起攥着拳头的右臂，跺了跺脚后控诉：“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会场立刻哗然。……

“各位且熄心头火！”叶帅的这句话，又使大家平静下来。叶帅说：“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叶帅强调，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行事，不可轻举妄动；军内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要注意搞好战备。

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震动。回到毛家湾，我把去送主席批示的情况和参加西山会议的经过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既未表示赞许，也没提出异议，只是当我讲到叶帅说“各位且熄心头火”时，林彪微微一笑。

关于西山会议的事，我在叶群面前只字未露，因为担心被她利用。我当时是把林彪列作“某些人”之外的。

5. 青海的枪声

2月中旬，新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造反派”与生产建设兵团某部队的武装冲突。关于这一事件，新疆军区

的报告与中央文革的《简报》的说法完全相反。军区报告说，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坏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夺部队枪支，殴打部队人员，冲击部队机关，甚至开枪打死打伤部队一些干部、战士。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这一小撮歹徒进行了武装镇压。目前这种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经平息，社会秩序已趋恢复。中央文革则称这支部队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造反有理”，但遭到武装镇压，因此这是一次严重的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

我把石河子事件的情况和两种对立的看法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听后未置可否，只是问了一句：“这个情况主席知道吗？”我说：“这些报告材料，主席都有。”

此后不久，青海的形势又开始紧张起来，青海省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说：在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群众组织，在北京来的一些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已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肆意大搞打、砸、抢，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已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一小撮坏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如果放纵这一小撮暴徒胡做非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部队已将盘据在报社里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不到几天工夫，仅我看到的就有十来份。那里的情况剑拔弩张，但林彪听讲之后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

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人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反击，一部分带头闹事、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被驱逐出报社，又一场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平息下去了。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他是麻木了呢？还是另有谋略呢？我更加不解了。

对于青海事件，中央文革最初保持沉默。但隔了些天，他们开始利用《简报》制造反击舆论。《简报》上登载了几篇“红卫兵”来信，信中哭诉他们被青海的赵永夫等人武装镇压的经过，写得凄惨惨，血淋淋。信尾常见几句这样刺人感情的话：“天上有个北斗星，红卫兵日夜想念毛泽东！”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了半途夭折的危险。红卫兵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向您控诉那些血腥镇压红卫兵的刽子手，相信您一定会给我们作主！”……

在“造反有理”口号盛行的日子里，这些被中央文革暗中鼓气的“群众”呼声，已经足以把青海事件的是与非翻过来。但在1967年2月，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似乎是尽可能稳住部队，并给那些把“造反”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因此，尽管中央文革印发的告状材料写得感人肺腑，并未受到最有权威方面的理睬。

6. 怀仁堂的怒吼

事情总不是孤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极其反常而令人愤怒的怪现象，自然会受到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抵制。这种情形，在中央内部也不例外。

2月的一天，谭震林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篇内容大致相同的信。信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古怪离奇的现象表示严重不满，指出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是一小撮个人野心家阴谋篡党夺权。他指名道姓地点了陈伯达和江青，认为很多事情都坏在他们身上。信件的语调既有愤怒，也有悲伤，认为如果继续照此发展下去，就将一切不可收拾了。

后来我才知道，谭震林的这封信是在所谓“怀仁堂事件”之后写的。关于那次事件，中央文革的王力把他与张春桥、姚文元核对整理的一份记录给了叶群，叶群亲自报给了林彪。整理者是把这份《记录》当作一颗重磅整人的炮弹而形诸于文字的，因此它是断章取义的。但尽管如此，它仍可反映事件的一些真相。为了叙述简便，特此照引如下：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计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后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

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删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大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

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这个《记录》清楚地表明，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一辈革命家都拍案而起，对那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作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但是由于当时陈伯达、江青之流正在得势，气焰十分嚣张，怀仁堂内的这场激烈交锋未得胜利进行下去。在场的总理处境困难，只好以暂时休会的办法才使这种对立的气氛没有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会后，谭震林怀着满腔忿恨，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那封倾吐衷肠的信。林彪对他的信仍以“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漠然未理，但在主席那里，他的信和怀仁堂发生的风波却引起了意外的反应。

7. 风云突变

一天深夜，主席召集紧急会议，通知林彪去参加。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去作他的代表。据叶群回来透露说，主席对怀仁堂的事“发火”了。主席生气地说：“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这个‘文化大革命’如果失败了，我准备再次上山打游击去！”主席让总理主持开会，处理怀仁堂问题。

这以后一连几天，叶群都去参加她所谓的“炮轰”在怀仁堂发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当然，

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我们当秘书的一无所知。但叶群的嘴象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她有次开会回来，眉飞色舞地念叨说：“我今天也向他们开炮了！”从叶群的神态中可以判断出，形势正在发生逆转，不但几位副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全国范围内由乱转治的希望看来也渺茫了。

钓鱼台的那帮子人是善于制造“舆论”的，还在炮轰几位副总理的会议尚未结束的时候，以下内容的大字标语就贴满北京街头：“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坚决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打倒谁！”这些标语的落款大都是“北师大井冈山”和“地质学院东方红”。不难看出，大标语都是有来头的。但北京的所谓“五大左派”组织中，只有“北师大井冈山”和“地质学院东方红”冲向“二月逆流”，其余的那几个因得内线消息较迟，动作显得不协调。于是，这又导致了这些群众组织的分裂，形成所谓“天派”、“地派”之分，他们之间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仗”。

由反击“二月逆流”勾起，已被搁置的青海事件又被抬了出来。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五人联名给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他们说，青海事件完全是赵永夫等人策划的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事件，因此应予彻底平反。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显然，主席最初对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

后，可以进行镇压。现在的问题是，张春桥等人力陈被镇压的并不是“右派”，而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另外，原来说被镇压的“造反派”开枪寻衅才导致流血冲突，现在证明“造反派”手无寸铁，是赵永夫等人谎报军情，把中央欺骗了。张春桥等人的这封信，使主席的态度发生动摇。既然可能“值得研究”，那就取决于“调查结果”了。

谁来“调查”呢？当然是中央文革。既当原告，又当法官兼律师，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可想而知。“调查”的方式也相当蹊跷：中央文革召开“调查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审，由中央文革挑选的“受害者”出场控诉，让各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旁听（等于间接被告）。会上反映的情况和观点全是一面倒，结论如同张春桥等人的信件一样，是非曲直完全来了个颠倒，罪魁祸首是赵永夫。在作了这样的“调查”之后，中央文革向主席作了汇报，并经主席同意，以中央名义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如果不是主席说了句“不要杀”，赵永夫险些被立即处死。

以青海事件为样板，中央文革又相继主持召开了关于四川、内蒙等地问题的“调查会”，目的一样，方式一样，结果也一样。结果就是证明，确实存在着“二月逆流”，这股“逆流”从上到下都有，其目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一切“真正左派”。

在这出闹剧里，叶群始终扮演了重要角色。钓鱼台的一切活动，她都积极参与其中。至于林彪，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对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也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8. “此例不可开”

1967年3月初，总理和叶帅在听取军队支左情况的汇报会上，鉴于不少同志希望中央军委召集军队同志开个会以适应新的形势，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同意向主席和林彪提出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的建议。这项建议，总理在当夜向主席汇报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提了出来；当即得到主席批准。次日，总理亲自给林办来电话，请我们把这件事报林彪，林彪也表示同意。但这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却人为地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回来：

“我现在在钓鱼台，正在和八楼、十一楼商量一件大事。”叶群交代给我：“你快去向首长报告一下：最近，总

“主任来了电话。”我把叶群电话的内容复述一遍。

“叶群在什么地方来的电话？”

“钓鱼台，康老那里。”

林彪又低头踱他的步。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等他说句表态的话。

“你告诉叶群，叫她马上回来！”林彪用不大耐烦的口气命令说。

我回电话给叶群，她没再问什么，很快回到毛家湾。她与林彪不知嘀咕了一些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又走了。后来才知道，她经与林彪商量之后，与康生一起到主席那里告了总理的状。据说主席表示：“总理是应当先与林彪同志通通气。”但并未深究。

此事，总理那里很快有了反应。总理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林彪，大意是说，他完全接受主席和林彪的批评。尽管此事的发生有些客观原因（当夜向主席汇报工作，其时林彪已休息），但作为他是不可原谅的。总理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给他念了总理的这封信，似乎有所感动。他当即口授了一封给总理的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他让秘书把记录重念一遍之后交代：“叫叶群看看。”

叶群看了林彪的口授信稿，顿时火冒三丈。她立即去找林彪，边走边唠叨着：“这简直是开玩笑！纯粹胡来！写的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就应付过去了。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在叶群坚持下，林彪同意把这封信作废，另由叶群给总理去个电话，以表“安慰”。在搞阴谋诡计方面，叶群自恃高明，林彪有时也甘败下风，此例算其一。

9. 林彪的“3·20”讲话

军级干部会议开始后，叶帅请主席和林彪到会讲话。主席说 he 不想讲了，可以请林彪到会讲讲。几个月来一直不爱吭声的林彪，为了准备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倒空前地忙活起来了。

“你给各个军区打个电话，”林彪向我布置说：“叫他们帮助提供一点材料，怎样才能把部队的支左工作做好，让他们把两个月来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作长篇文章，列出几条就够了。”接着林彪点了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几个军区的名，说有这几个军区的经验也就够了，多了也没用。在这同时，他还派我到京西宾馆去了解参加军级干部会的同志有些什么“活思想”，大家希望他讲些什么。

“根据会议的反映看，我在这次会上讲点什么好呢？”林彪在听我汇报几个军区的电话报告和军级干部会议反映出的思想情况之后，认真地征求对他准备讲话的意见。此时在场的，除我之外，还有叶群和林立果。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我说：“一个是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普遍感到忧虑，究竟应当怎样看；另一个是军队介入地方运动后，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究竟应当怎么办。这两个问题，首长如能讲讲，是参加会议的同志所希望的。”

“部队中有许多人对红卫兵造反看不惯，对一些老干部被打倒不理解。”在旁的叶群插进来说：“我看这个思想问题得解决，需要好好讲讲。你说呢，老虎？你是红卫兵，你最有发言权。”叶群又笑咪咪地问林立果。

“我看这是个感情问题，态度问题。”林立果歪着脑袋，用斜眼望着叶群：“对老干部看成是一切都好，对造反派看成是一切都坏，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没有阶级观点，”叶群说，“应当专门讲讲阶级观点问题。”

“好，就准备讲三个问题。”林彪拍板定案了：“第一，讲讲主流支流，也就是形势；第二，讲讲阶级观点问题；第三，讲讲军队怎样支左。讲这三个题目，你们帮助拉个条子。”

“都叫秘书搞，压力太大，时间也不允许。”叶群指了指林立果：“为什么不用用我们老虎呢？他是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叫他帮你想怎样讲形势，不是更好？”

林彪点点头：“那当然好！”

林立果洋洋得意地说：“形势部分，我包了。”

“阶级观点这一部分，我负责。”叶群说。

“那就剩第三部分了。”林彪说。

“第三部分由秘书们负责，以张秘书为主。”叶群说。

林彪点点头表示：“可以。”

林彪后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果然就是讲了这三个题目。但是，不管是叶群、林立果帮助准备的前两个问题，还是我们秘书们帮助准备的第三个问题，林彪大都没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在第一部分里，他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这正中钓鱼台那伙人的下怀。在第二部分里，他贬辱反对打倒一切的人是没有阶级观点，说要对老干部进行“阶级分析”，称颂红卫兵是“天兵天将”。在第三部分里，他讲军队只能“支左”而不能“支右”，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

危险”。

林彪讲话时，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到会捧场。林彪讲话后，叶群在林办借传播戚本禹的话来吹林彪：“戚本禹说，文革对首长讲话很放心，但对其他老师的讲话就拿不准。”

主席没有直接听到林彪的讲话，但据说是后来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主席指示把林彪讲话录音加以大量复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

林彪讲话内容传出去以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把林彪讲的“带枪的刘邓路线”接过去，到处在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

“首长讲话的录音中，有‘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提法吗？”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问。

“有。”我回答说。

“赶快把这句话从录音带中抹去！”叶群布置说：“如果有人打电话问首长是否讲过这句话，你们要一概否认，就说没讲！”

这句话确从林彪讲话录音中抹去了，但当时在场听林彪讲话的有数百人，怎么能从他们的心里把林彪讲话所造成的影响抹去呢？……

10. 老师们的困境

1967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值夜班。将近下半夜三点钟的时候，叶群才从钓鱼台开会回来。她到了秘书值班室，一进门就从皮包里掏出她作记录的几张白纸。

“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有些重要情况来不及和首长讲了。”叶群翻看着几张记录纸，显然已经十分疲倦。“我

明天中午起床后，说不定还得开会去。这些情况，你先和首长讲讲，等我抽出空来再详细和他说。”

我准备好记录用的纸和笔，只听叶群往下说：“我们开会集中炮轰叶帅和徐帅。这两个老师，仗着他们过去打仗有功劳，从心眼里对小将们造反行动看不惯，到处泼冷水。特别是叶帅，对中央文革态度很凶；中央文革都是左派，还能怕他们？2月份那些天，他几次指着中央文革的鼻子质问这质问那，以为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中央文革一开始对他有些忍让，目的是让他暴露一下。现在看清楚了，他是‘二月逆流’的一个主角，中央文革也毫不客气，都在向他开炮了。……我是代表首长参加会议的，在这样的场合不能保持沉默。我说明，叶帅、徐帅在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等问题上，都是背着首长干的，首长不能替他们承担责任。我还揭露了叶帅背后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叶帅在我发言的时候怒冲冲地用冷眼看着我，准是把我恨死了，但我不怕！……”

叶群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多分钟。她可能想去睡觉了，不愿意再继续讲下去。“算了，你先给首长讲个大概，详细的东西，等以后我给他讲。这两天，叶帅、徐帅可能要见首长；你们要注意，在我和首长见面前，不能安排见他们。”

“如果首长要主动找他们呢？”我问。

“我为什么先让你替我把钓鱼台开会的情况给首长吹吹风？就是为了防止他脑子一热，就找他们谈话。”叶群说着，把几张白纸塞进皮包。“首长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师也有感情。我实在难哪，但不能推着他向右转，看着他犯错误。”

叶群起身要走了，又念叨一句：“徐帅、叶帅都向主席写了检讨，承认在处理‘青海问题’上有错误和缺点。听说

主席对他们检讨还满意，但文革认为他们的态度根本没有改变，不能轻易放他们过去……。

我问叶群：“文革为什么不按主席说的去做呢？”

叶群说：“文革对他们有气，特别是对叶帅。”

早饭后，我在讲文件前，先把叶群讲的那些东西给林彪重复了一遍。林彪面无表情，但听得很认真。

“叶群每天都从钓鱼台开会回来的那么晚吗？”林彪听后问我。

“差不多每天都这样。”

林彪象是不大高兴，但没再问什么。

4月中旬，林彪召见两个人，叶群也在场。我去向林彪报一个紧急电话，恰恰林彪、叶群与被召见人的谈话刚刚收场。在林彪会客室的门口内侧，我碰上叶群正在往外走送客人。叶群拍着他们的肩膀，催促说：“……你们快去吧！要先把他的信心打掉。”

我从林彪那里回来，一直在思索：叶群催促两位客人“快去”哪里？叶群交代要打掉其“信心”的“他”是谁？莫非是叶帅吗？我联想到此前不久叶群布置把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赵根深调开，理由是那里快“起火”了，老赵作为曾在林办工作过的秘书在那里会有“是非”。军事科学院要“起火”，点火者肯定有叶群一份，其矛头是对着身兼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帅的。现在又去打掉对方的“信心”，这不分明是指叶帅吗？几天前我还以为林彪置身其外，如今证明我也是被蒙蔽了。

不久，军事科学院果真“起火”了。林办收到一份署名为“军事科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打印件，全是揭发叶帅所谓“三反”言行。这些材料，我给林彪讲后，林彪不动声色。

又过几天，主席批转一份揭发叶帅是所谓“叛徒”的证据材料。这个“证据”，是30年代初期国民党报纸刊登的叶帅《反共启事》。“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比“叛徒”更吓人的罪名吗？被人诬为“叛徒”就难得翻身，如再被抓住有《反共启事》的证据，就更不堪设想了。但主席却作了公正而令人心快的批示，大意说：“这个《反共启事》是国民党特务们造的。我可以证明，登这个启事的时候，剑英同志已离开该地几个月，正和我在一起。”

“张秘书，请你报告一下林副主席。”叶帅有一天来了电话，语调低沉而缓慢。“军事科学院的一个群众组织最近几天接连要我去参加他们批判我的大会。我的身体很不好，去参加这样的会确实吃不消。我希望让我休息一下。如果非让我参加批判会，是否等我身体好一些以后再说？……”

我去报告林彪，林彪这次却很爽快，“告诉叶帅，可以休息一下。”我想退出，却又听林彪说：“全面看来，叶帅还是功大于过。”

“首长后边说的这句话，我可以传给叶帅吗？”

“不要。”林彪摇了摇头。

……

11. 看风使舵

1967年的4月份，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地向极左的方面倾斜。

在青海，被压倒的“八·一八”派由于中央正式为他们平了反，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不仅揪出了赵永夫，而且进而冲击当地驻军单位。

在四川，由于中央文革把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专政的刘结挺、张西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并为他们以及四川地区“二月镇反”时抓起来的形形色色“造反”分子全部翻了案，这使四川的形势来了个颠倒。那些被中央文革平反而出的“左派”组织，对不支持他们的当地驻军严重对立，关系迅速恶化。

在其他各地，由于驻军“只能支左而不能支右”，结果是各个部队都只支持自己认为是“左派”的那一派；而没被部队支持的另一派，恰恰是中央文革承认的“真正左派”。这样一来，那些“真正的左派”便与部队对立，认为当地解放军不是支左而是在“支保”。有些地方的驻军，不断受到地方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冲击。而在执行“八条”命令期间被打成“坏头头”的那些人又大都得到平反，他们反转来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比当初更为厉害。

在各种情况下，全国当时仅有的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人民解放军，又趋不稳了。

4月初，从广州来的黄永胜求见林彪。他们谈话中间，林彪打铃叫秘书去。

“首长打铃了吗？”我去林彪的会客室问道。

“是的。”林彪说。他问：“根据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我说。

“为什么呢？”

“我一下子说不清楚。”

“这确实是个问题。”林彪又转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黄永胜说。

“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了。”林彪笑着摇摇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那样也好。”黄永胜附和着说。

“好，”林彪拿定主意说，“再搞上几条，张秘书作一下记录，准备再搞个军委命令。”他接着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也偶尔插上一句半句，我作了记录。林彪口述东西喜欢“一、二、三”，这次也是如此，但讲来讲去，他自己也记不住数了。他问：“多少条了？”我说：“十条了。”林彪说：“十条就够了。那次是八条，这次是十条。”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样？”黄永胜说：“很好。”林彪于是向我布置：“把它整理一下，誊清后给叶群，让她送文革去讨论一下。”

这个上午，叶群还在睡觉。等她中午起床以后，我把林彪口授的十条给了她。她看了看，连饭都没顾上吃，就拿着“十条”上钓鱼台找陈伯达、江青去了。

林彪的新十条，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其中规定，部队遇到群众组织冲击时，要耐心做好“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对不准开枪；要在各方面给“革命左派”群众组织以支持，不准和群众对立；不准随意捕人；要防止赵永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军队领导权，等等。这正中钓鱼台那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

“中央文革对首长提出的十条非常满意。”叶群从钓鱼台开会回来，兴致勃勃地对秘书们说：“铅印的修改稿清样很快就会送来，你们要抓紧讲给首长，好使他尽早批给主席。文革的人们提出，上次发八条的规格那么高，这次无论

如何不低于那次才行。”

清样确实很快送来毛家湾。可能由于叶群事先已给林彪吹了风，林彪听我念了这个修改稿后，立即挥笔在上边批上：“即呈主席审批”。主席也批得很快，批语比“八条”时少几个字，但仍有“很好”，规格不低。整开白道林纸铅印并套红印上主席批语的军委“十条”命令，几天内贴至全国各地。

“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鼓劲加油，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不久后以中央名义发的“六·三通令”，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毫不济事。于是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八条硬，十条软，六·三通令白瞪眼”。

我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报告后，林彪听后轻松地拉着长声自言自语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12. 一份“反革命”匿名信

1967年初夏，正当“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时候，传来了一种与正式文件、报刊的论调完全不同的声音，不过，这声音不是公开的呐喊，不是自发的辩论，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不用说，当时它被认为是一份“反革命”匿名信，由公安机关（公检法机关已被“砸烂”了，取代它的是“军管会”）下大力量侦缉，据说终于破获了。

我在林办看到的这封《公开信》共三份，它们来自不同的渠道，都是有关单位为了“发动群众”破案而复制的。信

的内容如此深刻而尖锐，以致事过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对它记忆犹新。

《公开信》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它肯定党在50年代以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制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自“八大”以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公开信》着重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与它所宣传的革命词藻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它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公开信》一针见血地说：所以造成当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兴风作浪的结果。它指名道姓地点了把持中央文革大权的陈伯达、康生、江青，说陈伯达是个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个野心家。一天不把这伙坏蛋清除掉，党和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

《公开信》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这伙自封的“左派”如此猖狂？这是因为有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鼓气。它于是点了林彪的名。它说，林彪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立过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帮“左派”小丑的不光彩的领袖。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在助纣为虐，事情不会糟到今天这样可悲的地步。

《公开信》又说，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也不能辞其咎。毛泽东同志以他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当中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不堪效仿的一面。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

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制，不可能不给他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公开信》唯一称赞的是周总理。它说，现在的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只是因为自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没有他，就更不堪设想了。

《公开信》向全党发出呼吁，要为挽救党的正确路线、挽救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斗争。它接着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主张，要求全党支持。

《公开信》最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是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的。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乱局的领袖人物，必定是与这场浩劫并无牵连的人，是党和人民的大多数所真正信赖的人。

.....

我所回忆的《公开信》内容，可能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其精髓不会有大错。

《公开信》的文笔，也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它那老练而善于掌握分寸的语言，不象出自一个年青人之手；它的文字流畅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说明它很可能是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笔；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实，有的是只有高层人物才了解的内情，因此它又可能是受到某高级干部暗中指点的作品。那么，它的真正作者是谁？

我是这般重视这封《公开信》，在给林彪讲述它时，就格外想看看林彪听后有什么反应。结果很使我失望。我讲过之后，林彪不为所动，一言未发。

但林彪真的不注意它吗？未必。我讲后不久，叶群把这份《公开信》要了去，说林彪和她都要“再看看”。林彪少有的“再看看”，说明《公开信》对他也打中要害了。

数月之后，中央公安部给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报告，说这一“反革命”案件已被破获。作案人是天津某中学的一位教员，证据是从他家里抄出了一个作案用的油印机，字体鉴定无误，而且他自己业已供认不讳。

此案就此了结了。但这是真的吗？我至今仍有怀疑。

第四章 “5·13事件”真相

事件，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件何其多！

每出一次事件，就有一大批人遭殃。说是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

那时我真糊涂了：“革命”究竟是什么？

1. 一次破例的“接见”

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作一下记录。不然，她们几个对我一个，事后她们说我对她们讲了什么什么了，我空口无凭。”

叶群接见演员干什么？既然要见，还找个“证人”在场做什么？不待我问，叶群自己的嘴就漏了风。

“徐秘书来，传一组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对我说：“不要小看她们，那是能通天的！”

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小招待所里，叶群接见了她们，为首的姓刘，叶群似乎认识她，至少知道她的名字。一见面，叶群就主动拉着对方的手，异乎寻常地以热烈的口气说：

“小刘，你好！我在多少天前就想见见你，就是抽不开空。你

长得比过去更丰满了！”

“叶主任好！”小刘很激动。接着她向叶群介绍与她同来的几位女演员，叶群一一同她们紧紧握手。

叶群让她们几位坐下来谈：“有什么话，尽可以和我谈。我一定帮助你们。”

“叶主任，我们几个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哪！”小刘说着，两只只有几分秀气的眼睛有些湿润。

“别着急，慢慢说。”

“叶主任，你知道，我们是保吴、余（余立金）首长的，可是在空政文工团里，和我同观点的，就这几个人。”她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几位。“他们骂我们是老保，还骂……”

“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围攻。”另一个女演员补充说。

“你们保吴、余，并没有错。”叶群说：“我和你们同一观点。”

“就是听说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也保吴、余，我们才保的。”小刘这时才有些笑意。

“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叶群故作试探。

“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小刘回答说。

“那你们就放心保吴司令，没有错。”

“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小刘又说：“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

“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们还要歌颂林副主席。”小刘补充说。

“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中央文革。”叶群越说越有劲。“你们先排好，我争取先让江青同志看看。她会支持你们的。”

“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排练呢？”另一个演员问。

叶群说：“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搞联合演出。”

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他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搞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

叶群对这一冲击十分恼火。她在背后大骂：“这些混帐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他们打我一耳光，我要还他们三下！”但她听说，参加冲击的群众组织都是中央文革公开支持的军内出名的几支“左派”，她想报复的心又收敛了。

2. 谁是“黑后台”？

5月中旬，仅一两天夜间，北京各主要街道就贴满了“肖华是‘5·13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倒‘5·13事件’的黑后台肖华！”之类的大字报，署名又都是“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用怀疑，这又是一个在统一的幕后导演者的策划下搞出来的。

这个幕后策划者是谁呢？我自然怀疑到了叶群。

“在北京各个主要街头，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说他是‘5·13事件’的黑后台。”我在讲文件时，故意把这一

切详细地讲给叶群听，试探她有何反应。

“活该！”叶群一点也不吃惊，好象是在幸灾乐祸。

我忽然想起叶群不久前当着秘书们的面流露的话：“我在有困难的时候，肖华看我的笑话。全军文革开会，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副处长，公开在会上顶撞我，谢富治、关锋立刻表示支持我，严厉批评了那个人。可是主持会议的肖华，却一声不吭，我后悔，当初就不该保他！”

“街上大字报都说肖华是‘5·13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有什么根据呢？”我又试探一句。

“那是群众自发贴的，谁管他有什么依据，群众贴的东西，说不定也有点影。”

叶群放的这个烟幕弹又把我弄糊涂了。说大字报是自发的，鬼才相信。但听叶群的口气又不象她亲手策划的，这种事她向来是很少隐讳的，她干了坏事也有时候往别人身上推，但这次，她不愿意暴露自己，难道还有什么原因吗？不是她又是谁干的呢？

一天后的一个电话，帮我解开了这个谜。来电话人是空军党办一个人，他让我向叶群报告以下情况：“请报告叶主任，我们根据她的命令，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附近去了！主任真高明，这些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主任还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坚决照办！……”

我当即去向叶群报告空军党办的电话，看她还说什么。

“他尽瞎吹，我算什么高明！大字报有震动，还不是他们的功劳！……”

3. 肖华求见难

1967年初夏，林彪又住进大会堂，值班秘书是我和新调

来的秘书张益民。叶群则住进“养蜂夹道”。

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肖华到大会堂来找叶群。

“肖主任在门口，等着见叶主任。”在大会堂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值班人员进来报告。

这时叶群正在大会堂，我立即去报告她。

“我不能见。”叶群说。“人家说他是‘5·13事件’的黑后台；我若见了她，人家就会说我是她的黑后台。我才不愿意给他当后台呢！”

“肖主任还在门口等着呢。”我提醒说。

“你就说我不在。”

我到大会堂门口，告诉肖主任叶群不在。我由于说这种假话而感到心中有愧，但又不能不说。

“叶主任不在，我就和你谈谈吧，然后你有机会转告她。”

我无法拒绝这种要求。于是，我把肖华请到了新疆厅。他的身体还象我以前看到过的那样健康，但面色忧郁，表情严肃。

“肖主任，你和我谈有什么用处呢？”我已得知叶群正在幕后策划搞垮肖华；叶群现在又避而不见肖华，肖华本人对这一切可能并不了解，他对林彪和叶群可能还存有幻想，以为既然找不到叶群，一个林办秘书总可以把话传过去，那时林彪、叶群总还是能够给他一些帮助的。

“怎么会没用？”肖华勉强地笑了笑说。“我和你谈谈，只要你把我的话转报给叶主任就行了。我不愿意打扰林副主席。叶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见到她。但我相信，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只要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是会帮助我想个办法的。……”

我拿起记录用的纸和笔，心想：肖华是个久经战火锻炼的老革命，但在复杂的政治风浪里，却显得过于天真了。

“一些人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说我是‘5·13事件’的黑后台，这是毫无根据的。”肖华继续说，“总政礼堂那次演出受到冲击，和我一点沾不上边。我自己心里有底，所以并不害怕。现在的问题是，军内一些群众组织整天和我纠缠，让我答复他们的问题，接受他们的批判。他们现在不大提‘5·13事件’了，而是说我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我也不怕，他们让我去，我也去了。……”

“他们让你到哪去？”我插问一句。

“他们在京西宾馆开批判大会，要我必须随叫随到。我不怕，已去参加几次。这个批判大会，根本不让我讲话，实际上是向我起哄，把我搞臭。……”

“你不去参加不行吗？”

“那就成了对抗群众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他们提出问题，我可以答复。我有缺点、错误，他们也可以批判，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无理取闹。另外，天天揪住我不放，我也吃不消。我作为总政治部负责人，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作。总政的其他几位副主任，都已难于工作了。我再不能工作，总政就要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着因总政不力而使全军工作受损失，将来怎么交代啊！……”肖主任讲到这里，情绪很激动。他象是还有许多话要说，但由于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能不尽量克制自己。他的话音停下了。

“肖主任，你说的话，我全部记下了，一定如实转报。”我抬头望了望他。

“我有几点希望。”肖华继续说。“我希望林副主席

能有所指示，象京西宾馆那类批判会，我是否可以不参加？如果参加，是否让他们选一些代表，我面对面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不要采取起哄的办法。还有，如果叶主任能抽出空来，最好见我一次，因为我还有好多话要对她说。”

.....

肖华走后，我去报告叶群。

“你简单点，我还有事呢！”我刚刚说了几句，叶群就不耐烦了。

我尽量扼要地叙述了肖华的谈话内容和他提出的几点要求。

“我不管！”叶群干脆不想理睬。

“我是否给首长讲讲？”

“不需要。关于肖华的事，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

“如果肖主任再来电话问，我怎么答复呢？”

“你就说首长最近又出汗了，你们转不上去，我也没办法。”叶群拿出了她的撒谎本事。

我感到很为难。林彪最近没“出汗”，这个谎我怎么说得出口呢？万幸的是，肖华这以后并没来电话催问，我才没陷于这种困境。

这事压了几天，就快到“七一”了。

4. 叶群的恶作剧

一个傍晚，叶群正在大会堂西大厅听我讲文件。突然，警卫人员进屋报告：“汪主任来了”。

叶群一听汪主任，就紧张地站了起来，摆手说：“我不

见：你们就说我不在。”

“他在门口等着呢。”警卫人员又说。

“张秘书，你去挡一挡。就说我不在，跟这种人见面，我从心里就烦。”

我随警卫人员到了西大厅另一端的浙江厅门口，见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空军余立金政委正在那里等候。

“林副主席现在身体怎样？”汪东兴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没提叶群，我因不用撒谎说“叶群不在”而立刻感到了一阵轻松。

“还好。”我回答说。我把两位客人让到浙江厅外左侧的沙发上坐下。

“有个事情，我们想当面请示一下林副主席。”汪东兴说。“‘七一’前夕，军内一些文艺单位要在大会堂举行纪念演出，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在研究参加的领导名单时，对肖华是否可以参加的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当让他参加，有的不同意他参加。究竟怎么办为好，大家最后推我们来请示一下林副主席。他现在能会客吗？”

我说“能”。也没请示叶群，我就径直把两位客人领进林彪住的浙江厅。这在平时是不允许的，因为叶群曾经规定，林彪会客前必须先报她。但是现在，既然叶群已编造了她不在的假话，而且事情也刻不容缓，我就大胆超越叶群自作主张了。

客人见林彪的时间很短。但客人不走，我因主管接待工作，是不能离开浙江厅门口的。

待把客人送走后，我回到西大厅向叶群报告。叶群听后意外地火气大发作：

“东兴同志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是说不见吗？”我据理抗辩。

“你们谁对我说过，是东兴来了？他是主席身边的人，我能说不见吗？”

“刚才警卫人员明明白白地告诉说：汪主任来了！”

“我听的是王主任，以为准是肖华的办公室主任王新兰找我来了，我才说不见。……这是谁报告的？”

“王基山。”

“把他给我找来！”

我去找王基山。王基山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参谋。已近40岁。他身高1.80米以上，体形消瘦，略微有点驼背。从个头看，他可以当个篮球运动员，然而他并不喜欢运动，搞警卫工作倒是个好手。

“主任找我吗？”王基山问叶群。

“不找你找谁！”叶群声色俱厉。“我问你，为什么东兴同志来，你却报告个王主任？”

“我报的是汪主任。”

“汪和王你都分不开吗？”

“分得开，我是说汪主任。”

“王主任的王，你怎么念？”叶群在王基山川山东话重复了一句“汪主任”之后说：“你看看，你对汪和王就是分不清嘛！”

我和王基山都忍不住笑了，发了一阵脾气的叶群也笑了。

“算了。”叶群收起笑容，也不想再骂王基山了。这是因为王基山是临时帮助工作的，叶群对待“临时工”比我们这些“固定工”总还客气些。但王基山闯了这一点小祸，并没得到叶群的宽恕。时间不长，不知是否由此而引起，王基山被打发回原单位了。

由于林彪摇头不同意，肖华被剥夺了参加“七一”晚会的权利。在平时这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一切都已反常的年代，这往往关系到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不让肖华出场！”这等于林彪的一种表态。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从此，肖华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5. 醉翁之意不在酒

林彪、叶群利用“5·13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搞垮肖华，那又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烈火烧向人们，是不分张三李四的。这不怪群众，因为他们不是煽风点火者。但那些放火烧人的人，往往又被无情的烈火烧了他们自己。空军是这样，海军也是这样，军内一些其他单位情况都是这样。

空军的吴法宪，借林彪大整贺龙之机，把反对过他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搞了下去。但他高兴没有几天，自己又四面楚歌了。空军各院校的学生，以及空军机关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纷纷起来造他的反。有些天，他吓得不敢公开露面，只能跑到一个山洞里去躲风，恰巧正在这时候，空军的一支部队击落了一架台湾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叶群立刻跑到一些造反的群众面前说：“你们知道，这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是吴司令指挥打下来的！你们天天要揪斗他，以为他吓得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他是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委托，一直在战备指挥所里指挥对敌作战。”叶群代表林彪说的一些话，确实起到了帮助吴法宪摆脱困境的作用。由于有林彪、叶群给撑腰，吴法宪也就在空军内部放手鼓励一些人保自

己。但在空军，反吴势力一度相当强大。整个1967年的上半年，吴法宪的日子都是不怎么好过的，直到“5·13事件”发生以后，由于林彪、叶群直接插手，吴法宪才算又直起腰来。

海军的李作鹏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林彪、叶群的幕后操纵下，一举搞倒了海军政委苏振华，并且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打得靠边站。但他们在海军也给自己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特别是李作鹏，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4月份有一天，叶群听说李作鹏正在受一些人的围攻，赶快打电话给那个群众会场，编造假话说林彪要找李作鹏去谈话；等李作鹏到了毛家湾，叶群火速派人把李秘密送到京西宾馆，从此，“保护”起来。也是在“5·13事件”之后，李作鹏在海军的处境才开始有所改善。

至于总后的邱会作，就更如此了。1967年1月份，叶群亲自出马，用林彪、陈伯达亲手写的条子，才把邱会作从总后的一些造反群众手中要了出来。但在此后，总后打倒邱会作的呼声仍然很高。林彪曾收到一份要求坚决打倒邱会作的誓言书，在上面可以看到，总后机关大多数人都签了名，足见邱会作的民愤之大。如果没有“5·13事件”，邱会作即便不倒，站出来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

“5·13事件”竟然成了转折点，这是为什么呢？前面提过，这正是由于林彪、叶群精心地利用了这一事件的结果。

参加“5·13”试验演出的，都是空军保吴法宪的、海军保李作鹏、总后保邱会作的一派群众组织。演出受到冲击后，两派群众发生小型武斗，各有所伤。但在事后，叶群故意去看望她所预先支持的一派受伤人员，而对另一派的受伤

者却不屑一顾。这样就在政治上给另一派群众组织以很大压力。

“5·13事件”之后，叶群对参加过冲击的群众组织，轻蔑地称之为“冲派”。“冲派”的人数不少，同情他们的人更多。他们不久后也联合起来了，有陆军的，有海军的，也有空军的，因此也自称为“首都三军”。前者被称为“老三军”，后者被称之为“新三军”。军内造成这样严重的大分裂，完全是人为的。

“新三军”虽然有些被动，但他们并不示弱。“老三军”搞“七一”演出准备，“新三军”也积极搞，而且在阵容和规模上更胜一筹。他们竞相争取林彪、中央文革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谁优谁劣，谁存谁废，就在此一举了。

“七一”前夕，两派群众文艺工作者同时在两个地点举行纪念演出。两派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光临支持。但林彪决定只看一派的演出，叫另一派坐了冷板凳。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群众组织如果失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就等于失去了战斗力和生命力。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新三军”很快解体了。“老三军”宣告胜利了。

8月份，还在主席南巡未归的时候，林彪去北戴河“休息”。留守在北京的叶群，与钓鱼台那伙人合谋，成立了代行中央军委职权的军委办事组。五个成员中就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这样关系重大的事，他们在事后才向主席备案。

对这样的结局，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第五章 林彪和“武汉事件”

林彪是个不露形迹的人，一直让人捉摸不透。但是发生武汉“7·20事件”后的那些天，他忽然活跃起来。他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谁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

1. 江青火急见林彪

1967年7月上旬，毛主席南巡，随员有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主席先到郑州，又到武汉。正在此期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事件”。

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江青见林彪之前，通常都在事先打个招呼，这次也顾不得了，林彪因怕“出汗”，对于会客有种种“禁忌”，这次也不在乎了。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叫叶群也来！”李文普从浙江厅出来，传达江青的命令。

“出了什么事，这么急？”我问出面接待这些客人的李文普。

“听说王力在武汉挨打了！”李文普小声说。“我还有别的事。你打个电话给养蜂夹道，就说传十一楼的命令，叫

主任快到大会堂来。”

叶群虽然正在睡觉，但一听是江青叫她，便立即应召而至。

“都有谁来参加会？”叶群一到就问。

“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都到了。”我答。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叶群急匆匆地去浙江厅。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向我、张益民和李文普作应急式的布置。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

“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叶群又突然转问李文普：“首长这里的安全有问题没有？”

“这里没问题。”李文普说。

“你总是‘没问题’！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叶群板着脸孔说。“武汉事件说明，反对中央文革的还大有人在。首长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那些恨中央文革的人，能不恨首长吗？至于我，倒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恨我，那实际上是恨首长。首长是主席的接班人，反对首长也就是反对主席。因此，你们做首长警卫工作的，一定要保证首长安全万无一失。”

“你们讲文件的也要注意。”叶群又对我和张益民说：

“我早就说过，讲文件要把屁股坐在左边，坐到中央文革这一边，不要老向首长的右耳朵里吹风。”

“讲文件主要是做到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我插嘴说。

“实事求是也要有倾向性。”叶群立即驳回我的话。“实事求是是主席说过的话，它本身是对的，但不能搞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当然要说首长考虑事情决定于你们讲文件的倾向性，那也把首长的水平说低了。我是为了保护首长，也是为了爱护你们；可不能在这样的问题上犯大错误呀！……”

叶群唠叨一阵之后走了。当天夜间，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就出现了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到了第二天，北京还在下着雨，长安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仍然不断。他们举着标语，打着三角小旗，反复呼喊着一色的口号：“打倒武汉百万雄师！”“揪出武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从7月21日起，《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文章，借武汉事件大力煽动极左，大造应由中央文革和“革命造反派”主宰一切的舆论。

2. “寄希望于小将”

这样一来，钓鱼台的“左派”英雄们在林彪、叶群的眼里就变得更加可爱了。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叶群的串连下，林彪在大会堂西大厅接见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与他们进行了少有的“亲切交谈”。他们谈了什么，外人难以得知。叶群事后故意在林办工作人员面前透露说：

“首长接见几位小将，对他们说，今后就寄希望于你们了！”

林彪接见几位“小将”时，王力、谢富治还在武汉。总理亲抵武汉，把主席安全转移到了上海。又过几天，总理又第二次飞往武汉，亲自安排把被打伤的王力和谢富治接回北京。就在总理尚未返京的时候，林彪又在大会堂浙江厅与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开会，决定利用王力回京一事再一次大作文章。

“首长叫去一位秘书。”内勤前来传令说。

“叫谁？”

“谁都行。”

我去了。原来不是林彪叫秘书，而是戚本禹有事找我们。

“请你给北京市革委会的×××（我已记不清此人姓名）打个电话。”戚本禹叫我到他的座位旁，毫不客气地对我布置说：“你告诉他，原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改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时间不变。”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一百万人吧？”陈伯达在旁说。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打这个电话，是戚本禹当着林彪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面向我布置的，因此我毫不怀疑它是根据这次会议所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个电话打了，这个号称百万人的天安门大会也开了。在开这个大会之前，王力、谢富治从武汉飞回北京，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和叶群到机场迎接。开这个大会时，林彪亲自参加，中心内容是迎接王力等“凯旋”。这一切，都登报、广播，使被打伤的王力成了“英雄”。

3. 武汉事件的起因

王力等人在武汉被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事过数

日之后，才从文件中得知一点真相。原来，武汉虽分为两大派，也有过一点武斗，但主席正在那里，问题并不难解决。主席对武汉“百万雄师”这个拥有数十万群众的组织，说过“不要压制它，不要叫它保守组织”。但刚从四川窜到武汉活动的王力，一到就去武汉军区“点火”，宣布“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武汉部队支持“百万雄师”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这样信口雌黄，立刻激起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找他辩论，他则仗恃中央文革的权势，企图用“帽子”、“棍子”把人们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压下去。在这种情形下，负责警卫他的武汉独立师的一部分战士，怒打他一顿，以消胸中之恨。主席当时对王力在武汉军区的作为也很恼火，说过“王力真凶啊！”可见所谓武汉“7·20事件”，完全是王力及其在北京的那些后台老板们蓄意制造的一出闹剧。

4. 得意忘形

钓鱼台的“左派”们在林彪的支持下，在“武汉事件”之后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他们利用广播、报纸大搞舆论攻势，不但把武汉的“百万雄师”打下去，而且对其他地方的一切所谓“保守派”不断施加政治压力。结果，两派对立加剧，武斗一再升级。江青乘机抛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面内战”火上加油。

他们乘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暗中指使一些人围攻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煽动在外交部夺权。

他们认定“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在军队，公开点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义、政委

蔡炳臣的名，并把他们揪到北京批斗。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故意默不作声。

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老三军”撑腰打气。

“八一”前后，陈伯达、王力之流正式在《红旗》社论中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街头上，也出现了这样内容的传单：打倒“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打倒“刘、邓”，是“第二战役”；现在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开始了。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5. 林彪请教戚本禹

“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

“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情况的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我回答说。

“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林彪说，“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

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为稳定武汉形势，已派曾思玉等去武汉工作。经过努力，形势正在好转。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授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何必等我！”到了钓鱼台十六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由于三伏的天气太热，只穿着一件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来穿上一件裤子，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到十六楼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让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音，象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的才由陈伯达落笔。以前我以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通过这小小的场面，我见那几位“小将”并不把他们的“老夫子”看在眼里。我于是想，在一切地方，表与里

都可能有个差距吧？

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大会堂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对他信稿的改动，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把信稿重誊一遍，立即派人坐飞机把这封由他签名的信送往上海。

两天之后，送信人从上海回来，带回主席对林彪信的批示。从批示看，主席对目前形势较为乐观；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抢枪事件，似乎也不很焦虑，认为不必过急，可待时机成熟后再从容处理。

8月9日，林彪接见武汉、沈阳、济南等军区负责人，作了所谓“八·九讲话”。在讲话中，他大讲“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甜头”，因此深受中央文革的赞赏。他又说“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具有两个条件：一是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和崇高威望；二是人民解放军的存在。他这样讲，又得到主席的赞许和军内一些人的喝彩。最后，由中央文革将讲话印成清样，经主席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将它转发全国。

但国内的大乱局面并未因此而好转，武斗风、抢枪风越刮越凶，各项建设事业都已基本停滞。

6. 替 罪 羊

8月下旬，主席终于采取了扭转形势的决定性步骤：下令秘密逮捕了王力、关锋，以后又抓了戚本禹。这表明，主席是不赞成极左派再胡闹下去的；抓住王、关、戚，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着也真灵，那些极左派头面人物

从此确实有所收敛了。王、关、戚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们是罪魁，但还够不上祸首。据说，打倒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和打倒一切。但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一罪责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他们自己。但奇怪的是，当主席决定断然处理王、关、戚问题时，从林彪、叶群到钓鱼台那一帮子昔日与王、关、戚打得火热的人，一下子又都变成了反王、关、戚的英雄好汉，更为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被打倒的人，一被街头人字报点名，二被当众宣布罪名（真假暂且不论）并带上几顶帽子加以批斗，三被专案审查。但王、关、戚被抓以后，却一反惯例，悄悄压下不提。直到1968年初，才敢于喊出“打倒王、关、戚”的口号。王、关、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谁也不得打听，谁也不得过问。据说后来成立了一个“王、关、戚专案组”，但由江青一人把持，谁也不得插手。

第六章 “杨、余、傅事件”始末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所以搞得乱哄哄的，主要是坏在江青和叶群这两个女人的身上。这话未免有些天真，事情也绝非这样简单，但它确实道出了人们对这两个坏女人的愤恨程度。对于江青，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然而对于叶群，人们却知之还少，见诸于文字的公开揭露也还远远不够。

人们要想知道叶群兴风作浪的本事有多大，看看她导演的一次事件吧！

1. 危险的信号

1967年底的一天晚上，京西宾馆礼堂即将举行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去出席观看。杨成武的秘书事先给林办来电话：

“今天的晚会，已经邀请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都来参加，帮助审查一个剧目。杨代总长让我打这个电话，请你把这个事情转报叶主任，希望她能参加。如果她很忙，由她自己定。”

我把这个电话内容报叶群，叶群让我打电话问问江青的秘书，江是否参加。

“准备去。”江青的秘书回答说。

“我也去！”叶群赶忙准备动身：“备车！”

.....

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已经很晚了。但这时的林办工作人员都还没下班。我们几个秘书正在看文件，叶群进来了。

“今天晚会的事，是谁来电话通知的？”叶群一进门就板着面孔问。

“杨代总长的张秘书。”我回答说。

“以前杨代总长通知事情，都是叫秘书打电话吗？”

“不都是。”郭连凯把话接过去。“多数情况下是杨代总长本人来电话。”

“太不象话！”叶群坐在沙发上，把小手提包往旁边一摔。“这样重要的演出，他们为什么不通知首长去？”

几个秘书见叶群来头不对，知道她想作什么文章了，谁也没敢吭气。

“我为这个事找杨代总长大闹了一顿。”叶群见我们仍不吭声，继续说下去。“我把他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指着鼻子问他，你杨成武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后面这句威胁性的话，叶群是咬着牙说的。在她那吃得越来越胖的脸孔上，每当发怒时，总是显得更加蜡白，横肉四起。她当我们几个秘书说话，但她那眯缝的眼睛却盯着正前方的玻璃窗，似乎杨成武此时正站在那里。她的表情阴森而冷酷，她的目光杀气逼人。她在火性发作时的神态我曾多次欣赏过，但象这次这样凶相毕露却还是头一回。

叶群走后，几个秘书发出一阵议论：

有的为杨成武同志打抱不平，“这样的晚会首长向来不

参加。就是不通知，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说：“这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的说：“她对我们讲这些做什么？”

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后来林彪、叶群搞垮杨成武的一个信号。

2：又一个迹象

在这事发生以后，1968年初，我又从林彪那里看到一点杨成武处境危险的迹象。

林办收到一份军委办事组写给毛主席和林彪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提请任命某军副军长为某军军长。报告最后由杨成武、吴法宪签名。

我向林彪报告后，林彪问：

“你查查，这人过去是哪儿的？”

我查过林办存用的军内高级干部档卡后，告诉林彪说：

“他一直在华北野战军，是在某军成长起来的。”

“那为什么要调到某军去呢？在某军里就不能提个军长吗？”林彪不满意地问。

“……”作为秘书，这是不可能由我回答，也不该由我回答的问题。

“你打个电话给青海的刘某，他是老某某军的，”林彪交代说：“你问他，在他熟悉的某军干部里，有没有适合提起来当军长的人材？”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用长途电话找到了刘某。他报告说，如果要从某军选个当军长的人材，还是不困难的。他列举了几个可以考虑的人选，认为其中现任某军副军长的某某

比较合适。

我又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某某……这个名字我不熟。”

“军委办事组的这份报告怎样处理？”我向林彪请示。

“暂时压下！”林彪用右手做了一个向下压的手势。

……

从这件往事的回忆中，我可以察觉出林彪、叶群对杨成武已开始有所不满。但我难以理解，这能成为林彪、叶群想在杨成武身上重开杀戒的真正原因吗？

事实上，厄运终于降到杨成武的头上了。同杨成武一起被林彪、叶群搞垮的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然受到“杨、余、傅事件”株连的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和普通干部。

3. 叶群大骂吴法宪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相当复杂而离奇的。我所知的内情有限，但可以描绘出个大概。只是要想说清楚它，这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去向叶群报一份需要紧急处理的中央传阅件。一走走廊从叶群办公室传出的大喊大叫声把我惊呆了。

“……你这个司令，连个女人都治服不了吗？……”

发出喊叫声的是叶群。照理说，我作为工作人员当领导人打电话时应当立即回避。我停下脚步，想转身回走。但是出于对叶群的憎恶和怀疑，我又打消了避嫌的念头，想听听她究竟是和谁在大发雷霆，她想治服的女人又是谁。



“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

“……就这么个小小女人，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就毫无办法?!”叶群还在继续喊叫。听得出她是在和谁在打电话。由于她的办公室的门是半掩半开着，加上她又是破开嗓子在大声叫喊，声音可以清清楚楚地传进走廊。

“吴司令啊！你这个司令可危险呀！”完全明白了，叶群是在训斥吴法宪。“你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还能带动千军万马？……你手中有权，但你不会用！你怕什么？……我给你撑腰，下令把她抓起来！叫她写，不写不行！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

我听走廊的另一端似乎有人走动，就赶紧抽身撤出走廊。回到办公室，我一直在苦心思索：叶群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呢？她下令抓的“女人”是谁呢？她逼那个“女人”写的是什么呢？

4. 林立果背后吐真情

我忽然想起前些天有人传说空军内部一些人勾心斗角的事情，说不定和叶群这次电话有点联系。那个传说是，空军党办内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非，科长周宇驰，副科长何汝珍等人；另一派是党办科长某某，以及吴、余的秘书等人。两派工作人员互不服气，互相敌视。王非这一派，因有林立果给撑腰，想仗势搞垮对方，独霸党办；另一派因多是空军首长的秘书，后台也不软，因此并不示弱。两派关系十分紧张，但又势均力敌，谁拿对方都没办法。

一天正巧吴法宪、余立金不在，王非以党办主任的身份，带头向另一派发动了袭击。他们同周宇驰、何汝珍，先

拿某某开了刀。他们抓住某某闲谈中说过林彪讲“大树底下好乘凉不科学”，说是反林彪的言论，因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断定吴、余回来是不敢过问的，吴、余事实上也没过问。搞垮某某后，他们又在策划搞垮余立金的秘书……。

我以为空军党办内几个人的胡作非为，肯定和林立果有关。一天林立果到我们秘书办公室来，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我听说空军党办内现在很乱，是不是你在后面指挥的？”

“不是。”林立果摇摇头。他用斜眼睛看了看我，微微一笑：“我知道有人在幕后指挥，你猜是谁？”

“我猜就是你。你在党办工作，党办的事不能不和你有联系。”

“不对。”林立果又笑了笑。“如果猜不到，我可以告诉你：主任。”

“主任？”我听说叶群是空军党办内部纷争的幕后策划者，未免有点吃惊。叶群是能够干出这种事的，但她为什么要插手空军党办工作人员之间的争斗呢？我对林立果说：

“你说主任是后台，完全出于我的意外。”

“确实是主任。”林立果郑重地说：“这几天你没见何汝珍经常到毛家湾来吗？”

“见过。”我说：“何汝珍确实经常出入毛家湾，与主任单线来往，但谁也不知道主任找他谈什么事。主任只是说，她与何汝珍一起在江苏的太仓农村蹲过点，何是她的工作队长，因此很熟悉。”

“最近何汝珍常往这跑，就是为的党办内的事。”林立果说。“主任听何汝珍说党办分成两派，很有兴趣。何汝珍

对她说，余立金的秘书与杨代总长的女儿的关系可能不大正常。主任一听说，更有了兴趣。主任就是这么个人，爱听、爱问、爱管别人的事。主任问何汝珍，你听谁说他们关系可能不大正常？何汝珍说，我是听那位秘书的老婆讲的。她找支部告的状，说丈夫过去与她的感情很好，现在变坏了。她怀疑丈夫经常陪着那女的出出进进，准是有了问题。主任交代何汝珍，你回去找那秘书的老婆，叫她把她说过的话写下来，交给支部。何汝珍回去找她写，但她一听说写成文字，这又牵扯到杨代总长的女儿，非同小可，因此说什么也不肯写。……”

“她最后写了没有？”我问。

“没写。”林立果说。“她对何汝珍说，就算我没说那些话，你们别叫我写了，我也不再告状了。”

“这事就拉倒了吗？”

“没有，下一步就看主任了！”

……

这是两天前的事。现在，我把它与叶群的电话联系起来，不难判断出：叶群下令吴法宪抓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秘书的妻子，她逼迫她写的就是涉及到那两人关系的告状信。

有人滥发淫威，也得有人甘愿充当打手。吴法宪遭到叶群一顿痛骂之后，他果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那秘书的妻子抓了起来。他派了一个空军副参谋长亲自挂帅，另带何汝珍等几名打手，把她押解到一个山沟中的空军某战备工事里，逼迫她写下她所说的话。但她已经发现被人利用，她始终没有屈服。

叶群迫害她的行为令人发指，但其后果尤为严重。事

实上，它成了数日之后演成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线。

5. 当面作人，背后作鬼

吴法宪在叶群的幕后指挥下，压服那女的不成，又把她的丈夫抓了起来。这一下事情闹得更大了。

余立金打电话找叶群，叶群推托不理。

杨成武代总长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赵志珍也来电话找叶群，叶群同样不睬。

“如果叶主任太忙，不能接我的电话，就请你把我反映的情况报告她，也报告给林副主席。”赵志珍在电话上对我说：“空军现在搞乱套了。余立金政委的秘书为了照顾我在空军报社工作的女儿，有时和她接触多一些，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党办就有人造谣，说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纯粹是胡扯，我听说后也没有往心里去。但他们实在不象话，硬逼着那秘书交代所谓的‘关系’问题。那秘书理直气壮地顶了他们，他们竟把他抓了起来。这件事都是空军吴司令下令干的。吴司令这样干太不应该了，它不但在败坏我女儿的名誉，而且这样下去，就把空军搞乱了。如果不及及时制止空军一些人胡来，后果很难设想。我是担心哪！请报告叶主任，让她注意一下空军的动向。”

我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电话。叶群装作吃惊的样子问：“吴司令抓人，她都听说了，我怎么不知道？”叶群笑了笑：“吴司令向来优柔寡断，这次怎么这么大气魄？不过我确实现在才知道。”

叶群扯谎，我已司空见惯。我故意默不作声，看她怎样

表演。

“你回个电话给她。”叶群对我交代说。“你对她说，她来的电话知道了。她反映的情况我一定向首长汇报。”

我回电话给她，她的情绪有些激动：“请你报告叶主任，谢谢她的关心。刚才我又听到一些新的情况，吴司令越来越不象话，有很多话光用电话说，是说不清楚的。我想到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见见叶主任就行了。希望叶主任抽一些时间，一起见一下余政委和我。……”

叶群听了我转报的赵志珍电话后，冷冷地自言自语道：“赵志珍这个人，真是得寸进尺！”她站起身来，想向林彪那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地问：

“他们想来见主任的事怎么答复？”

叶群一边向外走，一边答复我一句：“我得和首长商量一下。”

6. 故伎重演

过了一会儿，叶群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冲我说：“首长说见，不见不好。你打电话叫赵志珍和余立金到毛家湾来。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在场做一下记录；不然他们是二对一，我以后有口难辩。”

“老李！”叶群又转过头去对李文普说：“在安全问题上，你要注意一下！”

“不会有什么事！赵志珍主任和余立金政委都是常来的客人，对他们用不着担心。”李文普一如既往，总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所忧虑。

“你总是没事，没事！”叶群板起面孔。“常言道，

君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我也料想不会有事，但万一有事呢？赵志珍是个女性，她不一定敢；但余立金膀大腰圆，况且人心隔肚皮，谁能保他不变哪？！……”

李文普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想起叶群在贺龙见林彪时表演的那出恶作剧，觉得实在是可恶又可笑。

“好吧，我注意一下。”李文普只好顺着叶群说了一句。

“你也不要兴师动众。”叶群继续向李文普布置，用意是既要有所防范，又要不露声色。“只要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你或者派别的警卫员在走廊里来回走走，一听室内有动静，就赶紧冲进去……。”

下午二点，赵志珍和余立金准时到了，叶群对两位来客，暗中如临大敌，明里却异常亲热。

“余政委你最近好吧？”叶群问余立金。

“还好！”余立金显得勉强。

“空军的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的不多，你们来谈谈好。”叶群故作超然姿态。“你们两位谁先谈？”

“我先说说吧！”余立金声调低沉，但掩饰不住满腔愤怒。“我和吴司令的关系本来很好，但近来变得很紧张。他的一些作法，我觉得很反常。他下令把我秘书的妻子抓了起来，至今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最近他又背着我，把我的秘书也抓了起来，逼他承认与杨×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胡来吗？一个空军司令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作为司令，他想处理政委的秘书，难道不应当事先同政委商量一下吗？我找他问这件事，他支支吾吾，态度十分蛮横。我觉得这个人变了，他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他抓他们的关系，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杨×是杨代总长的女儿，她刚到空军报社工作，一切都很生疏；我怕一个女孩子进进出出不方

便，就派秘书去照顾她，这有什么不好？杨代总长现在正生病，吴司令这样搞，对杨代总长也不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看吴胖子有鬼。”赵志珍接着说。她对吴法宪十分恼火，因此就不顾礼貌直接称他的绰号了。“他明知他们的关系是没什么的，硬是要这样搞。我看他居心不良，想把矛头指向杨代总长。”赵志珍气得直发抖，再无法继续讲下去了。

“你们看怎么办好呢？”叶群装得很平静，试探地问。

“让林副主席说句话，批评一下吴法宪，不能再这样搞了！”赵志珍建议。

“余政委呢？”叶群问余立金。

“我也没办法。”余立金阴郁地说。

“那就这样吧。”叶群说。“你们谈的情况，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然后一定向林彪同志反映，对杨代总长和余政委，林彪同志都是很信任的，你们放心好了。吴法宪搞的一些事，林彪同志和我确实是不知道。你们回去后，不要着急。”叶群对赵志珍说：“叫杨代总长好好养病，别的事不要操心。”叶群又对余立金说：“余政委你要多多保重！”

……

客人走后，叶群立刻吩咐我：“打个电话，叫吴法宪快来！”

不到两刻钟，吴法宪到了。吴法宪在毛家湾门口，见我接他，忙问。

“是叶主任叫我来吗？”

“是。”

我领吴法宪进了毛家湾的院子，还没进房门，吴法宪低

声对我说：“要不是叶主任，我早就完了！！”

我把吴法宪送到叶群办公室就退了出来，叶群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又打铃叫秘书。

我上去后，见叶群同吴法宪正从走廊里走出来。叶群右手搭在吴法宪的肩上，左手指三划四，谈话声调很低，不知在向吴法宪密授一些什么。当见我走近他们面前，叶群才转向我说：

“张秘书，吴司令要走了，你代表我送一下。”

吴法宪还没走出走廊，只听叶群又大声对他吓唬一句：“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却！”

“是！是！”吴法宪奴颜婢膝地连说了几个“是”。

7. 受害者的控诉

事过一天之后，赵志珍接二连三地给林办来电话。她明知找到叶群不容易，索性把要倾吐的话都跟秘书讲了。

“张秘书，你报告叶主任，吴法宪简直把人快要气死了！”赵志珍在电话中的语气，使我感到她气愤已极，“我们本以为他会收敛些，但现在变得更放肆了！我报告了病中的杨代总长，杨代总长说，吴法宪所以这样干，是由于上了他身边几个坏人的当。他身边的几个坏人就是王非、周宇驰、何汝珍。这几个人编造谣言，煽风点火，吴法宪就偏听偏信，胡作非为。杨代总长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这几个坏人进行严肃处理，否则空军就无法得到安宁。”

我向叶群报告了赵志珍的这个电话，叶群气哼哼地骂了一顿：“多管闲事！……”

又过了一天，赵志珍再次来电话，语气愈来愈急躁，

“吴法宪简直要翻天了！杨代总长说什么他都不理，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他在空军到处散布坏话，攻击余政委，攻击杨代总长！叫他搞的，我女儿都无法上班了，整天当着我的面哭泣。吴法宪非要把人逼死他才痛快吗？吴法宪这样无法无天，林副主席和叶主任知道吗？我要求林副主席给杨代总长作主，如果杨代总长不称职，就把他撤了算了，叫吴法宪当总长！世界上还有个讲理的地方没有？！……”

在这个场面里，我这个秘书很难当。我知道这一切都坏在叶群身上。但是我能够把这一切底细告诉赵志珍吗？我也理解赵志珍如今为什么这么恼怒。照秘书的职责，我可以把赵志珍的话如实地告诉叶群，但那样作给赵志珍以至杨成武带来的会是什么呢？出于对赵志珍的同情，在向叶群转报她的电话时，我故意把她的那些容易刺人的牢骚话给省略了，但这又顶什么用呢？

很显然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就看如何收场了。

3月19日下午，林彪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正碰上叶群从林彪的房子里走出来。

“是首长打铃叫秘书吗？”我问叶群。

“是我打的铃。”叶群说：“赶快准备车，我要去十一楼。”

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去了，我估计肯定与空军的事有关。叶群是从林彪那里出来的，这说明她去找江青已得到林彪的默许。但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确实令人担忧。

8. 可怕的自白

叶群走后不久，林立果到秘书办公室来，我把他让进一

间小会客室。

“空军最近的情况你清楚吗？”我问林立果。

“不很清楚，但知道一些。”林立果说。

“我看现在的问题已不在于空军内部了，而是涉及到杨代总长的头上。主任表面上双方都支持，但在背后一个劲的纵容吴法宪反对杨成武，她想干什么呢？”

“很难说。”林立果又歪着头，用斜眼睛看了看我。

“我看主任的意图是把杨代总长搞垮。这怎么行呢？‘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上许多老干部都垮了，军内高级干部也垮了不少。杨代总长如果再垮了，还有几个能顶替他工作的人才呢？再说，有些干部被整垮，还抓了些历史问题当借口；杨代总长历史上却没问题可抓。主任这样搞下去，将来怎么收拾呢？”

对我的忧心忡忡，林立果置之一笑。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历史问题，而是在于想不想打倒他。”林立果的年龄比我小十多岁，但他现在却教训起我来了。“你太天真，罗瑞卿被搞垮了，他有历史问题吗？肖华被搞垮了，他有什么历史问题？照理讲，杨代总长是不会垮的。但这就要看说话算数的人想不想打倒他。要想打倒他，就不愁抓他的辫子。多少人垮了，不都是这样吗？”

林立果的这些话，令我吃惊。“文革”以来垮了那么多干部，难道都是这样垮的吗？我当时并不认真对待他的话，以为他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能懂什么呢？但事过之后，我慢慢领悟到，他尽管与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但他讲的毕竟是实话。“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悲剧，不都是这样演成的吗？

9. 居心不良的“关心”

叶群从钓鱼台回来之后，把我和林立果都找了去。

“张秘书陪老虎到杨代总长家里去一次。”叶群布置说。“杨代总长正生病，这几天心情也不太好。老虎代表首长和我去看看他，对他在精神上是个安慰。”

“和杨代总长谈些什么？”林立果问。

“不用谈什么，你们去就是看看他。”叶群说。

在去看杨代总长的路上，我对林立果说：“主任一会儿搞杨代总长，一会儿又关心杨代总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立果还是一笑：“难说。”他不肯多讲。

到了杨代总长住地，赵志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本来我是陪林立果来的，可是林立果这个主角十分呆板，他只是反复地说，“让杨代总长好好休息”。再就没词儿了。我被弄得很窘，不能多说话，又不能不说话。赵志珍陪我们在楼下会客室坐了十多分钟，一心想听林立果来说点什么，但什么也都听不到。为了打破这种沉闷不语的气氛，我提议去看看杨代总长，这才使大家轻松了一些。

赵志珍把我们领到楼上，一直到杨代总长的床前。

“林副主席派老虎看你来了！”赵志珍先向杨代总长打招呼。

“谢谢林副主席！”杨成武想坐起来，但赵志珍怕他晕倒，就让林立果坐在他床边，使他安静地躺了下去。

“希望杨代总长好好休息。”林立果还是重复这句话。我以为他准是在按照叶群的意图行事，这次来仅仅是看看杨成武的病情，作一下姿态，而绝口不谈它事。事实也可能确

实是这样，但这也有某种误解。林立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非正式场合，在他熟悉的少数人当中，他谈起话来并不涩口，有时甚至能说出几句与他的年纪和经历都不相称的话；但在一些需要讲究点礼节风俗和世故的场合，他却象一个呆子，一句客套话、寒暄话都不会讲，痴呆得令人发笑。叶群派林立果去探望杨成武，并不是真的爱护杨成武，而是在向他发动突然袭击前的一种两面派手法。可怜的杨成武，直到他被捕前的最后一刻还以为林彪是关心他的。3月22日深夜，杨成武被一伙武装人员带走了。

10. 不光彩的“使命”

8月22日深夜，叶群从大会堂打来电话：

“我正在一组这里开会，会议已决定对杨成武采取必要措施。”叶群在打这个电话的同时，可能已对杨成武动手了。叶群继续对我说：“我想托你办件事，你能办吗？”

“什么事？”我问。

“我想托你到丁×家去一趟。”叶群说。“前些天，我送给了丁×一套黄呢料衣服。丁×和杨家的关系很好；现在杨家出事了，我那套衣服留在那里不太好。我想把它要回来，你能不能去一趟？”

我感到一阵恶心，这成什么事呢？丁×很爱交际，平时既和赵志珍过往甚密，也和叶群有些来往。叶群为了拉拢丁×，给了她一套衣服。现在政治行情变了，叶群对丁×的态度也变了。但已经给了人家的东西，有什么脸皮往回要呢？

“这很难办。”我说，“主任已经把东西给了人家，我怎么说得出口把它要回来呢？”

“你不要为难，这很好办。你去对丁×说，我前些天给她的那套衣服，式样很好，我想再看看。这样她就不好意思不给你，她也不会多心。”

“再说，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看了看手表：“都12点多了，丁×早就休息了。明天再说不行吗？”

“明天就晚了。”叶群有些不耐烦。“现在你就去，不要拖。丁×是个夜猫子，这个时候不会睡觉。不和你罗嗦了，我还得去开会呢；有什么困难你和老郭商量一下……”不容我再说，叶群把电话放下了。

郭连凯在旁听我打电话，在我放下耳机后，忙问我什么事。我把叶群无耻地想从丁×那里要回衣服的事向他述说了一遍。

“主任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郭连凯皱着眉头对我说。“堂堂统帅夫人，林办主任，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竟能干这种丢人的事！”

“也不怪！”我说。“否则，主任就不是主任了！”

“你打算怎么办？”郭连凯问。

“我不想去。这成什么事！”

“不去还不行。”郭面有难色地说：“主任的为人你还不知道？你不去，她就会作你的文章。大人物都怕她，咱们这些小人物还能受得了？去就去吧，丢她的人与咱们工作人员何干！”

我觉得郭连凯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为这点事和叶群搞翻也犯不上。我拿起电话要了丁×，恰巧她并未休息。我照叶群交代的一套假话，把那套衣服从丁×那里要了回来；不，不是“要”回来的，应当说是骗回来的。叶群说是拿回来再看看，给丁×的感觉是看后再送回去；但实际上，这衣服的

所有权已永归叶群了。

这事情并不大，但它能反映一个人的灵魂，叶群的灵魂是极端丑恶的；我因当了这个倒霉的林办秘书，灵魂深处也受到了损伤。

11. 林彪出场前后

3月23日这一天，毛家湾内忙得乱哄哄的。

叶群从空军叫了两个人来，帮助林彪准备讲话材料。这两个人：一个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非，另一个是周宇驰。叶群亲自向他们授意，林彪讲话的主题是公布杨成武的“罪状”。杨成武有什么“罪状”呢？叶群开始列出五条，第一条就是“反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任何人，列出这一条是最致命的。第二条是反林彪。第三条是反吴法宪；还有两条，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到了傍晚，叶群从大会堂打电话回来，说主席点了三个题目，让林彪讲一讲：第一条是反对宗派主义；第二条是反对两面派；第三条是从哲学上讲讲“相对与绝对”。叶群又让那两个“秀才”重新按这三个题目整理材料，但林彪晚上九点就要讲话，时间已来不及。那两个人拼凑了一下，就把材料塞给七点多钟才从大会堂回来的叶群。

叶群又向林办工作人员布置任务：我的任务是给林彪拟几条口号；李春生的任务是给林彪选几条马列或毛主席的语录，李文普的任务是提醒林彪带《语录》。工作人员被叶群支的团团转；叶群还不时地发着脾气，威胁说谁误了事就找谁算帐。

我拟口号的任务最先完成，但也最先遭到叶群的痛斥。

“你拟的口号，只有正面的，没有反面的，这算什么？”

叶群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文化大革命’中喊的口号大都是这样。”我辩解。说。“一般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少废话！”叶群拦住我。“一定加上几条：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贺龙；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有了这几条，才算旗帜鲜明！”叶群想了一下又说：这还不够，还要加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我又按叶群说的，把“口号”重新整理一下，让保密员李根清誊抄一份，给了叶群。

林彪、叶群又急匆匆地去大会堂了。我和林办几个工作人员也到了大会堂会场，听听林彪讲话。会场的人坐得满满的，据说全是部队团以上干部。大家听说这个会有中央首长讲话，最后还可能受到主席接见，因此尽管许多人已等候了多时，也都很兴奋。我们到达会场后，也坐在普通观众席里，静心等候。但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才见主席台上有人走出来了。

为首的是林彪，其次是总理，后面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他们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场内鸦雀无声。几位老师也来到会场，但他们被安排在普通观众席里，这种台上与台下的不同处境，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党和军队的历史作了颠倒。

“同志们！现在开会。”林彪开始讲话了。“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出了问题？在场内听林彪讲话的近万名团以上干部都完全出乎意外。我注意环顾了一下四

周，见每个人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一双双目光都盯在主席台上。林彪的讲话，果然就是叶群预先传的那三个题目。林彪说，杨成武的第一条罪状是搞宗派主义，证据是想打倒吴法宪、黄永胜等与他不相上下的军内高级干部，说明杨成武有野心。听到这里，我心想我作为林办秘书，应该说是一个最知内情的人，但林彪罗列的这些罪状，我怎么在平时一点也没有听说呢？难道这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林彪讲的这些“证据”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林彪给杨成武列的第二条罪状，说他是“两面派”，在这一条里，为了证明杨成武反对林彪，林彪不指明地把总参处理一个林办工作人员妻子的问题也作为一条重要“证据”。林彪给杨成武列的第三条“罪状”是，他写了一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把权威说成是“绝对”的，因此违背了辩证法。林彪想从哲学上讲清楚“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但他自己就是爱讲“绝对”的，因此他越讲，大家听了越糊涂。

林彪在讲话时，一面在打杨成武，一面在捧江青。但我注意到，林彪故意压低了调子。按照叶群事先划的框子，应当把江青吹成“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林彪并没有这样讲。林彪说，江青是“我们党女干部中的杰出的女干部，女同志中的杰出的女同志。”看得出林彪这样讲已经很勉强，但在主席台上的叶群颇有些坐不住了。别人在讲话，叶群不时地扯起沙哑的破嗓子插进来带头呼喊口号：“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讲话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也都讲了话。陈伯达以下那些人的讲话与林彪讲的完全是一个调门。所不同的是：陈伯达鼓吹抓“小爬虫”、“变色龙”，康生鼓吹揪出“黑后台”（使人感到他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师），

江青则拼命地自吹自擂。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宣读了一份中央的命令，免去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宣布余立金为“叛徒”，逮捕法办；免去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任命温玉成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

这就是所谓“杨、余、傅事件”的一部分真相。

第七章 毛家湾与钓鱼台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北京城，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住的中南海之外，有两个地方最引人注目：一个是林彪、叶群的住地——毛家湾，另一个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住地——钓鱼台。我当时作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目睹了毛家湾与钓鱼台的主人们你来我往，眉来眼去，也多少闻到了一点他们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血腥味儿。用不着我多作评论，让人们通过我看到的事实，自己去作判断吧。

1. “十一楼”的常客

我到林办工作后的几个月内，没见林彪与江青有过直接来往，但叶群却是江青住地——钓鱼台十一号楼的常客。

“叶群呢？”林彪有一次查问。

“上钓鱼台去了。”工作人员如实回答。

“打个电话叫她回来！”

叶群在钓鱼台的去处，一是十一楼——江青，一是十五楼——陈伯达。有事找她，只要给这两个地方挂个电话，大半能找到她。果然，我在江青那里把她找到了。

叶群回到毛家湾后，见过林彪，出来就训斥我一通：

“谁叫你往十一楼打电话？”

“首长。”

“首长只听说我在钓鱼台，并不知道我在十一楼。”

“十一楼不在钓鱼台吗？”我总想把事情说清楚。

“十一楼在钓鱼台，但钓鱼台并不是十一楼，你懂吗？”

叶群教训我说：“钓鱼台还有八楼（康生住地）、十六楼（中央文革住地），多着哩！别的楼问题不大，唯独十一楼，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不懂事情的分量，我也不好有什么话都对你们讲。今后规定一条：不准你们随便打电话给十一楼！”

“如果首长叫打电话找你呢？”

“我去对首长讲。首长不会再叫你们打这样的电话。”

叶群接着发开了牢骚：“人家在那谈正事，他在中间插杠子，这不是失礼吗？……”

2. 林彪与江青之间

叶群后来怎样对林彪说的，我不得而知。林彪也确实没再让秘书打电话给江青住地。在我印象中，叶群经常往江青那里跑，大半是背着林彪的。听林豆豆说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蹲点”，不在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答：“看过。”江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

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很紧张，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不久后，以中央名义向全党转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听林办的老秘书们说，主席对这个“纪要”亲自修改三遍；我在林办的档案中，也曾看过主席批改稿的抄件。自此，江青的名声大振，林彪也从中大大沾了光。

尽管如此，我从种种迹象中觉察到，林彪对江青的戒心依然如故。

3. 唯“老夫子”之命是从

“文革”开始以后，钓鱼台一时成了“造反派”倾慕的中心；然而林彪自恃“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和他由来已久的高傲性格，对那些“文人”并未看在眼里。我看到，经常主动和钓鱼台套热乎的还是叶群。

1967年入冬后的一天晚上，叶群从外边回来，一进秘书办公室的门，就从小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往桌子上一摔：“这份文件是谁给首长讲的？”

我一看，是总理批出的一份外交特急传阅件。总理批：“拟同意，送主席、林彪、伯达、康生同志核阅。”主席已圈阅。我给林彪报过之后，林彪让画圈退回中办。

“我讲的。”

“总理批出的这份文件有问题！”叶群的脸色很难看：

“首长不该画圈！”

“……”我一时语塞。圈是林彪让画的，一个秘书知道该与不该！再说，一个林办主任有什么权利干涉“首长”对文件的表态！话已到了嘴边，但我又不得不咽了下去。

“老夫子（陈伯达）说，”叶群见我沉默不语，又接着说：“林彪同志先画了圈，他就是有不同意见，也不好说话了。”

“主席都圈阅了，有什么问题？”我实在憋不住了：“不是说‘主席画圈我画圈’吗？”

“主席的圈，不一定是主席画的。说不定是秘书画的呢！”叶群开始强词夺理。

“主席画圈很有特点，”我指了指主席圈阅的那份文件：“下笔很慢，画的正大又圆。如果怀疑主席的圈不是主席画的，那不就乱套了吗？”

“主席画了圈，也不能说就是主席同意了。”

我还想再和叶群争辩几句，不知谁在身后拉我衣服一下。我又沉默了。

叶群见秘书们谁也不再吭声，遂把那份文件装在小手提包里。一边往外走，一边冷着脸对我们几个秘书说：“今后凡首长表态的文件，必须经过我把关才能发出。不论什么传阅件，凡老夫子和中央文革没表态的文件，你们先不要给首长讲，让钓鱼台先看去。”她还边走边嘟囔：“我也难哪！……”

4. 江腾蛟泄露天机

叶群几乎天天往钓鱼台跑，她在忙乎些什么呢？有一天从上海来的一个电话，多少向我透露一点叶群与江青频繁往来的秘密。

“上海空×军江政委来的电话，可以接过来吗？”军委一号台总机问。

“可以接过来。”我说。

“我是江腾蛟。你是哪位秘书？”

“张云生。”

“张秘书，你好！”对方非常讲客套。“我们没见过面。不太熟。我认识你们的郭秘书、赵秘书、李秘书，这次又认识你了。”

“江政委有什么事吗？”

“我想和叶主任通个电话，可以吗？”

“叶主任不在。”

“叶主任太忙，这个我了解。她现在的担子很重，我不愿打扰她，也希望你们秘书同志多多保护她，帮助她。”

“江政委还有事吗？”

江腾蛟反问我：“你那里有电话保密机吗？”

“有。”

我们双方打开保密机的开关，这时江腾蛟才开门见山地讲话了：

“叶主任让我协助江青同志办的事，我都办了。”江腾蛟说。“这个情况，我本应直接向叶主任报告，但她太忙，我就不打扰了。我相信，林办的秘书都是绝对可靠的，所以

我把情况对你简单讲讲，你转报叶主任，好叫她放心。无锡那里，我派去的红卫兵已经抄了汪敬先的家。抄的东西已经弄回上海，不久可以送到北京去。在上海这里，我按照指示，派红卫兵搞了一些东西，不久也可送去。总之，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问题。我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忠心耿耿的，对江青同志和叶主任也是忠心耿耿的。我知道做这样的事情担点风险，但我不怕。可是我只能保密电话上这样大胆讲话，在普通电话上还不敢。我见过、碰过的事情很多，不能再吃泄密的亏……”

江腾蛟的电话，令我十分吃惊。几个月来，一些红卫兵打着“揪黑帮”、“破四旧”的旗号，到处搞打、砸、抢、抄、抓，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但还可以把它理解为受某种煽动的极左思潮。现在我却第一次听说，有人竟在暗地里操纵一些所谓“红卫兵”，在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卑鄙勾当。这样干的不是别人，其后台竟是江青和叶群！

江腾蛟报告的内容，我能明其大意，但里边究竟指的什么，我还听不太懂。无锡的汪敬先是什么人？江青为什么要暗中指使人抄他的家？江腾蛟为江青在上海搞的“东西”是什么？当秘书的只有照录原话的义务，没有追根问底的权利。因此，我也就不再在解开这类谜底上费心劳神了。

我向叶群报告后，叶群对江腾蛟的效劳很满意，但对我知道了这件事的一部分内情有些不安。

“你听懂了他讲的是些什么事吗？”叶群故意试探我。

“我不太懂。”我尽量装糊涂。

“听懂听不懂关系都不大。”叶群极力想使我不注意这个事。“其实，十一楼也没明确说让江腾蛟派红卫兵去干什么事，只是暗示他注意。不想江腾蛟这样积极！不过，既然做

了，这也符合大方向，没有什么！”

5. 一个神秘的文件包

不久后，我又接触一件神秘得出奇的事，大概和江腾蛟上次的电话内容有些联系。

有几天，赵根深陪着叶群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去了几次。老赵做些什么，他一般是不背着我的，这次却不然。我问他，他也只是说叶群叫他帮助整理一些文件，而不愿具体讲。我想，老赵是个谨慎的人，大概是由于叶群严令他“保密”，他才这样缄口吧？！

但有些非要工作人员帮助干的事，要向他们“保密”是很难的。

一天下午，老赵从叶群办公室回来，拿着一个象饭盒大小的纸包。

“老张，主任叫咱们两个去办件事。”老赵一边说，一边在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

“什么事？”我问。

“就是这个事。”老赵指了指那个纸包，然后继续写着。“主任交代我不要对任何秘书讲，包括你在内；但我想，她既然让你陪我去空军送这件东西，不告诉你也不好。这是十一楼委托主任保存的一包材料，都是上海红卫兵抄出来的。前几天我陪主任去东交民巷清理材料，就是清理这类东西。上海送来一麻袋，清理后选出一批，主任送给了十一楼。十一楼又从中选出一些，就是这一包。”

“都是些什么材料？”我好奇地问。

“大部分都是文艺界的，什么日记啦，书信啦，笔记

啦，等等。里边有郑君里的，赵丹的，反正都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为什么十一楼自己不保管，偏要委托主任保管呢？”

“谁晓得！”老赵说。“听主任讲，十一楼说她存的文件太多，对自己的秘书又不大相信，怕弄丢了。她认为毛家湾最可靠，所以叫主任给保管。”

“那么现在是叫你和我保管吗？”

“不。主任说毛家湾这地方也靠不住。她交代把这个包交给空军保密室，因为空军的档案文件都在战备工事里，她认为那里才保险。走吧，主任叫咱们两个去空军办这件事。”

赵根深拿起电话，和空军保密室打了招呼。然后我们坐车到空军大院，直奔司令部保密室。老赵是从空军调来的，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

老赵找到了保密科科长，当面向他交代这件事。但并没

这个神秘的文件包在空军保密室存了一个来月，江青又把它要回烧毁了。

那是一个晚上，老赵对我说：“主任已经从钓鱼台直接给吴司令去电话，让他派人把咱们两个送空军保密室的文件包送到毛家湾来。听说，十一楼过一会儿也和主任一起来毛家湾，不知有什么事。”

江青来毛家湾，是为了见林彪。陪她来的除叶群外，还有谢富治。这可把负责接待工作的老赵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多小时，老赵才回到秘书办公室。

“那个文件包，已经烧毁了。”老赵小声告诉我。“烧毁前，十一楼亲自作了检查，然后指定谢富治和主任监烧。烧了也好，我们用不着担心别的了。”

6. 林彪与江青迎头相撞

1967年2月初的晚上，我正在给叶群讲文件，只听从林彪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怪叫：

“叶群！——叶群！——”

我急忙放下文件，跑向走廊，见林彪还在大喊大叫：“叶群！叶群！”林彪的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他平时冷漠而严肃，很少露出笑容，也很少能被人看出他的喜怒哀乐。他就是生了气，我们工作人员能看到的也只是板着面孔，语气粗硬些，象现在这样火性大发作，我还是初次碰上。

“首长，怎么了？”我走上前去问。

“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林彪的怒气仍然很大。听他说要“赶走江青”，我惊得不知所措。刚转身回去

找叶群，叶群进来了。

这种场面，工作人员是不能旁观的。我赶快回避，只听在林彪会客室的门口传来江青的声音：“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与林彪的暴跳如雷相对照，江青的声调显得比较平静。江青还在说些什么，我离开走廊后就听不到了。我在想，林彪为着什么事和江青闹翻了呢？这是不好惹的一对。如果是旁人，不管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江青，或者对待林彪，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在林办工作人员中，我是这一场面的唯一目击者，因此

问我。

“不少。”我说。

“内容怎么样？”

“多是各大军区的来电，反映军内重大情况和各地部队三支两军的动向。内容都很重要。”

“这些文电我没看过，也不知你们说的如何重要。”叶群说着就走了。

“主任想看军委收电吗？”我主动插上问。

“不是我想看。”叶群边说边走。“十一楼说军委文件没意思，今后不要给她抄送了。她说，她今后不愿再看军队的文件。”

叶群走后，我一直在琢磨：江青为什么不愿再看军内的文件呢？这是不是和那天林、江之吵有关呢？难道江青是想作点颜色给林彪看看吗？最近这几天，叶群常常念叨：

“难哪，难哪！”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在这同时，林彪也严格约束叶群，不准她老往钓鱼台跑。叶群该跑还是跑，只是不让林彪知道。但林彪如果因此而真的动起火来，叶群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她在想办法稳住林彪，也在煞费苦心修好钓鱼台。

“我上钓鱼台去了。”叶群在一天下午出去以前，向秘书们打招呼说。她打这样招呼，是怕突然有什么紧急事需要她回来，便于工作人员及时用电话找到她。她说：“首长怕影响我休息，不愿意让我常去钓鱼台，但我不去怎么行呢？我在为首长跑，但他现在不太理解，也许以后会理解的。所以，我去钓鱼台的事，你们不能叫首长知道。”

“如果首长问呢？”

“如果首长找我，你们就说我在休息。你们要保证众口



“叶群，叶群！你快给我把江青赶走！”林彪从会客室跑到过道里，怒气十足地大声喊。

一词，不管首长怎么问，你们都必须一律说我在休息。几个内勤由李文普作布置，也不准他们乱说。”

叶群的这套布置，确实骗住了林彪。有几次林彪查问：“叶群呢？”工作人员都回答说：“在休息。”其实叶群已去钓鱼台。

这一次，叶群已走多时，内勤又来传林彪的话说：“找主任。”

“你没告诉首长，主任还在休息吗？”秘书问。

“告诉了，但首长还是要找。”内勤笑了笑。“首长问过几次，我们都说主任在休息。首长说，叶群怎么一天老是睡个没完呢？看来首长有些怀疑了。”

“是不是主任出车时，首长听到汽车响声了？”我问郭连凯。

“不会。”郭连凯笑着说。“首长房间的玻璃隔音，主任又是从东侧门出车的，绝听不到。我去对首长说说。”

郭连凯又一次去对林彪说叶群“在休息”。林彪这才不坚持再找了。但老郭还没退出来，叶群在林彪的正门外出现了！

“他们都说你在休息，你怎么这么快从正门进来了？”林彪迷惑不解地问叶群。

“谁说我在休息？我刚从钓鱼台回来！”叶群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但把郭连凯弄得十分尴尬。叶群继续乐呵呵地对林彪说：“是我告诉他们那样说的，怕你着急，我从钓鱼台带回来好消息，你听了就不会生气了！”

.....

8. 笑看叶群“挖墙脚”

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除了叶群——江青这条线之外，

还有一条线：叶群——陈伯达。如果说前一条线有点叶群巴结江青的味道的話，那么后一条线则相反，给人的感觉是陈伯达想借叶群投向林彪这位靠山。但是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有点政治资本，因此与其说陈伯达是“投”，倒不如说是叶群在“拉”。只是到了后来，由于钓鱼台内部的分化，陈伯达不用“拉”也来投了。

叶群拉陈伯达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

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

“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他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叶群对我们工作人员讲这些干什么呢？她是为了美化陈伯达？似乎这对陈伯达的形象并无帮助。她是为了炫耀自己？这倒很可能。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中央第五号人物，大名鼎鼎的“秀才”，响当当的“左派”。与这样的人物相近，总可以反衬自己并非一般。但叶群大概是忘记了自己是林彪夫人，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正派的女性，总不该只身闯入一个男性的卧室，坐在床边与人攀谈吧？即便这个女性不在乎这一世俗戒律，也总不该在旁人面前津津乐道地张扬自己的不体面吧？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地透露，陈伯达和他妻子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在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

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

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挺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很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象叶群那样形之于表。对于叶群的寒暄，他也不以语言相对。他的沉默寡言，正与叶群的锋芒毕露形成对照。我想如果不是性格上的原因，也肯定是这位客人饱经风霜，才使他显得这样老练。他一声不响地静听叶群对他有什么吩咐。

“我们到隔壁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叫我陪着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匆匆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的交代，把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主任为什么对陈伯达的事情这样感兴趣呢？”我说出了对叶群与陈伯达的关系上的疑虑。“刘××与陈伯达的关系变得这样坏，与主任从中插一脚有没有关系呢？”

“难说！我看没有主任插手，也不至于这样。”

.....

几天后，叶群自己露出了一点马脚。叶群见了于运深，对他说：“小于，你那天帮助办了一件好事，应当感谢你。”

“我是照主任的指示办的。”于运深绷着脸说。“事情办了，但难说好坏。说不定刘××在背后骂我呢！”

“她不会骂你！”叶群接过去说。“她骂的是我，恨的是我。她对我和老夫子接触多一些，就骂我是挖她的墙脚，自己吃了醋。我才不怕她骂呢！我和老夫子之间的来往，都是为了正事。老夫子是文革组长，我是首长的办公室主任；没有这一层，我老找他干什么？女人之心就是狭窄、嫉妒、多疑，目光短浅！不过我也是个女人，我可不象她那样！”

叶群越是这么说，越使我琢磨起“欲盖弥彰”这句成语来。但叶群讲的也有些是实情；如果不是毛家湾在政治上对

陈伯达有某种需要，叶群何必去找一个年纪比自己大20来岁的“老夫子”调情呢！

9. 叶群说：“我要紧跟江青！”

1967年国庆节前夕，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来访。按已定的安排，叶群也被列在迎宾的我国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这种场合，叶群从来都是乐于出头露面的，因此用不着旁人催促，她便提前驱车去首都机场了。

但外宾还没到，叶群又独自坐车溜回毛家湾来了。

“主任不是接外宾去了吗？”有的工作人员问。

“我去了，但没等外宾到，我就溜了。”

“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叶群对工作人员的质问并没引起反感，反而兴冲冲地大讲特讲起她为什么提前退场的“道理”来。她说：“我到机场一看，别人都陆续到了，唯独没见十一楼。没有十一楼，我怎么好出场呢？我对总理说，江青没来，我也不奉陪了。总理严肃地说，你走不得！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自己，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叶群叙述到这里，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

“总理说得对，江不去，你就溜，这不成理！”又有个

工作人员见叶群的情绪颇高，故意刺了她一句。

“你们不懂。”叶群继续表白说：“你们不懂江的分量，总理也不一定懂得这个分量。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10. 一出捧场戏

一天晚上，叶群从钓鱼台回来，手中拿着一卷子文件，对我们几个秘书说：“这是一件珍品，你们看看！”

我们上前一瞧，见它是两页16开白纸用铅笔写成的东西；另一些象是一本杂志，叶群还拿在自己手里不放。这两页纸上，主要是陈伯达的字迹。从开头看，它是写给主席和林彪的一封信；在第二页的落款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了江青外，全都签了名。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

“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下是署名者表示如何向江青学习云云，在上款“主席”二字上已经画了圈，从这个铅笔画的圈向右上引出一条线，线头指向主席亲笔批的几个字：“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这确实是件珍品！”叶群又一次重复说。“这涉及对十一楼的评价，而且有主席的亲笔批字，非常宝贵。现在是要给首长讲讲，首长也要有个明朗态度。你们谁去办这件事？”

“当然是讲文件的两位老张。”郭连凯指的是我和张益民。

“这封信上附的江青1937年发表的《公开信》在哪里？”我问叶群。那个附件仍在叶群手里，叶群却不愿拿给我们看；秘书不看，怎么给林彪讲？林彪根据什么表态？

“附件在我这里。”叶群打开她手里的一本旧杂志，翻到《我的一封公开信——蓝苹》那个标题，在我们几个秘书眼前幌了幌，又把杂志合上了。“这封信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鲜明的，但十一楼的意思是不愿意让它扩散，因为那是3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的人们不容易理解。”

“我们不看为好，”张益民故意顺着叶群说。“但我有个建议：这个文件最好由主任亲自给首长讲，便于和首长研究如何表态。”

“要讲就快去讲，再过一会儿，首长就要休息了。”李文普也添上一句。我们大家都看了看表，才晚上10点多钟。林彪一般是在晚11点前后休息，但靠近休息前听讲文件是会影响睡觉的，因此专管林彪生活的李文普这样催促也很自然。

“首长既然快休息了，不给他讲也行。”叶群抓住了机会。“李根清会仿首长的字，叫他代首长批句话就成了。这样，既不用惊动首长，也免得他批字太累，明天再补报也不晚。你们看好不好？”

秘书们谁也没吭声。大家在想，李根清批字代林彪表态，这成什么了？

“李根清呢？”叶群见大家都默不作声，就直叫李根清。

“根清！”郭连凯帮助叶群呼叫在隔壁的李根清，小李赶紧走过来，问喊他有什么事。郭连凯和他开玩笑说：“主任要重用你了！”

“书记老是拿我开心。”李根清见叶群在场，没敢再多

说，静等对他的吩咐。他来毛家湾工作已有两年多，和大家都混得很熟。他现在林办保密室工作，但还是个战士待遇。由于他写有一笔好字，又兼性情老实、耿直、稳重，不仅几个秘书喜欢他，林、叶对他也比较器重。他在性格和面容上都不象个年青人，然而他过于单纯，也时而带出一点幽默感和并不令人生厌的傻气。在毛家湾工作人员中的“三李”（李文普、李春生、李根清）中，他的年纪最小，但大家不叫他“小李”，而是习惯地称他为“老根”。他听郭连凯说叶群“重用”他，知道这是一种玩笑话。在林办内，他作为一名战士，实际上正在做见习机要秘书的工作，这已经够“重用”了，还能“重用”到哪去呢？于是他走近叶群面前问：“主任找我有事吗？”

“有事。”叶群笑着说。“真的，我想重用一下你。”

“主任也拿我开玩笑！”李根清羞涩地说着坐在叶群对面的椅子上。

“不是开玩笑。”叶群说，“我想叫你仿首长的笔体批几个字。”叶群又把陈伯达起草的给主席和林彪的那封联名信递给李根清。“这上面，主席已经有了批语了，首长也要批句话。首长快休息了，身体又不太好，我想不让他过度劳累，就由你代代笔吧！”

“批什么呢？”

“批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对江青的评价这么高呀？”李根清吃惊地冒出一句。

“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你没见那封信的签名吗？而且主席已看过，说明也认可了。首长表态要明朗，这不会有问题。你就代批吧，出了事我顶着。”

“这几个字，我也没练过呀！”

“你先试试，我看行不行。”

叶群领李根清到隔壁试字去了。不过一刻多钟，叶群拿着李根清代批的那件“珍品”，又回到秘书办公室来。

“你们看，根清仿首长的字象极了！”叶群的满意心情全形于表。

我们看到，在文件第一页上款林彪的名字上用红油笔画了一个长圆形圈，圈尾顺势向旁甩出一条线，仿林彪字体歪歪扭扭地批上几个红字：“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叫我们“内行”人看，这几个字明显不是出自林彪之手，但出了毛家湾，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出破绽。

“小于呢？”叶群又把于运深叫了来。“下一步工序就该轮到你了。这件珍品，需要复制20套。你过去搞过档案材料的复制工作，这次还是你去办。我还要去钓鱼台开会，你快点去找军委办公厅联系，复制好了后给我送去。”

“搞重要文件的复制从来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搞不合适。”于运深说。

“那就叫张云生陪你一块去。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扩散。特别是那个附件，只需要把《公开信》的标题影印一下就行，里边的东西不要复制。你们自己也不要翻看，看了没好处。我这是受十一楼的委托，你们可不能当儿戏！”

我和于运深到军委办公厅档案处复制这份文件，从开始联系到最后完成，用了两个多小时。等我们把它送到钓鱼台的时候，已经午夜12点以后了。叶群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她把20套影印品和原件拿了进去，不久出来对我和于运深说：“江对复制的东西很满意。你们可以回去了。”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我可能还没交代清楚；江青的那封《公开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叶群曾不想叫我们沾边，后

来由于要复制，不得不让于运深和我过手，但又规定我们不准看。可是我们绝对不会那样老实。那是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中间登有一篇题为《我的一封公开信》，作者署名“蓝苹”，即江青。文章大意是说，上海的一位电影女明星因受不了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而自杀了，现在这股风又向蓝苹刮来。人们造出种种“谣言”，说蓝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总之不怎么样。这迫使蓝苹发表一封《公开信》，既是表白自己洁身无暇，也是对那些“谣言”的一种回击。蓝苹说，她在济南的丈夫对她不忠实，不是她抛弃他，而是他背弃了她。她恨她那个丈夫，恨那个环境，恨那个社会舆论，恨那使她不得安静的一切。……

据我记忆，这就是那封《公开信》所要说的大概。我想，够不上说它是伟大的平凡，或者平凡的伟大。但在白纸黑字上，以最权威的方式据这封《公开信》而给江青戴上“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这却是真有其事的。

历史有时不公平，但永远不公平的历史是没有的。

11. 又向周总理发难

叶群下这样的气力奔跑于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并没有白费。一方面，她为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左派”搭了桥；另一

委名义下令，聘请江青为“全军文化工作顾问”，为江青进一步插手军队开了绿灯；作为报偿，叶群以林彪“联络员”的身份经常列席中央文革会议。1967年初，军委文革改组，江青当顾问，叶群为成员，又使叶群在军内的地位进一步高升。1967年8月，钓鱼台与毛家湾合谋、向毛主席先斩后奏而拼凑的那个军委办事组，叶群名列第三，一跃居于各老师之上。1967年底，叶群又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的中央碰头会成员，俨然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由于毛家湾的捧场，江青的权势也扶摇直上。名义上，她还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她的权势之大，似乎谁也不在话下了。不用说别人，就是备受人们崇敬的周总理，也动辄受一点江青的窝囊气。

1968年初，陈伯达抓住两件事作借口，向江青和叶群告总理的状。一件是，陈伯达给林办的一个电话，说晋东南地区武斗加剧，他建议派一个师去制止武斗。秘书把这个电话报林彪、叶群，林彪把电话记录批给主席阅，主席圈阅后又退林办。叶群又把主席圈阅过的陈伯达这个电话记录带给正在开会的总理，总理阅后当即退叶群。另一件是，陈伯达给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所谓电子工业问题的信，主席阅后批“请总理酌处”；文件传到林办后，林彪又把它批给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粟裕同志阅，然后才转给总理。就是这么两件很平常的事，却成了叶群伙同陈伯达整总理的把柄。

“有两个材料，你们赶快给我找出来。”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气呼呼地命令管理文件的于运深、李根清。“一份是老夫子前几天打来的那个电话记录，另一份是老夫子关于电子工业问题的信。”

“电话记录在。”李根清说：“那封关于电子工业的

信，主席批示原件已传给总理，我们这里只有抄件。”

“快，快！不管原件抄件，快拿给我，我还要去钓鱼台呢！”在李根清去找文件的时候，叶群对几个秘书流露说：

“为这两个文件，老夫子对总理很有气。他去找十一楼诉苦，说总理对他不尊重。十一楼就火啦，要我找到这两份证据，找总理算账！”

“他根据什么说总理对他不尊重呢？”我们几个秘书问。

“老夫子建议派一个师的部队去制止晋东南的武斗，”叶群说，“首长批给主席，主席圈阅退回。我又把电话记录给总理看，可是总理看了看就退给了我，连个字都不签。这不但是对老夫子不尊重，也是对主席和首长的不尊重。为什么十一楼火了，就火在这里。”

“这不值得火！”性情耿直的于运深顶了叶群一句。

“总理很尊重主席。主席圈阅过的文件，总理看后不再在上面写什么字，这正是对主席的尊重。”

“晋东南地区的武斗，总理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了。”我补上一句。

“可是老夫子有气，十一楼也有气。”叶群又变换了口气：“听你们一说，我是没气的。总理是好人，他那么忙，也不易。那个电子工业问题的信，听说总理也办了。就是老夫子，他总是怀疑总理对他不尊重，他一诉苦，十一楼就不让了。十一楼要批总理，我能和稀泥吗？也不能。我只能站在十一楼一边，批了再说吧！”

叶群正说着，李根清把文件找来了。叶群临去钓鱼台以前，还一再念叨：“我也难哪！”

这件事，反映出江青越来越飞扬跋扈；也反映出叶群

的地位有了变化后，虽然明里还在“紧跟江青”，但在暗中已经开始流露对江青的某种不满了。同时还反映出，一年前还被江青捧之拥之的“老夫子”——陈伯达，如今已经反过来乞怜于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女人面前了。

12. “老夫子”诉苦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起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作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作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在暗地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大概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好的，林彪同志对你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象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

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你知道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

叶群找林彪去了。不难看出，钓鱼台内部以及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

13. “螃蟹中有政治”

“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陈伯达给林办打来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尽管他的福建口音很难懂，但他吃力地吐出的这几个字，我们几个秘书都听熟了。

秘书的责任是每当接到陈伯达这样的电话之后即转报叶群，叶群则是有来必接，一接就同陈伯达在电话上一谈多时。叶群不再让秘书旁听她与陈伯达讲些什么，也不再让任何工作人员代她记下陈伯达对她讲了些什么。这表明，陈伯达在钓鱼台受到冷遇之后，已经得到毛家湾的青睐。

“老夫子最近来电话多一些，我本不愿意接，但不接又不好。”叶群大概是以为她与陈伯达通电话过于频繁，会引起林办工作人员的疑心，所以才这样主动到秘书们面前来表白。

“他的家庭生活不幸，心情不大愉快，总希望我能给他一些安慰。”叶群又说：“老夫子想吃鲜螃蟹，老郭能想办法帮助弄点吗？”

“现在不是吃螃蟹的季节。”郭连凯说。“要吃河螃蟹，还可以帮助想想办法。”

“老夫子不要河螃蟹，”叶群说，“你最好给他弄点海螃蟹。”

“现在是海螃蟹的淡季，产量很少。即或弄到，运到北京，已经很难吃上活的了。可是吃死螃蟹，容易中毒。”郭连凯对于水产并不在行，但他经常为叶群想方设法弄各种山珍海味和应季水果吃，所以也慢慢变成这方面的“专家”了。

“再困难，你也得想办法弄，而且必须弄活的来，不能叫老夫子吃了螃蟹中毒。”叶群对郭连凯心中有底，知道她只要交他办一件事，他就有办法“落实”。

“实在困难，主任。”郭连凯微笑着向叶群叫苦：“弄是能弄到，只是运到北京，万一吃了……”

“这你愁什么？”叶群把脸一沉：“怕运输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活螃蟹吗？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一次多弄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你们不懂，老夫子不是一般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很爱脸面；他不轻易开口，开口了，我就不好拒绝。这只是吃螃蟹吗？螃蟹中有政治！”

叶群几句话，就把郭连凯的嘴堵上了。郭连凯说：“我一定尽力办。”但当叶群一走，老郭就发开了牢骚：“还是得有权哪！反正不用自己出钱出力，吃吧！”

不过两天，螃蟹运来北京了。这不是由于郭连凯有多大的“落实能力”，而是由于毛家湾的特权。为了陈伯达吃几只螃蟹，郭连凯只消以林办名义给空军某人打个电话，事情就办了。那些螃蟹也交上了好运，它们乘坐飞机到了北京。

“螃蟹已经运来。”郭连凯向叶群报告说。“但还没出机场，一筐螃蟹中活的还不到一半了。怎么办？是先运回毛家湾吗？”

“怎么死的这样快？”叶群有些扫兴。“别运回毛家湾了；再耽误，就更没几个活的了。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

“大概还有一二十个”。

“足够了！”叶群说。“就把活着的送给老夫子，他也吃不了。快，快去办吧！”

郭连凯刚想走，叶群又叫他：“你回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去东郊机场，亲自把螃蟹取回，给老夫子送去。”

“那不行！你打个电话，叫老夫子的王秘书跟你一起去。这批螃蟹不能经毛家湾的人之手，不然老夫子万一中了毒，我们还犯嫌疑呢！叫王秘书当面取回，我们就没责任了！”

狡诈阴险的叶群，对谁都要“留一手”。在这样的事情上，她也不放过机会施展一下手段。

陈伯达吃上了鲜螃蟹，这自然又使他从毛家湾得到了几分温暖。但说“螃蟹中有政治”，螃蟹还不就是政治。在毛家湾与陈伯达结下的政治缘分中，又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

14. “不能为了一个军，丢了一个常委”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形势一直很乱。那里分成了两大派：一个叫“红楼派”，另一个叫“工总派”。当地驻军在“支左”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河北省军区支持“红楼”，×××军则支持“工总”。所以造成这种两派严重对立和两军对立的状况，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陈伯达乱插手。不久前陈伯达曾到保定地区活动

过，公开表态支持“红楼”、反对“工总”，还批了支持“工总”的×××军。这样，就使趋于联合的两派更加对立了，武斗一再升级，形势更加混乱。

“保定地区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叶群有一次问我。

“还是很乱。”

“有人造谣说首长是×××军的后台，老夫子是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的后台。在文件中有这种反映吗？”

“在正式文件中还没见到。”

“正式文件指什么？”叶群又问。

“指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或×××军的正式报告。”我说。

“非正式文件中有这样的反映吗？”

“在当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中，在个别群众来信中，有过这种反映。”

“也难哪！”叶群叹息一声。“老夫子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组长，他支持的，首长也要支持。可是×××军是首长带过的部队，也不能眼看着不理呀？！两边都支持，在老夫子那里又通不过，说这是和稀泥；只支持一边吧，又过意不去。怎么办好呢？”

“毛主席说，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应当实现革命大联合。”我回答说。“部队支左也一样，应当对两派做得对的都支持，使他们联合起来。”

“你说得轻松！”叶群冷笑了一下。“现在我想的不是什么两派联合，而是对老夫子怎么表态。老夫子就是拿那个谣言来将我，问我‘林彪同志是不是×××军的后台？’我说不是。可是他又说：‘如果不是，林彪同志为什么派自己的秘书去×××军工作呢？’”

“首长什么时候派自己的秘书去×××军了？”我是林办秘书，不能容忍陈伯达造谣。

“可能是指周××。”郭连凯在旁解释说。

“就是指的周胖子！”叶群说。“老周这个人也尽给我们找麻烦！他从总政出来后，到哪去工作不好，为什么偏去×××军呢？都是你老郭搞的！”

“也不完全怪我，是老周自己要去的。”郭连凯笑着解释说：“老周1964年离开林办后，在总政工作得还不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政瘫痪了，老周要求调动一下。他来找我，我报主任，主任也同意。他要去×××军，是因为这个部队过去能打仗，住得离北京近一些，比较方便。……”

“过去的事甭再提了！”叶群不让郭连凯再解释下去。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因为一个秘书，叫老夫子为难；也不能为了一个军，丢了一个常委。老郭你去办，把周胖子从×××军调出来，放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去！”

由于叶群的一句话，周××被从×××军调到了山海关以外的另一支部队。对这次突然调动，周自己在数年之后还感到莫名其妙。

周××的调开，对于保定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但它是毛家湾向陈伯达作的一种姿态，这姿态意味着什么，陈伯达是不会不懂的。

15. 令人费解的“炮打张春桥”

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回来，一进秘书办公室就向郭连凯布置一项神秘的“任务”。

“老郭，我交给你一项任务。”叶群说。“你把张春桥

去年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找出来看看！”

“看后给主任讲讲吗？”郭连凯问。

“不。”叶群故意眯缝了一下双眼，显出一副凶恶的神气。“你看看讲话中有什么问题，然后告诉我。”叶群说完就走了。

郭连凯忙着从保密室档案中查出那份《讲话》，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看不出这个讲话里有什么问题呀！”郭连凯摇摇头说。他接着把文件推给了我，说：“老张，你再帮助看看它有什么问题。真怪，主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考考我？不然，是张春桥又出了什么问题吧？”

我没理会老郭的自言自语，只顾翻看张春桥的那篇讲话。那是一份铅印的记录稿，可能是半年前南京军区报来的。当时我曾翻过，没留下什么印象，似乎也没给林彪、叶群讲过。事过半年之后，叶群为什么又突然叫郭连凯看看其中有什么问题？我也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看，这可以算作是叶群想作张春桥文章的某种迹象。但张春桥是江青手下的“红人”，难道叶群敢作他的文章吗？叶群交办这件事，是她刚从钓鱼台回来之后，莫非她是照江青的旨意行事？江青的干将已经所存无几，她为什么又来打张春桥的主意？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难道真的是叶群想捉弄一下郭连凯，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你看怎么样？”郭连凯见我陷于苦思，忍不住问了一句。

“看不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说。

“我怎么给主任讲呢？”

“你就如实讲呗！”

“如实讲，我只能说没看出什么问题。但这样一来，主任不会不高兴吗？”

“这怕什么！”

郭连凯在向叶群讲了“没看出问题”之后，叶群并没责怪他。老郭对此感到很庆幸，回来对我说：“主任正忙着打电话，也顾不上和我说什么了。”

我们正说着，叶群又过来了。她这次来，脸上浮现出一种局促不安的表情，这又是不祥之兆。但她并没给别人添麻烦，而是一进门就直盯上了正在办公室看书的李春生。

“李春生！”

“哎！”李春生听叶群大声叫他，放下了书本，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叶群。

“你老是钻在书堆里，别的事就不过问了啊？”叶群严肃地责问道。

“首长叫我看看法国史。”

“看什么史我不管。”叶群说，“我问你，最近顾阿桃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何汝珍回来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会打电话问问吗？”

李春生忙抓起电话要空军，然后回答叶群：“何汝珍现在在家。”

“他那几个人还在太仓吗？”

“我再问问。”

“不用你问了。”叶群气哼哼地走近电话机：“要何汝珍，我和他讲讲。”

李春生要到了何汝珍，把电话耳机递给了叶群。

“何汝珍吗？”叶群的嗓门很高，并且用命令的口气说：“我告诉你，你赶快打个电话，叫在太仓的那几个人马上撤出来，越快越好！不要说我叫撤的，不要打我的旗号，……你懂吗？你既然懂，就叫他们赶快离开太仓吧！少罗嗦，快，快！”心急火燎的叶群一边说着“快，快”，不管对方是否还有话要讲，就“咔嚓”一声把电话机压上了。

何汝珍听“懂”了叶群的话，读者不一定看懂了我这段叙述。这是怎么回事呢？顾阿桃是谁？“太仓的那几个人”与叶群是什么关系？叶群对何汝珍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了令人听懂，我不能不在这里作个注脚。

据我所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1965年冬至1966年春，叶群带着两个秘书（其中一个李春生）在江苏省常熟县太仓公社洪泾大队蹲过几天点，名义上是搞“四清”，实际上是想为她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叶群蹲的点，自然要出“典型”，出“经验”。没用多久，“典型”和“经验”都出来了。个人典型是个朴素善良的家庭妇女顾阿桃，她50岁上下年纪，出身很苦，一字不识，但很有学习毅力，依靠画图代意，学了几篇毛主席著作。正巧，她所在的生产队，就是叶群抓的点；她和她所在的生产大队都因此沾了“光”。后经叶群节节拔高，一吹再吹，顾阿桃和洪泾大队都成了叶群亲自培养的、报纸帮助扬名的“活学活用典型”。叶群离开不久，“文化大革命”就起来了。叶群为了让这个“典型”按她的政治需要发挥作用，从“文革”初期开始就几次派与她一起蹲过点的何汝珍去太仓活动，同时还授意何汝珍叫上海空军江腾蛟手下的几个人常驻太仓，指挥顾阿桃和当地的群众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后来顾阿桃和洪泾大队的

一些人都公开表态拥护上海的“一月风暴”，反对在当地支左的××军以及以许世友为首的南京军区，其幕后操纵者就是叶群。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上海“工总司”正在插手江苏，阴谋把江苏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但受到江苏广大军民的坚决抵制。叶群这样插手太仓，是向上海方面作的一种支持姿态。现在她急匆匆地要从太仓缩手，说明那里的政治气候有了突变，也说明从毛家湾伸出的这只黑手要另指他方了。

叶群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机的铃声又响了。

“哪里？”我接过电话一问，知道是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司令要找叶群。我说：“许司令，请您等一等，我去看看！”

叶群就坐在这里，我还去“看”什么？读者可能不懂，这是毛家湾的一种“规矩”。叶群规定，不准把她推向第一线；任何人来电话找她，秘书都只能说“我去看看”，以便使叶群有个“缓冲”的余地。

“主任，”我放下耳机后小声对叶群说：“许司令来电话找你，接不接？”

“许司令？接！接！”叶群的爽快异乎寻常，大大出于我的意外。以前许司令来电话，她大都是搪塞不接的。今天为何突然变了？

“许司令吗？你好啊？”叶群对许司令讲话的口气十分热乎。“好久没看到你了，……是啊，我太忙啦！……”在许司令讲了一些事情之后，叶群冒出这样几句：“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对，有人反对你。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那个人，我不说名字，你也会知道他是谁。对，对，我对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叶群在和许司令通电话的时候，李春生一直发愣地望着她。我也盯着叶群。当她点出反对许世友的人是“东边的那位”时，我们在旁的几个秘书都听得出她是指的张春桥。她昔日一直在暗中策划整垮许世友，如今又在南京与上海之间挑拨离间，而且竟然敢在深知内情的李春生面前掩盖她在太仓的阴谋活动，这足以说明她厚颜无耻至极。我转过头来看看李春生，他那副书生面孔一向很自然，但此时显得很窘，大概他也在为叶群的卑鄙而感到有些难为情吧！他不愿再看叶群的丑恶表演，又低下头钻书本去了。

又过了一天，叶群在毛家湾接见了从上海来的江腾蛟，经长时间密谈之后，又设“便饭”招待了他。江腾蛟后来派人送来一份揭发张春桥问题的材料；叶群看过之后，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又退回江腾蛟重抄一式两份。这两份揭张春桥的材料，都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了主席，另一份给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后边的这一份，没通过林办保密员发出，而由叶群亲自送到了钓鱼台。

在这以后，我从文件中看到，上海正在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浪潮。尽管叶群在掩掩盖盖，我看出这场闹剧的真正导演在北京。张春桥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全军，名声都不香，他遭此下场不会有几个人为之怜悯；但这次遭暗算，却是出于毛家湾与钓鱼台的一种共谋，这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

上海的“炮打”浪潮仅仅喧嚣10几天，就又平静下去了。听说这是由于，毛家湾和钓鱼台在打了他一巴掌之后，出于某种原因又授意保了他。不过，对张春桥这一打一保，在做法上与以往大大不同。从打到保，毛家湾与钓鱼台的头面人物没有一个公开出来讲话，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曾有

过的。表明风向的箭头被人在暗中拨动，而参与“炮打”的人是按箭头指示的方向行动的。现在，那箭头回指了，“炮打”也就停下了。事后的处置也与以往大大不同。如照以往，如有人竟敢“炮打”中央文革的要人张春桥，不用说张本人不会善罢甘休，就是钓鱼台的其他大将也是不会轻饶“炮打”的当事者及其后台的。这次事过之后，各方都装作若无其事，谁也不加声张。北京的操纵者们自然不便继续做作，反正已经把他的的小辫子抓在手里，打他正是为了拉他，知趣与否就在他自己了。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历史不净，资本不多，何况“炮打”来头不善，与其铤险自绝，不如顺水推舟，因此只好逆来顺受了。

16. 叶群与康生之间

与叶群同陈伯达、江青打得火热相对照，毛家湾与康生之间的关系却显得有些冷淡。这并不是由于康生不愿意靠近毛家湾，从他那一方来说，倒是乐于靠近并且有过几次主动靠近的表示的，只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声。例如1967年3月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前夕那一次，康生抓住总理为开会事先报主席、后报林彪，大叫“此例不可开！”上纲说总理这是把国防部长林彪“架空”了，并伙同叶群去找主席告状，迫使总理写了“检讨”。不久以后，他又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大会上，带头鼓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可是，尽管他极力想讨好林彪，林、叶却宁愿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叶群是钓鱼台的常客，她跑陈伯达住的十五楼和江青住的十一楼，鞋底都快磨穿了，但对康生住的八楼，却从不肯轻易登门。这是为什么，叶群从不透露，

旁人也不好乱加猜测。

但从1968年初夏开始，康生在毛家湾坐的冷板凳变得热乎一些了。

“老郭”，叶群一次对郭连凯说，“这是曹大姐给我写的字画，你拿去找人帮助裱一裱。”

“曹大姐”，即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叶群拿给郭连凯的那卷条幅，据说是曹轶欧应叶群的请求特意书写的。郭连凯把它展开后，只见上书一笔流利、秀气的草体毛笔字，抄录着毛主席的《蝶恋花》。

“写得太好了！”郭连凯赞不绝口。其实他同我一样，并不懂书法。“主任很少去八楼，这次曹大姐送幅字画作纪念，也不一般。”

“你懂什么！”叶群并不愿听郭连凯当面这样夸张“八楼”送字画的意义。“我早就听说曹大姐的字写得不错，但从来没有张口让她写点什么。会写字的人多得是！”

“女同志会写毛笔字的不太多。”老郭还是没理解叶群的话。

“少见多怪！”叶群沉着脸说：“你们以为我是偏爱女同志的毛笔字吗？绝不是。我是觉得以前跑钓鱼台别的楼比较多，唯独八楼去的少。我的一行一动是代表首长的；我请曹大姐写张字画，是表示首长对康老的尊重。你懂吗？”

郭连凯用右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是我缺根弦！”

“你要好好给裱糊一下。”叶群又说，“裱好了，说不定以后再让康老看看呢！”

从此，钓鱼台八楼也是叶群的常去之处了。在工作人员面前，她再不回避赞扬康生，什么“老理论权威”啦，“他在文革内受尊敬”啦，“学识渊博”啦等等，尽挑好的说。

康生批注过的古书，她拿来当作宝贝，叫李根清照抄在她保存的同类书上。特别是康生批注的《红楼梦》，各种眉批、旁注遍章都是，有些页上批得密麻麻地一大片；叶群要求抄得必须工整、准确，弄得李根清一连忙乎多少天，别的什么事也没空去做。

但是，叶群与康生的来往稍多起来以后，引起了陈伯达的嫉妒。一次，陈伯达来电话找叶群，我帮助接通电话后，退出前听叶群一开口就奚落陈伯达：“怎么，老夫子，你吃醋了吗？”

叶群接过陈伯达的电话以后，眉开眼笑地到秘书办公室来卖弄：“老夫子这个人的心真窄。他怀疑我和首长最近对他不好了；说我去八楼多，去他那里少了。……一个男子汉，怎么象个女人呢？”

17. 明里一套，暗中一套

可是不管怎么说，在事实上，叶群对陈伯达是亲近多于尊敬，而对康生则是尊敬多于亲近。陈伯达与康生是有矛盾的，叶群在双方之间力求平衡，但重心一直在陈伯达这一方。不知什么原因，林彪和叶群对康生的戒心一直是很深的。这种戒心，从张益民的处境中看得十分明显。

“老张，”叶群对张益民说：“听说中组部当军代表的郭玉峰是你原来所在部队的政委，是吗？”

“是的。”张益民说。

“你常和他联系吗？”叶群注视着张益民的表情。

“有过联系，但不经常。”

“还是少联系一些为好，”叶群用很冷的口气警告说。

“现在斗争很复杂。我这是出于对你的爱护！”

恰巧，张益民这时得病住院了。据郭连凯透露，叶群对张益民和郭玉峰的关系很不放心，在背后几次查过张是否经常到中组部去。

“张益民是郭玉峰的老部下，又很熟悉，现在都在北京工作，免不了要有些联系。这算了什么？”我对郭连凯说。

“主任的意思是防康老。”郭连凯比较了解叶群的底。

“郭玉峰的中组部归康老管，那位老张如果跟郭玉峰接触多，主任就会怀疑了！”

果然，张益民病愈出院后，一直到1970年11月调离毛家湾，叶群大半都把他支出去打零差，既不放心调开他，又不放心他在毛家湾接触更多的内幕。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是由于林彪、叶群对康生暗中加以戒备的缘故。

18. 左右为难的“拉条子”

毛家湾与钓鱼台在暗中勾心斗角，但在明面上，还一如往常地过往甚密。特别是在关于“左”与“右”两军对垒的场面中，他们还是唱着一种腔调，玩着一种把戏。它的典型表现是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那次会上，他们沆瀣一气，以清算所谓“二月逆流”为借口，大整包括朱德、陈云、叶帅、徐帅、聂帅、陈帅和李先念、李富春等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把个会议搅得乌烟瘴气。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以前，林彪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交代说：“在十二中全会上，我准备讲一次话，你们帮助拉个条子。究竟讲点什么，我还没想好，你们可以帮助想一想，先不急于动手。”

这种事，我和李春生都有过经验、林彪每次发表长篇讲话，总是在事先让秘书帮助“拉条子”，但“拉”什么，他并不具体交代意图；凭你去“拉”，最后他看一看（或听一听），能用一句就用一句，不能用也就算了。“拉条子”虽由林彪亲自布置，但往往叶群比林彪还着急，一催再催，就是林彪最后“吹”了也不要紧，反正“拉”出“条子”就算交差。因此我和李春生对“拉条子”的事并不感到有多大压力，知道这只是应付差使的事。林彪如果用不上，反而少担风险。

“‘拉条子’的事，你们想得怎样了？”林彪问我。他正在大会堂西大厅散步，走到秘书值班室门口，正巧我从里边出来。他停下脚步，低下头玩味着自己的右脚掌在地毯上抿了几下，并不看我。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和李春生都正在想，”我说，“但还没想出个头绪。”

“你们要抓紧。”林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不抓紧，可能误事的！”

我心中一惊：林彪以前对“拉条子”并不着急，这次为什么催促要“抓紧”呢？何况十二中全会尚未开会；等开会以后再“抓紧”，不是也来得及么？

“我和李春生抓紧研究一下，”我说。“我们争取早些‘拉’出个眉目来，再报告首长。”

“不！”林彪扬起右手掌，作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

“我的意思是叫你们抓紧想，而不是叫你们抓紧写。只要想好了，写很容易。陈伯达对我讲过，他写东西之前就是关起门来想，一想多少天，不写一个字；等想成熟了，一口气就把文章作出来了。陈伯达是个太秀才，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你们要注意。”

林彪这样讲了之后，我和李春生都开始“抓紧想”，真的并未写成一个字。然而“抓紧”与否，衡量有形的文字一目了然，衡量无形的思维活动却很不易。因为只限于“想”而不动手写，所以我们自认为“抓紧”了，别人却不一定这样认为。十二中全会开会后不几天，叶群就以我们“不抓紧”为口实，把我和李春生训斥一顿。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不抓紧动手？”叶群着急地说：

“这几天，我忙于开会，没有过问你们‘拉条子’的事。但是没有我张罗，光靠你们就得喝西北风！现在跟你们发火也不顶事了，赶快研究一下补救措施吧。老郭呢？……”

郭连凯正在办公室外边忙着什么事，我把他喊了进来。

“老郭！”叶群厉声质问郭连凯：“你这个支部书记尽忙乎些什么呢？现在‘拉条子’的事快要流产了，你想在旁看笑话吗？”

“我怎么能看笑话呢？”郭连凯笑呵呵地说。“主任叫我办什么事，我都保证完成。但‘拉条子’是秀才们的任务，我有劲使不上。”

“你是支部书记，什么事也跑不了你。”叶群说。“首长要在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这是重头戏。会议正在开，就是把讲话时间安排到最后，也没有几天了。这个事光靠张云生和李春生不行，大家必须全力以赴。如果人不够，就再增调人；如果需要什么参考材料，老郭你保证。”叶群又转向我和李春生：“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你们看过没有？”

“没有。”我们说。

“为什么不给他们看看会议简报？”叶群又问郭连凯。

“中办有通知，这次会议简报非常机密，除参加会议的

人员之外，任何人不准看。”郭连凯说：“不过咱们这里可以作为特殊情况。”

“要给他们看会议简报。”叶群下令说。“叫他们帮助首长‘拉条子’，又不叫他们知道会议的气氛，‘拉’出的东西准是牛头不对马嘴！”叶群可能发觉自己这样擅自改变中央办公厅的规定会给自己造成某种被动，就又改口说：“叫你们看会议简报，我也没这个权力。这次会议不同寻常，保密纪律非常严格，一旦追究起泄密的责任我也承担不起。但我可以推出首长；如果首长批准你们看，谁还敢来查一位中央副主席吗？……我去找首长。不能我急他不急！”

叶群的催阵确实起了作用。第二天上午，林彪把我和李春生叫到了大会堂。

“‘拉条子’的事，你们可以动手了！”林彪说。“我和叶群商量过，准备讲六个题目：第一，讲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二，讲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第三，讲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第四，讲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第五，讲讲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第六，讲讲今后怎么做。这六个题目，我都准备信口讲，不想念现成的稿子。但信口讲，也还得有个条子作参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胜利这两个题目，由老虎帮助我准备一下；他还是个娃娃，还不成熟，但我想叫他锻炼一下。关于路线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两个题目，就得靠你们帮助准备了。其余那两个题目，用不着作什么准备，我也不会讲很多，点一下就是了。”林彪稍停了停，又说：“我准备在本月二十六七日讲，你们抓紧弄吧！”

林彪交代意图很笼统，而且只是出了六个题目，但对待给他“拉条子”这样认真，还是少见。

“你们分的那两个题目，可以稍细一些，当然不是说要象作文章那样细。”林彪又说。“张云生是看‘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你来写一下关于路线这个部分；李春生是看马列书的，你分担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个部分。”

“路线这一部分怎么写呢？”我请示林彪，希望他再明确交代一下意图。

“我也没想好。”林彪说。“我想大概得讲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大事件，例如批判二月提纲啦，打倒彭罗陆杨啦，批判刘邓路线啦，批判二月逆流啦，打倒杨、余、傅和王、关、戚啦，等等。一些大的事件都得点一点，无非是说明什么是毛主席的路线，什么不是毛主席的路线。究竟具体写什么，怎么写，你找叶群去商量；他参加了十二中全会，知道的情况比较多。……”

我回毛家湾找叶群，她还在睡大觉。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总是在夜间出去活动，而在白天睡觉。等过中午了，她才起床。

叶群打了起床铃，内勤赶紧往上跑，郭连凯也急急忙忙地拿起一沓子待处理的文件向叶群住室走去。我在办公室看那些《简报》，心中还在盘算“拉条子”的事。

“主任叫你去！”郭连凯很快从叶群处退回来，对我说：“主任把‘拉条子’看作头等大事，听说你要找她，连文件也不愿听了。快去吧！”

我到了叶群办公室，见她坐在沙发上，两只手不停地在摆弄着一个手提包里的散页文件以及一沓大小形状不同的白纸片。她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连眼皮也不抬，就说：“坐下吧！有什么事快讲，我还忙着呢！”

我把上午林彪交代“拉条子”的意图向她作了汇报，并

请她就“路线”这一部分怎么写作些具体布置。

“这些不用你多作传达，我都知道。”叶群放下她的手提包，显出很自鸣得意的样子：“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给首长吹了风，他还不着急呢。这次十二中全会，非常重要。会议的主题是批二月逆流，你看过会议简报没有？”

“正在看，还没看完。”我说。

“你要抓紧看。看了简报后你就会知道，这次批二月逆流的温度很高。中央文革的看法是，它的意义不亚于十一中全会。不把二月逆流批倒批臭，有些人对他们总是有幻想，‘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能巩固。首长在会上讲话，也要重点批二月逆流。批的调子不能低于会议的简报。要点名批，不能客客气气。要点点陈帅、叶帅，他们的态度至今还不老实。二月逆流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特别是指向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要旗帜鲜明，要坚决支持中央文革，不要使人感觉好象首长是那些老师们的后台。……我不多说了，你看过简报后就明白了。快去抓紧看，抓紧动手，三两天内就把‘条子拉’出来。现在离首长讲话的时间最多也不到一个礼拜了，如果再不抓紧就要误大事了。……”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抓紧翻看会议印发的上百份简报。看了这些简报，令人毛骨悚然。确如叶群讲的，简报的政治风向一面倒，登的全是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发言。被批判的对象，不仅有叶帅、徐帅、陈帅、聂帅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就连长时间不露面的朱老总和陈云同志也挨批了。他们全都抓住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大作文章，上纲说在那个事件前后形成了一个“反党俱乐部”，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为刘邓陶翻案”，还有“山上

山下配合”、“军内军外呼应”，目的就是“推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实现反革命复辟”、“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简报》上看，在会上攻“二月逆流”最厉害的是王洪文之类的“小将”以及黄、吴、叶、李、邱等几员大将。奇怪的是，《简报》上很少刊登钓鱼台那帮子“左派”在会场上有什么表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是钓鱼台对“二月逆流”表示慈悲，而是它不愿过早地露出马脚。钓鱼台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摸不清主席的最后底牌；而叶群率领毛家湾的人马一拥而上，是因为她深知这么干有钓鱼台在幕后的支持，最后总不致弄到人仰马翻的地步。这里谈不上毛家湾与钓鱼台谁更明智些或愚蠢些，但既然是两家合拍的政治恶作剧，钓鱼台宁愿在幕后牵线，而把前台的主要角色派给毛家湾的人去扮演。

我看完了会议的所有《简报》，越发觉得给林彪拉“路线”这一部公“象王”难办了

明路线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再引几条语录，说明什么是毛主席的路线；再以后就点了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大事件，所用的口径全是中央文件或两报一刊社论已经有过的；讲到“二月逆流”，我故意把它写得含糊些，究竟怎样讲，让林彪自己去拿主意。因为“条子”就是讲话提纲，所以整理成文字后它不过几页纸，大约有一千多字的样子。

一个晚上，叶群从外边回来时，就把我叫了去。

“你们‘拉条子’，可是得慎重些。”叶群的腔调突然变了，“我刚从一组那里开会回来，给你们讲点新精神，不然你们也为难。”她从手提皮包里拿出几页作有记录的白纸，接着就给我讲起了“新精神”。只听叶群说：“一组讲，现在会议要降温。”我刚记下这几个字，叶群又说：“这些话你不要记，知道一下就行了。对‘拉条子’有用的话你再记。……首长当面请示主席，他讲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主席说，随你怎么讲，我不干涉内政。首长说，我讲话时要点点‘二月逆流’，可不可以点名？主席说，不要点名了。主席还说，对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要选他们作‘九大’代表，但他们也不要翘尾巴。……”

主席讲的“新精神”，不知被叶群“贪污”了多少，但就是她不得不露出的那几句，也使我如释重负。我想，我正愁着“二月逆流”那段没法写，现在既然有了“新精神”，我只要照录就能应付过去了。

“你‘拉’的‘条子’，还要把批‘二月逆流’作为重点。”叶群仍然抓住所谓“二月逆流”不放。

“主席不是讲要降温、要保吗？”我问。

“主席现在讲要降温，并没说以前大家批的不对。主席讲一批二保，证明还是要批的。”叶群极力按她的意志去解

释主席的话。“会议批‘二月逆流’并没错，现在的问题是首长讲话的调子可适当低一些。但太低了也不行；如果太低，就使人觉得首长不是在批‘二月逆流’，而是批这次会议了。那样，就给积极参加战斗的一些小将泼了冷水。中央文革也会不满。中央文革对首长一直是很信任的，不能叫他们失望。”

10月下旬的一天大清早，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林彪叫我和李春生拿着“拉”好的“条子”立即前去。我原以为一贯喜欢独出心裁的林彪，对这个“条子”不一定有什么兴趣，但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林彪当天下午出场讲话时，几乎把“条子”上所列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

林彪讲话后，对之有保留看法的人们沉默不语，然而却受到某些人的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发言，《简报》上登的几页篇幅发言纪要全是他对林彪讲话唱的赞美歌。钓鱼台的其余“左派”，却不愿公开加入吹捧林彪的合唱，而只是在暗地里通过叶群向毛家湾传些赞同的信息。

“中央文革对首长的讲话很满意。”这样的话，叶群在林办工作人员中不知吹过多少次。

19. 黄永胜出国引起的风波

借十二中全会之机大反“二月逆流”，是毛家湾与钓鱼台合谋作乱的高潮，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开始。据我观察，引起他们发生摩擦的导火线并不是反“二月逆流”；在那样的营垒划分上，他们是穿着一个连裆裤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分手呢？我看不是别的，而正是他们之间基于极端个人野心的利害冲突。在黄永胜出国问题上出现的摊牌，大概就是他们这种利害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十二中全会即将结束以前，中央文革碰头会曾经内定黄永胜率代表团出国，去参加11月份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党代会。但代表团成行前夕，江青突然提出异议，坚决反对黄永胜出访，理由很简单：他不配！这一下，弄得当时中央内部的气氛紧张异常，但斗争是非常隐蔽的，详情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不管控制消息多严，要从叶群的言谈话语中间找出一点能够有助于判断的迹象，还不是太困难的。

黄永胜原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也是林彪的老部下。1963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经林彪亲自提名，他升为总参谋长，并任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对于林彪给予他的信任自然感激涕零，但他长时期是在一个局部工作的，一下子担此重任，不免手脚生疏、感到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参谋长这个角色是举足轻重的，也是风险很大的。他必须处处顺从毛家湾，也必须事事取悦于钓鱼台。不用说惹翻了这两者必将大难临头，就是其中任何一方对他稍有不满意，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黄永胜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善于处处讨人喜欢。他有一股子对林彪的忠诚劲，这可以稳住毛家湾；但他对钓鱼台那些“文人”，却不能很快适应。特别是对江青，他就是想讨好于她，但结果却往往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压根儿就对黄永胜没什么好感；而黄永胜对江青，也就慢慢地觉得只可对之敬之而不可亲之了。

1968年4、5月，我在讲军委办事组的一份文件时，听叶群随口透露了这么一句：“黄批出的文件，钓鱼台都不愿意看。”她还流露过：“这个总长的人选不大理想。”

那时我曾费苦心思索过：黄永胜刚来北京不久，是否又要面临杨成武的下场呢？如果是那样，几个月之间就“打

倒”两个总长，军内还能稳定吗？军内如果长期不稳，还能打仗吗？我也想过，从黄永胜来京后与毛家湾的频繁来往看，还看不出林彪对黄有何不满的迹象：那么叶群讲的“钓鱼台不愿看黄永胜批出的文件”以及“这个总长的人选不理想”等等，有很大可能是反映了江青的态度。那时的叶群正对江青亦步亦趋，只要江青不遂心，黄永胜到头来总要倒霉就是了。

1968年7、8月，我在大会堂值班。一天，叶群带回一份文件，让我看后讲给林彪听。叶群交代说：“这是十一楼批出的文件，她让我送给首长看。我去送，就得我亲自讲；但我去讲，首长听了肯定不耐烦。我这个角色也太难哪！”叶群想了一下，又说：“给首长讲过之后，你们替他在江的批件上画个圈就行了。首长不必表态。”

我看了看叶群带来的文件。它是中央专案组的一份报告，江青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批了很多话。专案组的报告本身并不怎样引人注目，令人惊骇不已的是江青那些怒气冲冲的批语。报告开头写的是“江青、永胜……”等四个人的名字，大概这四人是这个专案小组的负责人。黄永胜在他名字上画了圈，然后引批出三个字：“拟同意。”另外两人也已圈阅。从江青的批语看，她是最后看到这份文件；也许就是由于这一条，她才在批语中那样大发歇斯底里。她批的大意是：“我（江青）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越过我批这份文件？这是夺了我的权！这是黄永胜有政治野心！……”如此等等。我看了江青的批语，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又不怎么理解。我气的是江青的霸道作风，笑的是她给黄永胜上的那些纲，不理解的是这份文件为什么不先送给江青看？

“我给首长讲这份文件时，如果首长问，黄为什么不先把文件送江青批？我怎样回答。”我问叶群。

“十一楼最近的身体不大好。”叶群说：“她交代过，一个月之内不要送给她文件看。”

“她交代过不看文件了，为什么还责怪别人越过她，夺了她的权？”

“你问我，我问谁去？”叶群作这样的回答时似笑非笑，给我的感觉是，她对江青的这种做法也不满。

我去给林彪讲这份文件，预料林彪很可能被江青的无理发难所激怒，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林彪听后，什么话也没说，表情也没变化。这也符合他的老习惯；在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的。

此事过后不久，我又看到一份江青批出的文件，是专送主席和林彪看的。原件是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写给江青的信。信中反映说，在中南的几个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

“保守派”正在得势。许多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但多是“老保”掌权，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被当作“坏头头”揪斗，至少是被排挤、压制。来信人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来信人并未点出“广州军区上头”的根子是谁，但不难看出他指的是黄永胜。

江青在这封来信上写了很长一段批语。她写道，她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气愤。她认为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很多省份也都存在。她提出必须揪出这个“根子”。她还建议用中央名义把这封来信和她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

江青的这个批件表明，钓鱼台又在策划新的问罪之师了。然而我给林彪讲了之后，林彪作出了非常冷淡的反应。

“这份文件主席看过了吗？”林彪问。

“主席还没看。”

“先送主席看！”林彪不置可否，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主席。

在林办把这份文件退给中央办公厅转送主席后，再也没听到回音，这说明它在主席那里搁浅了。江青是想借此作黄永胜的文章的，但苦于没能作成。这说明在十二中全会期间，钓鱼台的人为什么那样甘居幕后，而毛家湾圈内的那些大将又为什么那样趾高气扬。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黄永胜出国前的背景。

“黄（永胜）出国了！”叶群从外边开会回来，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几个秘书说。“这可真是不易啊！黄出国本是中央内定的，可是临要动身了，有人又出来反对。弄得没办法，只好请主席决定。主席点了头，问题才解决了。”

叶群讲的“有人”，并没讲是谁。但我们判断绝不会是别人，而肯定是江青。

自此，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双方的阵营也日渐分明。在明处，他们还继续在互相捧场；但在暗地里，却开始了一连串的勾心斗角。暂时看，双方势均力敌，谁也吃不了谁；但到头来，在利害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总会有一天公开摊牌的。然而究竟谁在最后占上风，并不一定取决于他们自己，而要看政治天平的重心倾向哪一方了。

20. 钓鱼台又出难题

在黄永胜出国前后，钓鱼台又出了一个难题缠住了毛家

湾。

一天中午，叶群向我布置一项“新任务”，派我去列席军委办事组的一次会议。我在林办工作四年，叶群派我干这种差使一共两次：一次是1966年9月初列席叶帅主持的军委常委会；另一次，就是这回要去列席军委办事组会议。两次会议相隔二年多，但军内决策机构的成员完全变换了。以前开军委常委会，叶群去也只能算列席；现在的军委办事组，叶群就是其成员之一，她为什么自己不去，还要派个秘书去作代表呢？

“军委办事组开会，林办派秘书去列席，有这个必要吗？”我问叶群。

“其实没必要。”叶群说。“但黄（永胜）一定要求去，不去一个人也不好。中央文革提出总政军管会主任的人选不合适，要换一换，黄为这个事很伤脑筋。他给我来电话，说军委办事组下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请我参加一下。这是个难题，我才不去呢！我和黄说好了，派个秘书去旁听一下，把他们讨论的情况记下来，回来向首长报告。其实不去也行，但黄最近的日子不大好过；去个人听一下，也是表示对他的支持。你的任务就是带个耳朵去听，带支笔作个记录，别的就没你的事了。……”

我赶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几个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正在那里坐等林办的人到来。在会议桌旁的一端坐着黄永胜，两侧分别坐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黄永胜和我打了招呼，我被让坐在吴法宪的下首。

“张秘书，”黄永胜对我说，“我们刚开始研究。我们讨论的是总政军管会的人选，王宏坤同志如果不行，派谁去更合适些。你来听听好，回去后向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汇报。”

我没说什么，拿出记录本准备作记录。

“大家说说吧，看派谁去好？”黄永胜对在座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说。

会场内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坐在我斜对面的李作鹏板着脸孔，把身子仰在软椅的靠背上；他戴着一副墨镜，因此难以看清他是在注视我或吴法宪呢，还是在闭目思索。他右边的邱会作，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表情无精打彩。邱会作的右边是刘贤权，他只顾低着头看文件。在我旁边坐着的吴法宪，两只小臂肘支在会议桌上，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又没说什么。我持笔严阵以待，但记录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怎么样？谁先谈谈？”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催促大家发言。

“这是个难题。”性急的吴法宪带头打破了沉默。“议论几次了，也拿不出个好主意。”

“拿不出也得拿，不拿行吗？”黄永胜话中有话地发牢骚说。

“说总政军管会右倾，怎样才算不右倾？”李作鹏把身子向前移动一下。“说王宏坤同志不行，谁行？”

“张秀川怎么样？”吴法宪试探地提出建议。

“他不行！”李作鹏不同意。

“胡×呢？……陈××？……”吴法宪一连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

“都不理想。”黄永胜说。

“要派一个不右倾的人去替王宏坤，这个人选还真不好找。”李作鹏说。

“派我们几个人去，也搞不好。”黄永胜也有些泄气。会场上，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个人你一言

我一语，都表示对于找不到这个难题的答案而苦恼。邱会作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刘贤权则继续低着头看他的文件。

看得出，这些“大将”们正在承受着一种政治压力。钓鱼台对派到总政担任军管会主任的王宏坤不满，压军委办事组换人。军委办事组是按照毛家湾的眼色行事的，而毛家湾对此并没吭过声。此时毛家湾并不愿与钓鱼台公开对峙，因为王宏坤的取舍无足轻重；如果军委办事组能换个人选也好，实在应付不了再说。但这却使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大为其难了。他已几经江青的棍棒之苦，还能再经得起这位“旗手”的千斤重压吗？他在一筹莫展之下，才向叶群呼救，期望她来听听他们的共同呼声，这样他就可以避免个人承担风险。不料，叶群是只狐狸，她决不上这个圈套；她知道，这出戏唱到最后，黄永胜只能靠林彪和她帮助收场，但不仅要黄一个人，而要军委办事组的诸员大将都能懂得这场戏的收场价值，至少懂得毛家湾与钓鱼台对待他们是截然不同的。

军委办事组围绕着总政军管会主任的人选问题讨论多时，但是毫无结果。发言的人都流露出有所不满，但谁也不肯明说这不满的矛头究竟指谁。他们大概因为只有林办秘书在场旁听，才感到不需有所戒备；同时也大概正是因为旁听的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才不便把这不满之声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一些吧！

会议实在开不下去，只好中止了。

“张秘书，我们只好讨论到这里了。”黄永胜站起来对我说。“你回去把我们讨论的情况向林副主席汇报。我们不是不想换人，而确实选不出更合适的人来。最后林副主席有

什么指示，我们照办。”

我离开会场，吴法宪可能要去厕所，跟着我到了走廊。他拍着我的肩膀，小声说：“这个事我们真为难哪！总政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边站了，副部长以上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倒了或靠边了，还说是右倾！解放军报社也是这样，站住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右倾吗？我们确实不好说。得林副主席说句话，不然我们顶不住！”

我回来后当即准备向叶群汇报，但叶群早已不在——她去钓鱼台了。等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有机会见了她，但没说几句，她就岔开了。

“军委办事组会议讨论的总政军管会主任人选，议论了几个人，都认为不理想。”我拿出笔记本，准备按记录向叶群汇报。“他们对这件事有些为难！……”

“别详细讲了。”叶群拦住说。“我和黄通过电话，情况已经知道了。”

“黄总长让我向首长汇报，说最后按首长的指示办。”

“也不用了。我去和首长讲，你讲不清楚。我也难哪！我得两边和稀泥！……”

我最初把这个事看得比较复杂，但此后再无任何动静，说明一场风波又暂时平息下去了。

21.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又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又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

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

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是顺利的。

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就是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天夜深之后，毛家湾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吃晚餐，叶群从钓鱼台回来了。她慌慌张张地走进秘书办公室，用一种非常急促的口吻对我说：“老张，快把所有参加‘拉条子’的人给我叫来，我要亲自给他们开个会！我要不催，别人是不会着急的。”

我把“拉条子”的人一个个请到毛家湾工作人员中几个单身汉的住室——它就在秘书办公室附近。

“我对你们说，”叶群用的完全是教训人的口气。“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一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的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都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拉条子”的人们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听了一阵，她显然感到疲倦了，于是宣布收场：“今天就说到这儿。总之，你们要抓紧，限你们在三天之内交卷！”

但还不到三天，叶群就从钓鱼台回来吹风说，陈伯达迟

迟写不出报告稿，误了‘九大’的召开，因此主席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张、姚负责执笔。张、姚的笔头比陈伯达快得多，仅仅用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把报告的初稿突击出来了。与此同时，陈伯达那个业已被废的初稿也全部写出来了。两个初稿都用铅字排成清样，分送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听叶群透露，中央文革碰头会只讨论了张、姚写的那个稿子，陈伯达借机反唇相讥，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但没有受人理睬。

康生给毛家湾来电话，向林彪极力推荐张、姚的稿子。他这个电话是打给叶群的，叶作了记录，让林办保密室存档。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老的电话，由我向首长讲。”叶群对我说。“张、姚写的稿子，我只能向首长讲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情况；稿子的内容，就得由你们去讲了。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但他坚持印出来，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对他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但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至于张、姚的稿子，文革是讨论过了，但还不知道主席的态度。可等主席有了态度之后再说。”

“我们‘拉条子’的事怎么办呢？”我问叶群。她规定的三

天限期已过，除林立果以外，其余各部分都已“突击”出来了，我告诉叶群这些情况以后，问她：“已经初步形成的‘条子’，主任什么时候看？”

“我不想看。”叶群又不着急了。“等一等再说吧。”

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现在不用讲。”林彪说。“他们还要修改，等改过了再说。”他接着又问，“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

“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一是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二是林彪很少征求讲文件的秘书对某一文件有什么看法，而且他自己很少明确表态，万一我的看法被他否定，也是自讨没趣；三是我觉察到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以及钓鱼台内部两个派系之间，有很多事情难说清楚谁是谁非，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不要紧，你说说看。”林彪微微露出一丝笑容。在他那一贯严酷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

“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林彪轻蔑地说。“你们可以

研究一下，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在给我‘拉条子’的时候，把能吸收的吸收过来。但他们作的是官样文章，这一点不要学。”

“我们‘拉的条子’，已经差不多了。”我乘机汇报说。

“首长什么时候能听一听呢？”

“不急。弄好了，先放在你们那里。最后可能用，也可能不用。你们可以不断作些充实，就是不用，也是练兵嘛！”

过了几天，又收到张、姚的第二次修改稿。主席这一次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改稿传到林办，林彪只让秘书讲讲主席的修改处，而对张、姚的整个稿子继续不加理睬。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这样，张、姚原稿中许多为钓鱼台张目的东西，或被主席改掉，或被主席增写的内容所冲淡。但尽管如此，这个几经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还是深深地打着钓鱼台的烙印。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于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改过。他原来布置“拉条子”，说是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月底，总理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张益民秘书拿着这份有总理批语的报告稿去向林彪报告，林彪还是一字没看、一字没改，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

“呈主席审批。

林彪×月×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来电话：

“‘九大’快开幕了，打算早一些把政治报告稿子印出来，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

“送给林彪同志看过了吗？”

“送过了。”

“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办，因为他们在等着付印。”

“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张益民说。

“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总理很着急。“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他不再看了，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这个事，叶群同志是知道的，因为她当时在场。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张益民请示总理。

“送出多长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

“不用再追了。”总理失望地说，“那已来不及了！”

22. 温玉成落选之谜

“九大”闭幕后，接着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主席、副主席。人们预料，那些坐在“九大”主席团常务主席位置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全都会当然地成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候选人。结果也基本上是这样，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温玉成。温玉成够不够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我们暂且不论，因为在那种

历史条件下这很难说。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事变化来看，特别是以温玉成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九大”主席团常委这种“资格”来推断，估计他当上个政治局委员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出于温玉成本人和一般人们的预料之外，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根本没见温玉成的大名。别人倒还无所谓，此时的温玉成吃不住劲了。

下午即将进行正式选举，温玉成在中午给毛家湾来了电话。

“我是温玉成。我现在在大会堂。我想和叶群同志通个电话。”温玉成的声音有气无力。我猜得出他此时打电话找叶群是为了什么。这一天清晨，林办就已收到印制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选票清样，那上面未见温玉成的名字。温玉成一定是已经知道了这种安排，可以想象得到他为此在精神上受到的震动。

我去报告叶群。叶群一听是温玉成找他，立刻显出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气，不加任何掩饰地表露说：“这种时候，他才知道要找我了！这个电话我不接！”我转身想退出，又被叶群叫住：“你等等。温玉成的电话放下了吗？”

“还没放。他在等着呢！”

“我从心眼里不愿接他这个电话，但他既然找到头上了，也不能用冷言冷语顶回去，我和首长商量一下。你告诉温玉成稍等一会儿，就说我现在有点事，几分钟以后再和他讲话。”叶群说着，向林彪的住室走去。不久，她出来让我立即把温玉成的电话接到她的办公室，嘴上还在发她的牢骚：“这种人是自作自受！不值得理他，但不能不理。听听他说些什么吧！”

我把电话接通后，从叶群那里退了出来。我在想，一年

前温玉成还是毛家湾的“红人”，如今却遭到林彪、叶群的白眼了。温玉成在作政治局委员的美梦，但没有毛家湾的撑腰，他能作得成吗？毛家湾为什么对他一反往常呢？这与其说是温玉成交了厄运，还不如说它是毛家湾与钓鱼台暗中勾心斗角的结果。可笑的是，在温玉成身上的这种勾心斗角，主要发自毛家湾这一方的疑神疑鬼，而并非双方的实力较量。毛家湾对温玉成的怀疑，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露出一些迹象了。

有一天，叶群从外边回来，神秘地和几个秘书谈论起温玉成来。

“有个情况，你们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叶群说。
“我听到一个反映，说在半夜三更里，经常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到温玉成的家里去。这些穿便衣的人，有男有女，有老一些的，也有年青人。你们说说这是些什么人呢？”

“可能是样板团的吧？”郭连凯说。“江青委托温玉成管样板团，样板团的人有事还不去找他？”

“那为什么不在白天找，而偏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找他呢？”叶群追问了一句。

“……”郭连凯答不上了。在场的其他几位秘书都故不作声。

“老张，你看呢？”叶群又来故意问我，大概是想试着拿我的智力和郭连凯作个比较。

“我看那个反映这种情况的人值得怀疑。”我也故意转移视线说：“温玉成在半夜三更里会客，别人怎么知道？难道会有人在深夜里对温玉成的住地进行监视吗？”

“不，”叶群赶忙解释说，“这是有人偶然看到的。”

“这种反映不一定确实。”我说。“就是有这种事，也

真可能象老郭说的那样，是样板团的人。白天睡觉，晚上演出，半夜还在工作，这在北京不算奇怪。”

叶群发觉这种问答没多大意思，也没再问下去。她走后，秘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叶群在暗中琢磨谁，谁就要倒霉，现在又该轮上温玉成了。有的说，准是叶群派人在暗中对温玉成的活动搞盯梢，不然她为什么能知道温玉成在夜间会见什么人呢？

1969年3月份，即珍宝岛事件前后，叶群又到秘书办公室查问有关温玉成的情况。

“温玉成最近还给林办送什么文件吗？”叶群问。

“还经常送。”我说。“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份他批给首长参阅的文件，主要是反映卫戍区部队情况的，也有些是有关战备的。”

“比过去少不少？”

“不算少。”

恰恰在这时候，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温玉成在总参主管作战，几次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有关情况。林彪、叶群都同意把这些电话记录转报主席，但叶群让把温玉成的名字勾掉，而代之以《总参作战部电话记录》。我问这是为什么，叶群说这是为了“突出集体，不突出个人”。其实我明白，这是林彪、叶群故意冷落温玉成的一种表示。

想当初，温玉成曾经深受林彪的器重。1966年8月，温玉成在广州军区被机关的一些人“炮轰”，日子很不好过。林彪当即表态，说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把他保了下来。1967年，林彪提议把温玉成从广州调来北京，委他以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这样的重任。“杨、余、傅事件”后，温玉成又兼任

举足轻重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并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时，温玉成扶摇直上。可是，被林彪器重的温玉成，也被江青看中了。江青对以前代她管过样板团的那几个人，都是热乎几天，就又一个一个地被他们踢开了，而把这难演的角色派给了温玉成。初进最高权力阶层的温玉成自然受宠若惊，但他不能一只脚踏上两只船，既要追随毛家湾，又要极力讨好于钓鱼台。这在毛家湾与钓鱼台以往有过的蜜月里，是不成为问题的；但在1968年以来的这种日渐变化了的政治气候中，他就身不由主地夹在两个相互利用又相互倾轧的阴谋集团之间了。他从事兵戎之业也许并不陌生，但作这种政治游戏却不在行。他一开始是天真的，但当他醒悟一些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玉成想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我敢断定，在最后一刻把温玉成的名字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彪以及叶群、黄永胜，以为此举是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他们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九大”以后，温玉成被降格到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这与他先前所任的要职相比，是大大受贬了。温玉成动身离京之前，林彪亲自接见安慰；叶群又把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与他亲亲热热地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此刻林彪、叶群都已发觉，温玉成原来不仅是自己人，而且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心腹。但他的被贬职是木已成舟，林彪只好照曹操杀蔡瑁之策行事了。

温玉成已深受毛家湾怀疑，怎么又摇身一变而成了毛家湾的座上宾了呢？其实，温玉成本人在对林彪的忠诚上是一直不成问题的，只是由于他管过样板团，一度 and 江青来往多

一些,才使毛家湾疑心生暗鬼。这个底细,我是“9·13事件”之后才弄清楚的。原来是这样:黄永胜的一个秘书,听黄永胜在和叶群通电话时骂过江青。这个秘书天真地以为这是黄永胜在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偷偷写了一封揭发信,托温玉成转给江青。这个秘书以为托温玉成转信是绝对可靠的。但他万万料想不到,温玉成在得知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把信转给了叶群,叶群又转给了黄永胜。结果,这个秘书立即被黄永胜、叶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秘密用飞机解往广州,投入监狱。这个秘书受了两年多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直到“9·13事件”后被释放出来。这个当初看上去相当精悍的大学生,此时竟变得头发渐白、两眼发直了。他后来所作的证实,大大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所谓温玉成落选之谜,这时才算解开了。

23. 假“搬家”

“九大”以后,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微妙。他们尔虞我诈,各不相让。这时政治天平的重心似乎在向着不利于钓鱼台的方向倾斜,但他们自以为有着别人不可攀比的特殊有利条件,又曾几次跃跃欲试,结果又都碰了壁。

1969年10月以后,林彪、叶群去苏州。叶群曾向工作人员宣布,对林彪和她住苏州一事,必须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对上海,千万不可让当时正在那里的张春桥知道。叶群宣布保密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人家(指张春桥)很忙,不要惊动。一旦叫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就得专程来看,那就添了麻烦了。”但实际上,叶群是出于对张春桥的戒备,对

张的戒备又是出于对尚在北京的江青的戒备，因为一旦张春桥掌握了林、叶的动向，江青也就掌握了。

但苏州距上海仅仅90公里，苏州的事情是很难长时间对上海“保密”的。叶群不愿让张春桥知道的事，张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林、叶自己泄了底。他们是从北京经空路直去苏州的，但同时又调了个火车专列由北京驶往上海待命。这次专列除坐有几名警卫战士之外，空无一人，但在沿线却惊天动地。铁路部门不知这次专列坐着何许要人，只好一路放绿灯，使它直达上海。有个专列抵达上海，上海的铁路部门自然要向市革委会作报告。张春桥得知后，亲往车站迎接，但迎到的却是一辆空车。在他的询问之下，警卫战士只能如实相告。这样，林彪、叶群坐飞机抵达苏州的第二天，就被张春桥得知了。但张春桥佯装不知，宁愿苏州方面有所动作之后再说。

张春桥知道林、叶住在苏州后，果然也就等于江青知道了。叶群曾布置林办在苏州值班的工作人员，如果江青来电话问林、叶现住什么地方，只可告她在“南方”，不要具体讲在苏州。但这一着很快就失灵了。

到苏州数日后的一天，叶群来秘书值班室找李文普，心神不安地说：“十一楼到底找到头上来了。她打电话叫我回北京一趟，我说首长最近老是出汗，我确实离不开。她说如果我回不去，她就来苏州一趟。这可怎么办呢？”

“她愿意来，就来吧！我负责接待。”李文普漫不经心地说。

“你说得轻松！”叶群说。“你们不懂，这里有难题，我不好对你们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让她来苏州呢？”

“我没办法。”李文普表示无能为力。“十一楼的特点

谁还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没人敢挡。”

“公开挡是不行的，得想个别的办法。”叶群想了一下后又说：“我有办法了：搬家！”

“向哪搬呢？”李文普有些为难，“首长对苏州这地方的气候很感兴趣，再说也刚刚适应。哪里还有更合适的地方呢？”

“杭州、无锡，都可以考虑。”叶群以为有了对付江青的妙计而自鸣得意。“你明天就派两个人去杭州、无锡看看房子，做做准备。这边，我给十一楼回电话，说首长住苏州不习惯，又想挪挪地方。如果她还坚持要来，我们就真搬家；如果她不坚持来，我们就不搬了。……”

叶群玩弄的这套假搬家的把戏，确实收到了挡住江青不来苏州的效果。但她挡住了江青其人，却没挡住江青出的“难题”。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子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信中认为，很多地方正在排演的样板戏，没有一个是真正称得上“样板”的，样板戏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信中认为这是“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信中大声疾呼，必须向这些“反革命邪风”作坚决斗争，并要求以中央名义把这封信转发全党，以引起广泛“警惕”。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江青、姚文元在里边几

乎逐句、逐段地加上了旁批，许多批注所上的纲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为了这两份材料能够顺利出笼，江青特致林彪一封信。信中大肆表白她是多么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多么渴望为此作出一点“贡献”。但她又苦于“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使她难于施展。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如同往常一样，这些东西照例由秘书先看，然后讲给林彪、叶群听。我刚给叶群讲了题目，叶群就把文件收了去，不让再讲了。

“不用讲了，这些事我都知道。”叶群面带愁容地说。

“这是个大难题。今年夏天，十一楼就把这些材料送给首长，要求首长批字支持。首长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后来被主席挡住了。现在事隔几个月，她又送批，叫我们怎么办呢？”叶群抓起电话机，对我说：“你先回去。我摸摸底再说。”

过了一阵子之后，叶群又把我叫了去。她说：“我向汪（东兴）和总理都摸了底。汪说，主席上次看了这些东西就很生气，这次是肯定不会批的。总理说，首长无论如何不要把这类文件再批给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现在首长夹在当中了，如何是好呢？……不管怎样，你把江的信和那两个附件先给首长讲讲，叫他说怎么办吧，我是拿不出好主意了。”

我去给林彪讲这些文件，林彪听后不露任何声色。

“还有什么吗？”林彪看我在合拢文件，问了一句。

“没有了。”

“叶群看过了吗？”

“看过了。”

“她说该怎么办呢？”

“主任说请首长拿主意。”

林彪站起身来，在室内踱着步。我坐在那里等他表态。他沉吟一会儿，走到我面前说：“压下，不必理睬！”

“不理睬怎么行呢？”叶群走进来，大声对林彪说：“这个人，你能得罪得起吗？再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文革中除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是那个小的（姚文元）起草的，已经改过八遍。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就给压下了，不都恨死你吗？”

“你说怎么办？”叫叶群这么一说，林彪也没主意了。

“依我说，你还得批几个字。”叶群坐下来。说。“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会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

“我批什么字呢？”林彪急于向叶群求教。

“还是照上次的办法，不明确表态。上次批的是，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这次批，可在前边多写一个‘再’字，就是：再请政治局讨论，并呈主席批示。”

“好，好，好！就照你说的办。”林彪兴致勃勃地坐下来，挥动红色油笔，在江青的那封致全党的长信上批了叶群所说的那几个字。

就这样，林彪、叶群把江青出的难题推给总理和政治局了。这以后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后来长时不见江青与姚文元合作的那洋洋数万言出世，从此可知它又彻底夭折了。

毛家湾与钓鱼台的紧张关系，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就是演成庐山那场“大笑话”的真实背景。那场“大笑话”的内幕，要比已经公诸于世的情况远为复杂得多，那就有待真正深知内情的人们勇敢地加以揭露了。

第八章 看林彪怎样“紧跟”

“9.13事件”以后，我有机会看到了“文革”以前林彪、叶群的一些“笔记”。我吃惊地发现，人们一度敬仰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对毛主席深怀不满。1958年的大跃进，林彪斥之为“凭幻想胡来”。毛主席发动的“反修”斗争，林彪看作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对毛主席本人，林彪批评是“言行不一”。由此可见，他反对毛主席是由来已久的。然而他在公开场合，却大声疾呼：“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简直成了莫大讽刺。

在明代，有位叫李贽的人，怒斥“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时弊，结果被送进大狱。在现代的中国，也曾有过不“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和“两个凡是”的可悲年代。林彪大概是深知讲出真心话是会遇到厄运的，然而他又有何必要在“高举”、“紧跟”上那样煞费苦心呢？

1. 林彪的“特点”

我到林办工作两个月以后的一天，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同我作了一次少有的交谈。由于四年多的时间只有这么一次，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那是在一次我给林彪讲文件之后。林彪斜靠在沙发上，

无精打采地听我讲完了当天的文件，端正一下身子，用一种严肃的目光打量着我，然后问：

“你来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了。”我说。

“噢，两个多月，时间不算长。对这里的情况都熟悉了吧？”

“初步熟悉了。”

“你看我们办公室几位秘书的水平怎么样？”林彪问。

“我看都不错。”

“如果把他们与部队中级别差不多的干部作个比较，他们的水平算是较好一些的呢，还算是一般的呢？”

我摸不清林彪问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只是顺口回答说：“算是比较好一些的。”

“你接触我也有两个多月了。”林彪把话题引到他自己身上：“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他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弄得我紧张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热了一下，心中也有些发慌。我怎么敢当面对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加评论呢？

“我不该评论首长。”我极力抑制着自己的紧张心情，嘴上这么说，心中却在盘算着如果林彪继续发问，我该怎么答对。

“可以评论。”林彪的口气平和，不象叶群那样盛气凌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

“如果非要评论，我可以根据我平时听到的反映，加上自己两个多月来的感觉，说说首长有什么特点。”我的心情由紧张多少变得稍微轻松了一点，但脑子里仍然紧张地筹措

着下几句应对话。

“你说说看。”林彪笑了笑，表示很愿意听听人们反映他究竟有什么“特点”。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我说。“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的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

“你来的时间很短，怎么看出我对毛主席跟的紧呢？”林彪很有兴致地问我。他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又可能怀疑我是在故意恭维他。

“我不是来北京后才有这个印象。”我说。“首长从1959年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首长的多次讲话中，次次离不开讲要拥护毛主席，紧跟毛主席，高举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些烙印，在部队中打得很深，我也不能例外。”

“这么说，你在过去就听到过我讲的一些话了。”林彪还在继续问：“你从1959年起才听到我的名字吗？”

“不，”我说。“我还在14岁的时候，就听过首长的名字了。1946年4月，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那时我正在长春读书。我在街上看过一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布告，布告的落款就署着首长的名字。不过那时候我年纪小，不大懂事。”

“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林彪又把话题拉回来。“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

2. 叶群的“语录”“像章”热

作“紧跟”的文章，叶群也很卖劲。林彪的“紧跟”

以唱高调、说漂亮话见长，叶群的“紧跟”，则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林彪带头鼓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子“破四旧”的狂热，同时把毛主席加以神化的运动也达到高潮。

这时候，毛家湾也不能不作作样子。

“老阳，你赶快检查一下。”叶群对当时担任林办支部书记的阳地说。“毛家湾挂的所有山水画，都一律取下来。那是四旧。首长在外边号召破四旧，在家里还摆着四旧的东西不动，被外来的客人看到了，成什么样子！”

“我看山水画不能算四旧，……”阳地有些想不通。

“你懂什么！”叶群申斥他说。“现在要事事处处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首长是忠于毛主席的光辉榜样，是靠这个起家的，不能忘了本。在他眼皮底下，不突出宣传毛主席，还能宣传那些山水画吗？要赶快行动起来，把毛家湾布置成三忠于的环境。要在你们秘书的办公室、会客室、警卫值班室以及所有家属宿舍，都挂上主席像，贴上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可能被外人看到的地方，那些显眼的地方，一定要布置好。你们布置后，我还要检查，不合格可不行。”

在叶群的督阵之下，毛家湾果然变成了“三忠于”的环境。到处是毛主席挂像或塑像，到处是毛主席语录标语；在一间会客室里，还贴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标语口号。但这些都是“外人”可能看到或比较“显眼”的地方，在那些“外人”不可能到达或者不“显眼”之处，则是另一个样子。林彪住室的墙上一一直是光秃秃的；叶群卧室挂着一个条幅，不过那不是主席语录，而是陈伯达手书的两个墨笔大

字：“克己。”

除此之外，叶群还有两个“嗜好”，见谁带着新式的毛主席像章就“抢”；见一个所熟悉的人就送《毛主席语录》。

叶群的像章热，一度到了发狂的程度，不用说，主动向她奉献像章的人已经使毛家湾门庭若市。她收存的像章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贵重华丽；其中有一个主席头像，听说是由纯金铸成，足有几斤重。她已收存像章几千种，但还不满足。谁带个新像章被她碰上，只要是她没有的，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死皮赖脸地上去把它“抢”到自己手里，然后拍拍对方的肩膀，道声“谢谢！”她还多次化装到北京的大街上去搞像章交易，那更是丑态百出。只见她头上裹着一个大围巾，嘴上蒙着大口罩，领着一个女内勤加两个穿便衣的警卫战士，在街头上转来转去，两眼不住地搜索着来往人们胸前的像章。一旦发现某人的像章是新式的，她立即上前把人拦住。初开口是以甜言蜜语向对方索要；对方不给，就凭旧像章和他换；如果对方还是不同意，就拿几枚或几十枚旧像章交换他一个，直到把这枚新像章弄到手为止。她曾扬言，她决心弄到一万枚新像章，去向主席73岁生日“献礼”。她这样做，是想表示她对主席的“热爱”和“崇拜”，但后来听说，主席对她这套并不感兴趣，她的像章热顿时冷了下来，那近万种像章也成了一堆库存废铁。

叶群见人就送《语录》，也有时叫人哭笑不得。她从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那里弄来的《语录》多得堆成山。她每次外出，都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带上几本，有时还叫随行的警卫人员帮她拿上几本，无论是在宾馆的走廊里或者电梯上，在娱乐场所的座席旁或者休息室，只要她能够和一个陌生人搭上话，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拿出一本《语录》塞

到对方手里。有一次，她窜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也是到处送《语录》，她看到了我的两个小女孩，便拿出《语录》要弄她们。她对我的八岁大女儿说：“你叫我声叶妈妈，我就送给你一本《毛主席语录》。”大孩子顺从地叫了一声，得到了一本《语录》。叶群又对我五岁的二女儿说：“你叫声叶妈妈，我也给你一本《语录》。”二女儿板着小脸孔说：“我不叫。我有妈妈，你不是我妈妈。”叶群威胁她说：“你不叫，我就不给你《语录》！”孩子立刻转过脸去：“我不要！”这件事，弄得叶群很尴尬。她后来见人就讲：“我不喜欢张云生的那个二女儿！”

3. “紧跟”种种

为了表白自己“紧跟”主席，林彪和叶群是颇费过一番苦心的。在这方面，我又想起来几件“小事”。

一件是林彪登上天安门，从来都是注意“紧跟”在主席之后的。

1966年国庆节那天早晨，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李文普忙得不亦乐乎，他一方面要照料林彪穿上适宜于当时气温的衣服（林彪穿衣服是随气温的变化而严格掌握增减的。他从不穿棉衣、毛衣，而只穿布料单衣；如果气温变凉，就每降几度增一件衣服，以至有时套四、五件衣服。这一套，唯有熟悉林彪生活规律的李文普才能掌握，别的工作人员谁也顶不了，林彪也不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谨记叶群的嘱托，掌握好林彪从毛家湾出发的时间，不能抢在主席之前，也不能落在主席之后。

“主席动身了！”毛家湾警卫值班室收到了警卫局特意

打来的电话，立即转告李文普。由于得知主席已动身，林彪也从毛家湾动身了，目标都是天安门城楼。原来以为，按主席住处与林彪住处和天安门之间的距离来推算，只要同时动身，主席和林彪抵达的时间也差不多。但主席住地距天安门比林彪住地稍近一些，主席比林彪早到了一两分钟。可是这样一来，叶群却把它看作一次“政治事故”；李文普因此被训得几天不见笑容。

“你是怎么搞的？”叶群怒气冲冲地质问李文普：“为什么让首长落到了主席的后边？叫主席等首长，这象话吗？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故！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我是照主任的指示办事的。”李文普解释说。“主任交代，让我掌握好，只要主席动身了，我们就动身。”

“我交代的意思是不能让首长抢在主席前边上天安门，但也不能在主席到后，首长才到。首长可以早到一两分钟，在城楼下电梯旁等主席；不能叫主席先到等首长。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边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到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

“是我没理解好！”李文普认了错，叶群这才不再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了。

从此以后，每逢林彪要去天安门之前总是这样：李文普通过警卫部门的协助，只要知道主席即将动身，就让林彪从毛家湾出发；林彪到后一两分钟，主席也到了。然后，林彪陪同主席坐电梯上天安门城楼，主席走在前边，林彪“紧跟”其后。……

再一件是，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总是随身带上《毛主席语录》。说是“随身”，也不尽然。这本《语录》，平时由李文普保管，临到林彪“出场”前，李文普把

它带上，直到现场，李文普再交给林彪。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语录》，不时地左右挥动着，口号声一过，这本《语录》又回到李文普手里。《语录》里写的什么，林彪从未细翻过，他只是提倡“背警句”而已。《语录》前面印有林彪著名的“再版前言”，是出自钓鱼台之手，版权也不属于林彪。人们经常看到的林彪“高举”《毛主席语录》的背后，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件是林彪向主席批送文件，也出现了变化。我初到林办时，多次看到林彪批给主席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或“送主席批示”。从1967年初开始，“请”和“送”都不再用了，而代之以“呈”字。这一字之改，曾引出一段对话：

叶群：“今后凡由李根清仿首长字体批给主席的文件，一律写呈主席阅或呈主席批示，不要再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了。”

某秘书问：“为什么呢？”

叶群说：“‘呈’字比‘请’字显得更恭敬些。”

“过去封建社会，下文上送才叫‘呈’。解放以后，这个‘呈’字已经没人用了。”

“对别人不需要，对主席完全可以。主席的地位最高，怎么恭敬也不算过分。特别是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除此之外，林彪、叶群更有一种“紧跟主席”的妙招，叫做：“主席画圈我画圈。”这是叶群在秘书们面前正式宣布过的，林彪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一条“原则”。由于林彪本人从不亲自看文件，而只听秘书给他讲，因此该由他表态

画圈的文件，这个圈他也不亲自画，而让秘书代画。但叶群严格交代，只有主席业已圈阅或有过表态的文件，在给林彪讲过之后，秘书们才能根据“主席画圈我画圈”的“原则”，把这个圈画上；否则，宁肯把这份文件推出去，也不能由林彪带头表态。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的重大问题时的表态与主席的表态有任何抵触之处，以致造成林彪“一贯紧跟”的假象。

4. 秘书“把关”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神化主席的狂热，对林彪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67年初，叶群交代林办的所有秘书帮助林彪“把关”。

“现在文件中对首长的提法很多，你们要帮助把好关。”叶群郑重其事地说。“人们尊敬首长，赞扬首长，这是好事，但提法不当就可能帮倒忙。今后凡是文件中出现对首长的新提法，你们都要提醒，一定把那些不适当的提法划去。”

“怎么算作提法适当，怎么算作不适当呢？”我问。

“适当提法，例如说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是报纸上经常宣传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叶群显然也划不清所谓适当与不适当之间的界限，因此只好模棱两可地说：“至于什么提法不适当，这很难讲具体。反正你们见了有对首长的新提法，就注意及时提醒吧。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保证不会说你们是反对首长。这是首长亲自交代的，我可以作证。”

“文件那么多，都要把关吗？”又有人问。

“不用，只限传阅件。”叶群说。“特别是送给主席和

“中央文革的传阅件，一定要注意。”

叶群布置过的一些事情，我十之八九都要打个问号，或者怀疑她是“假传圣旨”，或者怀疑她是别有用心；但这次布置的“把关”，我却当真了。

一次，我向叶群报告：在一份由军内传出送给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多处提到林彪是“副统帅”和“光辉榜样”等，但不知这样提法是否“适当”？

“这……我可作不了主。”叶群的神色有点不悦。“是首长交代让你们帮助把关的，如果勾掉这些提法，得让他点头才算数。他不发话，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叶群说着，让我拿着文件和她一起去见林彪。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进门就说：“你叫秘书帮助把关，现在人家把关了！……”

“好嘛！”林彪附和着说。

不能勾！”

“好了，好了，”林彪不耐烦地说：“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从林彪那里走出来，叶群小声对我说：“你提醒还是应当的。首长是个急性子，不把话听清楚，就下令划掉。我是拿话将他，其实他是喜欢‘三忠于’这个提法的，说他是‘光辉榜样’也不算过分。”

尽管叶群这么说，我也很难消除内心的顾虑。我发现“把关”里面有是非，这是何苦呢！从此，我对这类帮助“把关”的事再也不那么认真了。

5. 做作的“突出主席”

1967年夏，林彪又去住大会堂。一天，他让内勤来叫秘书。张益民去了。林彪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并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据说这封信送到总理手里以后，总理表示此举可以不必。但林彪想“突出主席”之心十分迫切，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而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这样，就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

林彪在“谦虚”方面的做作之举，更有甚者。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他回来之后，就吩咐叶群，叶群又吩咐秘书，必须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这样的事一共干过两次：头一次是叶群亲自带着警卫人员干的；又一次是叶群派我和另一名林办工作人员干的。我问叶群：“在大街上公开去撕标语，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被人揪住，怎么办？”叶群说：“这个，你们用不着害怕。你们穿上军装，坐上汽车，沿市内各主要街道察看，如果发现宣传首长的标语，就上去把它扯掉。一旦有人查问你们，你们就堂堂正正地打出首长的招牌，说明你是林办秘书，是奉首长的指示这么干的。他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来问。……”虽经叶群这么说，我心中还是不太有底。但实际上也还顺利。我们是在夜深入静之后才上街的，直到天亮后才回来。一夜之间，行程近百里（有汽车相助），撕掉宣传林彪的大字标语三十多张。中间曾两次被人盘问，我都照叶群的交代如实亮出“招牌”，确也灵。盘问者看看我们的装束，又望了望停在附近的上海牌小轿车，知道来头不善，也就缩口了。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向叶群汇报，叶群又拿它作资本出外去宣传。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向中央文革报告，说街上宣传林彪的大标语已在一夜之间被人撕掉，据称是林办的工作人员干的，但不知真假。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证实，这就又一次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6. 林彪的题词热

林彪到处题词，是“言不离主席”的。

1966年冬，林彪给铁道部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人民革命历史发展的火车头。”1967年“五一”节，林彪给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1967年夏，林彪给北京卫戍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1967年入冬，林彪又给海军“双代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总之，林彪次次题词都“突出主席”、“不离主席”，然而每次题词之后都引起一阵热闹的庆祝锣鼓，并且登报广为宣传，因此实际收到的效果又都是突出了他自己。

我下面回忆的是林彪题“四个伟大”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经过。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对我们几个秘书说：“蒯大富最近给中央文革写信，说他们正在建造一尊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他希望首长给题一下‘四个伟大’，用在竣工后的基石上。对这件事，中央文革已表示坚决支持。我想这是首长义不容辞的。第一，这是在宣传主席，而首长是一贯紧跟主席的，不能失去这一机会；第二，这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分量很重；第三，要求题词的是蒯大富。我对这个人不太熟，但他是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不能给他泼冷水。你们要准备好笔、墨和纸，一旦首长哪天情绪好、不出汗，我就叫你们，你们要保证不误事。……”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内勤突然传令：“主任叫快准备好笔墨和纸，首长要练字！”

郭连凯、李文普紧急出动，赶快去布置林彪练字用的文房四宝。我也得赶紧上去，因为如果不乘林彪“练字”的机

会提醒题词，叶群又该责怪我这个分工秘书“误事”了。

在林彪会客室的大型玻璃板茶几上，已经备好了笔、墨和宣纸。一个内勤帮助研墨，叶群在旁指指点点。林彪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挥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几排字。

发不同青心同热，
生不同衾死同穴。
书赠爱妻叶群
林彪

“怎么样？”林彪笑着问叶群。

“好，相当好！”叶群捧起林彪专为她题的字，眉开眼笑地玩味着。

我在一旁看热闹，对林彪写的“书赠爱妻叶群”觉得有些恶心。这太肉麻，也有失林彪的身价。林彪、叶群都在自鸣得意，似乎对周围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旁观看并不在乎。但叶群一抬头看见了我，就急忙故意转开话题。

“首长在做字，这是给我写着玩的。首长今天情绪特别好，有哪里要求题词的，你们赶快报。”

“要求题词的有好几起。”我列举了几个军区的小报要求林彪题刊头。“这些都已压很久了。”

“那都不急。”叶群拦住说。“不是蒯大富也要求首长题词吗？”

“是，还有蒯大富。”

“蒯大富要求题什么？”林彪问。

“他要求题四个伟大。”叶群说。“这事我和你讲过，你怎么不记得了？”

“蒯大富不过是个红卫兵，”林彪说，“全国的红卫兵成千万，我哪里记得那么多！”

“你不能小看蒯大富，人们都叫他蒯司令。”叶群凑在林彪耳旁说。“蒯司令的能量，比我们的一个军区司令都大。这个人好张扬，不知天高地厚，我也不喜欢。但他要宣传毛主席的四个伟大，又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我们不能泼冷水，毛主席这杆旗是你带头高举的，能叫别人代替吗？”

“当然不能！”林彪说。

“快研好墨，铺好宣纸！”叶群命令内勤说。

“怎么写呢？”林彪拿起笔，又抬头问叶群。

“四个伟大嘛！”叶群逐字逐句地念：“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照写不误。因他自己嫌落款的“林彪”二字写得不好看，又重新写了一张。

“很好！很好！”叶群对林彪的题词赞不绝口。“这张题词，分量比过去的所有题词都重。不能叫蒯大富独吞，不然他就会拿它去到处吹，抬高自己。也不能说这只是给清华的题词，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想把题词交给中央文革，请他们公开发表，这样影响就大了。”

果然，在“五一”节后的第二天，林彪题的“四个伟大”的题词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所占版面差不多有半张报纸大。同时，在许多地方，又出现了一阵庆祝林彪题词的狂热。

一些军区小报请林彪题刊头的要求一直被压下不理，但海军李作鹏要求林彪给题“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却很快得到了满足。1967年11月底，林彪从

由海关回到北京，一到毛家湾就要提笔“练字”。由于叶群的及时撮合，林彪即兴给海军题了词。当晚，不仅李作鹏亲自带着海军机关的一些人敲锣打鼓，游行庆祝一番，而且吴法宪、邱会作等人也发动“首都三军”上了大街，又是高呼口号，又是鞭炮齐鸣，一直闹腾到下半夜。后来听说有不少人是奉令去参加这次庆祝活动的，因为谁如果不去就会被扣上“态度问题”的政治帽子，在那种年月，这种帽子是可以把人打进“牛棚”的。

林彪给海军的题词见诸于全国各报之后，在外地也引起了反响。青岛的两派，为庆祝题词的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争执，甚至染成一场流血的武斗。

“青岛为庆祝我题词的事发生武斗的消息，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林彪在一次听讲文件之后问我。

“北海舰队为此事写了一份专题报告。”

“这个报告，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能够看到吗？”

“军委收电照例抄送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因此他们是能够看到的。”

“那么好，”林彪冷冷地板起面孔：“你们记住，我今后决不再题词了。今后不论什么人请我题词，你们一律挡回去！”

7. 真与假

1967年底，中央成立了一个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林彪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成员都是谁，他们是怎样活动的，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它下设一个写作班子，在京西宾馆办公，由叶群暗中遥控。

一天，林办收到一份这个写作班子起草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写提纲初稿。在讲给林彪、叶群之前，我仔细地翻看了一下这个稿子，许多内容十分令人吃惊。特别蹊跷的是，在叙述“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时，竟然说林彪是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叙述“文化大革命”时，竟然五次提到江青。而对功勋卓著的周总理，《初稿》从头到尾只有两处略加提及：一次是在南昌起义那一段，把总理摆在林彪之后一笔带过；另一次是建国以后，只是提及总理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看到这样明目张胆伪造和篡改历史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任何一个稍微熟悉一点党史的共产党员都会难以容忍。我抑制着自己的愤慨情绪去给林彪讲这份文件，看他有什么表示。

“这个东西，主要是应当突出主席。”林彪安然地说。

“你统计一下，看里边提主席多少处，提我多少处，提其他人多少处？”至于其它，他都没兴趣过问；对于说他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也未加制止。

我回到办公室抓紧时间对《初稿》中提名处作了粗略统计之后，又去向林彪报告：“这个初稿中，提到主席共有350多处，提到首长有130多处，提到江青5处，提到总理2处，提到陈伯达和康生各1处。……”

“嗯，先存起来。”林彪什么话也没再说，就这样听了就算完事了。

我又去给叶群讲，叶的表态更叫人气愤。她说，“这样突出主席和主席路线是完全应当的；提别人多了，就会冲淡了主席，那不好。不过这是个初稿，以后还要修改。你们如再收到修改稿，不要急于先报首长，只给我讲讲就行了。首长是编委会主任，你讲里边提他多少多少次，他也不好多表

态。最后的定稿反正是要经过他的。”

这以后，又陆续收到第二、第三和第四次修改稿。第四稿尤其不象话。原来的初稿，不管怎样，还两次提到总理；二、三次稿被删得只剩下一处，而第四稿却连一处也不见了。这样，这个所谓“党史”除了“突出主席”外，就成了突出林彪和江青了。林彪被吹成“一贯高举”、“一贯紧跟”、“一贯正确”，江青则被捧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居心叵测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不久后就流了产，那个叶群遥控的写作班子也悄悄解散了。

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来电话通知，要求把已经印发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编写提纲前后四次草稿全部收回销毁。我去报告叶群，叶群说：

“对别的家，他们可以收；毛家湾这一份不要交，我要留下作参考。”

“主任和京西宾馆写作班子费了那么大心血，他们为什么要收回销毁，那不太可惜了吗？”我问叶群。

“可惜，又有什么办法？让收就收，让烧就烧吧！”叶群没听出我的话中有话，接着又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感慨：

“一心想大大突出主席，但也难哪！”

“这四次草稿，谁看后也会觉得不公平。”我借机发泄出闷在心里的几句话：“为什么总理的名字最后被弄得一处也不见了呢？”

“谁知道！那都是他们下边的人搞的。”真正触到痛处，叶群就逃之夭夭了。

8. 表与里

林彪、叶群开口闭口不离“突出主席”、“紧跟主席”，但对于一个当初曾在主席身边工作、后来又回到毛家湾负责警卫工作的韩庆余，却一直百般防范，戒心重重。

韩庆余，原是8341部队司令部警卫科科长，后提为副参谋长。1966年8月，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林彪的地位已经上升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中央警卫局特派韩庆余来到林彪驻地，以加强警卫值班。那以前，林彪的警卫工作一直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以后，就变成中央与军委的两个警卫部门共同负责了。

“首长的安全，是中央警卫局的重点警卫目标之一；除了主席，就是首长了。”李文普对叶群说。“中央警卫局的意见是，首长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安全应由中央警卫局全部负责，而最好不要两家插手。”

“不能光听他们的。”叶群说。“两家插手也有好处，这样可以相互制约。首长是中央副主席，但同时也是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中央和军委的两个警卫部门都有责任管。不能只交一家，那样不好。”

“警卫局还有一个建议，想派一名副局长来这里加强警卫值班。主席和总理那里，都是由局长或一名副局长亲自值班的，因此……”

“我们不需要。”叶群打断了李文普的话。“你可以对警卫局讲，他们是好心，首长和我十分感谢。但要对他们说，主席身边的警卫力量加强一点是完全应当的，对总理加强警卫也有必要，至于首长这里，派来个韩庆余，已经足够

了。官不在大小，能办事就行。”叶群沉思了一下，又问李文普：“韩胖子这人怎么样？”

“挺好，”李文普回答说。“这个同志很稳重、老练，也好相处。他做警卫工作的时间比较久，曾经担任过警卫主席的一中队中队长，经验很丰富。”

“他在主席身边工作吗？”叶群觉得挺新奇。

“我听说是这样。”

“那……好啊！警卫过主席，现在又警卫首长，这是绝对靠得住的。”叶群言不由衷地说。“他在这就行了，可不能再派什么副局长来了。”

韩庆余被留在毛家湾，但长期不得好烟抽。他是代表中央警卫局负责林彪住地的警卫工作的，但在警卫业务上很少有发言权。根据叶群的摆布，他只能做两件事，一件是参加“警卫值班”。在林彪住地的隔院，设了一个“警卫值班

室”。参加值班的除警卫连全体外，还有军采办八处警卫处的两

同仁。但也有一个具体问题：他长期在毛家湾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却仍然在8341部队，回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很不方便。”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想他的组织关系仍可不变，但可以临时吸收他参加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

“那绝对不行！”叶群脸色一沉，“他参加毛家湾的支部生活，里边的事被他知道后，他还不传到外边去！？”

“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懂得保密纪律，只要规定下来，谁也不敢乱说。”郭连凯极力为韩庆余说情，“老韩来这工作的时间已经不短，我观察这个同志很老实，嘴巴也严。”

“靠不住！”叶群一向认为郭连凯的头脑简单，这次又找到了奚落他的机会，“对你老郭，我有些把握，因为你的脑袋缺根弦；但对于韩胖子，我没这个把握！”

“我脑子是缺根弦，”郭连凯笑呵呵地说。他见叶群的情绪还不坏，就又鼓起勇气说：“但这要看和谁比。比主任，我不行；比韩胖子，我还不见得次！”

“少废话！”叶群故作严肃地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今后严格规定一条：不准韩胖子介入里边的事。他有他的组织关系，和毛家湾支部不相干。他的责任是搞好住地的警卫工作，没有权利过问别的事。这方面出了问题，我就拿你支部书记是问！”

“是！”郭连凯不敢再说什么了。

此后，韩庆余在毛家湾工作几年，一直和“里边”格格不入。这一方面是由于叶群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韩庆余本人的谨慎。他明了自己职责的限度，也理解这个特

殊环境是个是非之地。他每次碰到叶群，对叶都是笑脸相迎，以礼相待。毛家湾的工作人员虽然和他接触不多，但对他还是不失尊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虽在警卫工作上无大作为，但各方面的关系比较融洽（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也就使他感到心安理得了。

但是，不管韩庆余怎样谨慎，也难免招惹一些是非。一个在林彪身边担任内勤几年的小战士，由于勤快、老实而一直得到林、叶的好感。但他有一次跑到值班室去和韩庆余等人聊天，被刚从外边坐车回来的叶群发现了。这个小战士当时就被调离毛家湾，而且事不过夜，从决定到人离开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自然，正式宣布调离他的理由是与同韩庆余的这次接触毫无关系的。

叶群对韩庆余这样百般疑忌，从来都不愿露出是出于疑忌主席的任何痕迹。就是对她所亲信的林办工作人员，她也向来都是讲韩庆余由于在主席身边工作过而如何“绝对可靠”，而且多次表示对中央警卫局派来个如此理想的警卫人员是如何满意。但是，她既然是要的一种骗术，就只能得逞于一时，而绝难持久。越是到了后来，她的真正用心就越清楚了。

9. 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在党的“九大”上，林彪、叶群的“紧跟”都得到了相应的高额报酬：林彪成了正式载入党章的主席接班人，叶群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外人很难知道，就在政治局委员选举的这个当儿，他们的“紧跟术”险些失了灵。

“九大”还没开完，叶群就在林办内部放空气说，“这

次开过‘九大’，我就要退下来了。我其实也没作什么大的贡献，只不过是运动推上来的。这样也好，参加上层会议活动少了，我也该抽空好好学习了。”

一向目空一切、狂妄自负、贪婪权位的叶群，此时忽然变得谦虚而老实起来了，这不是有点怪么？

考察一下她说这些话的背景，也并不奇怪。原来起因在江青身上。据说，一个时期以来，主席对江青的作为非常不满，甚至有些气愤。主席和江青的这种紧张关系，我从侧面也有所觉察。那是半年以前，叶群打电话叫我到大会堂小礼堂去给她送一份文件。我到后，正碰上江青在这个小礼堂一个群众集会上气哼哼地讲完话。江青向小礼堂主席台的后边走，叶群紧跟着出来，我随叶群之后。江青一边走，一边训着她的秘书，说这个秘书把她的什么文件弄乱了，等回去再算帐。江青训过秘书，又盛气凌人地对在她身后的中办主任汪东兴说：“……你回去好好安排一下。叫他好好休息，少操心别的事，实在不行，就让他搬古董！”汪东兴面带愁容，但在江青的厉声训戒之下，他也不敢吭声。江青在前边嚷，我在后边想。我在推测：她说的“他”是谁呢？这不是说的主席吗？如果是主席，江青怎么能用这种口气硬逼着主席“少操心”和“搬古董”呢？叶群在林彪面前是这样的，江青在主席面前原来也是这样，这不是正在重蹈吕后专政的覆辙吗？后来我又听到传说，主席并不理会江青那一套。然而我又听说，每当江青在主席面前的日子不好过时，叶群就去“和稀泥”，实际上是替江青找台阶。叶群回到毛家湾，也常不加掩饰地透露主席说她是“八级泥瓦匠”。到了召开“九大”时，主席几次提出“不准江青进入政治局”。这个动向，叶群知道得比谁都更清楚。她曾为江青辩护，但无济

干事。江青如果被挡在政治局门外，叶群还值得一提吗？如果叶群进不了政治局，她曾在林办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面前大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架子怎么能容易放得下呢？但事已至此，她不得不作点“舆论准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她在政治局委员选举前夕故作“退出”姿态就不足为奇了。

在绝望之下，又产生了转机。主席决定成立的酝酿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的工作班子，使江青、叶群复出又产生了某种希望。这个班子共有三个人：总理、康生和黄永胜。康生是钓鱼台的喉舌，黄永胜是毛家湾的代理人。因此尽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但在这个阵容里很难改变二对一的局势。1969年4月的一个下午，即九届一中全会进行政治局委员正式选举的前一天，主席召集这个工作班子最后商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江青、叶群都名列其上了。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毛家湾。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吴法宪兴冲冲地给林办来电话：“我想请叶主任接个电话！”

“她正准备休息。”我说：“请吴司令在叶主任起床后再来电话吧。”

“那么，请你转告也行。”吴法宪说。“最好现在就转，不要等她起床。”

“现在就转告，会影响她休息。”还有下半句话我不便说出口。我现在转告，叶群说她的休息受到了影响，和我发开脾气，你吴法宪敢情轻松。

“不会。她听到这个消息后会高兴的。”吴法宪满有信心地说。“你就讲我来电话说，黄已从主席那里出来，一切都很顺利。根据叶主任的嘱托，我已经向黄咬了耳朵。请叶

主任放心好了。……你就报告这么几句就行了。”

“吴司令的这几句话，我听不大懂。”

“你如实转告，叶主任是会听懂的。”

“叶主任明白你讲的‘一切很顺利’和‘咬了耳朵’是什么意思吗？”

“她会明白的。她也会高兴的。”吴法宪可能嫌我罗嗦，把电话挂上了。

我在去叶群卧室的路上，心中琢磨吴法宪这个不明不白的电话的含义。他在这样的時候向叶群作这样的通风报信，又说叶群听后会“高兴”，这肯定与即将举行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一事有关。莫非叶群想进政治局的美梦有指望实现了？

叶群的卧室还开着灯，几个内勤正在帮她作各种睡前准备，但她显然已经上床了。

“张秘书来了。”一个内勤报告叶群。

“你有什么事？”不能等我起床后再说吗？”从屏风后传来叶群的声音，这声调是有几分恼气的。

“吴司令来了电话，让我立即转告，并说主任听后会高兴的。”

“你说吧，吴胖子来电话说了些什么？”叶群的口气顿时变得温和了些。

我把吴法宪的电话内容照原话转述一遍，然后故意加上一句：“我对吴司令说，我对他的话听不大明白，他说主任是会明白的。”

“我如果还不明白，起床后再打电话问他。好了，你回去吧！”

……

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秘书正在办公室议论关于政治局委

员选举的事，林立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各位秘书大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快帮我出出主意。”林立果歪着头，斜着眼睛扫了一下在场的郭连凯、李文普、张益民、李春生和我，笑咪咪地问：“你们肯帮忙吗？”

“老虎，你说吧！”郭连凯说。

“主任刚才对我讲了个秘密，她还央求我帮忙呢！”林立果还歪着头，但他收起斜眼看人的神气，话中露出一丝乳臭未干的天真味道：“主任对我说，老虎，明天就要进行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了。这是妈妈的关键时刻。如果妈妈当不上政治局委员，就什么都完了。你爸爸虽然地位很高，但他身体不好，最近还怀疑得了癌症，还能活多久？妈妈还年轻，将来你就得依靠妈妈了。你如果能帮妈妈一把，使妈妈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一关，将来妈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主任让你帮她什么忙呢？”郭连凯问。

“是啊，我也问她，我能帮你什么呢？她说，老虎，现在除了你，谁也不行了。她又告诉我，她前些天和首长吵了一架；正巧，吵架后，主席就约首长去参加一次会。在会上，主席生气地说，不能让江青进政治局。首长也说，主任也不行；首长还说了主任的一些坏话。这些情况，后来由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告诉了主任。主任现在很后悔，说早不吵，晚不吵，偏在这个当儿吵，弄得一连几天不敢和首长照面。今天她听说，最后商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又有她了，所以特别高兴。可是她又听说，总理和黄永胜受主席的委托，要在今天晚上到毛家湾来，征求首长对候选名单的意见。主任特别担心总理前来，因为怕首长一气之下把她的名

字从候选名单上勾掉，那就彻底吹了。主任说，无论如何要阻止总理到毛家湾来；只要不来，那个名单就成定局了。可是怎样阻止总理呢？唯一的办法就得靠首长亲自发话，假装说首长现在正出汗，首长完全尊重主席召集小型会议商拟的候选人名单，请总理不要来了。这个话，主任现在不敢见首长，是说不上去的，而让我去帮她说。他妈的，她让我帮忙，就是帮干这个事，你们说我能帮吗？”

秘书们听罢林立果的这番暴露叶群丑恶原形的叙述，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太不象话了！”

在秘书们议论的同时，林立果也搭腔骂叶群：“他妈的，叶胖子真给首长丢人！”他又问大家：“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你不能干这种事！”“你要干这种事，就要承担历史责任！”

“好，我听你们的。”林立果说着，转过身就跑回去了。

林立果走后，郭连凯对李春生说：“春生，你看透了主任是个什么人了吧？”

“太坏了！”李春生红着脸说：“我以前上当了！”这位熟读马列书但对现实一窍不通的“书呆子”，这次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叶群是个“活学活用”和“紧跟”的榜样，对她服服帖帖，毫无怀疑，现在他才如梦初醒。从此，李春生对叶群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李春生的转变，使叶群直接控制的林办所有秘书成了清一色的反叶群派。从前，其他秘书虽然常在背地里议论怎样

对付叶群，但只要李春生在场，谁也不敢露出一句对叶群的不满，自此以后，这种戒备解除了。

但是，秘书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在小处是清醒的，在大处是糊涂的；对叶群是清醒的，对林彪是糊涂的。大家都以为叶群很坏，而林彪是受叶群的摆布的。因此一听说林彪在政治局委员选举问题上不再听叶群的摆布，甚至有可能在“一气之下”把叶群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都以为这是件大快事。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又一次证明秘书们的天真是多么可笑。

这一夜，我和郭连凯值班，一直等到天明，也没见到总理到毛家湾来。不难推想，这是叶群玩弄的“帮忙”把戏奏效了。

清晨五点多，林办收到总理致林彪的一封亲启信，信封上标有“特急”字样。这很可能是关于政治局委员选举问题的材料。由于“九大”以前林办讲文件的秘书可以在“特急”情况下拆开林彪的“亲启”件（叶群的亲启件、特别是标有“他人勿拆”字样的亲启件，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代拆），我把这封亲启件拆开，一看果然是印好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选票清样），并附有总理亲笔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总理信的大意是，主席在昨天下午召集小型会议，最后商拟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会后，主席委托总理和黄永胜到林彪处征求意见，但听说林彪身体不适（！），就没有前来。现在，把这个名单印成选票清样送林彪过目，如果林彪有不同意见，望速告总理；如果同意，即照主席原定方案，于当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进行正

1969年12月22日 对王光美中提中的21名政治局委员 4名政治局候

补委员的人选，总理在信中没作具体说明。但名单中的字形大小和姓氏排列，是很不寻常的。25名候选人的名字分成三种字体：主席和林彪排在最前，用的是一号铅字，总理和陈伯达、康生，用的是三号字；再以下，以叶群为首（因以姓氏笔划为顺序），用的是四号字。

我看过文件后，急忙到林彪、叶群那边看看动静，以便及时讲上去。这时，林彪刚刚起床；叶群则一夜没睡，还在忙着什么事。照毛家湾的规矩，这样的文件须先报叶群，因此我到了叶群的卧室外。

“主任还没休息吗？”我问一位内勤。

“没有。”这位内勤说，“一整夜都在打电话，现在也不犯困，可精神呢！”

我进去后，向叶群报告总理的信和那份候选人名单。

“首长起床了吗？”叶群问。她通宵忙碌，但似乎没有一点倦意。

“起床了。”

“那好，你去给首长讲讲吧。”叶群显然很兴奋，但还有点不放心。“你给首长讲过后，首长如果说画圈，那就算了；首长如果要批什么，你要先告诉我，不能急于批。这是主席定的名单，首长随便批什么不好。”

我来到林彪客厅。林彪见秘书这样早就找他，惊奇地问：“有什么事吗？”

我先报总理的信，后念那份名单。为了使林彪注意叶群的名字和这名字在名单中所处的前茅地位，我特意把“叶群……江青”之间的几个名字重复了两次。

“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名字，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吗？”林彪问。

“一般是的，但不全是。”我说。“主席、首长在前，用的是大号铅字；总理、陈伯达、康生用的是三号字，这以前都不是按姓氏笔划；叶群以下，用的是四号字，全按姓氏笔划。”

林彪抬起右臂，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圈，示意我代他把文件圈退总理。

林彪再没吭声。林立果散布的那个“可能一气之下”的幻影，此时完全破灭。

我又回到叶群的住室，报告林彪听讲文件后的表态。叶群正在她的卫生间打电话，我只好坐在外面稍等。卫生间的门是半掩着的，叶群打电话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听得出，和她讲电话的是总理。只听叶群喋喋不休地在说：

“总理不到毛家湾来是对的，这是林彪同志亲自叫我劝说总理不要来的，他不会有什么感觉。他说他有点汗，又说总理实在很忙，他完全尊重主席召集小型会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是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虽然有点汗，但问题不大，不会影响参加今天下午的选举。”

叶群说的全是谎话。昨天晚上，他何曾见过林彪呢？

叶群讲完电话后走出来，见我坐在这里，问：“你等半天了吗？”

“我刚从首长那里来。”

“首长怎么表态的？”

“首长只让画圈，没说什么。”

“那好！”叶群心上的--块石头落了地。“总理刚才在电话上说，只要首长没有不同意见，文件就不用圈退了。”

……

一夜没睡的叶群，次日上午又没合眼。下午三点就要举行

正式选举，她的兴奋加不安的情绪已达极点。怎能睡得着呢？

中午，叶群找李文普问：“首长下午要去参加中央全会，你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你要备好车，但不要动身太早。按时到达就行了。”

“不会动身太早。”李文普说。“每次去参加会，首长一般都只提前到十分、八分钟，先在休息室坐一下，等主席到，然后再进场。这次也准备这样。”

“这次不必这样。”叶群说。“这次只按下午三点到会，只要路上的时间够用就行。到后就进入会场，不必留下休息时间。”

李文普对叶群的这种布置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但我能猜出叶群的用心：她曾在电话上对总理说过谎，编造林彪“出汗”以阻止总理前来毛家湾，生怕林彪到场过早，总理万一问起他“出汗”的事，叶群就会大出其丑。如果真成了那样，林彪再来个“一气之下”，叶群是承受不起的。

下午的选举结果，可想而知。

第九章 林豆豆的悲剧

在林彪一家中，最令人同情的是林豆豆。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来到这个世上，在群魔乱舞的动乱岁月中消磨掉了她的青春。她耳闻目睹的政治丑闻远比我们这些“外人”多，她愤恨，她抗争，但终因力量过于单薄而无济于事。她于是从失望到绝望，几度轻生未遂。世情的峰回路转，又使她看到了前途的曙光，她又重新振作起来，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入人们共同前进的行列之中。

1. 如此母女情

“林豆豆”这名字，我在到林办工作以前就听说过。那是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之后，《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林豆豆”的纪念文章；文章的内容早已被我忘光，但作者的名字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时想，她成长在林彪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一定是很幸福的。谁曾料到，这个家庭给她带来的却是一连串的痛苦和不幸。

我初次见到林豆豆，是我到林办任职的两个月之后。她刚从外地回到北京，进了毛家湾的门，不论见到任何工作人员都无笑容；表情忧郁而冷漠。个子不算高，但身材匀称。两道眉毛稍显浓重，两只眼睛秀气但目光有些呆滞。这使人感到，她有着不凡的气质却似乎在精神上正在受到某

种难以摆脱的折磨。

“我们的豆豆，当初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常听叶群对林办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她所以弄成现在这样，整天愁眉苦脸的，全怪某某。某某写的那些匿名信，说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还说如何如何，使她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她一阵阵地哭啊，闹啊，有时还一个人在半夜三更跑出去。……哎，我这个苦命的女儿，她也真是太可怜！……”叶群说着，用手帕揉了揉湿润的眼睛：“你们大家要同情她，理解她，要对她有无产阶级的感情。见她有什么不好，不要怪她，而要全怪那些迫害她的阶级敌人！”

叶群的这些话，我还一度信以为真。是啊，一个正在芳龄的“帅府千金”，却被摧残成了这个样子，那个“阶级敌人”也着实可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叶群原来是个谎言家，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必须打点折扣，否则就要上当。这样，我对叶群关于豆豆被“阶级敌人”迫害之说，也就打上问号了。

“别听主任的！”几个老一点的秘书都这样告诉我。

“豆豆小的时候确实很好，但长大后，精神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不怪别人，全怪主任。主任说她性格古怪，常在首长面前嘀咕这、嘀咕那，弄得首长常发脾气。因此每当首长找主任发一次火，主任在事后就找豆豆算一次账，经常骂她，有时还动手打她。她在精神上实在受不了，又不敢再去找首长诉冤屈，就只好忍气吞声。前几年她曾被逼得寻短见一次，以后又被救过来了。你现在看到她整天无笑容，不愿多说话，其实这比前几年还算好一些了。”

我毫不怀疑，工作人员们透露的这些才是真情实话。母女关系弄成这样，人世间真罕见啊！

2. 叶群的“新发现”

1967年，林豆豆已经23岁，这是风华正茂之年，而她却经常悲观厌世，老气横秋。一个女青年被继续在精神上折磨下去，不就把她断送了吗？

叶群也在为林豆豆的命运而焦虑。豆豆毕竟是她的唯一亲生女儿。她要求于豆豆的只有一条：“一切听妈妈的！”可是，这个执拗的女儿偏就坚持相反的一条：“一切不听妈妈的！”叶群气极了，有一次恶狠狠地对豆豆说：“罗瑞卿、杨成武、肖华在我面前都不在话下，你算老几？”豆豆怒目瞥了叶群一眼，然后把头转过来，一声不吭，用她特有的沉默作为回答。叶群还经常逼问豆豆：“你究竟在想些什么？你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嘛！”但豆豆就是不说。不管叶群火气万丈，豆豆的武器就是沉默、沉默、再沉默。叶群能抓住女儿其人，但抓不住女儿的心；她想看看女儿的心究竟什么样，但什么也看不到。久而久之，一贯自以为是，以为只要手中有了权就能摆布一切的叶群，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却一筹莫展了。

“以前我在豆豆身上操了不少心，但都白费了。”叶群有一次来到秘书办公室，向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倾吐她作母亲之苦。“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再多一个，就更受不了了。我也想过，为什么我的一片好心，在她身上都不见效呢？我以前都怪某某，这也应该；但现在也得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教训了。我发现我没注意一个真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豆豆都年满23了，还不该替她想想终身大事吗？当母亲的完全应该；你们当叔叔的，也应该帮助想想。人家这么大

了，还孤孤单单一个人，能不忧愁吗？我不到20岁就谈恋爱，叫我等到23，我也受不了。难怪她整天闷闷不乐，问她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说；姑娘大了，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自己挂在嘴上呢？！”叶群以为自己有了新发现，越谈越来劲。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这些叔叔，能够帮我们的豆豆选个理想的对象吗？”

“这可不容易。”郭连凯说，“适合豆豆口味的青年人，不大好找。”

“我就不信，”叶群说，“你们认识的青年人那么多，就没有一个理想的？”叶群指着鼻子问几个秘书，其中也点到了我：“张秘书，你过去在东北工作，就不能帮助给找一个吗？”

“问题是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按一般找对象的条件，找一个也不算难。”

“什么叫一般条件？”叶群问。

“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年龄相当，相貌中上，性格相投，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我说，“一般找对象的条件不外是这些。”

叶群立即把话接过去：“这太低！就说我们豆豆，你说的这些条件等于是低标准，瓜菜代。要找，至少得找个大学文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文才；在仪表上，如果找不到潘安之貌，也得差不多才行；在身材上，不能太高，又不能太矮，最好是1.70米上下；在性格上……”

“全具备这样高的条件的男青年，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大家都摇头。

3. 黄夫人为儿子求亲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叶群一吐口要给林豆豆物色对象，很快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跑在最前面的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林、黄两家平时来往比较密切，当然大半是出于黄家的主动。早在战争时期，黄永胜就是林彪的老部下；现在，林彪的地位空前显赫，不能不对黄永胜有着更多的吸引力。但是，林、黄本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们之间“联络感情”就得靠各自的夫人了。

1967年冬，黄夫人来到北京，当面向林夫人——叶群求亲。这自然会讨得林彪、叶群的好感；论一对青年男女的条件，也可算得上“门当户对”。但是，叶群踌躇再三，还是把这门亲事婉言拒绝了。

黄夫人为之求亲的是她的长子。在黄永胜的四个儿子中，他算是“拔尖”的一个。多少女儿之家投以倾慕之情，都曾被黄家拒绝。如今黄家愿与林家联姻，想必是考虑到除了身世略逊一筹之外，其它条件并不逊色。就是按叶群定的那些“高标准”，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他还是被割爱了。这是为什么呢？

叶群说出口的理由很简单：“个子太高。”她在毛家湾当着我们说：“项辉芳想娶我们的豆豆作她的大儿媳，这倒挺吸引人。她的那个儿子，别的条件还可以，但就是个子太高，我没看中。我们豆豆个子小，叫他一显，就给显没了。”

其实，叶群拒绝黄门亲事的真正理由是：“不能和任何高级干部子女攀亲。”这理由她当时并没说出口，但后来多

次流露过；实际上也当作一条戒律，一直是这么做的。她说过：“不能和高干结亲。不然，一旦结了亲，我们对老子就只好说话了。”她的意思是：结亲是结亲，政治是政治；而她理解的政治，就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对任何高级干部，凭着林家的权势，既有“信任”他的自由，也有随时踢开他的自由。黄永胜是林彪所信任的；但林彪信任又被林彪打倒的并不乏其人。谁能保险谁信任谁一辈子呢？——这就是林彪、叶群信奉的哲学。按照这种哲学，黄家求亲就只能看作是一种“讨好”姿态，而不能认真对待。

4. “美男子”的梦

1968年元旦一过，叶群从京西宾馆回来，给我们几个秘书看了一张照片。她乐滋滋地说：“你们看看，这是项辉芳帮助豆豆找的一个对象，真可以说是美男子！”

我们几个人接过照片，端详一下这位“美男子”究竟是何许模样。单从照片看，此人虽然够不上叶群吹嘘的“美男子”，但也确非一般。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皮大眼睛，有一副匀称的面孔，头发梳得很漂亮，姿态很优美；加上摄影的灯光角度安排适度，使得这张照片更加显得出众。

“你们看怎么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吧？”叶群喜形于色地探问大家的观感。

“光看照片不行！”

“光看长得怎么样也不行！”

“……”

秘书们七嘴八舌。这种事，作为工作人员本不应多插嘴，但大家觉得这里的是非不大，何况谁也不愿发表肯定或



“我没看上他！”

否定的意见，参与议论几句也多少解除了一点整天埋头在文件里的烦闷。

这个人是不是“美男子”，叶群决心亲眼看一看。一天晚上，她通过项辉芳的安排，把这人用汽车接到了毛家湾。来人并不知道毛家湾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他下了车，被领到叶群的会客室。这是一间空无一人的房子，里边摆设不算富丽堂皇，但也并不一般：地下全铺的红地毯，四周是沙发，窗户上挂着一道紫绒帷幕，几盏明亮的电灯吊在空中。陪同这人前来的是一位陌生的女性——一位作曲家的妻子，她是项辉芳委托的直接牵线人。为了“保密”，根据叶群事前布置，牵线人对来人讲，领他到这里只是为了欣赏一下各式各样的像章。确实，来人一进门，就见一盒一盒各种精制的像章摆在茶几上。既然是看像章，也就没什么可多谈的。不管是真是假，房子里的一场看像章戏开始演出了。

热闹的是在这间房子外边。在门口帘幕的夹缝里，有两只眼睛不断在向房子里窥视。这正是叶群。她一边偷着看，一边小声地向身旁的工作人员议论着：“长的虽不如照片，但确实不错，我算看中了！”

叶群一眼看中，这事就有了八成。但此时林豆豆还在外地，她是否愿意呢？叶群吩咐用电话立即把她叫回北京。她断定，有了这位“美男子”，豆豆总不致于再愁眉苦脸了吧？

豆豆果然很快回来了。叶群对这位可怜的女儿，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亲热。她先是给豆豆看了“美男子”的照片，然后又请“美男子”给豆豆当面画了一张素描像——这就创造了双方对面相看的机会。接着，她就以普通母亲所常用的那种亲切口吻问豆豆：“你看这人长得怎么样？”豆豆大大方

方地回答：“还行”，叶群再向下问，豆豆低下头，就再不吭声了。

叶群立即跑到秘书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我看这门亲事有门了！”她接着就让郭连凯要项辉芳的电话，并以平时少有的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调对项辉芳说：

“项主任！（项辉芳是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我看你这个媒人大概是成功了！……你帮助选的这个 人，我算看上了，豆豆看来也不反对。……人家是少女，怎么好意思一下子正式表态呢？……你介绍的这个人画画很有天才，但能不能写文章呢？……文才也很好，那可太理想了！你可以对他说，我愿意把我的豆豆嫁给他。他不会拒绝吧？……”叶群对自己这样谦虚地跟对方讲话颇为得意，因此她又补上一句：“他不会觉得我们豆豆配不上他吧？……既然他也愿意，那么你就告诉他，请他拿出勇气，向一颗少女的心进攻吧！”说到这里，叶群哈哈大笑地耍弄项辉芳：“你谈过恋爱吗？你懂得一颗少女的心吗？你懂得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好，那就看你的下一步了！……”

叶群打这个电话时，她对这位“美男子”的热度已经达到了顶点。那天晚上，她的话题没有别的，一提就是“美男子”如何，连急待处理的文件都不愿意听了。

过了几天，正赶上过春节。节日这天，毛家湾接待了一批来“拜年”的客人。这客人中的中心人物是那位“美男子”。他原是东北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以来尚未正式分配工作。几天前他来毛家湾看像章时，穿的是一身便装；如今，他在前来给林彪、叶群“拜年”时，已经换上了一套崭新的空军军装。陪同他前来的有项辉芳，还有牵线人以及她的女儿，自然这个场面又是叶群亲自安排的。

说是“拜年”，实际上是让林彪亲自当面看看那位未来的女婿。林彪坐在正面中央，左边坐着叶群，右边坐着林豆豆和林立果，对面坐着几位客人。那位可能的女婿坐在客座的一端，正与林豆豆相对。他平时有些驼背，今天为了掩盖一下这个“美中不足”，特意尽量挺直地坐在那里。他的呆板表情，加上他穿的那套不很合身的新军装，看上去让人觉得特别可笑。

林彪当面相看已毕，这该是婚前的最后一幕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林豆豆明确表态：她坚决不干。她提出的理由就是一句话：“我没看上他！”叶群问：“他哪一点不好呢？”林豆豆轻蔑地回答：“他给我写的那几封信，每一封都能挑出五六个错别字！”

情书上有几个错别字就能使一门九成九的婚事告吹吗？也还不是。林豆豆自己是怎么想的，她从来不肯明说。直到后来，她身边的一位最了解她、也最同情她的女内勤——王老太太泄露了一些底：“只要主任热，豆豆就冷！”

豆豆不愿意，也还不能最后打掉叶群的热乎劲。在豆豆明确表示拒绝之后，叶群对这位“美男子”就此推开了事还不死心。她虽然看了几次，但还嫌看得不够准、不够细。为了拿定最后主意，她不但又安排由她自己亲自再“相看”一次，而且又从空军请来一个“专家”帮助她看了一次。这位“专家”外号叫“大炮”，可以称得上是叶群的亲信。“大炮”看过之后，在这位“美男子”身上从上到下挑出九大缺点。从此，叶群才算凉下这条心来。

5.派人四出选“佳婿”

1968年，是叶群四出派人给林豆豆（后来也为林立果）选“对象”的一年。这一年“五一”前后，她把林办的两名工作人员派去南方各地，不久后又从空军抽出两个人（其中一个“大炮”）派往东北各地，任务都是“找人”。找什么人呢？说穿了，就是给子女找“对象”。这种事，只听说在封建王朝的某些宫廷有过；到了资产阶级当了政，它就被“自由恋爱”代替了；然而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它却借着林彪、叶群的特权复活了。

8月中旬，林彪、叶群要去北戴河避暑。动身前一天，叶群对我说：“最近文件不太多，这次首长去北戴河，你就不用去了；有老郭在那顶着，就够了。”

我说：“过去都是老郭跟着首长到外地去，这次还是他去好。”

“我想求你帮帮忙。”叶群象是恳求似地说：“你能不能出去给我们豆豆找找人呢？”

派我出去找“美男子”？我一听就十分反感，我率直地对叶群说：“这种忙，我怕帮不上。我觉得，派人专门出去找人，就影响不好；派林办的秘书出去干这样的事，一旦传了出去，这成了什么呢？……”

叶群看我态度勉强，没再坚持让我出去。但过了一会，她又找我谈话，意思是下定决心把我派出去。她

是半个月左右；首长从北戴河回来，就把你叫回来。我在首长面前，就说你父亲生了病，回华北探家去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呢？”

我只知叶群的专横，对于这种人，不能当面硬顶，只能找些理由“软磨”。磨来磨去，磨得她改变主意，这在过去也是有过的。现在，看来她是下定决心叫我去干那种事了，我能不能再次“磨”得她改变主意呢？

“去南京有问题，”我说，“许司令常和我打交道，他知道林办的张秘书到南京来找人了，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不和他打招呼，在南京无法活动；和他打招呼，叫我怎么和他说呢？”

“你怕许司令干什么？”叶群设法说服我：“你去南京，不能和他打招呼，也不能叫他知道。你不能露出林办秘书的身份，也不能公开说出去是为豆豆找人。我叫老郭给你办个军委办事组的介绍信，就说是为军委办事组物色工作人员，谁还注意呢？你的名字也可以改一改，用个化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去南京还有问题。”我又一次提出去不得的理由：“南京分两派，过去武斗很凶，对立情绪很厉害；最近刚刚缓和了些，形势刚刚开始稳定。我去后，万一遇到两派再起争斗，难免被卷进去。如果有人听说有林办的一个秘书到了南京，我不被怀疑为挑动两派对立的黑后台了吗？”

“你为什么要当黑后台呢？”叶群继续驳斥我：“你去后，不要介入当地的运动，对两派的是非不要乱发议论。你的任务就是找人，别的事一律不要过问。”

不管我怎么“磨”，反正叶群是非派我去南京不可了。在我被“说服”之后，她又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起了“找人”

条件，中心是强调“高标准”。其中又特别强调两条：一条是必须长有“潘安之貌”（我也没见过潘安什么样）；另一条必须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为了“互相监督”，叶群又从空军报社调一个老王来，跟着我一同到南京去。为了来去不误时间，叶群还让郭连凯为我们从空军弄来两张免费去南京的民航飞机票。总之，这是为副统帅的女儿选女婿，慷国家一点慨算得了什么呢！

林彪、叶群决定于8月15日动身去北戴河，我和老王只能在他们动身后才能去南京。林彪行前见了我，似乎很认真地问：“你父亲病了吗？”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点了点头。叶群是一本正经地在林彪面前扯谎的，我如能勇敢地在林彪面前把它戳穿，那会如何呢？叶群常说：“提起千斤，放下四两。”这“放下四两”的确不错，可是要“提起千斤”呢？

我和老王到了南京，需要先经南京军区政治部换介绍信，然后再去江苏省革委会换介绍信，最后再到南京市革委会具体接洽。由于我们是打着军委办事组物色工作人员的旗号来的，接待单位当然会认真协助。但当对方问起：“选什么条件的人？”我们只能说：“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那貌美一条，是难以说出口的。对方又问：“怎么选呢？”我们又只能说：“我们准备亲自到几个大学里跑跑。”既然是选女婿，靠基层向上逐级推荐当然是不成的。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南京大学。在这里，我和老王翻看了几百份学生档案，首先注意的是档案中的学生照片，结果却使我们大失所望：没有一个是够得上叶群的“高标准”的。（叶群布置过，几个月前到毛家湾的那个“美男子”是标杆；如果不强于他，根本不能考虑。）

“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呢？”我和老王商量后回去如何应付叶群。老王和林豆豆经常以空军报社记者身份出外采访，深受豆豆信任；也和林办的秘书有过多次接触。这是位老实人，同情豆豆的处境，也对叶群心中有数。他同样不愿意干这种“找人”差使，因为他知道这虽然是在为豆豆选对象，但豆豆本人并不领情。豆豆对叶群的不满情绪也感染了他，但他能有多大作为呢？

“实在不行，我倒看上一个。”老王说：“这个人姓王，是中文系毕业生，很有文才，当过学校小报的编辑，从档案材料上看，人品也很好。”

“主任特别强调的是相貌，”我说：“这一条能交差吗？”

“向主任交差肯定不行！”老王说，“但拿他作为应付差使的对象，倒可以考虑。不然，我们空手回去，主任可能生疑。”

我想这话也有些道理，这差使不应付一下也不行。于是，我们弄到了一张这位学生的照片，准备回北京后用以堵叶群的嘴。

在我们感到在炎热的南京再也不愿“泡”下去的时候，郭连凯从北京来了电话，叫我立即赶回北京。由于普通长途电话不保密，他只是说了几句，但他的口气是急促的，似乎毛家湾有了什么不祥之兆。

6. 豆豆服毒

我们火速赶回北京。一打听，林彪、叶群仍然分别住大会堂和养蜂夹道。我是奉叶群之命外出的，首先到了叶群住

地，准备向她交差。但一进养蜂夹道，我被值班秘书李春生的一副神色不安的表情怔住了。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我问。

“出事了！”李春生说。这位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讲马列词句倒很熟练，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却往往沉不住气。

“什么事？”

“豆豆服毒了！”

“为什么？”我也一惊：“抢救过来没有？”

“送医院去了，估计问题不大了。”李春生接着给我讲起了豆豆服毒的原委：“我对你照实说，你千万不要叫主任知道。”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说，“你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豆豆服毒，完全是主任逼的。”李春生说着，用手摸了摸自己戴着的眼镜框——这是他每当严肃地和别人争论理论问题时的习惯动作。“你可能早已听说，大炮到东北给豆豆找人去了。大炮找了好久，向主任推荐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人称笔杆子，很会写文章又爱好作画，人长得也可以。主任一看，就热起来了。她让豆豆表态同意，但豆豆不吭声。从北戴河回来前后，豆豆向首长吹风，首长就根据豆豆说的，给主任下了四条指示。……”

“怎么，首长还给主任下了四条指示？”

“可不，就这四条指示惹出了一场乱子。首长口述了四条，让内勤记下来给在大会堂值班的秘书，再由秘书用电话传给主任。这四条：第一是，给豆豆找对象，要找拿枪杆子的，不要拿笔杆子的；第二条是，找对象的条件，应当按照德、才、体、貌的顺序，不要光强调相貌；第三，究竟要谁

不要谁，最后由豆豆自己作主；还有一条，我记不得了。内勤把这四条记录给了老郭、老李，郭、李不敢向主任传，怕主任翻脸；但首长又叫内勤查问，老郭不敢再压，就传给主任了。主任一看这四条，马上跳了起来，当着我们大骂首长，骂得才难听呢！但她只在背后骂，不敢公开去找首长闹。她说首长这四条，准是豆豆吹的风，条条都是对着她来的。这时候，正巧豆豆也在养蜂夹道，主任一连两天找豆豆大吵、大闹、大骂，豆豆不愿看，不愿听，就把屋门紧闭并插上开关；主任就使劲用脚踢她的门，还不住地用下流话骂她。但不管主任怎么闹，豆豆也不开门。最后主任破门而入，进去一看，再也不骂了。她赶紧打铃叫工作人员去，原来豆豆已经昏倒在地了，口里吐出很多白沫，明显是服毒了。主任叫赶快送医院抢救，并下命令给在场的工作人员，谁也不准对第二个人说，包括首长在內。”

李春生正在叙述着，叶群打铃了。他赶紧拿起了一沓待处理的文件，站起来对我说：“主任起床了，我必须上去报文件，我可以向她报告你已经回来了吗？”

“可以，”我说，“我正想找她。交了差就完事了。”

过了一会儿，李春生回来传话，叶群叫我立即上去。我向叶群的住处走去，李春生向我描述的那些可悲情景在我的脑海里还一直在翻腾。我心想，此刻叶群的心境不佳，见了我之后不知会向我发泄一些什么呢？

事情又一次出人意外：叶群见我后满脸笑容，似若无事。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南京之行，大有收获吧？”

“不行，什么收获也没有。”我回答说。

“怎么，你们两个人都空着手回来了？”叶群把脸一沉，“我就不信，那么大的南京，就连一个拔尖一点的也找

不到？”

“就是找到一个拔尖的，主任也不会看中。”我故意说。我手中带回一张应付差事的照片，但不到必要时，我不肯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看不中？你选一个拔尖的来，让我看看嘛！”

“必要”的时刻到了。我把那张照片递给了叶群。叶群仅仅看了一眼，就摔给了我；又象是在生气，又象是在想发笑似地说：“这不行！这活象个啾嘴猴！他哪配得上我们豆豆呢！”她马上转了话题：“你快到大会堂去吧！首长这几天很烦躁，有时候还问你探家为什么还没回来？你去后可不准提去南京的事，就说是看你父亲去了。首长要问你关于豆豆的事，你就说刚回来，不知道。”叶群说着，拿出一块手帕揉了揉眼睛：“……咳！我们豆豆真是个可怜的人哪！你没在家的这几天，首长给她下了四把刀子，气得她发起高烧住院了！……”我听着叶群的这片谎言，心中又气又笑，但当我留心她的表情时，她的两个眼角竟然真的滴下来几滴泪水！……

我到了大会堂，见林彪正在西大厅散步。据郭连凯介绍说，他此时的心情还好。我进去报告：“我回来了。”

“你父亲的病好些了吗？”林彪还是那样认真地问。

“好些了！”我没别的话可答。

简单谈了几句之后，林彪叫内勤打电话，找豆豆到大会堂来一下。内勤出去不久，郭连凯进来报告：“首长，豆豆到外地去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不多久。”

我回到秘书值班室问郭连凯：“豆豆不是在医院吗？”

“主任严格交代，不准那样讲。”郭连凯说。

我无限感慨地暗自思忖着，在这个天地里，无论怎样诚实的人，都成了“撒谎两重性”的俘虏了！

7. 又一道难题

豆豆被送到医院后，经过医生们的抢救，终于脱险。她的精神状态极度不佳，身体也很虚弱。一次吃了20几片安眠药，尽管大部分已被洗除，余下的药力也是常人所受不了的。陪她住院的是女内勤老王，她一方面要帮助做些护理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来自毛家湾的各种探询。林豆豆醒来后没再寻死，这位善良的王老太太还起了一定作用。

十几天后，王老太太从医院给林办支部书记郭连凯来电话说：豆豆要求出院。这样的事，郭连凯只能请示叶群。叶群同意出院，但只许她住在毛家湾“好好休息”。不准她到太会堂去“打扰”林彪。如果郭连凯把不住这个关，就要拿他是问。如果豆豆再出什么意外，郭连凯也有责任。为了不使豆豆对叶群增加反感，郭连凯只能多多宣传平时她妈妈对女儿是多么爱护和关心；就是这次暂时不准豆豆去见林彪，也不能说是叶群的规定，而只能说些林彪“正在出汗”之类的谎话。总之，只要豆豆不见林彪就行，只要她不再出事就行；至于怎样能够达到叶群的这个意图，就看老郭的“落实能力”了。

郭连凯被逼入两面受夹的境地。他既得罪不起叶群，也得罪不起豆豆；而叶群和豆豆的关系又如此紧张，他稍微应付不当，后果不知会多么严重。但我们这位老郭，还是比较

善于应付这种复杂的情况的，经他这样一应付，豆豆果然安然在毛家湾住了几十天，既未“打扰”林彪、也未出任何意外。最后，豆豆同意离开北京去外地“休息”，这一切难题就不再那么缠人了。

但是，豆豆人离开了，不等于关于豆豆的难题也离开了。一个月之后，这个难题又差一点把毛家湾弄得人仰马翻。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从大会堂回到毛家湾取东西。郭连凯皱着眉头，凑上前来对我说：“老张，又来难题了。你帮助想想，我该怎么办？”

“你处理难题，总是有办法的，”我说：“这用得着我帮助出主意吗？”

“这次来的难题很不一般，我是愁坏了。”郭连凯说，“豆豆现在住在杭州，空军报社的苏××和王××陪她在那里。苏××给我打来电话，说豆豆在背地里把空军机关的一个陈××叫到了杭州。这个小陈是做保卫工作的，豆豆了解他，也看中了他。把他叫去，说是临时帮助她做些工作，实际上是想进一步观察一下。这个小陈去了几天了，每天都和豆豆有接触。苏××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就把这情况报告我，可是我怎么办呢？我要报告主任，主任非火冒三丈不行，肯定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我如果不报，主任迟早会知道，万一豆豆与小陈之间出点什么事，而苏××又可以说早已向我报告，那还不是我倒霉吗？”老郭又皱着眉头说：“我真发愁，怎么办呢？”

我很同情郭连凯的处境，他这个林办支部书记，叫谁干也都是个挨骂的角色。他遇到了难题，我也不能置身于外；我应当帮他想想摆脱的主意，可是我又有什 么好主意可想

呢？我说：“这个事弄不好，可能造成更大的乱子；那时，就不是豆豆与小陈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特别是你的问题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郭连凯问。

“我说的是报告主任后可能出现的后果。”我解释说：“现在十二中全会正在开会，过几天首长还要准备出场讲话。豆豆的事再严重，比起首长出场讲话也微不足道。你向主任报告说，豆豆自己找了对象，还偷着和这个对象有了接触；主任听到后会暴跳到什么程度，不难想象。主任很可能又一次大发歇斯底里，甚至可能找首长去闹，那样首长出场讲话的事就可能因出汗而告吹。按主任的逻辑，首长能否出场，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报的是豆豆的事，结果却可能影响了首长的出场。到了那个时候，主任就会把这个责任上纲到政治上，那你还受得了吗？”

“照这样说，我现在报不得；等十二中全会开完再说。”郭连凯鼓了鼓勇气说：“那时再报，主任肯定会更发火；她愿发就发吧，能怪我什么！我不怕！”

这件事，郭连凯果然一直压了一个多星期，没向叶群吐露只字。10月31日，十二中全会正式结束。11月4日，老郭才吞吞吐吐地向叶群作了报告，这为时更晚了。

“你们都在欺骗我！你们都是混蛋！”叶群到了大会堂林办秘书值班室，一进门就大吵大骂：“你们背着我都搞了些什么鬼名堂？这个办公室，我宁可把它解散！你们都给我滚开！……”

在这里值班的于运深和李文普被叶群这阵泼妇大骂街弄得直发愣；但我心里明白，这准是郭连凯有所动作之后引起的恶性反应。我看叶群那张气得发青的脸孔，看她那唾沫四溅

的狂暴喊叫，看鼎鼎大名的林彪夫人的那副丑态，直觉得好笑。这是她的惯技，虽然这次比以往更凶狠些，也叫人更噁心些。

叶群见我们几个人都直愣愣地瞅着她，但谁又都不说一句圆场的话，更火了：“你们这些笨蛋，都在看我干什么！”她把手中的提包“叭”的一声摔在地下，在屋子里跺着脚蹦着高跳起来，扯着沙哑的嗓子叫喊：“那个没脸的小姐自己在外边找汉子了！你们看我有什么用？！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

叶群这阵丑恶表演，使我想起电影《朝阳沟》里反对自己女儿下乡的那个半老太太发怒时的表演。她也是蹦着高又叫又骂，但远不如叶群的动作精彩。演员们表演一个狂暴的泼妇所能发挥的想象力，在叶群面前也必定甘拜下风。

叶群大闹了一阵，没用旁人规劝，自己仰在了沙发上，情绪也逐渐缓和下来。她大概是太累了，也许是觉得在我们

“就这一次，”郭连凯笑呵呵地说，“过去从来什么事都没瞒过主任。”

“你们几个呢？”叶群指指我和于运深、李文普，“你们也都说说实话！”

“谁也没瞒过主任！”“谁敢瞒主任！”我们也都这样搪塞着。

“我料你们也不敢！”叶群说，“不过我想问明白，为什么小陈的事压了这么久才告诉我！”

郭连凯讲出了怕影响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出场讲话这条理由。

“全会是10月底结束的，你告诉我是11月4日，这又是为什么？”叶群还在追问。

“这是我的责任！”郭连凯陪着笑脸说。

“你的责任，你的责任！说的倒轻快！”叶群瞪了郭连凯一眼：“你误了这几天，说不定会造成多大的后果！如果豆豆和小陈之间真发生了我不愿看到的事，我看你这个支部书记还怎么当！”

“不致于……”郭连凯还想安慰叶群。

“我不愿再和你磨牙了！”叶群说着站了起来。她摔在地下的皮包，早由郭连凯拾了起来。叶群边向外走边嘟哝：“我看透了，将来林办支部败家，就要败在你们这一代！”

8. 风波并未平息

叶群离开大会堂后，就到空军找吴法宪去了。事后不久，郭连凯透露说：叶群下令给吴法宪，让他立即派架飞机去杭州，把那个小陈“接”回北京来。小陈回京后，吴法宪连夜

亲自“审问”，并逼他写了“检查交代”材料和不得再和豆豆接触的“保证书”。第二天，小陈又被用飞机秘密送往新疆某地；他从此不用说再看豆豆一眼，就连回北京也难了。这一切，都是吴法宪在叶群的幕后指挥下干的。吴法宪的外号叫“草包”，干正事并不中用，但围着叶群的指挥棒转，他到是相当卖力的。

小陈的事告一段落，但由小陈引起的风波并未平息。叶群不知从哪里探知，林豆豆在北京住院时，曾调看小陈的档案，并安排他到医院来检查过身体；而这种事，竟然又是林办两个工作人员帮助干的，叶群发现自己又一次被蒙在鼓里，顿时火冒万丈。她从外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毛家湾，指名叫那个“死老王”接她的电话。

“你陪着豆豆住院，都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叶群怒气冲冲地质问女内勤老王。

“主任，我没干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王老太太沉着地答对叶群。她已年过50，在毛家湾侍候叶群和林豆豆多年，对林家内情十分熟悉，也自信没什么辫子可被叶群抓住，因此她有时敢在叶群面前以直言相撞。

“你当我不知道吗？我看你这个死老王活够了！”叶群在电话上吼叫起来：“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要讲清楚，你在医院里帮助豆豆究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你还不老实，我就把你关进监狱！关进监狱！”

“关进监狱，我也没什么可交代的！”老王说。

“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敢这样嘴硬！”叶群又让郭连凯接她的电话：“你这个支部书记当得真好啊，毛家湾出了叛徒了，你知道吗？一个是女老王，一个是医生男老王；两个人都背着我，偷偷地帮豆豆又是调阅小陈的档案啊，又是盗

查身体啊！他们简直翻了天了！我命令你和李文普，这两个混蛋谈话，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他们如果老实地交代，别想叫我饶了他们！……”

根据叶群的命令，郭连凯和李文普连夜找两个老王“谈话”，事后又向叶群作了报告。但在这样的事情上，郭连凯是善于左右逢源的：他既根据叶群的旨意向两个老王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实际上又保护了他们；他既向叶群承认他们的某些做法欠妥，又使叶群相信他们是出于“好心”。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才算平息了。

9.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

叶群采用法西斯手段拆散了豆豆与小陈的关系，但向豆豆本人所作的解释，却是一种十足的欺骗。她通过吴法宪派飞机把小陈强行弄回北京时，告诉豆豆的理由是“紧急工作需要”；之后，她下令小陈永远不准接触豆豆，所用的借口是小陈身上有“梅毒”。为此，她逼迫曾经为小陈检查过身体的医生写了一份假诊断，编造说经测试“康氏反应”，小陈是四个“+”号。一个有四个“+”号的梅毒患者，怎么能和副统帅的女儿谈恋爱？！

叶群估计，她编造的这套理由是很难瞒过豆豆的。但她相信，豆豆之所以私自和小陈接触，并不一定是出于什么真正的爱情，而很可能是一种“女大怕身孤”的生理现象。如果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调开了小陈，再换上一个漂亮男子去顶上小陈的空缺，豆豆就不会闹事了。叶群自己如此庸俗而卑鄙，断定别人也必然是这样的庸俗和卑鄙。她毫不怀疑自己所作判断的正确，因此也就这样行事了。

一天，叶群问郭连凯：“老郭，把小陈从豆豆那里调开了，你听到豆豆有什么反映吗？”

“豆豆现在的情绪很不好，”郭连凯说：“杭州来电话反映，她经常到大桥边和大江边上去转。……”

“这个苗头不好，”叶群着了急：“她肯定是由下走了小陈，一个人太孤单。24岁的姑娘，这也不奇怪。现在我想赶快找一个能顶替小陈的人；只要有这么个人陪着她，她就会稳定下来了。你能给我找这样的人吗？”

“主任尽和我开玩笑，”郭连凯说：“我一下子上哪里找这样的人去！”

“他们在外边帮助找人的，不是给你寄过一些照片吗？”叶群问。“从那里挑选一个，说不定能挑出一个来。”

郭连凯拿出那些经他保存的照片，这都是曾经作为候选对象，由“各路人马”寄给毛家湾的。这些候选对象的照片，都曾由于叶群“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个个早已被淘汰了。

“这个人还马马虎虎，”叶群从中选出一张照片：“他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

郭连凯回答说：“这个人是海军机关的，叫于××。”

“噢，我想起来了，”叶群猛然回忆起于××的情况。

“这个于××，从形象上看，就是两个眼睛离得近了一点，我没看中。但和其余几个人比较，就属他强了。他被淘汰，我印象中好象除了相貌条件之外，还有点别的什么原因？”

“老张去了解过，叫他具体说说吧！”郭连凯指我说。

“这个于××，是海军张××的爱人苏×推荐的。”我介绍说。“主任派我去了解过他的情况，我回来汇报过，主任大概忘记了。这个人不合适的主要理由是他已经有了对

象，我们不能挖人家的墙脚……”

“已经有了对象，这关系不大。”叶群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过去说：“谈恋爱阶段，不受法律保护；今天爱你，明天可以爱她，恋爱自由嘛！何况，我现在是远水不解近渴，只要我看行，管他什么墙脚不墙脚呢！我是说于就干，现在就要看看这个于××究竟怎么样。打电话叫苏×立即前来！”

叶群一句话，把苏×叫到了大会堂。这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苏×很可能入睡，但她听到是林彪夫人亲自叫她，分秒不敢迟误。苏×到后，叶群明确告诉她，为了“应急”，叶本人准备现在就亲自相看一下这个于××。叶群说一不二，苏×只好照办。接着，苏×坐车赶回海军，把睡在梦中的于××叫起来，又陪他回到大会堂。

叶群亲自摆布这一切，但她并不直接出面。她让工作人员把大会堂西大厅侧面的林办秘书值班室临时作了一番布置。除原有的办公桌外，又在房子中间摆了一张长条桌，上面铺上白布，放上一座台灯——这是为了弥补光线的不足。于××被领到大会堂后，她让苏×陪着他在那个房里“谈话”，而叶群在房外的窗帘缝隙中向里张望。叶群一边偷着看，一边小声嘟哝着，还几次把苏×叫到外面，告诉她应当让于××坐怎样的角度，怎样引他发笑，以便能看出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表情。于××被弄得莫名其妙，苏×也被叶群支得懵头转向。

“我算看中了！这就是我未来的女婿！”叶群情不自禁地向最后一次被从房间里叫出来的苏×说。她让苏×先安排用车把于××送回海军，然后又把苏×领到秘书值班室隔壁间，作了进一步布置。最后，叶群又把原在空军报社工作过的韩副社长——林豆豆曾经很尊重的顶头上司——从被窝中

叫了来。他们三个人又在一起谈了一阵；等他们离开大会堂时，已过午夜了。

由于叶群这一阵闹腾，我不但整个晚上无法继续工作，而且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去。在我的脑海中，不时地浮现出各种奇思怪想：我想起了某某写给林彪、叶群的一封信，信中痛骂他们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对于一位党的接班人来说，这种攻击够“恶毒”了；但看看这些受“攻击”者的所作所为，信中的话不是正中要害吗？我又在想，人民大会堂是党中央和国家最高机关的议事和聚会的庄严场所，现在变成了什么呢？而我这些闷在心的话能够向谁倾吐呢？……

第二天，韩副社长奉叶群指派，带着于××去了杭州。叶群为他规定此行的借口是：“出差路过杭州，顺便看看豆豆”，给他的任务是：“设法使豆豆对于××产生好感”，并尽量让于××与豆豆长期“相处”下去。韩副社长离开大会堂前，叶群拍着他的肩膀说：“豆豆这个亲事，可能就成在你身上了！我祝你马到成功！”

但是，没过几天，韩副社长就带着于××折返北京。他向叶群报告此行的结果是：“豆豆把我们赶回来了！”

10. 强加于人的“接力赛”

于××受挫，叶群并不认为这是她的失败，而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韩副社长身上。她在背后大发牢骚：“都怪老韩太笨。本来是件大有希望的事，叫他这一弄，一切都落空了。”

叶群又找郭连凯问：“于××不行了，还有谁有点希望呢？”

郭连凯说：“没有谁了。我这里掌握的几个对象中，唯

一可供参考的就是‘大炮’推荐的那个林××。但豆豆对这个人早就有过表态：不感兴趣。”

“林××？”叶群顿时想起这个她曾中意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这个人可以考虑，你再把照片找出来，我仔细看看。”

郭连凯找出林××的照片递给了叶群。叶群边看边念叨：“这个人倒也不错，能写会画，很有才华。美中不足的就是鼻梁骨稍高了一点，长得有点象米高扬。”叶群又问：

“‘大炮’对这个人的评价如何？”

“他吹的很高。”郭连凯说：“他曾经吹过，这个人只要主任一看，一定满意。”

“那好，”叶群放下了照片，“我倒想看看‘大炮’的眼力。你立即打电话，叫这个林××到毛家湾来，我和首长都亲自看看。”

“首长和主任都亲自看，万一看不中，那样影响……？”

“你这人真笨，”叶群用指头点了点郭连凯，“林××来毛家湾后，还是你们挡第一线，我和首长只能在幕后看。看不中，就再叫他回去，那有什么关系！不过既然是‘大炮’所极力推荐的人，我相信也不会太差。现在的问题是豆豆那里还在唱空城计，不赶快再顶上一个去，她就不会断了小陈那条线。就这么定了，你快去作布置！”

经过郭连凯的安排，林××由吴法宪的秘书王××陪着来到毛家湾。同样是根据叶群授意，此时这位地方大学毕业生也穿上了一身崭新的空军军装，以便叫林彪、叶群看上去觉得“精神”些。

又一出相看女婿的滑稽戏，正在毛家湾上演着。这出戏的导演及其手法，与1968年年初的那次相比大致相同。但有几

点是不同的，一是地点不同了，上次是在叶群的会客室，而这次是在林彪的会客室，规格提高了，二是观众不同了，上次是叶群既当幕后导演，又当观众，这次虽然还是如此，但观众中多了一个林彪，这位堂堂的副统帅也被叶群“动员”来了。他尽管名位显赫，然而此刻却只能听叶群摆布。”

在会客室里，郭连凯佯装与林××谈话；在走廊上，在会客室门口的幕帘外边，叶群与林彪轮流着扒开帘缝向里窥望。

这出戏暂时收场后，叶群心满意足地对郭连凯说：“照片不怎么打人，但一看本人，比照片要强得多。他那点稍高的鼻梁骨并不突出，我觉得这还是他的一个特点呢。他最可贵的是有才，也不必过于挑相貌，首长也说，郎才女貌，郎就是要强调一点才嘛！明天，就把林××派到杭州去，别听豆豆说什么不感兴趣，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心里热乎乎时嘴上也说冷冰冰。这次林××去，她准会满意。……”

“那也不一定，”郭连凯表示怀疑，“豆豆是怎么想的，谁也摸不透。弄不好，豆豆又得把他赶回来！”

“你是用老眼光看新问题，”叶群教训郭连凯，“你不了解豆豆，我了解她。上次于××去，之所以失败，是怪韩副社长太笨，他根本不懂青年人怎样谈恋爱。他一去，就硬帮帮地叫于××讨豆豆的好感，结果引起豆豆的怀疑。这样的事不能急，得慢慢来，从远到近，从浅到深，在不知不觉间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爱情。”叶群故意拿郭连凯开心：“你和你妻子是恋爱结婚的，还不懂这个吗？”郭连凯笑着说：“我们是恋爱结婚的，但那比较简单，不象现在这样复杂。”叶群又拿坐在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打趣：“在林办懂得一点爱情的，大概还有李春生，他和小刘也是恋爱结婚的。李文普、张云生就不行，他们的婚姻都是旧式的，因此都不明白

恋爱是怎么回事。”叶群说着，自鸣得意地格格笑了起来。她又吩咐郭连凯，“这次要接受上次的教训，再不能派韩副社长那样的人去了。叫王秘书去怎么样，他谈过恋爱吗？”

“王秘书还行。”郭连凯说。

“那就叫王秘书陪着林××去。”叶群说，“我和吴司令讲讲，让他把王秘书借给我们一段时间，执行这次陪伴林××的任务。他走之前，我可以见见他，教给他一点办法，成败与否，他是个关键。”

就这样，在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秘书陪着林××去杭州参加另一场所谓“爱情”的接力赛。王××是吴法宪的行政秘书，平时办事还比较在行，但干这种差使，他大概还是有生以来的首次。他的特点是，只要是“首长”发了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得卖力气去“落实”。这次发话的“首长”又是毛家湾，干得好不好，不但影响着自己的未来，而且关系到吴法宪的命运。因此他是积极的，既要积极指导林××怎样去接近林豆豆，又要积极向毛家湾汇报进展情况，充当叶群的一个耳目。

“王秘书到了杭州后，进展怎样？”叶群不断地向郭连凯询问情况。

“王秘书来过电话，说一开始还不错。”郭连凯汇报说。

“怎么个不错？”叶群又问。

“他对豆豆说，他们是来杭州搞调查研究的，特意来看看豆豆，并且希望在怎样搞调查研究方面得到豆豆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已和豆豆见过面，谈起写文章的事，还能谈得来。”

“豆豆怎么样？”

“据王秘书说，豆豆最近的情绪稍好些。”

“这有门了。”叶群听后很高兴。“下一步怎么办，是个关键。你要杭州的电话，我亲自和王秘书讲讲。”

郭连凯很快在电话上找到了王秘书，然后把话机递给了叶群。

“王秘书，你这个头炮打得不错啊！”叶群在电话上扯开嗓子大声说：“……你向老郭汇报的情况，他都对我讲了，我听后很满意。我向你祝贺，祝你成功！……怎么样，这两天又有发展吗？又有新进展，那太好了！他们每天接触的时间多吗？……豆豆高兴吗？林××不显得拘束吗？……他们能够谈得来了，那就说明发起总攻的时机快成熟了。……怎么，他们谈话时，你都在场？那可不行，谈恋爱怎么能三个人在一起谈呢？你得放开林××，给他创造机会，能够单独和豆豆接触！事前你要告诉他怎么说，事后要让他向你汇报情况。你要帮他出点主意，让他知道我们是喜欢他的，我们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又要告诉他婚姻是不能父母包办的。他必须征服豆豆这颗少女的心，使她心甘情愿地嫁给他。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就向他发出总攻的命令吧！让他鼓起一个男子汉的勇气，怕一个大首长的女儿干什么呢？快向他发出进攻的命令吧！你必须在几天内把这个山头拿下来。现在快过年了，必须在年前向我报告胜利的消息。如果豆豆回北京来过年以前，已经和林××在外边成了婚，我们作父母的也没什么意见！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授权给你了，在关键的时候，你可以当机立断！……”

叶群在电话上象连珠炮似地向王秘书布置了“发起总攻”的任务。她占用长途电话线大谈“恋爱”经，一谈就是个把小时，既不嫌累，也不感心中有愧。她当着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面，无羞无耻大谈特谈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怎样向自己

的女儿“进攻”，竟然完全不顾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如果说叶群在别的方面象一个封建贵族，那么也可以说，她在自己女儿所谓“恋爱”问题上倒是相当“现代化”了。然而在现代有关恋爱的悲剧和喜剧中，上哪里去挑她这种独特的可憎角色呢？

几天后，王秘书用电话向郭连凯汇报了林××向豆豆“进攻”的初步“战果”。正巧，郭连凯刚接完电话，叶群就进来打听有什么新“捷报”。

“怎么样，王秘书又向你报告好消息了吗？”叶群问郭连凯。

“这个消息不怎么好。”郭连凯说。

“怎么，林××被豆豆赶回来了吗？”叶群不安地期待郭连凯的回答。

“还没到赶的地步，”郭连凯说，“但离赶也不远了。”王秘书报告说，这几天，林××已和豆豆单独接触过几次，每次接触后都及时向王秘书汇报。一开始还好，但豆豆很快就变脸色了。她问林××，是谁派你来的？是谁教给你讲这些话的？你到底想干什么？林××最初还能应付几句，但架不住豆豆一问再问，一套再套，他就把底告诉豆豆了。

“什么？林××把什么底告诉豆豆了？”叶群十分恼火而着急。

“林××对豆豆说，是空军吴司令的王秘书带我来，并且教给我怎么说的；他让我多和你单独接触，并说你的父母也不反对我们结成夫妻！”

“混蛋！”叶群按捺不住地大骂林××。“这个混蛋大学生怎么能这样说！他怎么这样笨呢？”叶群又追问，“豆豆怎么讲？”

“豆豆说，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郭连凯继续汇报说，“她还对林××说，看来你这个人还比较老实，你也有些才华，又有人在暗中支持你。我这个人有你这样的人在追求，也很难得。因此我可以和你结婚。……”

“这么说，豆豆是同意了？”叶群喜出望外地问。

“不，”郭连凯又给叶群泼了瓢冷水：“不一定是同意了。她最后对林××说，我必须对你讲清楚，我们是奉命谈恋爱，奉命结婚；我们结婚后，也只能作政治夫妻！”

“这是什么意思？”叶群迷惑不解。

“非常明显，豆豆还是坚决不同意。”郭连凯说：“王秘书也讲，强扭的瓜不甜！”

“那就算了！”叶群非常扫兴地说，“那就让这些混蛋们滚回来吧！”

……

11. 谁摆布谁

这以后，叶群继续在为豆豆找“对象”的事情上煞费苦心，但一无所成。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叶群的要价超乎寻常，她想找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女婿在事实上是找不到的。只要她认为是“十全十美”，豆豆本人不同意，她也没有办法强加给她。叶群对豆豆的执拗虽感讨厌，但她确信凭着自己的权势和手腕，可以降服任何人，一个小小的豆豆算了什么呢？她在豆豆面前就曾这样露骨地说过：“你想反抗我吗？你这是在作梦！多少大人物都不在话下，难道你还想在我面前试试吗？”她的这种恐吓，豆豆虽然听后更加反感，但也深知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叶群自认为能摆布一切，难道还摆布

不了自己的女儿吗？她是能摆布的，在选“对象”的问题上尤其能够摆布。问题是已经选来的那些人，叶群对其中的几个虽曾一度着了迷，但仔细一想，他们也并不“十全十美”，因此豆豆拒绝也就拒绝了。这个不行，还可以再找一个。叶群说过：“我就需要一个女婿。中国这么大，我不信就找不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们豆豆配找一个这样理想的人，我也相信凭着我们现有的条件，完全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叶群讲的“现有的条件”主要是指林彪和她的权势。既然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那么现在已经有了“权”，还用愁自己的女儿去嫁给一个二、三等的男人吗？

另一个原因，是叶群和豆豆的严重对立。叶群想的一样，林豆豆想的又是一样。叶群想的是：豆豆找“对象”，不能完全由她自己作主；不然，她随便看中一个什么人，结亲后就成了毛家湾推不开、赶不走的贵客。不用说这位贵客不“理想”会被旁人“笑话”，可怕的是这位不称心的女婿万一成了林家的“叛徒”呢？因此她的原则是：只有我叶群中意才成，只要豆豆“胡乱”挑来的一律打掉。林豆豆呢？她想的却是：选“对象”虽说是终身大事，但如今已成了她在精神上受折磨的根源了。她已经完全被剥夺了自主的权利。她已经看透叶群为此事这样卖力，纯粹是别有用心。叶群关心的并非自己女儿的真正幸福，而是她自己。她想控制自己女儿的一切，包括控制女儿的婚事，只是为了在自己身边多一个驯服工具，听凭她任意摆布。她对付不了叶群，但“惹不起可以躲得起”。然而要是有一个叶群的心腹安在自己身边，那就躲也躲不起了。斐多菲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现在的林豆豆上哪里去寻求真正的爱情呢？自由又在哪里呢？她怀疑自己并非叶群所生，她

憎恶叶群的一切，她恨这难以摆脱的家庭环境。她悲观厌世，不时生出走绝路的可怕念头；她曾两度自杀，但都被死神推了回来。她年满24岁了，这样年纪的姑娘谁还不想一想自己的终身之事呢？但她看到，她这只是一种妄想，除非她向叶群屈服。然而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古怪，叶群给她的即便是甜枣，她也会当成毒药。因此她处理婚事也有一条原则：只要叶群热心的人，她一律不要！

林豆豆在心灵上早已叛离叶群，但她在表面上还尽量装成叶群顺从的女儿。叶群骂她，她从不还口；叶群污辱她，她从不公开反抗。叶群后来派人四处为她选来的那些“对象”，她也不再象从前那样矢口拒绝。她也学了林彪的一套：遇事不说行，也不说不行。1969年以后，叶群看中了两个人，把他们同时弄到北京，让豆豆表态倾向哪一个。豆豆看过这两个人后，分别给他们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一个是叫“猴”（此人机灵些，因而得此称），另一个叫“熊”

（此人憨厚些，也因而得此称）。叶群问她：“你是喜欢猴呢？还是喜欢熊？”豆豆开始不吭声，后来不得已说了一句：“两个都不错。”叶群说：“也不能要两个呀！你得倾向于一个才行。”豆豆说：“我还看不准。”叶群觉得这又“有门”了；看不准好办，让豆豆亲自接触他们就能看准了。但豆豆又拒绝和他们直接接触。两个人当中，她听说“叶群喜欢‘猴’”就故意说自己喜欢“熊”，她后来又听说叶群对“熊”有了浓厚兴趣，她又变挂说倾向于“猴”。她是在有意搪塞叶群，也象是故意捉弄叶群。她实际上对这两个人都无好感（唯一的理由就是叶群中意她不要），只是用此法抵消叶群在精神上给自己的折磨。这是古往今来母女之间独一无二的婚事游戏，但这游戏竟然玩了一年多。叶群本想摆布豆

豆，却不料被豆豆摆布了。

12. 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

豆豆毕竟成熟一些了。她慢慢地学会了怎样对付叶群，也逐渐在改变着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她回到北京后，曾经和我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对话，这大概是她的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吧。

“人为什么要活着？”林豆豆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这样古怪的问题。

“活着是为了革命。”我顺口回答说。

“革命是为了什么？”

“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为什么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因为大多数人是好人。”

“为什么说大多数人是好人？”

“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毛家湾的大多数人都都是好人吗？”

“可以这样看。”

“主任是好人吗？”

“她是你妈妈，我不好说。”

“郭连凯也是好人吗？”

“他在本质上也是好人。”

“好人为什么还干坏事？”

“他自己干，由他自己负责；别人让他干，别人要负责。好人也可能干坏事，但和坏人干坏事在本质上根本不同。”

“你说在毛家湾谁是坏人？”

“我不好说。……”

“我看你这个人是个中间派！”

“在这里当个中间派也不易，但中间派也算好人。”

“我看当中间派，活着没意思！”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中间派，……”

“你看我是什么派？”

“你说我是中间派，那你就是左派！”

“我不想当左派。我最多也是个中间派！”

“当中间派活着没意思，你是说又不想活着了？”

“我从今不再想死了，我愿意好好活着。”

“我也要问你，活着为了什么？”

“我活着，是为了那些同情我、帮助过我的好人；我如果死了，他们就会遭殃。为了他们，我也必须活着。”

……

的确，林豆豆没再寻死。她活下来了！她活下来的意义，在后来的“9·13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林豆豆的悲剧，该是到了落幕的时候了。

第十章 如此国防部长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是一位有名的战将。尤其在东北，林彪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我在长春读书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就见有四次报道林彪已经死去的消息。敌人出于恐惧而造谣，说明林彪在战争中确是令敌丧胆的传奇式人物。但是全国解放以后，林彪以养病为由，长期脱离了军事实际；出任国防部长以后，又热衷于搞什么“高举”、“突出”，对大大变化了的现代战争条件以及日新月异的军事理论和技术几乎不闻不问。万幸的是，他任国防部长期间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独特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的注意力全在“突出政治”上，但他不是一点不关心军事；有些事，他不但关心，而且抓得相当具体。试举他的几项“试验”为例。

一项是“堆山”。据说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指示一些部队“堆山”，因此这已成为付诸行动的事情了。为什么要“堆山”？据说是为了应付“现代战争”。在入侵之敌必经之处，因无险可守，势将导致敌人长驱直入；用人工堆成几座山，形成隘口，派以少量兵力以火力实行封锁，造成前

进中的敌人的巨大障碍，这样就可以争取时间，利于我组织反攻。但“现代战争”是否就是这个模式，敌人是否就照林彪的设想从“堆山”处袭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林彪创造了这个“堆山”战术，自然很想亲自看看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一年初夏，他把我找去，问起了“堆山”的事。

“我曾经让工程兵在北京东边和东南面堆两座山。你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现在堆得怎样了？”

我用电话问过工程兵之后报告林彪：“两处‘堆山’正在进行。东边的那座山进展稍快些，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我想去看看。”林彪又有些犹豫地说：“不，还是你们先去看看。李文普一个，你一个，坐上车，去看上个把小时，回来给我讲讲。”

根据林彪的布置，我和李文普坐车到了东边的“堆山”工地现场。从远处看，在一片茫茫平原上，确有一个人造假山从地平线凸起。但到了近处看，这与其说是座山，不如说是一些丘陵。工程还在继续进行着，机器的轰隆声、汽车的马达声、战士们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工程指挥员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之后，接待热情，讲解认真。

“我想象中的‘堆山’，一定堆得真象一座山一样。现在看并不象真山那样高。”我脱口说。

“堆成现在这样，就已经很费劲了。”工地指挥员笑着解释说。“这原来是一个洼地，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硬是要在上面搞个人造山，工程量相当大。我们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用机械施工，已经搞了几年，才成目前这个样子。光是动用的钢筋水泥，从远处运来的石头和土方，修建一个大型工厂也绰绰有余。我们国家大，若是一个小国，是谁也堆不起

的。”

工地指挥员领着我们去看人造山的地下工事。这仿佛是城市中的地下防空战备工程。从入口处进去是一个蜿蜒伸展的走廊，全用钢筋水泥被覆，走廊是纵横交错的。

“这是你们设想的吗？”我问。

“不，这是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的原则设计的。”

“敌人如果已经到了这里，说明天津方向已经落在敌人之手，因此这个设想是以天津失陷为前提的。但是，假如敌人不从这个方向来，而从北京的西侧、北侧打来呢？”

“我们是工程兵，……”工地指挥员笑了。他没再回答这个问题，意思是：这不是应该由他考虑的事。

“如果敌人轰炸怎么办？”我又问。“这个人造山能经得住敌人的轰炸吗？”

“一般的轰炸还能经得住，至少短时间内的轰炸能够经得住。”

“火炮从哪里入位呢？”李文普也插上问，“工事通道很窄，是过不去火炮的。”

“这是工程设计上的缺点。”工地指挥员显然也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木已成舟，再加改进就须耗资费力了。

我和李文普在参观之后，共同的感觉是，这个“堆山”不成功。回到毛家湾后，我们如实地将参观中所得的印象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一声未吭。他想亲自看看“堆山”的念头顿时打消了。此后数年也一直未再提起“堆山”的事。他靠脑子一热轻提轻放，倒也不在乎损失了什么；但“堆山”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别的地方也徒劳地进行着；一笔相当可观的人力、物力就这样糟蹋掉了。

在进行这项“试验”的同时，林彪还让他的儿子林立果

搞了一项所谓的“试验”。

那是一个下午，林立果不知从哪里弄来两辆崭新的自行车。他在毛家湾的院子里把这两辆车拆开又装上，装上又拆开，时而把自行车的零件绑配成这样，时而又绑配成那样，一连忙活几天，弄得汗流浹背。

“老虎，你在干什么？”我问他。

“你看，好玩吗？”林立果歪着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摆弄他的自行车。

“我不理解，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又问一句。

“首长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搞一次试验。……”

“试验什么呢？”

“试验一个战时用的交通工具。”林立果停下来，笑着对我说。“首长讲，一旦打起仗来，汽车用油成了问题，汽车就玩不转了。他让我试验一下，能不能用两辆自行车，把它们拴在一起代替汽车呢？”

“真新鲜！”我也憋不住笑了。“这能行吗？”

“这不正在试验吗？”林立果皱了皱眉头。“两辆自行车，四脚落地，这是不会倒下了。后轮问题不大，问题是前轮；两辆前车把是活的，必须固定死才能保持平行，但一固定死了，也就转不成弯了。你有什么高招吗？”

“我无能为力。”我摇摇头。“你这样弄，万一不成功，两辆自行车不就报废了吗？”

“那是小意思！”林立果毫不吝惜地说：“任何试验都免不了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万一成功了，这不是一大贡献吗？”

我默默地走开了。我揣摩着这项“试验”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即便“成功”了，这算什么“贡献”呢？如今现代科

学的发展是如此迅速，现代战争的条件尽管艰苦，难道还要退到几十年以前去吗？

不久就有了结果：这项“试验”彻底告吹了。两辆自行车除了胶带以外，其余零件差不多全部报废。

这以后，林彪又授意搞了一项“试验”：修建小庙式高射炮掩体。不过这已经不成“试验”，因为林彪既然下令，北京附近的某些高炮队就照这么做了。

这件事发生在林彪一次出外“转车”回来之后。他在“转车”的时候，发现郊区的某些高炮阵地虽然设在山坡或有掩体的平地上，但都炮口朝天，一目了然。他回到毛家湾，就把李文普找了去，说照这样，敌人在空中的卫星把地上的所有高射炮阵地拍照去了。因此，他给李文普一项“任务”，让他另带一个工作人员再坐车到一些高炮阵地上看看，设计几种高炮阵地的掩蔽物，然后再拿回来给他看。据李文普说，林彪设想出的几种掩蔽物，大体都类似小庙。这就是说，在每个高炮阵地上，都要用苫布或其它代用品罩起来，外形呈庙状或类似庙状；这样空中的敌人就会看不出这是高炮阵地了。林彪授意后，李文普为此事出去跑了好几次，终于画出了几个图形。林彪看过后，让他转给空军的吴法宪研究实施。吴法宪向来是把林彪交代的東西当作“圣旨”看待的，但这是否符合实际，他是不管那些的。

2. 林彪与核试验

我国进行第一次热核武器（氢弹）试验，这个消息震撼了世界，也惊动了毛家湾。但在毛家湾里所引起的反应，同外界的想象是不同的。

试验方案经过总理详细审核后，送请主席和林彪最后批准。主席阅后划了圈；林彪则根据“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原则，让秘书代他划圈了事。

正式进行试验这一天，有关部门的信息传递工作做得十分及时、细致。试验现场的指挥机构同北京的主管部门开设了专线直通电话，随时报告进展情况。北京的主管部门又与林彪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保持紧密的电话联系。在现场，试验是由聂帅亲自指挥的，在北京总理直接领导着这次试验。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对试验的漠不关心则是令人难解的。

“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国防科委有关部门来电话报告说：“试验现场的气象条件正常。全体参加试验的人员已经各就各位。试验飞机正在待命起飞。……”

为了使林彪及时了解试验的进展情况，我立即去向他转报试验准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的情况。林彪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我讲完，然后把手一挥。我见他一言不发，就赶快退出来了。

“带着样品的飞机起飞了。……现在距现场还有20公里……”国防科委继续不断地报告说：“还有10公里，……五公里，……一公里……”飞机抵试验场地上空，……，已经投掷，……！飞机已迅速撤离试验现场上空，……，已经爆炸！……，飞机已经安全返航，……。从几百里以外的基地观察，核爆炸时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火球在几分钟后转化成向上翻滚着的烟云，烟云呈蘑菇状，十分好看。……试验前线一片欢腾！……试验是成功的！……聂帅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发来传真电报，正式报告试验成功！……周总理在电话上对试验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请报告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望即告诉我们。”

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试验了一颗氢弹，它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新水平，也标志着美苏垄断热核武器以进行核讹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这一消息十分令人兴奋，以致国防科委那位专门负责用电话传报情况的同志的声调都已变得难以平静了。我也由于内心的激动，顾不上整理记录，就赶忙跑去向林彪报告。我想林彪听到这个消息后，如果说几句表示祝贺试验成功的话，那对参加试验的全体同志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好，就这样。”林彪听后无动于衷，只是把手一挥，不多吭一声。

对于林彪的冷漠，我早有感触。但我却又经常这样天真地想过：喜怒不形之于表，这也许是林彪这类大人物的一种特殊性格吧！

当晚将近夜深的时候，总理批来准备正式发表的关于氢弹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审稿。总理特意来电话说：关于氢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已报主席知道，主席同意发个正式新闻公报。但新闻公报草稿写好后，得知主席已经休息了。由于外电根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侦听所得的情报，已经对我热核试验成功有了初步反应，我们的新闻公报发表的尽量早一些，则对我更有利些。因此，总理建议这项新闻公报送请林彪审阅后，即准备正式由新华社公布。此事业经主席原则同意，发新闻公报后还可补报主席；但等主席起床后再发，就有些晚了。

“我们不能干这种事！”叶群对总理的建议肆意抵毁：“总是想把球踢给首长，好让首长担这个责任，首长才不干呢！”

“总理的意思是这个公报急需发表，而又等不及主席起床再定。”我说。“况且主席已原则同意，会有什么问题

呢？”

“再急，也差不了几个小时。”叶群不耐烦地说，“首长一直没具体过问核试验的事，怎能让他承担这个责任呢？”

“那怎么对总理讲？”

“我去向总理作解释。”叶群说着，拿起电话要总理：“总理吗？……你请林彪同志审批那个新闻公报稿，这是你对林彪同志的尊重，他很理解。但林彪同志的为人，你是了解的。他一贯维护主席的最高权威。因此他的意思是：这份公报还是送主席最后审定合适，你看呢？……”

叶群是用林彪的口气讲话的，她又是“维护主席的最高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还能再说什么呢？由于要等主席，公报发表的时间推迟到次日上午，至于这会为我国在外交斗争中带来什么，叶群是不在意的。

3. 林彪手下的“叶推事”

林彪在“文革”中遇事不吭声，不表态，唯以“紧跟主席”是从；但林彪作为国防部长，事无巨细都推给主席，这大半要归“功”于叶群。因此秘书们背地里称叶群为“叶推事”，其缘由是这样的：

1967年6月初，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向林办打电话报告：天津驻军请示，准备派一个连的兵力到郊外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去收割小麦，往返需要三天。总政肖主任准备用电话答复他们，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这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部队行动；因此特向林办报告一下。

我把这个电话大意先报叶群。叶群说：“你可以给首长讲讲，但必须把这个电话记录抄报主席。”

“肖主任办公室电话报告的意思是叫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就行了。”我说，“这属于备案性的报告，并不需要答复，因此还有必要请示主席吗？”

“肖华既然向这里报告，就是想叫我们对这次部队调动负责。”叶群说：“首长才不替他担这个责任呢！”

“这不是部队调动，而是一个连队的行动。”我又解释说：“它的驻地并无变化，只是临时到附近20多公里的地方去收小麦。这样的事，“文化大革命”以前连向总部报告都不必，由军区或军一级单位首长批准就行了，现在虽然由于运动的关系，部队调动批准权限可相对集中一些，但一个连队去收收小麦有什么问题呢？”

“说去收小麦，谁知道他们去干啥！”叶群以自己的狡诈去揣度别人：“他要去镇压造反派怎么办呢？”

我对叶群的强词夺理又气又好笑，但又不能继续和她硬顶。但我还是建议说：“我看这样的事可以不必干扰主席。如果需要答复，只要首长点头，由我们打个电话就足够了。我记得首长讲过，对主席要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

“我比你更了解首长。”叶群说着把手中拿的那份电话记录收了去。“我去和首长商量一下，让他去决定吧！”

我回到秘书办公室稍等片刻，叶群走了进来。她一进门就对我说：“首长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权力应当高度集中，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应报告主席。天津这个连队的行动，要经主席批准。”

就这样，到底把这件小事推给了主席。主席看过林彪转报的这份电话记录，在上边划了个圈即将它退回林办。叶群又拿主席圈阅的这份电话记录把我教训了一通：“你看主席圈阅同意了，并没提出批评，这证明报主席是对的，证明

当初你们建议不必报主席的道理是站不住脚的。”

“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仍然不解。“部队中一个连队规模的行动都要报主席，主席受得了吗？”

“以后再说以后的。”叶群说，“反正多向主席请示报告并不错。”

4. 元帅与将军

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所处的地位，一些高级将领总不免希望得到机会见见他，向他汇报军队方面的情况，得到他的一些必要的指示。但除了极少数林彪所亲信的几员大将之外，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很难得到这种机会。在这后一类情况中，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的遭遇是最令人寒心的。

“我想和林副主席直接通个电话，请你帮我转报一下。”韩司令给林办来电话。

我向韩司令解释说：“林彪的房子里没有电话装置；他由于怕着凉，也从来不亲自接电话。”

“那样，我们有事向他请示，怎么对他说呢？”韩司令问我。

“一个办法是当面和他谈，另一个办法是在电话上讲，由值班秘书根据记录向他转报。除此之外，还有写成书面、或者写信、或者发电报。……”

“再没别的办法吗？”

“没有了。”

“我帮助想个办法。”韩司令爽朗地说：“你们在他的办公室接个小喇叭，用一条电话线和秘书值班室的电话机相通连，再装一个开关。这样，我们想向他报告的情况，在给

你们秘书讲的时候，只要把开关一开，他就可以全部听到。这既不会误事，又不会着凉，你看好不好？”

“我把韩司令想的这个办法转报叶主任。”我说。

“好。”韩司令又补充说：“你报告叶主任，就说我们做军区工作的，有很多事情想向军委的领导同志谈一谈。见面的机会难得，只好靠电话。林副主席怕接电话着凉，我们能理解。但我想最好能安个小喇叭，让他亲自听听我们在电话上反映的情况，我们就满足了。如果想安装这样的小喇叭，我们这里就生产，我可以派人送去一个。”

事后，我把韩司令员的电话大意报叶群。叶群轻蔑地说：“不能听他的！愿意安小喇叭，他自己安去，我们这里用不着！”

但是，韩先楚司令员办事情是认真的，他真的从福州给林彪弄来一套带有一个小喇叭的扩音装置。他借来北京办事之机，派人把这个装置送到林办。叶群听说后，不但不领情，反而在背后把韩司令骂了一顿。她说：“韩先楚这个人象个孩子，真不懂事！”她还故意挖苦说：“他说是小喇叭，我还怀疑它是窃听器呢！”在叶群的催促之下，韩司令送的这套扩音装置在毛家湾连夜都没过，就被当作“窃听器嫌疑”送到总参一个技术侦察部门供“研究”去了。

韩司令到北京后，又数次给林办来电话，要求向林彪反映部队中的重大情况。我都及时报叶群，但叶群一直不让理睬。叶群说：“在韩司令那里，什么都可能变成重大情况。他这个人爱罗嗦，我和首长都烦他。”最后，韩司令只好降低要求，说如果林彪实在“太忙”，见一下叶群也好。但就是这样，叶群也不愿赏脸，而是派林办两个工作人员去应付差使。

当时，韩司令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我和林办另一个工作人员到医院去看他，并且说明我们是奉命前来听韩

司令谈情况的。

“实在见不到林副主席，叶主任又忙，我只好和你们秘书同志谈谈了。”韩司令无可奈何地说，“和你们谈，你们作好记录，回去再汇报，我相信不会走样。但我总觉得，托人传话总不如当面谈好。现在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内军外碰到的新问题相当多。这些问题，有些是我们本身能够处理的，有些我们就处理不了。我们心中，也有好多话想向军委的领导同志谈谈，可是去找谁呢？军委常委已经不起作用了，总部的机关也有自己的问题。越级去找毛主席，又怕打扰他老人家。林副主席分工管军队，我们有事只好找他。我们处在福建前线，部队除了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以外，战备工作也很紧。我希望中央、军委了解我们的情况，给我们作些指示，我是怕出事，一旦出了事，我们不好向中央交代。……”

接着，韩司令详细地介绍了福州部队当前执行各项任务的情况、问题以及福建社会上两派斗争的主要动向；谈到极左思潮正在影响着军队，以致军内也出现了某种分裂的苗头，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他谈了一个上午，又约我们下午继续谈；总共谈了约有五个多小时。他拖着有病的身體正在住院治疗，谈话时间这样长是过于疲累的，但医生几次劝告，我们也屡屡建议，他都不肯停顿，不肯休息。他的精神令人感动，心情也是容易被人理解的。

“我还没有谈完，但我不想再谈了。”韩司令最后说，“有些重大问题，我只能等待见了林副主席的面之后才能谈。今天谈的这些情况，我希望你们回去后如实地向他转报。我理解他的身体不好，听几个小时的汇报恐怕受不了，但我讲了这么多，他能听上一半，我也就满足了。……”

我回到毛家湾，先准备向叶群汇报。但叶群关心的只是

一些“趣闻”，对韩司令所反映的部队情况没有丝毫兴趣，因此一句也不愿听。

我又去向林彪汇报。林彪比叶群强一些，但他也只许我“扼要地”讲了十几分钟。

“韩先楚和你们谈了多长时间？”林彪问。

“一个上午，又加下午近两个小时，共约五个多小时。”

我说。

“五个多小时？”林彪似乎有些惊奇。“哪有那么多的话可说？”

“韩司令说，他并没谈完，有些重大问题只能和首长当面谈。”

“哈哈！五个小时还没谈完？”林彪哈哈大笑。“你先扼要地讲讲，他这五个小时都谈了些什么？”

我把韩司令讲的问题略作归纳，讲了一些题目和内容要点之后，对林彪说：“韩司令说把这些内容全向首长作详细汇报，担心你身体吃不消，但你如听上一半，他就满足了。”

“哈哈！”林彪又一次大笑。“用不着听一半。听你讲了要点，我就听明白了。你讲要点用了多长时间？”

“大约10多分钟。”

“这10多分钟就足够了。”林彪显然不愿听下去。“就是这样，他讲了五小时的话，我看10分钟就够了。”

5. 林彪的“战备热”

珍宝岛事件以后，毛主席几次提出要“准备打仗”。全军都在认真贯彻主席指示，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但林彪对此并不重视，也不着急，他似乎认为事态并不那么严重。但是

事过几个月以后，总理在北京东郊机场与苏联的柯西金达成协议，中苏双方准备在10月份举行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谈判，边界形势已略趋缓和，林彪却在这个时候异乎寻常地热心抓起战备来。

1969年9月，林彪在总参召开的“三北”作战会议上讲话，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为了强调战备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为个表明抓战备的认真态度，他自己也有了一些行动。他平时因为怕风，连房门都不敢出，但此时却在住地的院子里练起了骑马。他还指示总参有关部门为他绘制了一张近三米宽、七米长的“三北”地区要图。这张地图在林办宽敞的会客室展开并挂起后，林彪手拿一根指示棍，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叶群在他身旁充作助手。叶群特从空军报社调来的一名摄影记者，及时地把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场面摄入了镜头。事后叶群得意地表露说：“现存的影集中，只有首长过去指挥打仗的镜头，但没有一张是和平时期的，现在可有了机会把它挂上了。”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

“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和总参管作战的阎仲川立即到我这来。”

我打过电话后不久，几员大将都陆续到了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是从不让工作人员在场的，这次却有点特殊，叶群布置我在场作记录。叶群说：“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你们注意记一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

在林彪的会客室，几员大将端正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林彪给他们下达指示。林彪在地毯上低头漫步，并未急于讲

话，很可能是在思索着他讲话时该用怎样的措辞。

“今天叫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问题。”林彪停下来，抬起头望了望在座的几员大将，开始慢慢地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人们一般都在欢乐的时候，战争说不定就开始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1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一排地在那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这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在机场的跑道上要设路障，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紧抓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就问题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其他几个人也都连声表示“拥护”，但没有谁再补充什么“措施”。

林彪说句话轻而易举，但要部队见诸行动，就得惊天动地。我注意到，从当晚九点至午夜，北京西郊的上空一直传来

飞机的嗡嗡声，这表明飞机的转场在紧张进行。下半夜，吴法宪给林彪来电话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几个机场除值班以外的飞机，已经全部转场；其它措施也已落实。

还在空军的飞机正在转场的时候，林彪头脑一热，又下了一道既可笑、又很危险的命令。他让李文普给总理打电话，说为了防备敌人利用节日进行轰炸，防止因轰炸造成水库决堤，他主张把北京附近几个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存水在节日前夜全部放掉。总理接到李文普的电话之后，立即对林彪的主张表示反对。总理说，如果把这些水库的存水全部放掉，不用说一夜之间，就是延缓几天放完，也至少要使下游的几十个县受淹。因此万万使不得。李文普把总理的意见又转报林彪，林彪这才作罢。

6. 林彪视察张家口

国庆节期间虽然太平无事，但林彪抓战备的热乎劲并未冷下来。节日一过，他提出要亲自出去看看地形。办法是坐上飞机，在空中视察。路线是：北京——五台山——雁门关——张家口——八达岭——北京。随带人员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总参负责作战工作的副总长阎仲川。计划在张家口住一夜，次日返程。此行是保密的，因此行前除向主席的秘书备了案之外，没有向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打招呼。

林彪尚未动身之前，叶群就忙着为此大作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去张家口，为林彪在那里过夜

安排住处；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准备了三架专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乘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开去一辆“吉姆”车；不巧，这辆车行至中途即发生事故，致使一老人死于车祸。国防部长轻易不出行，但人未动身，就付出了一条人命的代价。

正式动身的这一天，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八点，林彪、叶群驱车到了机场时，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人正在那里等候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已前来准备为林彪送行。

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我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这种飞机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未发生过严重技术事故。机身并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有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另三个还可照常工作不影响飞行。航速不算很快，但由于内部装潢适度，比较安全，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在机场跑道附近还停着一架“伊尔——18型”大型客机，也是为林彪一行准备的。林彪这次出行虽然不加声张，但随行人员的规模甚为可观。仅林办的工作人员（秘书、医生、内勤、司机等）就多达十多人，还有半个中队的武装警卫人员，再加上吴法宪、郑维山所带的随员，共约近百人。这么多人都搭乘飞机，三架客机也是满载的。

这么多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处境最为奇特，这人就是吴法宪。林彪此行的目的是“看地形”，而吴法宪是个空军司令，“看地形”与他并不相干。与他多少有点关系的是林彪乘坐的专机是空军的，但已有一位空军副参谋长随行专门负责专机的使命，何必惊动空军司令的大驾呢？外人很难

设想，这里面也有一段原委。这个主意出自叶群。叶群最担心坐飞机会摔下来。但林彪和她出于某种需要，有时又不得不坐坐飞机。她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在想不出别的万全之计的情况下，就抓住空军司令作人质。她在林办工作人员面前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只要首长和我坐飞机外出，必须拉上吴司令陪着。他是对飞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的。飞机出了事，他也跑不了。”由此可见，吴法宪寄林家篱下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对于乘坐飞机的人员，叶群也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她让林彪带上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由吴法宪、郑维山等人陪同；而她带上林立果，去坐第二架“子爵号”。她说，这样做，即便林彪的座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因此，她是从来不允许林立果与林彪坐同一架飞机外出的，她自己也尽量不与林彪同行，以免发生“万一”，同归于尽。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们后来在“9·13事件”时的仓皇出逃。那一次，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登上了一架新进口的“三叉戟”式专机，向着苏蒙的方向狼狈逃去。但是，事情真巧，正是这唯一的一次同机奔逃，却在温都尔汗的一声轰隆巨响中，他们终于没能幸免同归于尽的可悲命运。这是叶群的预见有理呢？还是天意呢？

话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再说林彪、叶群的这次张家口之行。

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具体的使命。两个工作人员中，一个是我，一个是从空军报社抽调来“帮助”工作的摄影记者。我的任务是记录林彪沿途的一切谈话，摄影记者的任务是摄下林彪“视察”途中一切“有意义”的镜头。

我们乘坐的第一架“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飞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奔去。由于是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高度压得很低，速度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面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时而拿起望远镜向下张望，摄影记者及时地抓住机会，把他的姿态拍入镜头。

“子爵号”客机内舱，原来是一个桶形，设有四十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间作为工作间，一间作为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长方形桌，两旁各有两人软座，另一侧横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他身旁，以便随时回答林彪“看地形”时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坐在林彪对面，而阎仲川、马卫华（北京军区参谋长，他是随同郑维山前来的）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这个小间的人已经坐得满满的，但谁都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只因林彪不吸烟（林彪无此嗜好），烟瘾再大的人也只能忍耐着；只要林彪不先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机舱内一片寂静，只有那轻轻的飞机马达声才使得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得到一些缓和。

“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带头打破沉寂。

“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外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吧？”

“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除了山水如旧外，道路、村落、桥梁有好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林彪说着，仍在隔窗向外张望。这时，郑维山已把一张五台山地区的概况图展在林彪面前，林彪拿起放大镜，在上边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

“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
“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一开始有点拘束，但当林彪使他把话匣子打开，他就滔滔不绝了。他尽量详细地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讲到一些有利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条件；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一种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想在他所防御的地带用坦克突破，他有决心把它打得落花流水。郑维山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干练，又有说服力。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活中，他不但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才能，而且也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能可贵的口才。一路上，从五台山，经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林彪的只字片语，就能引出他的一套长篇大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别人在他面前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他也并无反感。郑维山象连珠炮式地倾吐着自己的军事见解，林彪一直是洗耳恭听。

飞机在张家口降落，当地驻军的杨军长、贺政委出面迎接，用车把林彪一行送到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样的居住条件和林彪所常住的那些豪华场所相比，自然相当简陋，但在张家口，它还算是第一流的。

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于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军政主要领导干部。共分三批接见，第一、二批，分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第三批，是空军团一级的干部。每次接见，都由吴法

完，郑维山等人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大年龄，然后就又询问一些有关战备方面的情况，由被接见的干部回答，最后，林彪在讲话中作些指示，郑维山讲话时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林彪的这些指示。

被接见的这些部队干部，难得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有这么一次当面谈谈的机会。他们趁着林彪询问“部队有什么困难”，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感到苦恼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这些年来，由于林彪一再强调“突出政治”，并且一批再批所谓“单纯军事观点、单纯

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林彪讲话时，大家静静地听着，细细地记录着，也都在默默地思索着。他这样一讲，似乎那些以前糊涂的问题现在弄清楚了，但似乎现在清楚了的问题又被一些往事的回忆弄得更加糊涂了。林彪现在讲的话是有权威的，但他过去讲的话也同样是有权威的。他过去讲过“毛泽东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中心的中心，灵魂中的灵魂”，现在又讲“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

林彪讲话后，郑维山代表大家表态“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因此看来问题算是解决了。林彪从早到晚，忙活了一整天，他稍感疲劳，早早地就休息了。

但精力旺盛的叶群，却不肯轻轻地放过这仅有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带着吴法宪、郑维山去游当地的百货公司。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这些“大人物”驾到，又破例把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许多过往的群众也都一拥而进。许多人如同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是想来买什么东西，而都是各有所好。叶群不过是招摇过市，借机露面以显示一下威风；那些拥进来的人们则是被这几位不速之客所吸引，都想看看热闹。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在商店里游逛的人们都吸引过来，把个叶群、吴法宪、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几个警卫人员，难于打破这堵人墙，只能暗中叫苦。

“我以为大家不会认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眉开眼笑地对人群高声说。她拿出《语录》本，举在空中挥

动几下，又高喊：“我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旁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人群。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向吴司令致敬！”

吴法宪于是也举臂高喊：“向叶主任学习！向叶主任致敬！”吴法宪胖得象个阿弥陀佛，他在镇静时，两只眼睛已被脸上过分胖的肌肉挤得十分狭小；而现在，由于过分兴奋，他的姿态更可笑了。

叶群和吴法宪互相吹捧，互相呼喊着向对方“学习”“致敬”的口号。这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引起一次次鼓掌声，也引起一阵阵轻蔑的笑声。

这场闹剧，不得不收场。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吴法宪等人护送出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处。

“真不象话！”随同叶群去商店的一位警卫人员，回到住处后就大发牢骚。“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还叫我们保证绝对安全，这样公开出去大喊大叫，还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安全！……”

次日上午，林彪、叶群坐飞机返回北京。对于林彪、叶群、吴法宪、郑维山等人来说，他们这次张家口之行可能各有收获，但这些“收获”都是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7. “一号命令”发出前后

中苏两国政府商定，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

我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中央政治局于10月中旬开会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以防患于未然。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的。

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离此三四十米的原来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干部、医生）住的房子，则与林彪、叶群住的房子正成三角。秘书值班室有几台电话，其中有一台是叶群住室与值班工作人员的“热线”。林彪叫秘书，用不着挂电话，只需让内勤过来叫一声就行了。

“首长叫秘书去一下。”内勤进来通知说。

这是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由于刚来苏州，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还顾不上拿出更多时间翻看从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莫非是要听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

“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对我说。他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等着记录，而他象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

一、……

二、……；

三、……；

……；

这也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达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让给黄永胜打个电话也是这样。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话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了吗？”林彪问我。

“都记下来了。”我说。

“再念一下。”

我又照念了一遍。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我问林彪：“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

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但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我说，“第一，象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条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

“这一条建议也提的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又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他是善作大文章的，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辞句。当然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进门就带头说：“一〇一呀！你让秘书转给我看的那份电话记录稿，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好嘛！”林彪笑着打趣说。

“你讲的这几条，都很重要，也都很好。”叶群坐下来谈。“不过，我想给你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她把我

的建议说成是她的，用意是清楚的。

“什么建议？”林彪面有笑容。“我爱听。”

叶群重复了我提的那两条，问林彪：“你看怎样？”

“同意，就照你说的那么办。”林彪说完，又低着头在地毯上来回漫步。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我问。

“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林彪口述这个“一号命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可苦了全军百万指战员。他们奉命疏散，在严寒的季节里一直远离营房，挨了一冬的冤枉冻。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部队服役，他在数年之后复员还乡，但一提“一号命令”还是怨声不绝。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的。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谈判代表团从伊尔库次克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就要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载什么谈判代表的，而大半可能是

携带原子弹的不祥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地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这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谁能说我们的国防部长不辛苦呢？谁能说林彪讲“战备是最大的政治”不是认真的呢？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8. 假戏真作

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敌人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中蒙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都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各个方面的动向，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在乌云密布的紧张气氛之下，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我作为国防部长的值班秘书，此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一方面，我感到我这个角色的分量相当不轻。林彪受托主管军事工作，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处于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他的举措是否适当，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是否对敌我双方的情势了如指掌。但是他现在远离北京，远离毛主席，远离总部的作战参谋机构；他既不看文件，也不亲自掌握情况，唯一能够使他了解

一些情况的，就是秘书值班室的这两台直通北京的电话。这电话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我值班贻误了情报的传递，以致酿成大患，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吗？另一方面，我现在整天在和各种军事情报资料打交道，这些资料是不能全盘端给林彪的，而只能经过分析、综合之后，扼要地讲给林彪听。可是我的军事技术知识基础很差，怎么能保证我所分析、综合的东西不出误差呢？……

我怕误事，决定将这些忧虑报告叶群，看她说应当怎么办。

“我看照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对叶群说。

“危险什么？”叶群惊奇地问。

“现在爆发战争的迹象很多。”我说，“苏、美、台都进入了全面战备。他们的意图是什么，现在还弄不清楚。要真的打起来，敌人先动了手，我们肯定得被动、挨打，要吃苦头。”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我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我说。“首长是国防部长，现在远在苏州，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怎么能指挥打仗？”

“他不了解情况，就得怪你们。”叶群盯着我说。

“你们秘书给他讲文件，报情况，误了事我就找你们是问。”

“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及时给首长讲，也已经晚了几天了。我的情况来源，就是北京林办的值班秘书。情报部门把情况报给总参作战部，作战部报告毛家湾，毛家湾再报告苏州，我再报给首长，这样一辗转就是一两天了。苏联的飞机飞到北京用不了一小时，导弹只要几分钟；首长一两天后才知道情况，不危险吗？”

“那你说怎么办？”叶群也没主意了。

“我也没更好的办法。”我说。“我想起码应当保证情况传的及时。为了及时，最好减少中间环节，让总参作战部每天把重大敌情及时用电话传给苏州。”

“这样可以。”叶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个电话给总参，让他们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分秒不能误。你还可以打个电话给空军情报部，让他们也及时直接向苏州报告情况。这样双管齐下，情况就会来得更及时、更准确些。”

“在苏州值班的秘书就我一个，我又不懂军事，这副担子使我感到有压力。”我继续向叶群叫苦。

“这不要紧。”叶群说：“你一个人不够，再从毛家湾调一个来。”

“林办的几个秘书都是政治干部出身，没有一个在军事上是内行；再调一个秘书来，也还和我差不多。”我向叶群建议：“现在是抓战备工作的紧张时期，林办秘书中最好增加一个懂一点军事的。”

“这不必要。”叶群把我的意见顶了回来。“首长过去指挥打仗，从来不依赖秘书，就是调一个懂军事的少将来当秘书，也用不上。”

不管怎样，由于开辟了几条及时掌握情况的渠道，我作为林彪在抓战备工作期间的一个耳目，觉得心中的压力减少了。各方面的情报，每天从总参作战部、空军情报部和北京的林办秘书值班室源源不断地传到苏州来。这下，我这个值班秘书可有事情干了：要记录频频打来的电话，要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要看每天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要向林彪、叶群及时报告各种重要军事、政治动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行政事务。几天后，北京又来了一位增援的值班秘书，但

这种忙碌的情形也未见缓和。

奇怪的是，林彪对听我给他讲战备工作情况和敌军动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他抓战备的那股子特殊的热乎劲，只存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来北京前后的那几天；过了那一阵，他的热乎劲明显变冷，但每天还能耐心听我报一次情况；又过了几天，他连一天我去讲一次，也不爱听了。

9. 叶群的一句话

有一次，林立果跑到秘书值班室，闲谈中向我发议论说：“我看这个仗打不起来。我们紧急战备，苏美也紧急战备，很可能是双方都摸不清对方意图，两头都担心对方先动手。”

林立果的议论，我当时以为他是一种小孩子之见。但事后想来，他的议论也不无道理。从苏联的战略动向看，它的重点还在欧洲；它在我边境上搞大兵压境，主要是向我施加压力，但若真的发动武装进攻，它的兵力明显地远远不足。至于美军，它当时在越南问题上已陷于不能自拔之地；太平洋舰队和远东美军进入全面戒备，完全是一种守势。而我方在苏美炫耀武力之时，加强战备体制也是必要的。但当时把战争气氛搞到如此炽热而危险的程度，也不一定是必要的。

林彪本人大概也慢慢明白了这一点。敌人的紧急戒备，可能是对我军“紧急战备”的一种反应；而我军的“紧急战备”，是执行林彪“第一个战斗号令”的结果。

林彪“凉”下来了，但叶群还在“热”。

我军各部队自从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进行紧急疏散以来，已经一月有余。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了，形势也渐趋缓和了，但是部队的处境却变得越发艰难。特别是

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住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些，部队的指战员也是完全能够战胜它的。但是现在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条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需要，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就感到有些莫明其妙了。加上进入了寒冬季节，部队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各种思想反映也随之越来越多。……

这些情形，我根据各军区来电所作的反映，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部队可以回营房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林彪问。

“他们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我说。“如果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回营的决定。”

“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说。“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让他们研究一下。”

林彪表态同意让部队结束疏散，这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叶群的阻挠，这事未能实现。叶群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在关键性问题上，叶群总能在林彪面前当大半个家。这次又是这样。叶群的一句话，又使上百万人多受了几个月冤枉苦。

10. 林立果乘机捞油

在林彪的“战备热”中，林立果也从中乘机取巧，为自

已捞了一把。

林彪、叶群到了苏州，林立果也跟着来躲了几天气。几天之后，他见战火并未燃起，就又窜回北京。在北京，他伙同空军党办的几个心腹搞了一项所谓“技术革新”，并就这项革新以空军党委名义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现在，他带上这份报告，又跑回苏州来了。

“这是首长批给主席的，你帮助发出去吧。”林立果说着，把一份文件推给了我。

我接过来，头一眼看到的就是林彪用红油笔在文件顶头处批的几个醒目大字：“呈主席阅，林彪。”再仔细一看，这是空军党委的一份报告。

“这份文件是你带来的吗？”我问林立果。按文件发送手续，这样的文件本应经空军保密室发往林办保密室，再由林办保密室转送苏州；如今这样以私人代送方式处理一份文件，是不符合保密规定的。

“是我带来的。”林立果带有一种自满的神气说，“若不是我，指靠他们上送，三天也送不到。这个报告，我还有一份功劳呢！”

林立果走后，我翻看了一下这份报告。大意是说，如何预先发现敌人向我发射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是当前战备工作中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空军组织一批力量进行了研究和试验，并且初步取得了成功。这项研究，就是在原用于侦察敌机的地对空雷达设备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使它能够改用于侦察来自敌方的导弹。这样，如果改装几台这样的设备，把它布置在北京四周的适当位置上，就可以在敌人已向北京发射导弹之后，使北京能够得到五至十分钟的预警时间。这项革新对于首都的安全是一

个贡献。……

我不懂雷达技术，但看了空军的这份报告，对它是否成为一个“贡献”深感怀疑。看来林彪对这项“技术革新”的成就是欣赏的，不然他为什么批“呈主席阅”呢？

后来我才弄明白：与其说林彪是欣赏“技术革新”，不如说他是为了抬举参与此事的林立果。几天后，主席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个圈，并把它退给了林办。这件事，立即转化为抬高林立果的资本。报告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上送后立即由林彪亲自批送给主席，主席又圈阅过。对于空军来说，这还不是一大喜讯吗？

林立果又一次乐滋滋地跑到秘书值班室来，他递给我一封已经拆开的私人信件，说：“这是吴司令写给我的一封信。你看看，帮我想想怎么办？”

我不看则已，一看吴法宪信中的一些令人作呕的语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的信共分三段：第一段，是感谢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段，是吹捧林立果参与起草的那份空军党委报告，是“空军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份文件”，他准备组织空军机关的全体干部学习；第三段，表示他准备送给林立果一件“纪念品”——一个金壳怀表。信的文字只有一页长，但吴法宪的一副奴才相已由他自己勾画得淋漓尽致。

“吴法宪的这封信实在不象样子。”我气愤地对林立果说。“他好象是抬高你，实际上对你有害无益。”

“为什么？”林立果故意问。

“因为他失去了原则，也失去了身份。”我说。“他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空军司令，参加革命几十年，年龄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能低三下四地说要感谢你这样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

的青年的教育和培养呢？如果说教育和培养，那么党呢？人民呢？毛主席呢？……”

“我也觉得过分。”林立果附和着说。“所以才找你商量，你说我该怎么办？”

“依我说，你把他的信顶回去。”我说。“你要告诉他，他写这种信是没有原则的，也是没有好处的。他作为你的首长和长辈，有责任教育和培养你，而不是反过来，说什么感谢你对他的培养和教育。他对空军党委的那份文件，评价也过分。他说送给你一个金怀表，你要干脆拒绝！……”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林立果有意讨我的好感。“这个信，确实不大象话。可是主任……”

“主任看过了吗？”我问。

“看过了。”

“主任怎么说？”

“主任说，吴司令这是好意。她还让我打个电话，对吴司令表示感谢，对他送的怀表，主任说却之不恭，我只能收下，但要劝他今后不要再送了。”林立果把眼珠转了转，又说：“主任给我出的主意，你给我出的主意，我都赞成，又都不赞成。我赞成你的看法，但不赞成你的方式；我赞成主任的方式，但不赞成她的看法。我要叫吴司令知道，我这个人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但我也不能给他下不来台，不能不讲点礼貌。……”

我没再说什么。心想：林立果虽然年纪不大，但叶群的那一套，他已学到家了。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他既要装作讲究“原则”，但又不失实惠。

林立果以后怎样和吴法宪搞交易的，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地知道的事情是：林立果自从利用“战备热”参与搞了那项

“技术革新”之后，他被吴法宪捧上了天。吴法宪亲自署名，以空军党委名义发布了一项命令，提升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一个刚刚参军两年多的毛孩子，按正常的服役期还不到时间，就一下子提成了师职干部；这还不算，让他当空军党办副主任还嫌不够，又兼任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从而在我军历史上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我为此事曾在背后骂过吴法宪，但实际上，这是毛家湾走出的第一步棋。

林立果被破格提升的事，是在北京值班的郭连凯用电话告诉我的。我们两个人对此十分惊讶。我由于当时过于天真，以为这种事即或被叶群默许，一贯讲“谦虚”的林彪也会阻拦的。这既然是从空军文件中反映的情况，我也就有了把它捅给林彪和叶群的机会。

“从空军的一份文件中知道，老虎已经被任命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了。”我未加评论，想试试叶群的反应如何。

“这说明我们老虎在空军干得不错！”叶群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这次提拔，完全是空军的事，我并没给他们作任何暗示。”她又问：“你给首长讲过了吗？”

“还没讲。”

“你就不用讲了。培养老虎，这本是首长的意思。”叶群叮嘱我说：“但你不要给他讲老虎被提升的事，省得叫他为难；我和他讲讲就行了。”

我心中更加疑惑：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呢？！

.....

11. 外事活动中的国防部长

1970年初，国内形势稍趋平静，国际间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却愈来愈引人注目。特别是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一再升级，在这个时候，柬埔寨又发生了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人民都在奋起抵抗美国的侵略。中国作为印支人民的可靠后盾，一直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给予他们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

在国际斗争方面，林彪既不在行，也不热心。我在林办工作四年多，只记得他在对外工作上做过两件事。这两件事，他都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做的；做是做了，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第一件事，是接见越南的范文同和武元甲。由于越南抗击美国的斗争在主要方面是军事性质的，这两位来访的越南人很想求教于这位“传奇式”的中国国防部长。经主席批准，并在我外交部的安排下，范文同与武元甲约见林彪的愿望实现了。事后，我看过林彪与他们谈话的记录。林彪所谈的内容，中心是一个“熬”字。林彪对他们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是胜利。”这两个越南客人听后有啥反应，记录上没有记载。但“熬就是胜利”，这无论在政治术语和军事术语中都是首创的，因此它不能不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

林彪做的第二件事，是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引起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的严重不安。阿尔巴尼亚是受到苏联武装侵略威胁的一个，因此它急于借助中阿友好，对付苏联。巴卢库特此访华，并且故意想使他的访问带有一点军事色彩。他来北京后，受到主

席和总理的接见。他又提出见见林彪。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接见。后来客人提出，如果身体不好，就是一起照个像，登登报，显示一下中阿两个国防部长站在一起的特殊意义，他就满足了。这样，林彪只好同意。但这次见面，林彪的举止非常蹩脚。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下，接见在大会堂新疆厅进行。我目睹了这个场面。巴卢库一见林彪，就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镁光灯一闪，摄影记者把这个场面摄入了镜头。之后，他们又在照像所需的强光灯照射下，坐下来通过翻译寒暄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

12. 林彪的“失常”

1970年5月，鉴于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主席决定发表一项关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央并决定于5月2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由林彪代表毛主席宣读这项声明。这项任务很庄严，但也是不难完成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事，林彪又一次表现失常。

5月20日早晨五点多钟，内勤就来通知说，林彪让我去给他讲讲“话题”。秘书给首长讲“话题”，除了毛家湾以外，在别处还没听说有过这种事。就是在林办，一年以前也没有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前面介绍过林彪本人是不亲自看文件的，全听秘书讲，而且只听个大概。“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最多时一天能听两次，一次听二三十分钟。林办每天收到反映国内外重大动向的文件，平均都有一二十万字，最多时达30几万字；仅仅在几十分钟内听个大概，这已经是

很紧的了。但是后来，林彪越听越没兴趣，就减为一天听一次，再减之为几天听一次，有时是一个礼拜左右听一次。这样，许多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林彪只知道一点题目，而不知其端细。如果他整天闷在房子里无所事事，倒也露不出闭目塞听的弱点；但他总是要参加主席召集的会议，陪着主席接见一些重要外宾，或者参加一些大型群众集会。参加会议或接见外宾的时候，他可以装哑巴，少讲话，以掩盖自己的孤陋寡闻，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身旁总有一两位重要外宾站着，时而要主动和他攀谈几句，这时他想装哑巴就有困难了。怎么办？叶群帮他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他每在正式“出场”之前，由讲文件的秘书给他点题式地讲讲可能作为“话题”的国内外情况——特别是国外的情况，以便作为他与人攀谈时的“原料”。这办法有点“临阵磨枪”的味道，但总比“一问三不知”好一些。他这样试验过几次，觉得还有点用，就逐渐成为“制度”了。

我拿着一沓子可作“话题”的文件（这是预先作了选择的），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无精打采，睡意未尽。看来他刚起床不久，还没完全挺起精神来。但他知道，在这天上午十点举行的天安门大会上，他将“出场”宣读主席声明，他要和西哈努克或者宾努站在一起。他已经一个多礼拜没听秘书讲什么了，因而“出场”前听听“话题”是必不可少的。他打破了以往饭后才能听讲文件的惯例，这天大清早就把秘书叫来了。

“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林彪慢吞吞地说。

“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我刚要开始讲，林彪招手，让我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这又是一次破例。他以前说是怕风，从来都是让讲文件的秘书坐在离他有几米远的对面

沙发上，今天，他不管什么风不风了，大概是出于认真吧！

我开始给他讲“话题”。从柬埔寨讲起，讲到当地军事斗争的概势、朗诺集团的动向、美国插手后的困难以及有关西哈努克的一些趣闻；又讲到越南、老挝的情况，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以及苏联的动向，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的政策等等。我开始讲了几句之后，林彪闭上了眼睛。我以为他是在闭目静听，但讲着讲着，我发现他把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口形微开、一动不动、毫无表情。……

“他睡着了。”我心想。此时我不能继续讲下去，又不便离开。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等着他醒来。直到内勤进来，我才退出。

林彪后来何时醒来的，我没去打听。他没再叫秘书。我给他讲了那么多“话题”，他究竟听进了多少，我也无从知道。

上午10点，天安门群众大会准时开会了。我在毛家湾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大会的实况转播。

宣布大会开始和奏东方红乐曲后，林彪开始讲话：

“我要发表讲话！”林彪拉着湖北腔的长声说：“……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林彪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我非常吃惊而焦急地听着，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呢？林彪讲了几句之后声音停顿了。这时听到一些咯咯声，似乎是在移动话筒。接着又听到林彪讲话的声音，他这才开始宣读主席的“五二〇声明”。他的声调缓慢，吐字还算清楚，但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还有几个字也念错了。

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大会上说胡话，叶群把这归咎于工作

人员的失职。她回到毛家湾，就大骂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责怪说他们夜间给林彪用的安眠药过量了。她恶狠狠地说：

“这次饶了你们！下次再出这样的事故，就算作是有意识地进行政治破坏！”

当事的工作人员在背后直叫屈：“这次用的安眠药同以前的用量一样大，这能怪谁呢？”

其实，这谁也不能怪，只能怪叶群。后来我才听说，林彪每次正式“出场”前，她都让内勤给他打一种针。一针下去，林彪顿时兴奋异常，以致上了天安门，比常人还“精神”；回到家里，针剂的药力过去，又象大病一场。林彪这次的“失常”，是否与此有关？她给林彪用的那种“兴奋剂”又是什么？请懂行的人们去分析，我是说不清楚了。

第十一章 “选美”记

1957年反右时，一个人因为说了句“党天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天下”也残存不多了，人们一度见到的却是“家天下”的复活。

看看毛家湾的“选美”活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手段之卑劣，在古今中外都属少见。如果不是“朕即天下”的魔影又重现世间，那又作何解释呢？

1. 假探亲，真“选美”

“九大”一闭幕，叶群就把我找了去。

“老张，‘九大’以后的事情不多了，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跑跑呢？”

我以为，这是叶群又一次想把我支出去为豆豆找“对象”。但一年多来，尽管叶群煞费苦心，豆豆并不领情，相反导致了母女关系极度紧张，叶群也渐渐失去了当初的那股热乎劲。那么，叶群是想让我给林立果去找“对象”吗？

“主任，我不行。南京那次……”我以那次失败的南京之行作借口，想打掉叶群派我干这种窝囊差使的念头。

“你找男的不行，可以帮助找找女的。”叶群和颜悦色地说。在这种情形下，她是很少板面孔的。“老虎今年24

岁，也不小了。你们当叔叔的不帮忙，还能叫他打一辈子光棍吗？首长和我处在这样的地位，还能自己亲自出去跑这种事吗？你就帮助我们分分心吧！”

“老赵、老张一直在外边跑，还有空军的大炮、于新野也在跑这个事。依我看，再不能增加人了。我总觉得，派专人出去找人，影响不大好；派秘书出去，更值得考虑。我是为首长的声誉着想，因为时间久了，总会传出去的。”

我的这种泼冷水的话，对叶群丝毫不起作用。她坚持说：“什么影响不影响，这用不着你们担心。谁家的女儿不出嫁？谁家的男人不结婚？我们就找一个，多了也不要。我们只是想找一个条件理想一些的。特别是给老虎找的人，不能是个丑八怪；首长已经到了晚年，得叫他看了高兴才行。我已经下了决心，这种事不舍得花本钱不行。不光是你，我还要另组织力量出去。你别的地方也不用去，就回你的老家——东北。松花江一带的水土好，那里一定出美女。说去就快去，你明天就动身吧！”

“我是从东北部队来的，那里熟人很多。”

我怎么说呢？”我故意出难题。

“你就说回去探家，你家不是住在长春吗？”叶群为了催我回长春帮她儿子找对象，装出对我关心的样子：“你一直忙于工作，也该回去看看你老父亲了。你去探家，顺便替我们找找，这还不行吗？”

“如果是探家，我就只能去长春，别的地方不好去。因为到处是熟人，我很难做到保密。”我想，找不找人倒次要，借这个机会探探家倒也不错。

“行，行，行！”叶群连声应允：“你就去长春，别的地方不用去。原来已决定派大炮、于新野去吉林地区，这

回你可以和他们一块走。他们打的是为军委办事组物色工作人员的旗号，你的旗号是探家，这样就不会引起外人怀疑了。你们的主要任务是选女的，重点跑跑中学。找人的条件你都知道，我就不用多说了。”

叶群规定的“找人”条件我确实知道。“九大”以前，叶群就曾派邱会作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胡敏专程去西安、南京等地选“美女”；大炮等人也积极张罗过。叶群最初提出的条件是：一是必须长得“美”；二是年龄在20岁左右；三是身高1.65米左右；四是文化程度要在初中毕业以上。这几条，中心是个“美”字。胡敏对这种“美”的要求还作了发挥。据她说，青年女性的“美”有两种类型：一是所谓“艳型”，即桃花面；二是所谓“丽型”，即面目清秀。胡敏为了报答林、叶保救邱会作之“恩”，对林家“选美”特别卖力。她能说能干，果然就给叶群选了两名“美女”作“标杆”。“艳型”的标杆，是胡敏从西安选来的，相貌确实出众：柳眉杏眼，面如桃花。但叶群看后嫌“稍胖了点”，吹了。“丽型”的标杆，是胡敏从南京某文工团选来的一名舞蹈演员，比之西安的那个更加媚人，但身高达1.69米，叶群嫌她“高了一点”，也放下了。这两个候选对象虽未中选，但却成了各路选“美女”的“样板”。叶群说：“我们要求的条件并不高，但必须强于这两个，我们也不要多，就要一个。我们国家这么大，我们就想选一个，还选不出来吗？”

我知道，我的长春之行是满足不了叶群的欲望的。“探家”回来后怎样向叶群交差，我已有过南京的经验，并不发愁。发愁的是叶群让我和空军的大炮、于新野同行。这两个都是叶群的亲信，又都是“找人”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

的监视，我的“太极拳”很好打；如今有了他们，我就不好作戏了。我需要设法摆脱他们，但怎样摆脱呢？

我们一起登上了去长春的火车。在分配卧铺时，我让大炮和于新野住在一个卧铺间的对面铺位上，我则要了一个与他们相隔的另一个铺位，这样就减少了与他们“扯乱谈”的机会。但列车一开动，大炮还是主动凑到我这边来，附在我身边小声说：

“张秘书，我能有机会和你一起出来，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这次一定能够获得个大丰收。……”大炮并不了解林办的内幕，也不了解我，他以为既然是林办秘书，就必然是林、叶的心腹；他向林办秘书表忠诚，也就等于向林、叶表忠诚了。

“我不会有太大作为。我是回长春探家的。”我厌恶地回了他一句。

大炮停了一下，没再絮叨。但他坐在我身旁，恋恋不肯离去。

“主任对我们这样信任，我真不知怎样报答。”大炮又凑近我身边：“不找一个叫首长和主任满意的人，我死不瞑目！……”

我低声警告他：“在这个场合，不要议论这样的事！”

大炮瞅了瞅附近卧铺上正在等待入睡的旅客，对我笑了笑，然后走开了。

次日上午，我们抵达长春。经大炮出面安排，我们住进了空军招待所。一个房间有两张床，我们三个人只好分住两间，他们住一间，我单独住一间。他们想让我“特殊”些，我则想和他们疏远些，这样安排双方都无不满。

“我们怎样行动？”大炮问我。他又说：“张秘书在

这，我们一切听你指挥！”

“这好办，”我说。“我到吉林省军区弄两张介绍信，然后咱们分开活动。你们两个在一起跑跑距离远一些的学校，我一个人跑跑近的。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走到哪，没人知道你们是谁；可是我一出门，就可能碰上熟人，活动不便。因此就靠你们了。”

“咱们能在一起活动就好了！”大炮对我不和他们一起活动深感失望，但我陈述的理由，也可能使他信服。因此到长春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各干各的了。

大炮很有办法，他从空军的一个单位借了辆小汽车，拉着他们两个人在长春各学校转。一个半天能够跑两三个学校，没用多长时间，长春的大半数中学叫他们转完了。而我是“探家”来的，等我看过父亲，又回距长春六十里的家乡看望了几个弟弟，还没真的开始跑学校，他们就“完成任务”了。

“这个地方不行，”大炮对我说：“我们跑了几十个学校，没见一个理想的。在校的低年级学生年龄太小；够年龄的，又都上山下乡了。我们转移一下怎么样？”

“我们想到吉林去，”于新野插进来说。于新野和大炮都在空军党办工作，大炮是副科长，于是他手下的秘书，因此有大炮在，于很少插言。这次去吉林，大概是他的主意。他说：“吉林市靠近松花江，听说那里的人皮肤好。我们想去看看。不然，在这呆多久，都只能是浪费时间。”

大炮说：“到吉林去的主意拿定了，张秘书领我们去吧！”

“我不能去。”我笑了笑，“我到吉林去探什么家呢？”

大炮和于新野去吉林以后，我从空军招待所搬到了省

军区招待所。我是吉林省军区的“老人”，许多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孤身的老父亲在本市工作，对我住省军区招待所都不感到奇怪。他们不理解的是，我为什么初回长春时住了几天空军招待所？我只能对他们说：“军委办事组有两个人来物色工作人员，在北京听说我要探家，就拉着我一道来了。他们原是空军的，因此住到了空军招待所。叶群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她让我对那两个人在长春的活动给些协助。”这些话，完全掩盖了为林、叶选“美女”的真相。

不管怎样掩饰，我还必须想到回北京后怎样向叶群交差。不能过于积极，但也不能空手离去。我于是在环顾四周，见无熟人的情况下，溜进附近的几个中学。由于我持的是省军区的介绍信，又装作是给省军区业余文艺演出队物色女学员，所以这几个学校都很热心。结果，我从我看过的女生照片中选了两张，又看了看她们本人。她们距林、叶“选美”的条件相差很远，但在一般女生中还是出众的，因此作为我应付叶群的“对象”还是可以的。剩下的时间全由我自己任意支配：白天逛逛大街，晚上下下围棋。我到林办后几年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不但身体相当疲劳，而且精神上深受压抑。相比之下，现在倒难得地逍遥自在了。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郭连凯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叶群急着要“收获”。如果希望不大，就叫赶快回去。

我回到北京后，叶群一见面就问：“听老郭说，你在长春找了两个供参考的，情况怎么样？”

“不理想。”我把那两张女学生照片递给了叶群。“选了这两个，相貌都不错，就是年纪太小。”

“多大？”

“大的16岁，小的15岁。”

“呸！”叶群冷了半截。“我们成了开幼儿园了！简直是开玩笑！”

事后，郭连凯对我说：“选这样年龄小的，明知不行，还报它干啥？主任那么急，还能叫老虎等10年后再接婚吗？”

“我是为了应付交差的。”我说，“这总比空手交差好一些！”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比空手交差引起的后果更坏。这个过错，我是不能怪罪别人的。

2. 林彪亲点锦州有美女

1969年6月中旬，即我从长春回到北京之后不几天，叶群又一次派我去东北“找人”。以前，她派林办工作人员外出“找人”，还羞羞答答地装作是背着林彪的，这回，她却明晃晃地把林彪的牌子亮出来了。

“老张，我和首长商量过，决定派你再到东北跑一趟。”叶群怕我再和她讲价钱，干脆采用了不容商量的口气。“首长说，他过去在东北打仗的时候，看到锦州一带的女人长得很好看。我看，你这次去东北，第一站就先到锦州，说不定能在那里拔出一个尖子来。”接着，叶群作了具体布置：她让一个叫“陶干事”的人与我同行。我们仍需打着为军委办事组物色工作人员的旗号，在看过锦州以后，再去沈阳、旅大……。每离一地，都要用电话或写信向在北京的郭连凯报告“战果”。叶群最后一再强调：“锦州是首长亲自点的地方，绝不能轻易放过。”叶群问我：“你有把握吗？”

“我没把握！”我说，“我出去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也难免失败。”

“先别说丧气话！”叶群给我打气说：“我对你们这次出去，抱有很大希望。陪你去的那个陶干事，是江腾蛟手下的人，对帮助我们找人非常积极，也有经验。有他帮助你，还能说没把握吗？……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找找看吧！”我说。

我从长春回来后，曾经暗中下定决心不再沾“找人”的边。但现在林彪本人下了命令，我还能说什么呢？副统帅都不怕搞坏了影响，我怕有何用？

叶群派陶干事与我同行，用意是让我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但作为林办秘书，我的处境比非办工作人员总要优越些。一旦离开叶群，我就成了“主角”了。到了锦州后，我对陶干事说：“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两个分头跑。”结果，没用两天时间，锦州的几所中学就叫我们跑完了。

我们晚上碰头时，陶干事问我：“你有收获吗？”我说：

“没有，你呢？”陶干事说：“我见到一个，相当不错。可惜就是年龄小了点，才16岁！”我说：“这根本不能考虑。我从长春找过一个16岁的，受主任一顿批评。”陶干事说：“这个16岁的女孩非同一般，放弃了实在可惜。”他坚持要向毛家湾推荐，说不能光看年龄，还得看身材；他看中的那个女孩身高1.65米，成熟得象个20几岁的人一样，完全适合叶群规定的条件。他又说，如果认为这人还不行，就很难再找到更理想的人了。

我想，对这种事不怕不积极，就怕过于积极。陶干事这人就积极过分了。我怎么办？对他的这种热乎劲，我不能公开泼冷水。你坚持向叶群推荐，我也不反对；我知道，这同样是徒劳的。

“我建议你明天去看看。”陶干事见我犹豫，又一次给

我加温：“我相信，你看过之后一定会满意。”

第二天，陶干事领我到了这个女孩的家里——他早已把女孩的家庭住址查到了。这是一个俭朴的普通干部家庭，女孩的父亲不在家，母亲见有客人来，急忙招呼请坐、倒水；女孩继续在外屋里做饭。自然，我们穿着军装，是以当地驻军支左人员“家访”的身分出现的，主人并没见疑。我们来的目的是当面“相看”一下那个女孩，这也不需要作特别安排，只是一眼掠过就够了。

这一看，我被陶干事征服了。女孩的相貌虽然不及叶群的“高标准”，但的确是出类拔萃的。由于年龄太小，选她作林立果的“对象”根本不可能，但用她堵堵叶群的嘴，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这样，在我们离开锦州的时候，我把陶干事弄到的这个女孩的照片寄给了郭连凯。所以这样急迫，是因为锦州这地方是林彪亲自点的，叶群又曾交代及时报告“战果”。我不想为此“立功”，但也不愿再次受到责怪。

3. “三个在一起比比看”

离开锦州后，我们经沈阳、旅大，来到了外长山列岛。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因为叶群有过交代，我这次出来活动，不要叫沈阳军区知道，也不要叫我在东北地区的任何熟人知道。然而，向沈阳军区领导机关“保密”比较容易，我不主动上门就行了；向我的熟人保密就很难，因为在沈阳、旅大，认识我的人也不算少，我怎么能完全避开他们呢？但这样一来，我也就有了改变叶群交代我们去处的口实。

“躲开沈阳、旅大，我们上海岛去！”

外长山要塞区所管辖的六个海岛，我们转了五个。辽阔的海洋，秀丽的海岛风光，使我这个久住内陆城市的人大开眼界。什么毛家湾的烦恼，什么“找人”的压力，在浪花滚滚的大海之上全被我忘在脑后了。但是，就在我对这海上乐园着了迷的时候，郭连凯从北京打来了紧急电话。他自从我们离开锦州之后，就再也不知道我们的去向。叶群责怪他，他只能干着急。他没有办法，只好用长途军用电话“跟踪追击”。追来追去，他最后发现我们正在海上游弋。他报告了叶群，叶群又对他发了一阵脾气。但不管怎样，他总算查到了我们的行踪，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主任听说你们上了海岛，大发火了！”郭连凯在电话上对我说，“主任说，张云生这小子哪里是出去帮我们找人，纯粹是游山玩水去了！主任命令你们立即返回北京。你们回来路经锦州时，把陶干事推荐的那个女孩也带到北京来。主任要亲自看看，你们在外跑了这么多天，到底选了一个什么理想人物。要看好，可能平安无事；看不好，就难交代了！……”

郭连凯传达的叶群的这些斥责，并没有给我和陶干事带来什么麻烦，这多亏锦州的那位女孩帮助解了围。这个女孩被我们带到北京后，叶群一看，立刻转怒为喜。

“你们的眼力确实不错啊！”叶群夸奖我和陶干事说。

“这是陶干事的功劳，没有我的份。”我说。

“你们两个各有一份。”叶群笑盈盈地对我说：“老张，你在长春找的那两个，也可以调来北京，请我们看看！”

“那两个不值得调到北京来。”我说。我一听叶群要调我在长春选的那两个女孩来京，心里有点慌。我是用作应付

叶群的，这不是要弄假成真吗？我对叶群说：“这两个女孩才十五六岁，主任早说过年龄太小，为什么又要看她们呢？女孩虽小，但一旦进京，惊动很大。这样做好吗？”

“首长都点头了，你怕什么？”叶群说：“原来说15岁

4. 少女的“奇遇”

三个女孩在北京，叶群指派一个女工作人员出面接待。这个女工作人员叫小刘，是林彪身边一位警卫参谋的妻子。她原在铁路部门工作，与那位参谋结婚后，被叶群弄到解放军总医院当了护士，同时穿上了军装。叶群并不是对工作人员发善心，而是为了自己作打算。她事实上把小刘当成了自己的内勤，让小刘占着医院的名额，干着毛家湾的事。在选“美女”的高潮中，小刘也成了叶群的爪手。她利用小刘是个女性这一特点，专门去和那些被调进京的“美女”打交道。叶群在幕后操纵，她在前台动作。她并不很机灵，但在叶群看来还是中用的。

由小刘率领，三个女孩来到养蜂夹道的室内游泳池。她们一齐下水游泳了。这时，一个穿着奇特的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又高又胖的男青年，在游泳池的岸台上踱步；他们一边低声谈论着什么，一边用眼睛不住地向着正在游泳的三个少女瞟去。三个女孩一开始被看得不好意思，经小刘做工作，也就渐渐习惯了。这两个游泳观众不是别人，正是叶群和林立果。

女孩们上岸穿好衣服后，叶群和林立果漫步走过来。叶群装作不认识她们，一边热情上前和她们打招呼，一边向她们问这问那。林立果则贴在叶群身后，歪着脑袋，笑咪咪地用他那惯有的木匠吊线似的眼睛注视着她们。叶群兴致大作，摆出一副大首长的架势，让女孩们给她唱歌、跳舞。孩子们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她们都羞怯地红着脸，低下头；但不能摆脱叶群的笑脸劝诱，再加上小刘在旁不断做工作，最后还是



这两个游泳观众不是别人，正是叶群和林立果。

唱了，跳了。……

这是叶群精心导演的一场“偶然相逢”戏。第二天，这场戏的续幕搬到了大会堂。叶群事先有过布置，不要告诉女孩们这是什么地方，也不要告诉她们见的什么人；只须告诉她们一条：她们对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但这大会堂的雄伟气魄，坐在这里的那位光秃顶的“大人物”形象，哪里还能保住什么密呢？她们一眼就认出：这个“大人物”是林彪！

女孩们不再感到羞涩，但都被惊得呆痴了。她们紧张得手足无措，只能听从叶群摆布。叶群叫她们唱支歌，她们单人竟然唱不出声来，只好集体唱，但三个人的声音加在一起也难以叫人听得见。叶群叫她们跳跳舞，她们更是手难起、脚难抬，只好算了。没有办法，叶群叫她们每人念段“语录”，这还算好，念都念了，但一个个的声音却是颤抖的。林彪只愿坐在那里看，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由于这场戏的彻底失败，以后几天内又由叶群导演了几次。自然，后几次要好一些了。

5. 有进无退

还在女孩们在大会堂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三番五次的选择时，叶群又派我到南方去执行一项“新的使命”。我已经深深陷了进去，看来很难自拔了。

“这三个女孩，首长、我和老虎看后都很满意。”叶群对我说。“如果不是她们年纪太小，就算有希望了。这几个虽然不成，但证明你还是会看人的。首长和我都下了决心，一定给老虎找个真正高标准的。现在各方面的力量都已动员

起来。除了原来已经派出的人之外，又从空军调了一些人，就连那些夫人们也都亲自上场了。但我心里明白，出动的人虽然不少，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奔跑的人并不一定多；谁知道他们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呢！你看人很有水平，又受到首长和我的信任，就去作一次最后的努力吧。你这次出去，也用不着到处跑，只到武汉、广州看看就行。江腾蛟两口子都正在武汉，项辉芳正在广州。他们都很卖力气，但看人的水平不行。他们看到一个就相中一个，动不动就向我们推荐，要送他们选的人到北京来看看。但都送到北京看，不但代价太高，风险太大，我们的精力也受不了。你这次出去，帮我们过过筛子，你认为值得看的，再向我们推荐。这个新使命就托给你了。你既然帮了我们，就一帮到底吧！……”

叶群的一番美言抚慰，并不能打动我的心。但是我没再表示什么，也不能再表示什么了。林彪亲自上阵了，叶群的主意拿定了，许多大将的夫人都出场了，我还算什么呢！

在即将动身前往南方的那一阵子，我的心情十分难受。我焦虑的不是能否完成这项“新的使命”，而是那三个尚在北京的女孩的下场。由于我的过错，她们才被人弄来作戏。明知她们不够“对象”条件，还是硬要拿她们开心作乐。她们以后怎么办呢？……

6. 江腾蛟“戴罪立功”

我乘民航班机前往武汉。免费的飞机票是郭连凯根据叶群的布置从空军弄到的。这用不着毛家湾掏腰包，因此尽管机票很贵，也是无需吝啬的。

到了武汉之后，江腾蛟派他的随员老唐前来机场接我。

我是来干什么的，大概早由郭连凯在电话上告诉江腾蛟了。因此我一下飞机，没用多作介绍，老唐就把我领到武汉军区招待所，去见住在那里的江腾蛟。

江腾蛟其人，我在前面略略作过介绍。他原是上海空四军政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是个红军，但并不具备一般红军战士那种纯朴、正直的本色。在上海，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流勾勾搭搭，在所谓“一月风暴”中投过机。在南京，他以“左派”自居，煽动一些人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并且整倒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因此成了南京一带“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在南京混不下去，躲到北京躲风。许世友向党中央、毛主席报送一批有关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控诉江腾蛟罪行的专题材料。我给林彪讲文件时，当讲到江腾蛟品质恶劣和生活作风时，林彪脱口说了句：“坏蛋！”但就是这样一个“坏蛋”，一直是毛家湾的上客。不仅叶群与他往来频繁，而且林彪本人还曾接见过他。他在毛家湾的卵翼和庇护之下，暗中当上了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据说他来武汉是搞“调查研究”的，但实际上是在专门为林家选“美女”而奔跑。毛家湾希望他“戴罪立功”，他是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的。

我到了招待所，江腾蛟笑脸迎在门外。这是我第一次在近处见到他，也是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打交道。瘦瘦的身材，不高的个子，细长的脸上挂着一副金边眼镜，上身穿件白的确凉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淡咖啡色凡立丁裤子，脚上穿着皮凉鞋，手中拿把芭蕉扇。这哪里象个饱经战火锻炼的将军？分明是个逍遥自在的风流隐士。和这样的人来往，我这还是初次。回避他是不可能的，留点心就是了。

“张秘书来，我们热烈欢迎！”江腾蛟一开始就想给我

留下一个热情、可亲的印象。

“叶群主任派我来，只是转一转、看一看。我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应付着说。

“这是张秘书的谦虚！”江腾蛟借机拿出吹拍逢迎的本事：“强将手下无弱兵。林办秘书和我直接打交道的虽然不多，但我知道，他们个个呱呱叫！”

我心里想，江腾蛟真不愧是叶群的中意之徒，他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张秘书是代表叶主任来的，责任很重。”江腾蛟又说：“给老虎选对象的事，这个关系重大，值得大作文章。听说有的人对这个事不大积极，这是对林副主席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是党章上肯定的主席接班人，对他三心二意还了得？”他说着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显出很激动的样子：“我江腾蛟就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林副主席很了解我，叶主任也很了解我。我江腾蛟的骨头就是被人砸成灰，我这颗忠于林副主席和叶主任的心也绝不改变！……”

“坐下来说吧！”坐在一旁的江腾蛟的妻子说。“张秘书是带着任务来的，你快把我们这的情况向他说说吧！”

“好，我现在就说。”江腾蛟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我来到武汉后，每天都在活动。见过一些长得不错的女孩子，但她们还不配嫁给老虎。我倒是见到一个绝色，不敢说在全国数一数二，反正在我见过的女性中，她是最出色的。”江腾蛟又转过脸去问他妻子：“在咱们住过的上海，还真没有见过长得这样美的少女，是不是？”

“没见过。”他妻子附和着说。

“张秘书！”江腾蛟又兴奋地站了起来：“光听我说不

行。明天找个机会，我带你去看看！”

“张秘书坐飞机很疲劳，得让他先休息一下。”江腾蛟的妻子说。

“对，对，休息一下以后再说。”江腾蛟又走到我的跟前：“你就住在我这里，我们没事聊聊。这里条件好，一切都方便！”

“我不能住在这，”我说，“最好能把我的安排到一个普通招待所去。”

“张秘书，这就见外了！”江腾蛟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这里住处多的是，为什么到别的地方去挤？老唐！你去安排，就让张秘书住这儿了！”

我拦住了老唐。我强调说，我不愿住这样高级招待所，并不是“见外”，而是为了“保密”。武汉军区的首长认识我，而叶群有过交代，我这次来武汉是不愿叫军区的首长知道的。他们一旦听说有个林办秘书住到了军区招待所，那不就麻烦了吗？我这样一讲，江腾蛟只好把我放开了。他的心情是“遗憾”，我的心情是高兴。住在远离江腾蛟的武汉空军普通招待所里，我这一夜过得很安静。

第二天，我看过了江腾蛟狂热推崇的那位“绝色”之后，我又一次使他大大扫兴。我告诉他，这个“绝色”早有人向毛家湾推荐过。叶群看过照片，嫌她的辫子太细，长得象个“小糖人”，因此放弃了。江腾蛟听后泄气地说：“这个人要不行，可就难找了。……”

7.悠悠广州行

武汉不是久留之地，我决定立即赶赴广州。这都是我从

未到的地方，借机会欣赏一下南方城市风光，也对我够有吸引力了。

不巧，在武汉机场的候机室里，我碰上了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曾思玉是我在东北工作时的老首长，我调林办工作前，就是他找我谈话的。按说，我既然到了武汉，就应当主动去拜会他，但叶群为我此行套上了枷锁，使我过其门而难入。现在偶然相遇，我可怎么对他说呢？

“张秘书，你怎么到了这里？”曾司令看到我之后，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去广州，路经这里。”我不能再多说了。

“在这住几天吧？”

“这次不行了。”我指了指停在机坪上的班机：“再过20多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我接着问他：“怎么这样巧，曾司令也到这里？是送客人吗？”

“不，我刚从天上下来。”曾司令笑着说。“老天爷又给我们添了点麻烦。最近雨量过大，有几十万亩土地被水淹了；我和省革委会的同志们一起坐飞机看看灾情。受了点损失，但没什么要紧，我们有办法。……”

相比之下，我感觉脸上有点发热。人们都在忙于真正的工作，我在忙什么呢？

飞机抵达广州，夜幕早已降临了。前来机场接我的，是广州空军政委的王秘书。他把我送到空军招待所，安排了住处，什么也没问就离开了。据他说，他是接到吴法宪办公室的电话，说北京有个张同志到广州来，叫他们协助安排住宿。至于这个张同志是什么人，来广州干什么，大概北京没有明讲，他也不便多问。而我来广州，主要是找项辉芳，并不干

空军什么事。因此他只要安排我住下，就算“完成任务”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住广州军区的招待所呢？这也是为了“保密”。还在武汉的时候，郭连凯就打电话告诉我：到了广州后，无论对军区、对空军，都不能暴露我这个林办秘书的身份，只有项辉芳是个唯一的例外。

我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在军区杨副司令的家里找到了项辉芳。她约我立即前去，以便“当面谈谈”。

项辉芳是黄永胜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50来岁。她平时待人和蔼，不象叶群那样盛气凌人，因此很讨下边工作人员的好感。但在广州，她是相当有“权威”的，我到广州后才知道，她奉叶群之命前来选“美女”，除从北京带来几个人之外，还动员了广州军区的大批力量。她在湖南撒开了一个“找人”班子，在广州撒开了一个“找人”班子，还在汕头撒开了一个“找人”班子；其中，仅汕头一地，她几乎把广州军区文工团歌舞队的人都投入了“找人”游戏。她坐镇广州，指挥着三路人马，真可谓兴师动众，有声有势。

“项主任，你派了这么多人出去，影响好吗？”我在杨副司令家里，小声问项辉芳。

“没关系！”项辉芳毫不在乎地说。“他们只以为是给新成立的总政歌舞团选学员，并不了解真正在选什么。”

接着，项辉芳向我介绍了她在广州“找人”的情况。她说，尽管下了这样大的力量，至今还是一无所获。她强调说，这是由于广州地区“水土”不好，以致不论男女，普遍有几个特点：个子小，皮肤黑，颧骨高，眼框深陷。为了证明她的论点有根据，她特地让我参加一次广州军区文化部举行的小型录选歌舞学员测试。她说：“这就是广州的水平，连我都没看上，怎么好向叶主任推荐呢？”

我看出了项辉芳的不安，她是怕在叶群面前交不了账。我于是说：“广州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如果叶主任不信，我可以作证！”

我在广州的“任务”，就这样“胜利完成”了。在准备动身返回北京的前夕，郭连凯又在电话上传来了叶群的新的命令：“主任叫你继续向东走：去福建！”

天哪，这算没完了！！

8.直言不讳的韩司令

对我继续“东行”，郭连凯在电话上交代得十分明确、具体：第一，搭配一个“新班子”。除我之外，另配两员“女将”。一个是宋×，郭连凯的妻子。她受叶群指派，目前正在湖南“找人”，近日到广州与我会合。另一个是胡××，空军某医院的医生，空军报社苏××的妻子。苏××过去曾负责过培养和帮助林豆豆进行采访工作，常与毛家湾打交道；叶群在心急眼红之后，把他的妻子也拉了来。胡××即将从北京动身，也在广州与我会合。第二，我们这个“新班子”会齐后，即动身前往福建。为了“争取时间”，让项辉芳从广州军区借辆汽车送我们到福建境内。第三，我们去福建的事，已由毛家湾向韩先楚司令正式打了招呼，请他大力协助。因此我们一到福建境内，就可以打着韩司令的旗号；如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韩司令的夫人联系。

我们到福建后，一打韩司令的旗号果然十分灵验，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但这时已到了入伏季节，所有的中学都放了暑假，上哪里去“找人”呢？最初到漳州，又经厦门、莆田，最后到了福州，仍然都是无所作为；事实上真的

成了“游山玩水”了。

在福州，韩司令的夫人刘志出面接待我们。这以前，不论在武汉，还是在广州，我这个办秘书都只能作“黑人”，成天躲躲闪闪，生怕当地军区知道我的身份。现在到了福州军区，再用不着掩掩盖盖了。但这有“好处”，也有叫人为难处。好处是活动“自由”了些，难处是应讲排场的事落到头上了。

“韩司令请你们到家里坐一坐。”刘志来电话说。“过一会儿，我就派车去接你们。”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韩司令在这个时候叫我们到他家里去，很可能是请我们吃饭。”我放下电话后，对宋×、胡××说。

“请客吃饭，这象什么？”宋×气哼哼地说：“我们不能去！”

“不去不好，不去就失礼了。”我说。“韩司令热情接待我们，是表示对首长的尊重。他的目的不一定就是请我们吃饭，很可能要谈点什么。”

“那样，你一个人去就行了。”宋×还是坚持不想去。

正说着，刘志进来了，经她一番劝说，说是不去的宋×还是跟我们一道去了。

“是请我们吃饭吗？”我在车上问刘志。

“是吃点便饭，”刘志说，“你们来一趟福建很不容易。”

“除了韩司令之外，还有别人吗？”

“还有皮副司令，再没别人了。”

“皮副司令知道我们来找人的事吗？”

“知道。韩司令对他讲过，除他之外，就再没别的人知道

了。”刘志又补上一句：“皮副司令的嘴很严，他不会传出去。”

到了韩司令家里，果然就是吃顿“便饭”。入席后，韩司令、皮副司令和刘志坐在一边，我们三个坐一边。我们不会喝酒，因此只顾吃饭。韩司令在北京见我的时候，曾经一口气和我谈了五个多小时的福建情况；可是这次相见，他的言谈很少。坐在他身旁的皮副司令，除了说几句有关福建风土人情的打趣话外，对我们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我向来吃饭快速，我们那两位“女将”又饭量很轻，因此这顿“便饭”很快就用完了。

饭后，皮副司令说他事忙，告辞而去。刘志陪两位女客人闲聊，韩司令则单独约我到了他的会客室里。

“你们出来多少天了？”韩司令问我。

“半个多月了。”我说。

“这样搞，我很有意见。”韩司令直率地说。“给子女选对象，托一托人就够了，为什么要派专人出来跑这种事呢？林办秘书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这要传出去，影响多坏啊！？”

“韩司令这样说，完全出于好意，我完全理解。”我说。“但是您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作秘书的是左右不了局面的。”

“你们可以提出建议嘛！”韩司令用一种令人敬畏的目光看了看我。

“提过多次，但不起任何作用。”

“一次不起作用，就多提几次。”韩司令站起来说：

“你们提了不起作用，我来提。你回去对叶群说，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不能这样干了！这关系到主席接班人的声誉呀！关系到党的传统呀！你对叶群讲，这是我的看

法，听不听在她！”

我对韩司令的一身正气十分敬佩。但他的这些话，不会被叶群抓辫子吗？叶群不会上纲说他这是对林彪的“感情、态度问题”吗？叶群如果向他反扑过来，他受得了吗？我于是对韩司令说：“您的这些意见，我可以如实向叶主任转报。但这好吗？”

“没什么不好！”韩司令的态度斩钉截铁：“你回去后就如实汇报！”

从韩司令的家中出来，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想过，在参与林家选“对象”活动的人们中，象韩司令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相形之下，江腾蛟之流的奴颜媚骨是多么可鄙！

我们在福建实在混不下去，只好返回北京。以后我得到机会，如实向叶群转报了韩司令那些披露肝胆的直谏之言。叶群听后把脸一扭：“韩先楚这个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9. 瞧瞧这一家

当我离开北京后的这段时间内，毛家湾演出了一场令人笑掉大牙的丑剧：为着给林立果选“美女”的事，林彪和叶群打起来了，林动了手，叶群下了跪！……

据知情人事后透露，经过是这样的：

邱会作的妻子胡敏从南京选来的那个舞蹈演员，虽然已被叶群淘汰，但是事情并未完结。这个演员，姿色出众，可身材偏高。当时，叶群问林立果：“老虎，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林立果歪了歪脑袋说：“马马虎虎。”叶群说：“这是终身大事，马虎不得。叫妈妈看，这个人虽很出色，但并不



“你这个坏婆娘！……你给我滚！……我们俩离婚！”

理想，比她强的美女多的是。妈妈决心找个叫你心满意足的，把这个人放弃了吧？”林立果说：“我对她也没多少兴趣。”

叶群和林立果讲的都不是真心话。叶群不喜欢那位女演员，这是真的；她讲的理由，却是假的。她嫌她“又馋又懒”，其实她自己呢？她说她的眼睛象个“钩子”。她怕“钩”谁呢？内勤的老王透露说，叶群不喜欢女演员的唯一理由是嫌她的个子太高。她身高1.69米，而叶群身高只有1.54米；一旦成了亲，婆媳站在一起，就把婆婆的形象显没了。叶群是个自以为高人一头的人，怎能容许儿媳比自己高出一头呢？另一方面，林立果说对女演员“没兴趣”，这是顺着叶群说的假话，也是从豆豆那里学到的一点对付叶群的手段。他初次见到她，就被她那媚人的姿色迷住了。他以为叶群对他也会象豆豆那样：你热我就冷，你冷我就热。他甚至认为叶群是喜欢这个女演员的，只是不肯那样明说而已。叶群爱说假话，谁能断定她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呢？不料，叶群这次讲“不喜欢”，却完全是真的。叶群一吐口说不行，胡敏就照叶群的眼色把女演员退回南京了。

对女演员着了迷的林立果，大失所望。他决心背着叶群，把她弄到手。他直接去搬林彪这个大后台，在林彪点头后，他背着叶群又把她弄到了北京。等叶群发现了林立果正在暗中与女演员私会，同时得知这一切都得到林彪的幕后支持时，压不住发火了。她气哼哼地找林立果算帐，林立果故意把这把火引向了林彪，将叶群的军：“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是我爸爸叫我这么干的！你有勇气，为什么不找他去！”叶群架不住林立果的这种激将法，立刻就去找林彪大闹：“我辛辛苦苦地为老虎找对象，你倒成了摘桃派了！”林彪没听明白，问：“你说什么？”叶群又拉开了嗓子大喊：“你是摘——桃——

派！”林彪也大叫，“我摘什么桃？”叶群火上加油：“你摘的是女人！漂亮女人！”这几句话，把个林彪激怒了。他指着叶群：“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叶群还是不甘示弱：“你是摘桃派！”林彪顿时气得脸发青，手发抖，挥起胳膊就给了叶群一耳光子。叶群哪里受得起这个，她又哭又叫又闹；林彪是一不作二不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嘴上还不住地骂着：“你这个坏婆娘！……你给我滚！……我和你离婚！……”叶群最后见林彪真的翻了脸，不得不下跪求饶了……

正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推门走了进来。这是倒霉的秘书张益民。他本来是想向叶群报个电话，不幸遇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想回避一下已不可能了。没有办法，只好壮着胆子上前劝架：拉开了林彪，扶起了叶群。……

林彪此时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他高声对张益民说：“张益民！你可以作证！叶群说我是摘桃派！我要她滚开！我要和她离婚！……”

风波逐渐平息下来之后，张益民偷偷地向其他几个秘书讲述了他给林彪、叶群拉架的经过。大家对他说：“这个架拉坏了！叶群必然对你从此产生了戒心。”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叶群时常在张益民的背后念叨：“张益民何必插手我们家中的事呢？在他面前，我这个主任还怎么当呢？”以前叶群由于张益民认识中组部的郭玉峰，就对他有点戒备，现在又加上这笔新帐，就更对他不放心了。

对这件事最开心的是林立果。他在工作人员面前不加掩饰地流露说：“主任挨批，是我故意挑的。他妈的，我帮她的忙，她倒打起我的主意了。老子也不是好惹的！”

第十二章 “九大”后的林彪和叶群

有人说过，人在得势之后，常常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更加成熟了，要么是更加膨胀了。

让人们看看，毛家湾的主人的选择是什么呢？

1. 林彪“重上井冈山”

我从福州回到北京后的当天深夜，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了。郭连凯通知我：“立即到养蜂夹道，接受一项新的任务！”

什么叫“新的任务”？莫非又是想派我去“找人”吗？

“不再派你找人了。”郭连凯见了我之后说。据他说，林彪、叶群早已去北戴河避暑，留他在养蜂夹道值班。“刚才接到主任从北戴河打来电话，首长准备再过几天要去井冈山。主任知道你已经回到北京，决定派你陪同空军的胡萍立即前去打一下前站。”接着，他向我具体交代了“打前站”的各项细节。他曾多次为林彪、叶群外出跑前跑后，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而我是初出茅庐，对他讲的许多“特殊要求”，听来都是陌生的。

前往井冈山为林、叶“打前站”的共有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胡萍和罗孝礼。胡萍是负责专机事务的副参谋长，

对飞行业务很熟；他本人就是飞行员出身。罗孝礼是林办的警卫参谋，他作为李文普的助手，主要是负责林彪、叶群的日常生活事务。郭连凯给我们三个人作了分工：胡萍主要是负责航线的安全、专机和机场的准备。罗孝礼主要是负责林、叶到井冈山后的生活安排。我则主要是负责林、叶在途中的住宿、车辆、安全等一些行政事务。这个任务听来简单，但对于林彪这样一个人物出行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三个人坐林彪准备乘坐的专机先到了江西的漳树机场。这架“子爵号”专机是执行试飞航线的任务的，把我们送到漳树后，它就飞返山海关机场了。然后，我们又乘坐一架两个引擎的“安—24型”飞机到了吉安机场。这架小飞机也是执行试航任务的，因为林彪、叶群从山海关乘坐大型飞机抵漳树后，需要换乘一架小型飞机到吉安，——吉安机场太小，容不下大型飞机起落。这时，胡萍遇到了难题，我也遇到了难题。他的难题是，吉安机场是个不常用的土机场，一片荒芜的草坪代作飞机起降的跑道，不用说大飞机落不下，就是小飞机也不安全。但胡萍毕竟是个内行，这个难题并没有难倒他；他组织灵巧轻便的“安—24”作了几次试着陆，结果都成功了。

我的难题是住宿安排。林彪住任何地方，都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房间必须宽敞，大致得有中型会议室那样的面积才行；二是室内气温必须适宜，最好在摄氏零度上21度左右。这两项要求，前者较为好办，难弄的是后者。8月下旬的江西，酷暑难耐，平均气温都在三十二三度以上。室内的温度，一般也很难降到30度以下。这怎么办？我确实难住了。幸亏胡萍助了一臂之力，他布置当地的空军单位设法弄来一些冰块，把房内的所有门窗堵严，实行人工降温。这

样搞的结果，还是根本不可能把室温降到林彪所要求的那条温度线上，但总是好多了。

江西的程世清听说林彪即将前来，亲自去井冈山坐镇指挥着食宿准备工作，同时从省革委会抽调了五台小汽车（其中包括两台当地最好的“吉姆”车）到漳树机场待命。但江西的车再好，林彪、叶群也觉得不配他们乘坐。一架大型“安一12”运输机降落在漳树机场，两辆进口的高级轿车从机尾的舱口开了下来：这是林彪、叶群在北京用的专车。

“北戴河让我通知你，李文普他们快要动身了。”郭连凯从北京来电话说。他的意思是，林彪、叶群快要动身了。“明天晚上过夜的地点在吉安机场，你们那里要加紧准备。因为在漳树机场只是换一下飞机，所以你要把停在漳树待命的汽车赶快调到吉安的机场去！”

这个电话，我是在漳树机场接到的。次日黎明，我把林、叶的两辆专车以及江西增援的几辆汽车，除留一辆作机动外，全部调往吉安。我也随之赶到吉安。漳树到吉安有300多华里，汽车行驶需要三个多小时。时间紧迫些，但还是得及的。

在吉安为林彪降了温的那间大房子，几天来一边在抓紧进行内部布置，一边在坚持用冰块继续降温。在现场工作的人们又热又累，一个个汗流浹背。现在听说“首长”真的要在这里过夜，他们不辞辛苦，又更加紧张地忙活起来了。

午饭前后，郭连凯的紧急电话又追到了吉安：“首长、主任就要起身了，预计晚上六点左右到达漳树。今晚过夜的地点就在漳树！”

“不是说在吉安过夜吗？”我着急地问。

“又改了！……”

这真是折腾死人了！“上边一张嘴，下边跑断腿”，一点不假。已经准备基本就绪的吉安机场临时住处突然决定不用了，几十人几天流下的汗水等于白费；已经停止了准备工作的漳树机场，不得不重新“突击”准备。别的好说，在室内实行大幅度紧急人工降温，谈何容易！同时，已经把汽车都调吉安去了，还能重新开回来吗？如果漳树没有汽车，林彪、叶群从飞机上下来到他们的住处怎么走呢？

一架试航的“伊尔—14”飞机正准备从吉安起飞，我随它赶回漳树，亏得有这么一个现代化交通工具在旁，不然这300多里的路程也要误事的。

回到漳树，我又请胡萍协助安排机场的住宿准备。时间已经没有那么多，只好按“低标准”办事了，至于汽车，幸亏我控制了一台机动车，如果再从机场凑上一点破旧车辆，也可以凑合过去。条件低劣一些，就请将就一点吧！不然我有什么办法呢！

晚上六时许，林彪、叶群、吴法宪、林立果、林立衡以及林办随行工作人员、警卫部队人员共达百余人，分乘两架“子爵号”专机和一架“伊尔—18”飞机先后抵达漳树机场。

他们下飞机后，除林彪、叶群乘坐一台我留用的机动车之外，其余人员都只能坐一些破旧的车辆。车辆一个跟着一个向着临时住处开动，大多数是40年代的美式吉普、中卡以及大型“解放”……。这当然不很壮观，但照一般条件相比还是可以的。

到了临时住地，我正紧张地为所有人员安排住宿，叶群把我叫了去。她第一句问的就是：“这有没有拔尖的人材？”我苦笑着摇摇头心想：此人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实在讨厌！

这一夜，我一直忙忙碌碌，没得合眼。次日一早，又得先乘飞机去吉安，为林、叶抵吉安后去井冈山作准备。

林彪、叶群从吉安下飞机后，转乘汽车去井冈山，这情形就大大不同了。林彪和叶群乘坐的都是美国制造的“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林彪的一台是大型的，叶群的稍小一些。这两辆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就很显眼，现在出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公路上，更是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有十几辆大小汽车（警卫部队坐的是几辆大型卡车）组成的车队，所经之处都是惊动很大的。但叶群嫌这还不够。车队一出吉安机场，她的车就“失踪”了。这把随行的警卫人员吓了一跳。一查才知道，她是坐着高级轿车到吉安市内转了一圈；她没有别的用意，只不过显显威风罢了！

到了井冈山，又是一片忙乱。本来，程世清安排山上最好的两幢小楼让林彪和叶群住，但他们得知后不同意，偏偏要住在三层楼的井冈山宾馆里。宾馆内的一切客人只得搬出。罗孝礼在一、二楼分别为林彪、叶群布置了住处。但林彪到山上一看，又不同意这种安排：他非要和叶群来个大掉过儿，他住在二楼的会议室而让叶群搬到一楼。然而给他布置一套住室殊非易事，又是沙非地毯，又是堵窗挂帘，又是调节温度，又要空气新鲜。不得已，罗孝礼又得重头来。反正得让林彪、叶群满意了才算数，不然要这么多工作人员干什么呢！

叶群一住下，就让我用电话找在北京的郭连凯。恰巧老郭不在。等后来叶群接通了郭连凯的电话后，我在走廊上只听她在大声吼叫：“你（郭连凯）干什么去了？……什么？你到车站接张益民去了？好啊！你可以当外交部长了！我问你，你是干什么吃的？是张益民重要，还是首长重要？……”

首长坐汽车、坐飞机出远门，你担心会出什么事吗？他要在途中出了一点危险怎么办？你不在电话机旁值班，不老实实在地坚守岗位，而去接一个小小的张益民，他是你的什么人？……你对首长是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你嘿嘿笑，就想叫我原谅你吗？……你知道首长到井冈山来的重要意义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白吃饭！……算了，今后规定一条：只要首长在外出途中，你在值班电话机旁不准离开一步！……”

2. 毛家湾内的“黑人”

从林彪这次上井冈山以后，毛家湾多了一个“黑人”。黑人者，非指其肤色黑，而是叶群对林彪也“保密”也。这个人从1969年夏，直到1970年11月我调离林办，一直围着叶群转。叶群对秘书们说，“这人是帮我学诗练字的，你们不要吓唬他，也不要让首长知道。”秘书们听叶群这么说，大家宁愿睁一眼闭一眼，谁还敢去多嘴？

此人名叫朱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江西漳树机场的林彪、叶群临时住地。那天晚上，叶群对我说：“我从北戴河带来一个人，叫朱彦。我打算派他去南昌，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古玩和字画。从漳树到南昌，需要有一辆车送他一下。这件事你帮助办办。我已告诉朱彦，过一会他去找你。”

在林彪、叶群都休息了之后，果然有一个人前来找我。他有40岁上下，脸形消瘦，中等身材，仪表不俗。

“我叫朱彦。”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准备明天到南昌去，需要借一辆汽车。叶主任叫我来找张秘书。”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他，林彪、叶群离开

漳树后，他们用的那辆机动车已经完成任务，反正它需要返回南昌去。由于我还忙着别的事，没再和他谈什么，就让他休息去了。

到井冈山的最初几天，叶群拿来几页16开白纸，上边写有叶群字体的十几句“五言”顺口溜。“一望山多树……”。叶群说这是林彪在北戴河作的“五言诗”，让我和李春生提提意见。我们都推说不懂诗，提不出意见。叶群遂让我和李春生先后打电话找南昌的朱彦，她与朱在电话上长谈多时。所谈内容，大概与“诗”有关吧？

1969年冬，林彪、叶群到苏州之后不久，叶群把朱彦也调来了。他住的房间，就在秘书值班室的对面，但我们之间很少来往。叶群与朱彦都是单线联系，差不多每天都叫朱彦去，一谈就是个把小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工作人员一无所知。叶群后来透露说：“调朱彦来，主要是帮我练练毛笔字，也还抽空给我讲讲立体诗词。”但不久我就发现，朱彦不仅给叶群讲诗，而且还帮助叶群作诗。一次，我偶尔为着一件什么事去找朱彦，见他的办公桌子上散放着一堆诗词草稿。我问他：“你还在作诗玩哪？”他说：“都是主任叫写的。”

到了1970年上半年，事情就更加明白了。叶群对朱彦帮她作诗的事不再掩掩盖盖。但她只是讲：“诗是我的习作，叫朱彦帮助改改而已。”叶群的这些“习作”，多达几十篇，除了五言、七言律诗或绝句之外，还有各种牌名的旧体词。这些东西，有的由郭连凯根据叶群的布置托人裱成了“字画”，有的被刻在珍贵的古砚上，作者的署名自然都是叶群，这些将陈列在历史档案馆的“文物”，似乎表明叶群不仅是颇具文采的女“诗人”，而且是一名柳公权书法

的得意弟子。但我要以目睹的事实作证：那些诗词的内容固为叶群所授，但作为诗词，真正的版权应属朱彦；至于书法，我曾亲眼见过是朱彦先写成，然后由叶群采取仿影手段照葫芦描下来的。在这点上，叶群也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

1970年5月，我首次在郭连凯让人裱糊的字画中看到了林彪的那个《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不过我看到的不是中央在“9·13事件”后公布的那个“叶群学字”，而是邱会作的手体。邱会作也是标明“敬录育容”的诗，以表示他对林彪的忠诚。但林彪是何时谄成的这首《西江月》，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9·13事件”后，朱彦向中央专案组交代说，1969年夏林彪在井冈山亲自接见过他，与他谈了半个多小时，授意他帮助作成了那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朱彦甚至说，召他上山，在山上的食宿，都是由林办张云生秘书安排的，这纯粹是胡扯。我和随林、叶上过井冈山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朱彦从没有上过井冈山，也根本没有他与林彪在山上“面谈半小时”之类的事。我甚至可以证明，在我任林办秘书期间，朱彦从未与林彪见过面（林彪召见任何人，是避不开工作人员的），林彪也并不知道毛家湾内藏着这么位“诗人”，至于他为什么这样胡扯，那只有问他自己了。

叶群与这位朱彦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令人生疑。也是1970年5月的一天，郭连凯去向叶群报一件他感到棘手的事，非要拉着我作陪。我们进了叶群的“学习室”（秘书进入这里，从来没有敲门的习惯），见叶群正与朱彦谈着什么。叶群坐在桌子正面，朱彦坐在桌子一端，这似乎很正常。叶群见有两个秘书进来，令朱彦退去。朱彦刚走，叶

群就脸色一变，指着我和郭连凯的鼻子大骂：“你们搞什么鬼？我和朱彦是谈学习，用不着你们来监视！我叶群是个正派人，君子坦荡荡，我没有任何辫子抓在你们手里！”我和老郭都被弄得莫明其妙。还是老郭善于应付这种场面：不管叶群怎样发作，他总是笑呵呵地作出令叶群满意的解释，这才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又过了些日子，叶群突然试探地对我说：“这些天，朱彦见了我总是战兢兢的，他的脸色也苍白，象是害怕什么似的。你们是不是吓唬他了？”

“他是来帮助主任学习的，我们怎敢吓唬他！”我故意装傻。

直到庐山事发以后，这个“黑人”才逐渐从毛家湾消失了。

3. 叶群的障眼法和“学习热”

1970年初夏的一天，叶群对我们几个秘书说：“我们林

叶群用了这个障眼法之后，毛家湾的工作人员不但一个没减，反而迅速增加了将近一倍。增加的新人中，都是被调来“帮助工作”的。这时候，毛家湾人来人往，倒是空前热闹起来了。

在毛家湾东院南侧的二层楼里，住着几位“帮助工作”的，其中：有两位是专门帮助叶群翻看哲学书籍的，有一位是专门帮助叶群翻看外国文学作品的，有一位是专门帮助叶群作诗练字的，有两位是专给林彪、叶群找书、画表的，有两位是专给林、叶裱糊各种条幅的。

在东院北侧的三层楼下，也住着几位“帮助工作”的，其中：有一位是帮助林彪、叶群翻看中国历史书的，有一位是帮助叶群翻看世界历史书的，有两位是专门帮助林彪、叶群研究国际问题的，还有一位是林、叶指名请来的“笔杆子”。

此外，在空军大院的一座小楼上，还隐居着几位为毛家湾“帮忙”的学者，大半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这样算起来，为林彪、叶群“帮助工作”的各种专家、学者共达16人之多。它本身，就构成了膨胀后的毛家湾的一大特色。

这些“帮忙”的学者，大都由叶群直接调用，很少有机会与林彪见面。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叶群恨不得一夜之间吞为己有。但获得知识的过程却不象滥用权力窃取物资财富那样容易，靠下命令不行，靠变相的“打砸抢”也不行。于是，叶群就独创了一套“捷径”，加紧为自己“适应新形势”作准备。

叶群突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为此特调来两位专搞哲学工作的人材放到毛家湾。但由于叶群的学习方法过于独特，以致这两位哲学通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叶群的办法

是：让他们把马、恩、列、主、要哲学著作内容都列成表，如同自然科学家表述各种公式那样。在这张表上，要标明这部著作的发表时间、历史背景、主要命题、基本论点、论战对象、推论根据、典型例证、最后结论以及现实意义等等。让一位哲学教员在课堂上讲授这些内容，虽然颇费精力，但还不算太难的事。然而如果叫他把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类哲学巨著的内容压缩在一张表格上，就并非轻易了，既然非此不可，学者们是有办法把它列成表的，但教员理解了的东西，学员不一定能理解。叶群能否理解得了呢？教员不敢过问，叶群自己也不在乎这些，反正列了表就能算是成绩了。表格草稿画成后，要先交叶群过目。不学无术的叶群，哪里能看出当与不当？她只好求教于专给林彪看书的林办秘书李春生。李春生提了几条意见给叶群，叶群再以她自己的名义提给学者。这样就在一个哲学教员面前，叶群也象是一个有哲学造诣的“内行”了。草稿经过修改后，叶群再让郭连凯转交那几个帮助抄东西的“书法专家”，用极其工整的墨笔字抄在几大张道林纸合并而成的大表上。这张大表抄成后，叶群只需对它再瞥上几眼，就卷收在一个专用的大画缸里。到了1970年夏天，这缸中的“哲学大表”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但自命好学的叶群究竟从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只有鬼才知道！

叶群“学习”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很特别。一开始，叶群还顾不上“学”什么文学作品，而是想方设法在北京内大搞文学书籍的变相“打砸抢”。她用吴法宪作引线，用“军委办事组”作招牌，听到哪个军队院校停办或解散了，就把那个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全部文学名著收缴到毛家湾来。到1970年夏天，原来没有一部文学存书的毛家湾，竟然有了藏书半

富的图书馆了。这以后，叶群就找人帮助她翻看中外文学名著，重点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把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写作背景、故事梗概、主要人物、各方评价先写成介绍提纲，并在书中的精彩处划上杠杠，个别地方还加上眉批、旁注，然后一起交给叶群。这些翻看的书目，有些是学者推荐的，也有的是叶群自己点的。但从内容上看，叶群最感兴趣的东西莫过于那些描写宫廷政变或玩弄阴谋诡计之类的情节；她所注重的，并非名著中的正面人物，而是那些擅长在幕后摇鹅毛扇、能够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的人物。所以，如果说叶群在中外文学名著中并没有吸收到任何真正的营养，那么可以说，她从这些作品所揭露、所鞭笞的反面形象中学到的各种歪门邪道，倒还是不少的。

叶群“学”历史，方式则又是一样。帮助她翻看外国史书的是位曾在苏联留过学、得过副博士学位的学者，在与叶群见面时不带一丝笑容，这一下就给叶群种下了坏印象。过后不几天，叶群怀有一种不耐烦的心情故意问他：“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尼古拉一世是什么关系？”学者信口回答：“尼古拉二世大概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吧！”叶群抓住这一点，就在林办工作人员中卖弄说：“什么副博士，他还不如我！尼古拉二世是尼古拉一世的孙子，他却说成是儿子，还配教我呢！”结果，这位学者在毛家湾没“帮”几天，就被叶群赶走了。被赶走的学者并非不幸，留下来的才是不幸。留下给叶群翻看中外历史书的有三、四个人，大部分都被关在空军大院的一栋小楼里，除了给毛家湾圈点一些古书、从古籍中抄录一些诗词以及打一些零杂之外，长时间无所事事，苦闷已极，但又都难以脱身。

4. 林彪、叶群和历史学家

待遇稍优一些的学者是杨老。他是中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前担任过某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对这位年至花甲、学识渊博的老学者，林彪、叶群都不敢轻视，并且期待他对自己有所效劳。因此在毛家湾“帮助工作”的学者中，杨老是唯一受到林彪接见的人。这样一来，这位熟知历史但对现实颇为无知的老人更加劲头十足了。

一天，林彪让我传话给杨老。林彪说：“让杨老来帮助我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是怎样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儒家大概是主张一切团结，反对斗争；法家大概是主张一切斗争，不要团结；道家大概是以为团结、斗争都无所谓，但他们是怎样具体论述的？叫杨老将原话摘成卡片，而不要整理成文章。摘卡片，也主要是摘各家代表人物的原话，例如儒家的孔、孟，法家的韩非，道家的老子等等。……”

“限他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我问。

“不急，”林彪说，“当然也要抓得紧一些。”

林彪布置秘书干什么事，都必须报叶群知道。叶群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我不管。他爱叫杨××搞什么就搞什么，反正老杨头帮我干的事不能耽误。”这时，杨老根据叶群的布置，正在准备给她讲中国古代史，还要帮叶群搞点诗词格律的研究。说是“讲”历史，实际上大半天都是在写提纲；提纲必须是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叶群，一份由讲者参用。而每隔两三天，叶群就要给杨老布置一项“新内容”。年已60的杨教授，一面要紧张地应付叶群，一面又要为林彪摘

录儒、法、道三家的语录卡片，这受得了吗？

“如果实在受不了，我可以替你反映一下。”我同情地对杨老说。

“不要紧。”杨老说。“别看我的年纪大，可是身上没什么病，精力也还行。更重要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心情舒畅！”

杨老也真不愧是老当益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不但应付自如地“完成”了叶群给的“任务”，而且星夜为林彪摘录了上千条儒、法、道三家代表人物的语录。但是，他的天真并没有换得林彪与叶群的宠爱。他费力摘录的那堆古人语录卡片，林彪大概是由于当时另有他想，对它连一眼也没看，就让秘书压在了抽屉里。他为讨好叶群，把自己早年的一部著述《三皇考》奉送给叶群，却险些闯下一场祸。

“杨××在送给我的讲课提要的同时还附上一本书，这是什么意思？”叶群板着脸问我。

“杨××说，这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的一部研究性著作，送给主任参考。”

叶群拿起那本书，还没及翻看，就“啊！？——”地大叫一声，把书推开，仰在了沙发上。她故作地用手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大喊：“这书上有……？赶快给我拿走！拿走！”

“这又是怎么啦？”我心中想，莫非是叶群看到了什么危险品？

我走近前去，看了看杨老送的这本书，并没发现任何值得惊疑之处。我于是告诉叶群：“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没有什么可疑之物。”我这样讲，是以为叶群可能怀疑这书中藏有爆炸物。这类敌特常干的害人勾当，在内部参考资料中

常见记载，因此被叶群那一声惊叫，我也引起了过敏反应，但现在摆放到叶群面前的是本书，不必那样大惊小怪。

“封面！封面！”叶群还在叫。

“封面上也没什么！”我说：“这上只有个书名，上边还有个图案，画着一条蜷缩着的蛇。……”

“你怎么还挂在嘴上？”叶群又一次大喊大叫，“我不敢看，也不愿听，快给我拿走！杨××这个老头子就是讨人嫌，谁稀罕他的什么著作！告诉郭连凯，叫他早点走吧！”

我刚要离开叶群的办公室，又被她叫了回来。她这时似已恢复了平静，对我说：“我刚才骂杨××的话，不要传到他的耳朵里。知识分子好多心，不要伤害了他的面子。但从今以后，把他写的提纲交给我就行，我不愿再听他讲什么了。”

5. “大秀才”的遭遇

在毛家湾另一边正在上演学者戏的同时，这一边的“拉条子”戏又要开场了。

林彪、叶群还在苏州的时候，于运深就在电话上向我和李春生传达过林彪、叶群关于准备“拉条子”的指示。不过，这些“指示”常常自相矛盾或者朝令夕改，弄得你无所适从。

3月底，于运深给我来电话说：首长讲，四届人大快要召开了，现在就得为他讲话“拉条子”作点准备。第一步，先搞点调查研究，题目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调查的人不要多，除你和李春生之外，再加上个老虎就行了。“具体怎么搞，首长叫你们研究一下。……”

我和李春生作了简单商量，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搞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研究还算问题不大，但若把林立果也拉进来，那就麻烦了。于是我们就找林立果商量，建议他与我们“各干各的”，林立果巴不得他不和我们拴在一起，因为他在空军党办可以任意摆布别人，而在毛家湾，他却只能听我们这类“叔叔”摆布，而他对此是不甘愿的。

我和李春生刚在北京跑了两个工厂，对于“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复杂的课题还根本没“调查”出个眉目，叶群又从苏州给我们压来了新的“调查研究”任务。

“你们这几天在北京干什么呢？”叶群在电话问我。

“根据首长的指示，正在搞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研究。”

“搞什么抓革命、促生产？！”叶群大声训斥说。“那不是当务之急！首长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中心还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旗帜是首长最先打起来的，不能把它丢了。你们搞调查研究，别的先不要管，就集中搞活学活用！”叶群还问我：“你通吗？”

“通！”我说。讲“活学活用”，谁还敢说“不通”呢？

我嘴上“通”了，但实际上并未动。一方面是由于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北京前后，我和李春生都有些别的事缠身，还顾不上再去搞“调查研究”；林、叶也可能暂时把这个事搁在一边了。另一方面，当时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比较紧张，主席曾当面敦促林彪注意看“两大本”（内部参考），林彪回毛家湾后就把这个事布置给了我，而关于“调查研究”的事说不定已被他忘在脑后了。

5月下旬，毛家湾就请来“帮助工作”的“大秀才”，即姜思毅。叶群说，为林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光靠

毛家湾的几个“小秀才”是完不成任务的，必须调个“大秀才”来。“大秀才”还有谁呢？真正才华横溢的许多“大秀才”都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倒了，少许幸存的几位，毛家湾对他们还信不着。“文化大革命”以前，军内也有几个“大秀才”曾被毛家湾器重过，但运动开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被毛家湾踢开了，就是被钓鱼台拨弄的是非缠身了。剩下的还有谁呢？叶群想来想去，想到了姜思毅。姜思毅曾在谭政任主任的总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长，是全军有名的年轻有为的“笔杆子”。但林彪上台后仅仅一年，谭政被整个打倒，姜思毅也受到了株连。从那以后，姜思毅虽还在总政工作，但被降职留用，一连10年一蹶不振。1970年4月，姜思毅被分配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当副主任，等于是又从军职降到了正师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林彪、叶群整得半垮了的人，又被毛家湾重新起用了。

姜思毅来到了毛家湾后，叶群把“拉条子”的事完全寄希望于他，但这与林彪的意图并不合拍。一次我给林彪讲完文件后，林彪问：“姜思毅在干什么呢？”我答：“主任让我们找些资料给他看，……。”林彪自言自语地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个人讲话，向来不习惯吃别人写成的稿子。……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去，例如放到报社……。”

林彪说的关于姜思毅的这些话，我后来传给了叶群。叶群一听就发了牢骚：“首长这个人，是又想吃，又怕烫！姜思毅是把快刀，他不用，我还想用呢！”叶群想了想，又说：“把姜思毅放到首长眼皮底下，他想起来就问，怎么办？为了不让首长看到姜思毅，可以把老姜派到外地去搞搞

调查研究；如果首长再问，你们就说他下去了。”

根据叶群的一声令下，姜思毅果然出外搞“调查研究”去了。调查的中心题目仍然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姜思毅于6月初赴广州军区某师，6月底返回北京。之后，他又主动要求去东北部队有名的“红九连”，想在调查“活学活用”上下下功夫。但他刚去东北一个礼拜左右，就被叶群的一个火急命令召回来了。

“给老姜一个十分紧急的任务。”叶群说。“中央正在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首长准备在会上讲讲话。讲什么，首长还没想好，你们可以帮助想想。要赶快帮助首长突击一个讲话用的稿子，限三天内交卷。这个任务，以老姜为主，张云生、李春生协助。”

这一下，可把姜思毅难住了，难的是：他从来没给林彪写过讲话稿，而现在不知一点讲话人的意图，又限期交卷，这怎么写呢？但这是副统帅的重托，就是再困难，也得硬着头皮写。姜思毅为了避免他一稿失败而误事，再三恳求我与他“平行作业”：他负责起草的讲话稿，我负责另准备个讲话用的“条子”。但由于叶群并没有给予我这样的任务，加之这时我又患了急性感冒，那副担子只好由姜思毅一人承担下来，三天后，姜思毅如期交卷，写成5000余字，但在这时，林彪又决定不讲话了。对于姜思毅赶出的那个稿子，叶群一眼也没看。如果不是郭连凯后来在林办支部学习会上把这个稿子借去“参考”，那么老姜三天的紧张劳动成果就都白废了。

6. 门庭若市的毛家湾

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院庭内常

常停放着一排客人乘坐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意邀请来的；因为每一场只能容纳一二十人，加上主人有意让某些“观众”之间不致“碰面”，所以只好分场映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分量”是不轻的。一遇有这样的事情，作为毛家湾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的郭连凯，就几乎忙得不可开交了。

“老张，我实在忙不开，你得出来支援支援了。”一天晚上，郭连凯主动向我求助说。

“支援什么？”我问。

“主任又要请客人来毛家湾看电影，”郭连凯说。“你没看我正在忙着打电话吗？”

“请人来看电影，已经好几次了，怎么还要请？”

“请过多次，但客人并不重复。”郭连凯解释说。“有几次是请老夫子和黄、吴、李、邱的；有几次是专请各家的夫人和子女的；有一次是专请老虎在空军党办的战友的；还有一次是专请为找人出过力的；……。我倒好，现在快成了毛家湾的俱乐部的主任了！”郭连凯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来你已经对这一套很熟练了。”我取笑说。“不但成了毛家湾的俱乐部主任，而且快当上主任的外交部长了！”

“我是瞎忙一阵。”郭连凯并不以为我是在拿他开心，甚至可能以为我是在恭维他，因而喜形于色地自谦起来：

“主任经常骂我的脑袋象浆糊；只要不再挨骂，我也就满足

了。……说真的，今天晚上的活动非同寻常，我已经请老李、小罗帮助张罗一下，但还是嫌人手不够，只好来打你的主意了。”

“你想让我干什么呢？”

“别的事也不用你帮忙；你就在晚上七点钟以前往西院的门口一站，见有客人前来，热情地把他们让到西院客厅里去就行了。”

“那你去干什么呢？”

“我的事多着咧！”郭连凯说。“你在西院接待的是黄、吴、李、邱的夫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我却要在东院迎接黄、吴、李、邱本人。主任说，老夫子今天还可能来呢。他们一到，首长先要见见，然后由主任陪着去西院看电影。这个戏的大头在东院，西院只管等着看电影就行了。”

这场戏由叶群导演，郭连凯出面张罗，毛家湾的不少工作人员参加助阵，终于顺利开场了。我接完了客人，又回办公室看文件，但过了两个小时以后，郭连凯又从西院给我来了电话：

“老张，又得请你去支援一下。”

“又支援什么？”

“电影散场后，主任准备请客人都到三座门招待所去吃顿忆苦饭。一切都由我安排好了，只想请你提前去看看；等我们前去时，能有人在门口招呼一下就行了。”

“现在都快半夜了，还吃什么忆苦饭呢？”我问郭连凯。

“别问了，我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郭连凯有些不耐烦地催促说：“你快坐车到三座门去吧！”

我到了三座门招待所之后，见那里已经按郭连凯的布置准备停当。又过了一刻多钟，一辆辆小轿车从门外开进来了。为首的是叶群和陈伯达，然后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再然后是黄夫人项辉芳、吴夫人陈绥炘、李夫人董其彩、邱夫人胡敏以及他们的子女，最后是这些“贵客”的随员和工作人员。郭连凯跑前跑后，把这些人一一安排入座。在左侧第一席上入座的是叶群、陈伯达和黄、吴、李、邱等几员大将；第二席上是各大将的夫人；以下各席是各大将的子女和工作人员。虽然不算盛大，但也坐了六七桌。

我仔细地注意着这餐“忆苦饭”是个什么样儿。只见在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盘比大拇指稍大一点的精制包米面窝窝头，看样子算是“粗粮细作”，但吃起来却香甜可口。除此之外，主食中还有大米绿豆粥，新作的油酥烧饼；副食以凉拌盘为主，每桌都摆了八大盘，品种新鲜多样，味道也能证明它是出自高厨之手。我暗中想：所谓“忆苦饭”，原来是这样！如果这还算“苦”，我就不再想追求什么“甜”了！

在吃“忆苦饭”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致辞、讲话，只有叶群所在的那张桌子上一直谈笑风生，其他各席都哑然沉寂。第一席的“大人物”先动了筷，别席上的人们也都不客气了。席尽人散，每张桌子上的那盘“黄金塔”象征也大都不见了。

散席后，客人陆续离去，只有郭连凯和我留在最后。客人中最后离开的是黄永胜，他在登上汽车前拉了拉郭连凯的手，然后说，“今天晚上用的钱，记在我帐上！……”

第十三章 庐山会议前后

人们都听说，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闹成一场“大笑话”。又有文件说，那是林彪搞的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究竟真相如何呢？

我当时没上庐山，因此失去了作证的资格。但我在会前会后耳闻目睹的一些事实，可能有助于人们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

1. 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

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有一次，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江青要找他听电话。吴法宪住地的秘书告诉江青，吴不在家。江青问吴法宪干什么去了，秘书说不知道。其实这个秘书明知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但由于吴有过“保密”禁令，因此只能对江青讲假话。电话放下后，这个秘书急忙再挂电话告诉吴法宪，吴法宪又急忙从毛家湾坐汽车到三座门。从另一个地方给江青回了电话……

这类事情多起来以后，我们在旁看热闹的工作人员们也就慢慢明白了，“九大”前夕开始形成的两个新的营垒，已经阵线分明了。这营垒的一边是：以毛家湾为中心，以“副统帅”加“亲密战友”为招牌，以军内某些单位为基本阵地。另一边是：以钓鱼台为中心，以“最高夫人”加“文艺革命旗手”为招牌，以上海及某些“左派”掌权的地区为基地。两个营垒都靠“文化大革命”起家，都拥有一批卖身投靠的积极追随者，也都对某些不明真相和天真幼稚的人们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他们都标榜自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定左派”：一个把“最最最”和“三忠于”、“四无限”、

“四个伟大”喊得震天价响；另一位则把“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创举”叫得神乎其神。前者具有“笔杆子”实力，后者几乎把持着所有的舆论阵地。在当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一段，他们的利害关系一致，因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如今，他们在“权力再分配”上一再发生利害冲突，由此而导致的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互相倾轧就越来越白热化了。

但是，不管毛家湾或钓鱼台哪一方，他们只能在毛主席默许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家私；超过了这个限度，他们就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在这一点上，钓鱼台从过去两三年的几次挫折中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因此学得乖一些了；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帆风顺的毛家湾，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种情况，正在使毛家湾本来就已膨胀了的头脑更加膨胀。他们看到自己一再得手，也看到钓鱼台节节失利，因此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得寸进尺。加上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他们认为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了。

这就是我从我所能接触到的环境中，所看到的1970年夏

季的政治形势。

主席一提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林彪就向主席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于运深在给我看这两份电话记录时说：“这些记录都是主任事后口述，让我追记的，谁知是真是假！”据于运深讲，他判断这个点子很可能出自叶群。

传出叶群与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召开四届人大问题的一份纪要，其中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7月的一天，叶群从外边开会回来，趾高气扬地在秘书们面前流露说，“政治局开会讨论四届人大问题，争论可激烈啦！我站在多数一边，那个少数孤立了。”叶群并没有说明他们激烈“争论”的是什么，也没明确点出那个“多数”是谁以及被“孤立”的“少数”是谁。但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判断出，所争论的问题中心是如何对

待毛主席的问题；参与争论的“多数”是以林彪为后台的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少数”是以江青为后台的康、张、姚等人。至于这个“多数”、“少数”是否能够成为政治局内真正的多数和少数，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毛主席就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叶群在听取调查研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汇报会上插话说。这个汇报会，是叶群授意安排的。名义上，是让毛家湾的工作人员们听一听基层“活学活用”的先进经验；实际上，叶群是想利用这个场合搞点借题发挥，用她在外边利用所谓“多数”鼓吹的那套东西感染一下毛家湾内部。正在汇报的中间，叶群插进来说：“首长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经过斗争的；首长讲毛主席是天才，也是经过了斗争的。我坚决维护首长讲的毛主席是天才，还受到别人的打击！”讲到这里，叶群故意提高了嗓门，煞有介事地说：“罗瑞卿就打击过我！……但是我并不害怕！为了拥护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不怕任何打击，不怕挨骂、挨打，甚至不怕坐牢、杀头！……”她越说越显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掏出手帕揉了揉自己的眼角：“过去没怕过，现在也不怕，将来更不怕！……”

叶群的这一番表演是针对谁的呢？如果从以往的记录来看，她是针对着钓鱼台的。不然，她现在还怕“谁”呢？

2. 双方都在演戏

有意思的是，虽然毛家湾与钓鱼台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但这两家的头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得一如往常那样热乎。

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拿出几张大幅照片放在秘书办公桌子上。

“这张照片是十一楼亲自拍照的，”叶群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她答应给首长作个纪念，同时让我推荐给解放

“这照片背面的一些字迹怎么处理？”我又问叶群。这背面是江青用软铅笔写的几个大字，上首是“敬赠”，中间写着“林副主席玩存”，下首是“江青”的署名。我想弄明白：这是不是也要印在《解放军画报》上？

“这背面的字，是十一楼写给首长的，与画报无关。”叶群又补充交代说：“这张原件，《解放军画报》在制版以后要退给我。”

我把一些重要的细节都弄明白之后，到了解放军画报社，找到该社负责人高帆。因我事前曾以林办名义给他挂过电话，现在我又手持江青亲笔署名的照片，他自然不敢怠慢。在当时，一个画报社能够接受“副统帅”办公室推荐“旗手”的摄影作品，已感到莫大荣幸，也对发表此作的“任务”不敢吐个“不”字。然而我看得出，高帆面有难色，似乎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有困难吗？”我问高帆。“如果有实际困难，我可以回去反映一下。我理解你做具体工作的处境，可以帮助你们说句取得谅解的话。”我这是壮着胆子说大话；实际上，不用说我帮助他取得“谅解”，谁能帮我取得“谅解”呢？

“是有点实际问题，不过问题也不算大。”高帆说。“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摄影作品，我们发表时必须保证质量。但要保证质量，就需要有时间。8月这一期画报，我们在六月底就已制版付印；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实在来不及了。尤其是封面、封底的付印时间更早；如果换用封底，原来的制版和已经付印的全部封面、封底就将全部报废，造成十几万元的损失。所以我想，如果能改在9月号发表就好了；那时不用说封底，就是改在封面上也完全可以。当然，如果非要用在8月号上也无不可，只是出版时间要推后了。”

高帆讲的虽然很婉转，但意思十分清楚：最好推迟一个月以后再用。他讲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以为是无法拒绝的。江青摄的那张照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时间价值，为什么非要在8月号上发表不可呢？况且如果将原来印好的画报全部作废重印，这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得要多少人的汗水才能补偿啊？！

“你讲的这些实际情况很值得考虑。”我对高帆说。“我回去向叶群主任汇报，请她转向江青建议推迟一下发表时间。还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了。”高帆笑了笑说。“主要是时间问题。如果能推迟一下，那是最好了；实在不能推，我们再想办法。不过发表时最好不用‘高山’这个笔名，因为我们报社有个人也叫高山，犯过错误。”

回到毛家湾后，我立即向叶群作了汇报。我以为高帆所提的两个实际问题很有说服力。至少可以推动叶群再去找江青讲讲道理，使她尊重画报社的意见。叶群听后立即去钓鱼台，我以为这大概成为一种可能了。

但是很快就使我大感失望。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告诉我，江青同意把“高山”的笔名换成“大海”。至于发表时间，她根本没向江青讲，理由是怕江青“不高兴”。叶群说：“十一楼说要发在8月号上，就是8月号，不能再推。这要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叶群说着，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江青摄的彩色照片：一个电影放映员正在聚精会神地检修电影放映机器。叶群吩咐，这幅照片也要发表在8月号的解放军画报上，用在扉页，套色制版，笔名“峻岭”，同样要求“保证质量”。

就这样，江青拍摄的两张大幅彩色照片，同时出现在《解

放军画报》，1970年8月号上：一张用在封底，题为《提高警惕》，笔名“大海”；另一张用在扉页，题为《聚精会神》，笔名“峻岭”。刊物推迟半个多月才出版；但清样一经印出，叶群就要来五份，亲自去钓鱼台拱手送给了江青。

这是1970年7月的事情。整整一年之后，《解放军画报》又发表了一幅署名“峻岭”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的是秃着头的林彪正在翻看《毛泽东选集》。此时我已调离林办将近一年。这把我这个毛家湾内幕的知情人都弄糊涂了：林彪什么时候那样认真地捧读过《毛选》呢？从庐山会议到“9·13事件”前夕这段紧锣密鼓地短兵相接的时刻，江青何以付出这等代价以抬高林彪呢？难道林彪、叶群真的那样推崇江青吗？难道江青真的那样拥戴林彪吗？那都不一定。这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治交易，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在这场政治交易和表面文章的背后，双方都在精蓄力量，选择时机，准备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摊牌。

3. “摊牌”前夕的林立果

当时机尚未到来之前，谁也不肯轻易动手。不过，1970年夏天，毛家湾似乎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因而加紧了准备摊牌的步伐。一方面，他们正以毛家湾为阵地，以林彪为招牌，以叶群为前台老板，聚拢着陈伯达和黄、吴、李、邱这些大将进行战前演练；另一方面，他们则把赌注押在了毛家湾的“一条根”（叶群语）林立果身上。林立果虽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但林彪、叶群似乎都已下了决心：在这风雨欲来的关键时刻，该是到了“放虎出山”的时候了。

“老虎准备最近在空军内部讲用，事前想叫他在林办支部内先讲一讲，你们帮助他把把关。”叶群对郭连凯布置说。

叶群作这样布置的用意大概是：让林立果在林办内吹一吹，如果吹得好，可以在林办工作人员中提高她这个宝贝儿子的“威信”，免得大家总是把他当孩子看。更主要的是，叶群对林立果准备在空军“讲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心中很没有底，也想利用林办的工作人员控制一下林立果对外讲话的口径，免得他“放黄腔”，打乱毛家湾的整个步调。叶群是认真的，但郭连凯并没有认真对待，以为叶群只是说说而已。郭连凯也有些顾虑：林立果根本没把林办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谁敢给他“把关”呢？因此尽管叶群几次催促，郭连凯却一直按兵未动。

“我已讲过几次，让老虎先在毛家湾支部大会上讲用一下，老郭为什么老是不动呢？”叶群差一点没发火，她用严厉的口气质问郭连凯：“你这个支部书记，难道连个支部大会都召集不起来吗？”

“这怪我抓得不紧。”郭连凯笑呵呵地说，“开个支部大会并不难。”

“既然不难，为什么不早点开？”叶群仍然板着脸问。

“我是想，老虎不是咱们林办支部的……。”

“那怕什么？”叶群瞪了郭连凯一眼：“现在不管老虎属哪个支部，反正他是首长的儿子，你们都是他的叔叔，还怕他不服吗？你赶紧召集支部大会，让他讲用，我也亲自听听。不然，首长过两天就去北戴河，我就没时间了。”

“有主任亲自参加，我这个会就好召集了。”郭连凯说。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家湾召开了支部大会，实际上

所有工作人员全都到了会。那些“帮助工作”的学者、“专家”也被请来了，把个小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叶群坐在正位上，她的左侧是林立果，右侧是郭连凯。郭连凯主持开会，但开场白刚说上几句，就被叶群拦了过去：

“这个会议是我提议召开的。”叶群说。不知为什么，她今天又带有不悦之色。“老虎准备在空军作一次讲用，事先让他在毛家湾支部大会上先讲讲，请大家帮助提提意见。”

“我怎么讲呢？”林立果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看了看叶群。他的神气也显得不大高兴，也很不自然。

“你怎么准备的，就怎么讲吧！”叶群说。

林立果压根儿就不愿在什么林办支部大会上讲用，也不愿受叶群这份控制。但在叶群的压力面前，他只好勉强从命。他把打印好的一本八开纸讲用稿放在自己眼前的茶几上，头也不抬，结结巴巴地照念起来。

“你这样照稿念，我们可受不了。”叶群又插上来说。

“你最好参考着稿子，按照大意讲给我们听，这样也使我们觉得自然些。另外，你在正式讲用前，也应先给我们报个题目，使我们对轮廓有个印象。”

林立果不得已，只好重新讲起。他说他准备讲三个大问题：第一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第二是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是讲“中国要强盛”的问题。他平时说话时就有点口吃，这次讲话脱开稿，精神状态又不佳，讲起来就上句不搭下句了。听的人都觉得很滑稽，但谁也不敢笑。他这样讲确实吃力，只好又回到了稿子上，逐句逐字地照念下去。不用问，那个打印好的讲用稿也不是他一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周宇驰、刘培丰等人帮他准备的。他吭吭哧哧地念了三四十分钟，会场上的人们大都强打精神地

在听着，但也有个别坐在后侧的内勤人员打起瞌睡来了。

“我听得太累了！”叶群打断了林立果的“讲用”，站起来说：“休息一下。”

休息过程中，叶群把林立果、李春生和我叫到了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叶群就没好脸地对林立果说：“你这是讲的什么？我们都快要睡着了。全是一些干巴巴的议论，没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可听不进去。就这个水平，还能拿到空军去讲用吗？”

林立果立即解释说：“我准备的素材很多，具体事例也不少，但怕时间不够用，就都省略了！”

“你那些例子在哪儿呢？我们没听到一个！”

“都在这儿。”林立果翻了翻他那本八开纸讲用稿。

叶群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又说：“我们既然肯坐下听，就不怕用时间。你都省略了，谁知道？”

“如果不怕多用一些时间，我可以讲些例子。”

叶群没有再和林立果纠缠，又转向李春生和我说：“你们两个都是秀才，听老虎讲的那些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心想，在这种场合，最好一言不发。

“有些话讲过了头。”李春生忍不住提开了意见：“例如老虎讲，毛泽东思想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中的动力。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把思想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是唯心的；说成是‘动力中的动力’，离历史唯物主义就更远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正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只有物质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

李春生是专门读马列书的。他平时对一些现实问题如痴如呆，胆子也小，但在他熟悉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向来一言不

苟，寸步不让。不用说林立果，就是叶群在理论问题上胡扯几句，他也敢和她当面争辩。我很钦佩李春生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但对他的过于天真感到忧虑。不准看透，叶群也好，林立果也好，搬弄一些理论词句，不过是唱唱高调而已，何必当真？何况他们母子之间，目前正在明争暗斗，作为工作人员何必介入其中？果然，李春生提的这个问题，马上被叶群所利用，成为她制服林立果的一颗小炮弹。

“你看看，”叶群对林立果说，“你讲的就是有漏洞嘛！不帮你把把关，能行吗？”

林立果用冷眼瞪了一眼李春生，但没作声。

“张秘书有什么意见？”叶群又转而问我。

“我同意李春生讲的，没新的意见。”我搪塞着说。

休息过后，大家又听林立果继续“讲用”。虽说增加了一点事例，但效果好不了多少。除了空话、大话之外，就是一些华而不实、耸人听闻的“新语言”。他是学着林彪的腔调讲话，但其诱惑力与林彪的讲话相差甚远。看来林彪的那套花言巧语，他这个继承人还没“真正学到手”。

林立果又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家也跟着遭了一个小时的罪。最后，叶群也可能听烦了，坐累了，一句话也没吭，就这样冷冷散场了。人一散去，林立果就在背地里骂：“叶老胖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咱们走着瞧！”

4. 庐山传来的火药味

1970年7月26日，林彪、叶群在北戴河“避暑”，不久后又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随去的工作人员有于运深、李春生、李文普等人；我和郭连凯奉命留在北京值班。会前

的气氛似还平静，但会议一开始，就变得异常了。

8月23日晚，叶群从庐山来了电话。

“你是谁？”叶群大声问。

“张云生。”

“我告诉你，二中全会已经开会了！”叶群的语气十分趾高气扬。“首长已经在会上讲话了。他是即席讲话，根本没用你们拉的条子。他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坚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他讲话后，反映很强烈。他讲了，我也准备讲。在明天的小组会议上，我也打算开一炮。我不想讲别的，就集中讲讲毛主席的领袖地位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的领袖行吗？那肯定不行！苏联没有一个好的领袖，已经变修了。印度的客观条件很好，但没有一个好的领袖，至今革命也没成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也不会有今天。毛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谁反对这一条，谁就要倒霉！……”叶群在电话上喋喋不休地向我大发议论，使我觉得纳闷：她对我讲这些干什么呢？再听她讲下去，我就明白她的用意了。“赶快叫姜思毅帮助我写个发言稿子，我明天就准备用。文字不要长，但要有分量。今天晚上，让老姜连夜突击；明天早晨让郭连凯托中办送信的飞机给我带到庐山来。……我说的这些，你作记录了吗？”

“我没记。”我说。叶群平时对我们议论什么，一向不准我们作记录，以防我们留她的“文字根据”。这次她讲的话简直象连珠炮，我想记也跟不上。

“我是想叫你把我讲的意思传给老姜的。”叶群说：“既然没记，我讲多了也没用。姜思毅在吗？我直接和他讲讲算了！”

我请姜思毅去接了叶群的电话。自从林、叶离开北京后，姜思毅一直留在毛家湾。叶群给他的任务，是继续考虑并且准备给林彪在四届人大上讲话写个讲话稿。后来听说中央决定要先开二中全会，他又受命帮助“拉”一个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讲“活学活用”时用的“条子”。但据叶群这次电话透露，林彪讲话时根本没提“活学活用”，因此老姜的“条子”又白废了。这几天他没什么事干，但林、叶不发令，他又不肯离开毛家湾。就在他闲得难受的时候，叶群又找到头上了。他接过叶群的电话后，可能是由于受宠若惊，也可能是因为感到压力过重，从电话间出来时显得很不安。但这次是叶群明确交代让他一人承担“连夜突击”的任务，因此他不好再推了。

姜思毅不愧是个“大秀才”。他受领“任务”之后，仅仅经过半宿的“夜战”，就“突”出来一份几千字的发言稿。由于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推敲修改，第二天大清早，郭连凯就把它转送庐山去了。

姜思毅的文章也许并不太差，但很难对上叶群的口味。叶群大讲所谓“领袖”问题，是想搬石头打人，然而姜思毅并不了解叶群的心机（叶群当时也不会对他明讲），因此作起文章来难免文不对题。后来听说，姜思毅写的东西传到叶群手里之后，果然又成了废品。

我在北京值班，对当时庐山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从叶群那次杀气腾腾的电话中，已经能够嗅到一点火药味了。

5. 令人迷惑不解的沉寂

这以后，一连七、八天，庐山方面一直音讯全无。以

往，叶群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一两次长途电话，向郭连凯要这要那、问这问那；但在这七、八天中，叶群象是变成了哑巴，一次电话也不讲了。在庐山的其他林办工作人员，也象断了线的风筝，和毛家湾断绝了联系。这可把整天习惯于忙忙碌碌地应付叶群的郭连凯急坏了，他经常在办公室内念叨：“怎么搞的？庐山怎么一次电话也不来了呢？……出什么事了吗？”

我虽然不如郭连凯那样焦急，但也觉得情况有些反常，心中也想：莫非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疑惑的时候，庐山来电话了。打来电话的是李春生。他说：“首长和主任让查一个典故。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处在什么地方？请告诉杨××帮助查出个结果后，尽快打电话给我。”

我问李春生：“最近一个礼拜以来，主任没往回挂过一次电话，这是怎么回事？”

“在电话上不好讲。”李春生回避了。

我赶紧去找杨老。这位帮助工作的学者此时仍被留在毛家湾，但自从林彪、叶群上了庐山后，没人再给他新的任务，因此他也感到闲得发闷。对于李春生通知他查的这个典故，他毫不费力地作出了回答。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他同时也点了这句话的出处。我遂用电话告诉李春生，但心中又装了一个新的疑团：林彪和叶群让查这个典故的用意是什么呢？后来李春生告诉我，这句话是主席在会议上讲话时引用的。林彪、叶群都不懂，更不知其出处，因此才让人帮助查。

于运深来电话时，我也问过他。他比李春生稍进了一步，但也只是告诉我：“这是件好事。具体情况，你别在电

话上问，我也不好说，等回去后再讲吧！”

情况越来越玄妙了。既然是件“好事”，为什么还不让我问，于运深不愿在电话上讲，李春生又那样守口如瓶呢？

6. 林立果故意露“底”

稀罕的是，于运深、李春生暂时不愿向我透露的事，林立果却向我挑明了。9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林立果从庐山来了电话。

“你值班吗？”林立果问。

“我值班。”我回答。

“值班室里还有谁？”

“就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下半夜，别人都休息去了。”

“那好，请你打开电话保密机。”

这是林立果想向我透露一点什么重大消息的信号。我随即打开了电话保密机的开关。这台保密装置并不算先进，但在当时的国内还是比较好的。保密机打开了，林立果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林立果在保密电话上讲话不再有所顾忌。“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了损失。……”

“主任为什么煽风点火呢？”我问林立果。“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他曾给姜思毅来电话，让他给写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发言稿，还说要在小组会上放炮。是不是这个原因？”

“比这复杂的多，我也几句话讲不清楚。”林立果不愿作更进一步的透露。“不管怎样，主任今后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主任现在的情绪怎么样？”我又问：“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加暴躁了吧？”

“还暴躁个屁！”林立果幸灾乐祸地说。“她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首长跟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

“主任干这种事，首长事先知道吗？”

“首长不知道，但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作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

最后，林立果叮嘱我：“我对你讲这些，是表示对你的信任。你可以把这些情况转告在北京的豆豆，但不要告诉郭连凯。郭连凯这小子只知道跟着主任跑，我对他没好感！”

放下电话后，我为叶群遭到的失败感到庆幸，同时也对林立果对我的“信任”深感不安。在这样一个时刻，林立果向我透露这些情况是非同寻常的。叶群毕竟是林立果的生身母亲，林立果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为什么要拉我？想来想去，我发现自己已经陷进了危险的漩涡。林立果与叶群有矛盾，想插进林办，取叶群而代之。但我当时认为，尽管林立果有野心，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对于整个党和国家构成危险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当前的最大危险是已经爬上高位的江青、叶群之类。叶群虽在庐山伤了“元气”，但她绝不会甘心失败，今后还会东山再起，兴风作浪，因此万万不可放松警惕。至于林立果，对他也需加以戒备，但要整掉叶群，他也许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这些想法是多么天真而又危险，在以后的事变中暴露无遗，这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7. 从膨胀到“收缩”

膨胀多时的毛家湾，被庐山的一瓢冷水泼得“收缩”些了。但这“收缩”没过多久，又被一种新的更加肆无忌惮的膨胀所代替，只是膨胀的形式有了变换。

“主任从庐山来电话了！”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接过叶群电话的郭连凯，兴冲冲对我说：“可真是不易，盼了七八天，才盼来一点消息！”

“什么消息？”我问。

“主任叫赶快收缩。”郭连凯说。“主任讲，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就是号召认真学习。主任还叫我多学点哲学呢！为了抓好学习，主任说我们毛家湾必须收缩一下。”

“收缩什么呢？”

“主任讲，毛家湾只留一两个帮助看马列哲学著作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一律打发他们回原单位去。在外边帮助老虎、豆豆‘找人’的人，也叫他们一律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

“为什么要收缩呢？”我还是明知故问。

“主任没讲，咱也不好问。咱是管落实的，主任叫收缩，咱们就收缩。”

结果真是这样：没用几天时间，在毛家湾帮助工作的人，都被打发回去了。还在外边“找人”的人，也被郭连凯用电话一个个叫了回来。

9月中旬，林彪、叶群从庐山转经北戴河回到北京。50

多天没和我们见面的叶群，这时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前，她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现在，她逢人便笑，态度温和。尤其是对待林办的工作人员，她显得特别热情、亲切。

“张秘书，你好啊？”叶群一见我，就主动伸过手来。

“两个月不在家，你们可辛苦了！”

“首长和主任在外边开会，比我们更辛苦！”我应承着说。

“不，还是你们在家值班的秘书辛苦。”叶群谦让说。

“首长去开会，我只是作个助手。这个助手可不容易当啊！这次在庐山，首长原来准备作一次长篇大论的讲话，我就劝他少发些议论，而应请主席多讲一点。有的人在会上乱放炮，结果就出问题了。我一直比较谨慎，结果就比较主动。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号召加强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多读点马列原著，学点哲学。我以前就积极帮助首长抓学习，证明这样做就对了。不学习，多么危险哪！……”

叶群讲的“有的人”，大概是指陈伯达；但她不但想把自己的丑底极力遮住，而且还想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她讲谎话从来不脸红，这次也是这样。

“这次庐山会议很重要。”叶群后来又对我们几个秘书说。“今后关于庐山会议的中央传阅文件还会有一些。于运深、李春生跟首长上过庐山，对情况比较熟。我看今后有关庐山会议的文件，就由他们两个包下来给首长和我讲，你们没上过山的几位秘书就不要插手了。这不是对你们不信任，而是对你们的爱护。一旦泄了密，对你们也不好。”

叶群不让其他秘书接触有关庐山会议的文件，是怕在更多的工作人员面前现出自己的丑态，但她怎么也料想不到，她的儿子早已经使她原形毕露了。

庐山会议后的林彪更是沉默寡言。他除了听于运深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秘书讲任何其他文件了。他有时看点电影，但只让李文普从中外的战斗故事片中选些打近战的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他既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平时不是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看来，他是更加烦闷，也更加孤伶了。

林立果呢？自从庐山会议后，直到我调离林办以前，他就一直没回北京。据叶群说，林立果下山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当节日来临，工作人员总要事先提醒叶群把仍在外地的林立果、林立衡召回北京，以便一家人“团聚”。这次，1970年国庆节将至，郭连凯也做了同样的提醒。但叶群却说：“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可以不必惊动他。”

第十四章 脱离险境

1970年10月22日，林办支部书记郭连凯被调离，叶群把老郭留下的空缺派给了我。可是，我这个“代理”支部书记只干了三天，毛家湾就又一次乱了套，我也就幸运地“下台”了。

这个过程时间不长，但很微妙、复杂。这是我前半生面临的最严酷的选择，也是叶群自己哀叹的“第一次失败”。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白自己，我并不愿意多占篇幅去逢迎读者。但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毛家湾末日将临前的颓败景象，看到叶群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的荒淫无耻和走投无路，我觉得花些笔墨还是值得的。

1. 毛家湾“大查夜”

10月22日这天午夜，其他工作人员都已休息去了，秘书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于运深。小于是当天值班秘书，我则是作为支部书记专门等候叶群的。郭连凯在任时，叶群曾立下一个规矩：支部书记必须按照叶群的作息时间来作息。就是说，叶群睁开眼睛后，支部书记必须保证“随叫随到”；叶群休息后，支部书记才能去休息。这个规矩已经沿用几年，我也不能例外。因此尽管两天来由于处理郭连凯调离后留下的问题，我已被弄得疲惫不堪，在叶群出外活动尚未回来的时

候，还不得不“坚守”岗位。

“老张，已经过12点了，留下我一个人就够了。你回家休息去吧！”小于同情地对我说：“这两天，你的两只眼睛都熬红了！”

“主任还没回来，我走不得。”我说。“我第一天上任就破坏规矩，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没什么了不起，”小于说，“规矩又不是死的，也允许有个特殊情况。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怎么休息了，再熬下去，恐怕就倒下了。你尽管去休息，主任回来后有什么事，有我顶着。如果她查问，我就照实说明情况；她再不讲理，也不能不让人家睡觉！”

我以为小于说的确有道理，况且我也委实过于困倦了。走吧，何必那么认真呢！

我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去。但还没出楼门，又想回家休息不成。目前最痛快的是睡一个好觉，可是回家以后睡不了多久，就要被早起上学的孩子们吵醒。要休息好，莫不如到办公室楼上找个空房间，在那里睡到第二天中午也不会有人干扰的。

到了秘书办公室的楼上，我找了一间平时供临时帮助工作人员休息的房子，那里正好有一张床。我抓过一条被子，和着衣服躺下就进入梦乡了。

正在酣睡间，突然觉得有一束强烈的亮光刺照在我的两只眼睛上。我被惊醒后正在定神，就听有一个熟悉的口音在喊：

“哎呀！这下可把你找到了！”

这时室内的灯已经打开。照在我脸上的那件东西原来是个手电筒，站在我面前大声喊叫的是李根清，他身后还站

着叶群的一名内勤。

“根清，你这是干什么？”我惊问。

“我们找你找得好苦。”李根清平静下来后告诉我：“从一点到现在，已经足足找了你好两个小时。主任找你，快去吧！”

我下了楼，先到秘书值班室。于运深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一见我，就又惊又喜地问：“老先生，你到哪里休息去了？”

“就在这个楼上。”

“我的天，简直成了大笑话了！”于运深苦笑着说：“主任断定你一定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去了；我说绝不会，可是她不信。她在一点钟前后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叫你。我说你这两天很疲劳，已经休息去了，有什么事可以由我转告。主任说不行，必须立即派人把你找来。于是我派内勤去家属宿舍找你，你爱人说你没回家，没找来。主任怀疑你爱人怕影响你睡觉，故意不叫醒你。于是她第二次、第三次派人到你家。这时主任又怀疑你和你爱人故意捣乱，就又一次换派两个人到你家，叫你爱人开了门，进里边察看。结果还是没找到你。就这样，主任先后五次派人去找你不着，就更火了。她又怀疑你可能是偷偷离开毛家湾到外边‘打小报告’去了，但经过查问值班哨兵，都说没见到你出外去。她甚至怀疑你趁郭连凯不在家，是不是……？她越是找不到你，就越是着急、发火，下命令必须把你找到，否则她不去睡觉。万没想到，你就在楼上。你看这不是笑话吗？你去后，她可能会大发火，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不怕她这套，到楼上睡觉并不犯罪！”我镇定地说。我问于运深：“主任这样急着找我，她有什么事呢？”

“不知道。”

我到了叶群办公室，准备硬着头皮再尝尝她给“下马威”的滋味。但大大出于我的意外，叶群见我后，不但没发火，反而比平时更为和气、亲热。

“老张，你到哪里去了？”叶群轻声轻气地问我。

“我哪里也没去，就在办公室楼上休息。”我说。“听说主任派人找了我两个小时，有什么事吗？”

“是我派人找的。”叶群忙笑着说。“找不到你，我不放心；找到了，我就放心了。”她又装作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做支部工作，不要丢了老郭在时留下的传统。我并不要求更多，只是要求在我休息之前，你不要离开值班室，以便有事好找。这个，能办到吧？”

“可以办到。”我说。

“再有，”叶群又说：“我每天晚上休息以前都要游泳一次，还要内勤给我作作按摩。这些，都要叫他们事先做好准备，不要叫我等得着急。这个，也能办到吧？”

“可以。”我心怀反感，但嘴上只好这样说。以前我知道叶群有这种游泳、按摩的骄奢嗜好。在毛家湾西院，叶群不惜挥霍国家重金，修了一座几百平方米、冬夏保持30来度的高级室内游泳池；叶群每次游泳，除了有内勤服侍之外，还专门找了一个会游泳的“教员”。这种“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的派头，工作人员们都看不惯，但是谁敢露有一点不满呢？更令人气愤的是，帮助叶群过这种奢侈的生活，竟然成了林办党支部的一项“任务”，而我现在也将成为这不光彩“任务”的承担者，这如何是好呢？

“凡是支部的事，你赶快抓起来，以后抽空把情况对我讲讲。”叶群进一步交代说。

“天色已经不早，主任该休息了。”我劝了一句后，又问叶群：“主任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只是想看看你。”叶群又是一笑。这笑容是我从到毛家湾以来没见过的。她又温情脉脉地重复着说：“我只是想看看你，……”

我退出来，让等候在那里的内勤工作人员安排叶群休息。回到秘书值班室，我和于运深都在用心揣摩：叶群这又是在演什么戏呢？

2. 令人作呕的“聊天”

叶群的用心所在，第二天就清楚了。

尽管我已经连续几天没得好好休息，还得抓紧在叶群睡觉时的空隙，把郭连凯扔下的几件事抓一抓，至少得把有关情况掌握起来，以便应付叶群的随时发问。现在我接了郭连凯的班，感到力不胜任，但又难以推卸。我抓紧上午的时间，先把情况拢一下，又设想了一些难题，准备在叶群起床后向她报告。

叶群在中午起了床，一睁眼，先听于运深讲了几句文件，接着就叫我去。

我已注意到，庐山会议上遭到的挫败，使叶群的元气大大损伤。她极力掩盖她此时在政治上的恐慌和精神上的颓丧，在某些方面比过去多少有些收敛。在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上，也不象过去那样神气和霸道了。

“你真的看不出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吗？”叶群又一次探询我的口气。

“大的变化，确实看不出来。”我说。“不过，我和大家都感到，主任最近发火少了。”

“这就对了，说明你还是看出了问题。”叶群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你说我最近发火少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你猜猜！”

“我猜不到。”

“真猜不到，我可以告诉你。”叶群酸溜溜地说，“这个功劳应当归你！”

我对叶群作戏的本领深有领教，但受到她这样的抬举，不免使我一愣。我苦笑着说：“主任是拿我开心。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叶群说，“我不是拿你开心。你来这工作已经四年。我一直在注意观察，发现你有一条最难得的优点：从来不发火。我听说，你家里家外的麻烦事也不少，但你都从容不迫，不上火，不着急。我过去就缺少这条优点。哎，这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哪！可是我一旦注意了，也就受到你的影响。我也要象你那样，遇事沉住气，憋住火；实在不行，就用右手大拇指狠狠地掐紧左手腕，控制自己。你看，你看，我这左手腕都掐出印来了！”叶群说着，果真伸出了左手腕让我看。

叶群在一个工作人员面前这样“谦虚”，我过去还没见过。她这是明明白白地对我表示有“好感”。但她居的什么心呢？一下子还摸不透。

晚上，叶群再一次找我“闲聊”时，就比较露骨了。她不住地唉声叹气，甚至矫揉造作地说：“我这个可怜人，谁能同情呢！”

我故意问她：“主任处于这样高的地位，还不满足吗？”

“是啊，论地位，我可以感到满足了。”叶群又打了一个咳声。“论物质生活条件，我也可以知足了。但这是外表；实际上，我是非常苦恼的。交浅言深，君子所忌。对别的秘书，我是不愿讲这些的。讲了，他们也不理解。但你和他们不同。你的家庭生活也有不幸，也有听话的水平。我愿意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希望你理解我，同情我。你喜欢听吗？”

我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但还是强打精神说：“主任愿意说，我就愿意听。”

“我和首长虽然结婚几十年，我只能在政治上沾他一点光，”叶群不加掩饰地说，“但作为夫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他住他的房子，我住我的房子，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我每天晚上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感到空荡荡、冷森森的，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点乐趣。你可以想想，作为一个女性，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

我想不到叶群竟然说出这种下流话。她和我“聊”这些干什么呢？

正在踌躇间，于运深进来帮助我解了围。小于报告叶群，黄永胜有急事，想和她通个电话，由于叶群去接电话，我这才脱身出来。不久，叶群要车外出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3. 危困之际见知音

回到秘书办公室，我把叶群对我从“闲聊”到开始引诱的经过，向于运深学了一遍。当时张益民已被叶群支去外地，李文普还在住院，李春生又书生气十足，于运深是唯一能够帮我摆脱困境的可靠同志了。小于气愤地说，“主任安的不是好心，你要警惕，我早就怀疑这个东西不是正路货！”

“我已看出她居心不良。”

“她会不会动手动脚？”于运深担心地问。

“我估计暂时还不会，”我说，“她尽管很下流，但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面前，还要摆摆政治局委员和副统帅夫人的架子。因此目前看来她只是和我调情，用语言引诱我上圈套，还不会……”

“那好办，”于运深接过去说：“以后她再找你磨牙，我每过10分钟就找个借口去冲一冲。我只听说过男人能强奸妇女，女人还能强奸男的吗？”

4. 妖形毕露

第二天中午，叶群起床后又找我去“闲聊”。她这次又进了一步：口口声声说她过去对我的印象如何好，说在感情上早就是我的“俘虏”了，只是不好表露。她甚至说，她对我的这种“感情”，从两年前就已开始，但她一直在控制自己。她每次随林彪外出，总想把我带在身边，但为了“避嫌”，才安排我在毛家湾留守。她说她由于经受不起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曾经打主意把我调离毛家湾。但又说，我如真

的被调开了，她也受不了。总之，她已经从内心深处“爱”上自己的秘书了。她的表白尽管娓娓动听、情意感人，但这些话出自一个挂着“政治局委员”招牌、身为主席接班人正房夫人、年过半百的叶群之口，实在叫人听不下去。

我坐不住了，想要离开。但叶群妖意正浓，一再摆手不准我动。于运深几次进来“冲击”，但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一个外来电话“救了驾”。小于进来报告说，项辉芳有要紧事找叶群，叶群这才说：“张秘书，你替我接过来吧！”叶群支退了小于，自己佯装“上厕所”，让我接好电话等着。不一会儿，叶群回来了。她接过电话机，立即用左手将电话压上，右手叉着腰，用一种非常淫贱、非常叫人恶心的神情瞪了我一眼。这一目光扫来，我几乎被吓得魂飞天外。我心里蹦蹦直跳，挪腿就向外跑，嘴上只好说：“主任早些休息吧！”刚刚跑出门，叶群又叫我；我被迫转回头，又说一句：“主任该休息了！”叶群又用那种象是要吃人的眼睛盯了我一下。我慌忙关上门，跑回办公室去了。

见了于运深，我又把叶群刚才的淫相和丑态描述一遍。他同我一样，虽然平素对叶群都十分反感，但对她这种拉人下水的卑贱手法，都大大出乎意外。他也惊呆了。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叶群又从卧室打来电话，叫我立即前去。躲是躲不开了，只能硬着头皮去。我打定主意：你拉我下水，我坚决不干，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到了叶群的卧室，见几个内勤都在门外等着。我一个人走了进去。室内的灯光还亮着，叶群已经在屏风后上床了。

“张秘书来了吗？”叶群在床上问。

“我来了。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

“无事不找你。请坐吧！”

我在室内靠边处的一张软椅上坐下。

“坐得离我近一点！”叶群以命令的口气说。

“坐得不远，”我说，“主任说什么，我听得清楚。”

“坐近一点！”叶群又一次命令说。

我只好把椅子向前挪了挪。

“再近一点！”

我又挪了挪。

“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不能再近了。”我已挪了几次，已经无处可挪，“再近，就过了屏风了。”

“过了屏风有什么关系？”

“过了屏风，就不好了。”

“有什么不好？”叶群追问：“张秘书，你是不是害怕？”

“我不害怕。”这是真话。不知怎么，我这时的胆子倒壮了。我怕什么？我不信叶群能吃了我。

“那是为什么呢？……你既然不害怕，为什么不理解我呢？这两天，我和你讲了那么多，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

“主任的意思是我刚刚接手支部工作，鼓励我好好做工作。……”

“我要求你的并不多，”叶群拦过我的话，“只是希望你对我说些安慰的语言，作些主动的表示。这还做不到吗？”

“该我做的事我一定努力做好，不该我做的事我不能做。”我说。

“什么事该你做？什么事不该你做？”叶群让我澄清我说过

的话。

“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我就该做，否则就不该做。”

“我让你做的事，对党和人民不利吗？”叶群厚着脸皮问。

“主任需要冷静。”我岔开话题。“只要主任冷静下来，会理解我这样做是对的。主任很忙，应当保重自己。……”

“你的话，比黑格尔的哲学还难懂。”叶群失望地说：“我现在承认，我在你面前第一次打了败仗。看来，我违背了‘交浅言深、君子所忌’这句格言。老张，你对不起我！……”叶群说到这，哽咽着哭起来了。

“主任不要过于激动，平静下来就好了。”我不得不圆场说：“主任该休息了！”

“老张，你太不理解我！”叶群还是带着哭声说：“你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同情我？为什么不理解我？为什么？……”

正在这时，内勤进来了。他们在门口等待料理叶群午休，可能等得不耐烦了。叶群一听有人进来，哭声立即收住。问：“谁来了？”

“内勤。”我说。我借机抽身起来，叫内勤赶快安排叶群休息。

5. 以毒攻毒

回到秘书办公室，我又抓紧和于运深一起商量对策。叶群一步逼紧一步，能磨得过去吗？此刻，我和于运深促膝深

谈，分析利弊，但在如何对付叶群的问题上，都一筹莫展了。

“我看只有和她磨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于运深最后说：“只要你稳住自己，不上她的钩，就不怕。她如果先动手动脚，你就坚决不动；她毕竟是个女的，能把你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主意？”我说：“等她动了手，你就不干，也晚了！她会恼羞成怒，反咬一口，那不更坏了吗？”

“那怎么办？”小于又没主意了！

“有了！”我急中生智：“这办法可能灵。”

“什么办法？”

“以毒攻毒！”

……

下午五点多，叶群又起床了。内勤传过话来，第一个就是叫我去。一次新的纠缠又来了！

“请坐下！”叶群用少有的客套先稳住我。她还在站着，我不敢贸然先坐，她摆了摆手，然后又露出一丝微笑，自己先坐下说：“请坐吧，别怕。怕什么？”

我坐下来，故意问：“主任叫我来，有事吗？”

“没什么要紧事，还是想找你聊聊。”叶群不象前几次那样贱皮贱脸，但神气还是温和的。“我还是那句话：我理解你，但你不理解我。你说你不怕，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讲讲，我听听。”叶群说着，又用一种挑逗的目光盯着我。

我低下了头，故不作声。

“为什么？”叶群又一次追问。

“不好讲。”我横下一条心：她再追，我就要“以毒攻

毒”了。

“有什么话不好讲？”叶群笑了：“你还对我保密吗？”

“不是保密。”我故弄玄虚地说，“我讲了后，怕主任生气。”

“我不会生气。”叶群根本想不出我可能讲些什么，也断定我不敢惹她生气。她又一次笑嘻嘻地给我吃定心丸：

“你尽管讲，我保证不生气。”

“主任真的不生气，我就讲了。”我和于运深商量过，如果叶群把我逼得无路可退，我就将“以毒攻毒”。叶群爱说假话，我就以假对假：你不择手段，我也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的一套话一下子都涌到了嘴边：“主任一再问我为什么，我确实想和主任说说。主任就是不问，我本来也想主动说说；但由于这两天主任过于激动，我就不敢说了。”

“你快说吧！”叶群急不可耐。

“我想告诉主任，我和××关系不太正常。”

“你说什么？”叶群大吃一惊。

“我和××关系不够正常。”我又低声重复了一句。

叶群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真心话”弄呆了。她紧盯着我，但说不出什么话来。她已向我保证“不生气”，看来这使她在极力克制自己，不然早就跳起来了。我见她正在被我要弄，心里觉得好笑。心想，这发炮弹打中了，看你还来纠缠吗？

“真的吗？”叶群镇定了一下，这才问了一句。

“真的。”

“我不信。”叶群摇摇头，又露出一丝笑意。“那好，我们就谈到这。我准备出去一下，要车！”

我打电话要来车，叶群坐上出去了。一切已风平浪静。回到办公室，不等小于问，我就兴奋地告诉他：“那张牌打出去了！”

“怎么样？”

“灵了！”我把刚才的经过学了一遍。

于运深也很高兴。我们都觉得，这出戏算是告一段落了。原来担心这样会带来一些后果，看来是一种过虑。

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6. 恼羞成怒，反咬一口

事实很快就作出证明：我和于运深都确实高兴得太早了。当天深夜，事情就急转直下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起了变化。

这天晚上又轮到我值班。等到下半夜一点，叶群才从外边回来。一听打铃声，我赶紧上去。叶群坐在她的“学习室”里，脸孔冷酷得吓人。我一坐下，她就咆哮起来：

“张云生！你真好大的胆子！你也没看看毛家湾是什么地方？你竟敢调戏我！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的事，难道以为我以前不知道吗？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以为我这两天讲的话真是对你有什么好感吗？你完全想错了！现在可以告诉你，我那是对你设的圈套，引诱你说出真话，你果然不打自招了。真是太不自量！……”

我听到叶群这阵声嘶力竭、厚颜无耻的嚎叫，简直把肺气炸了！特别是她说什么是我调戏她，又说什么我中了她的圈套，几乎使我也跳起来。想立刻扯着她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几耳光，痛快地骂她几句：“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但又

一想，她手中有权，我硬撞不得。她不过是恼羞成怒，反咬一口。但我并不怕她：她既然输了理，敢把我怎么样！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叶群霍地站了起来，左手叉着腰，用右手点着我的脑袋：“我只要说句话，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把你关进监狱！把你流放边疆！我把你攥在手里，愿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不为叶群的虚声恫吓所动。我心中有数：你敢！把我抓起来，看你怎样发落？把我关进监狱，看你怎样定罪？你把我流放边疆，看你怎样堵住我的嘴？要在庐山会议以前，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这些狠毒的手段都是拿得出来的。贺帅、罗总长、杨代总长、肖华主任，都一个个被你整垮了，张云生这个小人物还在话下吗？但是如今，你在政治上处境不利，毛家湾的阵脚也已经乱了。我料想，你即或想对我下毒手，也未必敢。如果破罐破摔，看看谁怕谁？！

我以冷静的沉默等待着叶群的下一步动作。但她骂了一阵，又恐吓了一通，全身的解数都已经使完了。她见我坐着一声不吭，自己也就坐下来，声调也逐渐放低了。

“张云生！你和那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群的口气仍然咄咄逼人：“你要老老实实在地交代！”

“主任，我和她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强作笑脸说。

“你们的关系不正常，这不是你自己讲的吗？”

“是我讲的，但那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你为什么还要讲？”

“我为什么那么讲，主任能够理解。”我还是笑着说：

“这两天，主任过于激动。我那样讲，是为了使主任平静下来。”

叶群被弄得哭笑不得，她也无辞应对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为了使我平静下来，你为什么不用别的办法呢？”

“我想过，别的办法都不灵，只有这类办法才行。”

“不对。”叶群摇摇头。显然在我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已经在叶群的内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她已看透了我绝不能接受她的引诱，但立即闹翻，对她也不一定可取。

“那好吧！”叶群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我但愿你也不敢。我要求你，从今天起，你的工作只限在办公室值班，不要再到西院去。”

7. 趁势“下台阶”

我立刻感到，趁着叶群想下台阶，我下台阶的机会也有了。我何不借机要求调离毛家湾？我早就想脱开这个险恶的环境，但这鬼地方是想来不易，想走也难的。在平时，不用说要求调动工作，就是叶群看谁有点不安心，就会抓“感情问题”、“态度问题”的辫子的，但在此时，由于我使叶群“第一次打了败仗”，叶在我面前已经把脸丢尽，我在叶群面前也只能是等着挨整了。但我并没把叶逼到绝境，她身上还有更重的政治创伤，料想她还不会立刻对我下毒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主任，你要求我今后再也不去西院，我保证做到。”我说。“但是，我有个要求，请主任考虑。我觉得我已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因此请求早些把我调开。我到林办工作已有四年，也该下基层去锻炼一下了。”

“那不行！”叶群立即表示拒绝。“你不能走。你走了，支部这摊子工作谁来接？再说，老郭刚走，又把你调开，这叫我对人怎么解释？”

“我想的是我继续留在这已不合适。”我坚持说。“至于支部工作，我只是个上任三天的新手，换个人并不难，何况我做老郭那样的工作也不称职。主任说对人不好解释，那也不成问题。人员调动是常事，新陈代谢嘛！”

“不行，”叶群还是不松口，并且用近于哀求的口气说：“老张，你再别想调走的事了。现在是我们正需要人的时候，你就帮帮忙吧！我这几天对你讲的那些话，是表示对你的信任；我宣布并不收回。（她刚才还说是给我设的圈套！）你帮我们维持一下这个乱摊子。你实在想走，至少也得再过半年以后，给我们时间物色新人，但现在，你不能走。你就安心继续工作吧！”

“我已经提出请求了，请主任和首长考虑吧！”

8. 转移视线

我从叶群那里出来，已经下半夜三点。不管怎样，我已经完全摆脱了叶群的纠缠，而且还出现了一点脱离毛家湾的希望。现在感到被动的是叶群，而不是我。由于有一点这种快慰，我回到值班室后不到一刻钟就安然地睡着了。

我正在睡梦中，被有人推门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见是李文普。他这些天一直在住医院，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老李，你什么时候从医院回来的？”我坐起来问。

“刚到家。”李文普说。他身体仍很虚弱，加上神色忧郁，讲话的声调低沉而无力。

“病好了吗？”我请他坐在我的床边。

“算好了吧！”他不自然地坐下来。

“现在才早晨六点钟，你为什么不等吃过早饭再回来？”

“心里着急。”老李还是闷闷不乐。

“你回来好，我正想和你唠唠。我想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一件事。……”接着，我把这两天叶群怎样企图拉我下水，于运深怎样帮我设法摆脱困境，叶群又怎样恼羞成怒，直到昨夜的倾盆大雨式的大发作和最后关于工作调动问题的“和平谈判”经过，向李文普如实说了一遍。

“你做得对。”李文普说。“主任实在太坏，不能听她摆弄。她不会有好下场！但你不应提出调动工作。老郭刚走，你又想走，留下我们几个怎么办？”

我说：“我的工作，还是以早些调开为有利。你们不想放我走，这是因为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能理解。但主任不想放我，她是别有用心。她现在表面装热乎，是想稳住我，实际上把我恨死了。她是暂时不得手，但不会饶过我。留我在这，一是便于控制，二是等待时机，寻找整我的借口。她整了我，还不牵连你们吗？我躲得远一些，她想整也难些了。所以我劝你们在调走我的问题上，不要在主任面前帮倒忙。你们帮我走得越早越好。”

“走了也好，”李文普想开了。“实际上我也想走，只是走不开。我的身体也不行了。”

“看样子，你的病还没全好，为什么这样急着出院呢？”

“主任叫我回来的。”李文普也对我讲了实话：昨天夜间，叶群大概在回毛家湾之前，不知在什么地方给正在住院的李文普去了电话。叶群煞有介事地说：“张云生出事了，你快回来吧！你回来后准备接替他的工作！”因为李文普不

明真相，所以初见我时才露出那种忧郁不乐的表情。

我们正说着，于运深上班来了。他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早晨天还没亮，主任就秘密派人把我和李春生找到了她的卧室。她说，张云生出事了，让我们把知道的、怀疑的事情都揭露出来，并且布置我们监视张云生，有什么情况随时向她报告。李春生大吃一惊，可是我觉得又气又笑。我想：揭什么？要揭，就揭你主任！但我装作不知，李春生更不用说了。主任见我们啥也不知道，就说，张云生这小子很鬼，你们要在今后注意他一点。我现在是想先稳住他；他的工作，准备交给李文普。你们要和老李好好合作！……”

“你这是向谁报告呢？”我打趣问。

“呀！我泄密了！”

我们几个都哈哈大笑。

鉴于叶群向李春生散布了谎言，既掩盖自己丑行，又对我进行中伤，我和于运深、李文普商定：把真相告诉李春生，以免他受骗。李春生听后气愤地说：“主任真不是好东西！”

此后不久，我又把叶群的丑行全部告诉了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张益民和在毛家湾帮助工作的赵根生、阳地。大家都对叶群切齿痛恨。这样一来，在毛家湾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勤杂人员除外），都在抵制叶群方面抱成了一团。叶群自命高明，不可一世，但现在成了“瞎子”（什么真相也看不到）、“聋子”（什么真情也听不到）；她欲摆弄别人，摆弄一切，反而被几个无名小辈摆弄了！

毛家湾表面上的平静，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9. “好离好散”

为了维持门面，叶群让我继续抓“支部”工作。为了稳住我，她极力设法不使我对她产生反感，因而一再重申：她对说过的那些“好话”绝不收回。但我的想法是，不能在虎口求生，最好尽早离开，要努力争取创造离开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似乎已经在望了。

意外顺利的是，这种条件的出现比我预料的还要早。

就在叶群那场丑戏暂时收场的不几天，叶群找我商量，她现在想把小罗调离毛家湾。理由是：××的妻子小刘与××出的那种事，怕一旦泄露出去，对毛家湾这个红旗支部的名声不好，也还怕××的一家和××的一家为此闹出新的问题。

“这样不好。”我说，“在×××的问题上，××和小刘是原告，原告还没最后处理，先把被告调开，这不公平，后果也不会好。”

“如果不调开小罗，××的事能保住密吗？”叶群对于捂住毛家湾的丑盖子非常用心。她曾布置过：有关××的事，绝不能传到毛家湾以外去，也不准传到××的耳里，以防发生“意外”。而××已经不在，他的家还住在毛家湾。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使叶群心神不安。她已经感受到毛家湾内乱所造成的被动，还能受得住再乱一次吗？

“很难保密。”我抓住叶群怕乱的心理，有意搞点火上加油：“迟早要露出去。”

“再下一道命令，谁也不准透露！”叶群又摆出她那霸道的神气：“谁透露出去，我拿他是问！”

“下这种命令，可以约束工作人员，但约束不了他们的家属。”我又一次故意给叶群出难题。

“谁的家属谁负责。”叶群说：“再说，工作人员不透露，家属怎么会知道？”

“我的家属孙志杰知道！”

“孙志杰怎么会知道？”

“那天晚上小刘找张益民和我反映问题，在走廊里哭哭啼啼，孙志杰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她比哪家的家属知道得更清楚！”

“孙志杰是你的家属，你可以包下来做工作嘛！”

“我包不下来！”我说。“我约束不了孙志杰。她的个性很强，最近和我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我说什么，她根本不会听。做孙志杰的工作，除非主任亲自找她谈谈！”我故意把孙志杰说得难以约束，并且把球踢给叶群，用意是为我的下一步打算作准备。此时，孙志杰也成了我对付叶群的一张牌了。

“我不能找孙志杰谈；你的话她都不听，她能听我的吗？”叶群对孙志杰也毫无办法了。这在以前，她靠权势，压住100个孙志杰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今已不成。她在我面前出了丑，很可能怀疑我已向孙志杰透露（其实我对自己的家属还在守口如瓶）。叶群早就听说孙志杰的个性倔强，如果她知道她叶群是这种下流货，不用说做什么工作也不会有效，不当面再给叶群点难看才怪呢。叶群又一次被我难住，说：“那可怎么办呢？”

“我倒有个好办法，就怕主任没有决心采纳。”我乘机又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不过这一次是为了帮助叶群“解围”。

“什么好办法？快说！”

“同时调走几个人，问题就解决了。”我提出同时“调走罗某，也调走我和张益民。”

“这不是办法。”叶群立即表示拒绝。“一下子调走你们三个，毛家湾减员一半，那不乱了吗？”

“乱不了，”我说。我得设法说服叶群：“同时调走我们三个，只会减少矛盾，不会增加矛盾。单独调开小罗，他和小刘都可能闹起来；同时调走我和张益民，他就说不出什么了。调走我，我人走家搬，也就不担心孙志杰的工作没人做了。调走我，又调走张益民，这显出是正常调动，不会引起外界怀疑。……”

我出的这个主意，对叶群有所吸引，她原想只动小罗，被我一发难，又缩手了。她暂时不愿放我走，本来是想便于对我的控制，但看来我多呆一天，也多一天她的难堪。她早已对张益民不信任，因此才经常派他外出打“零差”；如得机会调走张益民，她是巴不得的。

“有什么理由调走张益民呢？”叶群假意地问。

“他的身体多病，坚持不了夜班工作。”

“这样动的面太大，”叶群还在犹豫：“我难以下决心。我和首长商量一下吧！不管怎么样，老张，你帮我们把这个门面维持好，我们会感激你的。我们尽量好离好散吧！”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这一新的发展告诉给李文普、于运深和李春生。他们一开始都埋怨我多出此主意，但经我说明利弊，大家也都想通了。我希望他们在叶群面前帮助吹些“冷风”，促使这个主意能够实现。没有他们的配合和保护，我想从毛家湾顺利而安全地脱身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几天，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终于下了决心：同

时调走我、张益民和小罗；对内对外都讲这是“正常调动”，谁也不要有什么“感觉”。我走后所造成的林办支部书记空缺，暂时由已经调出三年多的阳地回来填补。林彪、叶群并不喜欢阳地，但架不住李文普、于运深、李春生一齐“吹风”，叶群也就只好屈从了。

还在外地的张益民，很快被召回北京。叶群让我做他的工作，以防他对这次调动突然而不满于自己。其实我最了解张益民，他也是早就“心不在魏”了。

为了安抚我们，并且为了显出我们是“正常调动”的样子，在我们离开毛家湾前，林彪、叶群要最后接见一下我们三个以及我们的家属。这是不小的“关怀”。张益民、小罗夫妇都应召到场，唯独我的爱人孙志杰不肯“赏脸”。并不是由于她有多么高的觉悟，也不是由于我在她面前吹了什么风，而是由于她在毛家湾住了几年，对这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没什么好感。一般人对待“大人物”容易产生的那种盲目崇拜，在她身上是找不到的；一般人怕因失礼而遇到某些不幸的那种恐惧心里，她也是不存在的。她见识不多，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对于林彪、叶群的接见，她同样不领情。如果是我，即或心怀不满，也还要在大面上应付一下，以免自找麻烦；但她不然，只要是不顺心，谁也不能把她不愿做的事强加于她，至于什么后果、影响、礼貌之类都不在话下。这是一种执拗和无知的表现。但她的这一特点，也有时引起我的格外尊敬；在某种条件下，执拗和无知是一种缺陷，但也可能成为一种美德。

对于林彪、叶群的最后接见，孙志杰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拒不参加。我动员几次，仍不见效。这种情况，不但我，就连李文普、于运深也都忧虑起来了。

“还是得动员孙志杰参加，不然后果不好。”李文普对我说。“主任这样安排，是为了作作姿态；你不服从她，她会上纲上线的。人快走了，还担这个风险干什么呢！”

尽管如此，孙志杰还是按兵未动。工作人员们都为我和孙志杰捏一把汗，在最后一刹那，这不会惹翻叶群吗？

结果却是太平无事。叶群问：“孙志杰为什么没来呢？”我说：“她身体不好，来不了。”叶群当即高兴地说：“让她好好休息吧！”我忽然明白了，叶群这时最担心的是孙志杰露面。孙志杰如果到场，说不定在林彪面前和叶群撕破脸，那不更坏了吗？

1970年11月17日，我带着我的全家离开了毛家湾，回沈阳军区工作。在汽车从毛家湾开始开动时，我惘惘望望为我送别的那些熟悉的人们。不知怎么，我的眼窝顿时湿润了，思绪万千，难以抑制。……

后 记

本书在酝酿、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过不少朋友的帮助和指教，在此谨表谢意。有些修改意见很重要，但由于我获知稍晚，难于完全采纳，只能留待以后设法补救。

本书手稿的第一批读者，曾向我提出一些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也是以后的读者所关心的，因此特以问答的形式略加整理，附在本书末尾。

作 者

1988年5月13日于北京

问：你写这篇回忆录，是否受人指使，或者受到某种压力？

答：不是。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向我施加什么压力。写这篇回忆录，完全是出于我的主动。

问：你为什么要写它呢？

答：我是受一种责任感所驱使。政治生活的封闭，会造成扭曲历史的恶果，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我由于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四年有余，这段时间内又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自然也就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然而我发现，业已公诸于世的有关林彪、叶群以及那段历史的材料，虽然有不少是真实可信的，但也确有相当数量的望风扑影或

肆意编造之作。因此，我感到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是我以及一切知情人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所记述的那段历史是不幸的，人们应当谨记：绝不能让它重演。

问：不久以前，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实文学《毛家湾的女主人》，副题特意标明是“一位秘书的琐忆”。看了你的回忆录，有些内容似乎与那篇纪实文学雷同。这是怎么回事？

答：《毛家湾的女主人》主要取材于我的回忆录（原名《毛家湾见闻录》）；所谓“一位秘书的回忆”，大概是指我。可是，我事前对此毫无所知，该文作者也未征得我的同意。两位署名作者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位在两年前曾与我有过接触。我们当时想合作写点文学性的作品，我于是让他看了我的回忆录手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合作中止。我曾向他表示，我所提供的素材，可以供他进行文学创作时参用，但涉及真人真事时务须慎重。可是万万料想不到，两年后他竟用当事人“回忆”的形式，把我回忆录的部分内容抛了出去。有些地方，他们几乎是大段大段地抄引回忆录；有些地方，他们又肆意添枝加叶，以致造成多处严重失真。他们的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的愤慨。但考虑到他们的年纪还轻，只要吸取教训，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因此我除了要求他们公开道歉之外，不愿再作深究。

问：你写的人和事，全是真的吗？是否有虚构？

答：我写的是自己在林办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有些就是切身的经历，这里没有任何虚构。

问：就凭你的回忆录，能把所涉及的历史真相说清楚吗？

答：这绝不可能。我只是林办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所

知十分有限。就林办内部来说，知情人还有不少；就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来说，知情人就更多。如果大家都能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所知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写出来，那事情的全貌就清楚了。

问：知情人不只你一位，如果别的知情人对你写的东西提出异议，那该怎么办？

答：这里的关键是事实本身。如果我只说明了事情的一面，而别的知情人说明了事情的另一面，这就有助于把事情的全貌说清楚。如果我说的不准确或者说错了，别人根据事实加以指正，这是好事。如果事实本身并没有弄错，只是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因而在认识上产生差异，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

问：你的书名叫《毛家湾纪实》，而你写的许多事都涉及到“文化大革命”，这会不会给人以“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根子都在毛家湾的感觉？

答：对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和责任，中央早有结论。我写《毛家湾纪实》，是因为我当时工作的地址在毛家湾——林彪、叶群的住地，林、叶当时的活动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而我又是“纪实”，所以就把两者牵涉到一起了，这里没有别的意思，不应引起错觉。

问：你在回忆录中写有关叶群的事很多，好象叶群的许多活动都是背着林彪的，是这样吗？

答：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秘书。我和叶群在工作上的接触多，自然在回忆录中涉及她的事就多。叶群的许多活动都是背着林彪的，但打的却是林彪的旗号。这样的例子，我在回忆录中列举不少，如果让我详尽揭露，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说叶群的一切活动都是背着林彪的，也不是

那么回事。只是叶群爱说假话，林彪从叶群口里知道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如实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的，实在难说。

问：既然这样，林办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及时揭露？

答：在当时的条件下，谁敢？叶群常吓唬说，谁反对她叶群，就是反对林彪；谁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当时又有个“公安六条”悬在头上，谁甘愿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毛家湾内，只有勇敢的林豆豆是个例外，她曾经几次向林彪耳边吹风，揭露叶群，但结果却是引火烧身，反过来又几次被叶群整得死去活来。

问：你为什么那样恨叶群？

我对叶群，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憎恶。叶群与我并无个人恩怨；在林办秘书中，我在叶群眼中也许还是比较受到器重的一位。但我觉得她的所作所为，与我多年所受到的教诲不相符合，与我所崇尚的人品也格格不入。憎恶叶群的不只我一个人，在林办时间较长的工作人员几乎人人如此。

问：现在怎样来看叶群？

答：依我看，叶群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人物，从她身上有很多教训值得汲取。她既是那场历史性的大骗局的参与者，也是那场大骗局的牺牲品。但叶群也不是一无是处。她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固然十分霸道；但比起江青来，她还是好一些。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大多被整得很苦，但林办的工作人员大多还能落得个“好离好散”。

问：看你写的，林彪好象并不如“9·13事件”后人们传说的那样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我在林办工作，起自1966年8月——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之后，止在1970年11月——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不久。在这段时间内，我发现林彪并不如我

以前从传闻中听说的那样“神”，并曾对他的病弱身体以及他甘受叶群摆布而感到不解和忧虑。但是说老实话，我当时在他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如果知道他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卖国贼”，我一天也不干。至于联系后来发生的“9·13事件”，应当怎样正确、全面地评价林彪，我相信历史会有公论。